

世界现代化历程

总论卷

本卷主编 钱乘旦
本卷作者 刘 成 刘金源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目 录

第一部分 现代化的理论回顾

第一章 现代化的概念

第一节 经济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第二节 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第三节 社会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第四节 心理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第五节 历史学视野中的现代化

第二章 国外研究状况

第一节 50年代的研究状况

第二节 60年代的研究状况

第三节 70年代及其后的研究状况

第三章 国内研究状况

第一节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第二节 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三节 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研究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节 市民社会与现代化的起动力

第三节 殖民主义与非欧洲国家现代化

第五章 原初现代化理论

第一节 涂尔干：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第二节 滕尼斯：从共同体到社会

第三节 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第六章 经典现代化理论

第一节 经济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第二节 政治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第三节 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第四节 心理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第五节 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第七章 从现代化修正理论到世界体系论

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第二节 依附论的兴起

第三节 世界体系论

第八章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节 后工业社会理论

第二节 新发展观

第三节 生态现代化理论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第二部分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 资本主义形成前的世界格局

第一节 四大文化圈

第二节 中世纪西欧的几个特点

第三节 世界各文化圈比较

第二章 现代化在西欧的酝酿

第一节 人的解放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三节 地理大发现与商业精神的形成

第三章 现代化在西欧启动

第一节 启动的三个条件

第二节 政治现代化在西欧拉开帷幕

第三节 早期工业化

第四节 早期进入现代化的其它国家

第五节 争霸与战争

第四章 现代化在欧美的发展

第一节 现代思想在西欧的扩散

第二节 现代化在西欧的延续

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形成

第四节 西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

第五章 现代化在全球扩张

- 第一节 俄国与东欧的现代化
- 第二节 西方移民殖民地的现代化
- 第三节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 第四节 亚非国家的现代化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与“后现代”

- 第一节 危机和战争笼罩下的欧美世界
- 第二节 战后欧洲的变化与全球化
- 第三节 发达国家的“后现代”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专题讨论

第一章 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

- 第一节 “世界史”的含义
- 第二节 “世界史”的体系
- 第三节 苏联体系
- 第四节 构建新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

第二章 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格局问题

- 第一节 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发展
- 第二节 中古西欧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的发生
- 第三节 共性与特殊性

第三章 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

- 第一节 问题再次提出
- 第二节 古典时期的“民族”
- 第三节 中古时期的“民族”
- 第四节 “民族”与“国家”吻合
- 第五节 期待与展望

第四章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

- 第一节 政治稳定与发展
- 第二节 现代化启动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
- 第三节 现代化推进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
- 第四节 政治结构需适应社会变化

第五章 “反现代化”现象的理论假设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个案探讨

第六章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第一节 早期重商主义时期

第二节 鼎盛重商主义时期

第三节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第四节 危险的选择：军国主义道路

第五节 当代资本主义集大成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现代化的理论回顾

第一章 现代化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现代化研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心理学、历史学（综合学派）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涉足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一大批开创性研究成果纷纷涌现，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现代化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化这一问题，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现代化的概念这一问题又非常重要，它是所有现代化研究赖以立足的基础。为此，在涉足现代化研究之前，非常有必要对现代化的概念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

第一节 经济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现代化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变化莫过于经济领域内的变革，经济学家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现代化的概念给予诠释。在这方面，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当数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刘易斯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与落后的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即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与弱小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对立，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限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传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建成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由英美等发达的中心国家开始，经过工业化得以实现，而处于边缘国家的现代化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模仿中心国的工业化，或通过与中心国的经济联系为工业化创造条件。¹ 这样看来，刘易斯眼中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仿效对象、全面推行工业化进而实现“西化”的过程。

与刘易斯相比，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则更进了一步。罗斯托超越了单线型的生产方式理论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经

¹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济成长的阶段论。罗斯托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传统社会阶段”；第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即起飞前的准备阶段；第三是“起飞阶段”，第四是“趋向成熟阶段”，第五是“大众高消费阶段”。罗斯托据此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具备有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社会，而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就是“起飞阶段”。“起飞”完成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社会开始向现代过渡，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² 由此看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抽去了社会形态的性质，但显然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为考察原本的，在这方面他与刘易斯同出一辙。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工业化必然造成人类使用的能源结构的变化，美国学者列维（Levy）由此从这一视角对现代化的概念加以说明。列维指出：“我的现代化定义的关键，在于使用无生命能源和使用工具来增加努力的效果。……认定一个社会是较高现代化还是较低现代化，根据的是该社会成员使用无生命能源和（或）使用工具来增加他们努力效果的程度。在任何社会中，这两种成分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缺失或完全存在。”³ 列维后来在谈到现代化的标准时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当然，即使比率非常之低，一个社会也绝不可能缺乏两种能源中的任何一种。同时，无论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如何高，也不可能完全不使用生物能源。就最低限度地说，无论多么经济地使用能源，做决策总是要运用人脑能源，除非达到机器主宰一切的地步。”⁴

第二节 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造成的变迁并不限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变革也不可忽视，一些学者由此从政治学视角来涉足现代化。比较政治学之父阿尔蒙德（Almond）认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在《发展区域中的政治》一书中的前言中，阿尔蒙

² 详见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³ M. 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04 页。

⁴ M. 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9 页。

德等人明确提出，应按照政治结构分化与政治结构功能专门化程度，以及在政治文化中现代风格所占的优势等标准来给政治现代性下定义。什么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呢？阿尔蒙德等人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指出，政治结构的分化，就是“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⁵阿尔蒙德认为，在西方制度中，每一种结构都有一种专门的功能控制和调解着其他结构功能的发挥，而传统的、特殊的、颂扬式的、带着感情色彩的传播风格已广泛地被专门化、普遍化、成就化以及中性情感的合理风格所渗透。⁶

这就是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后来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一项发展研究》一书中，阿尔蒙德进一步从政治系统功能的分化与加强来阐述政治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在阿尔蒙德等人看来，政治系统有着五个方面的能力，即提取（extractive）能力、调整（regulative）能力、分配（distributive）能力、象征（symbolic）能力与回应（responsive）能力，这些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系统的分化而不断加强，由此造成政治形式的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增长。⁷这样一来，阿尔蒙德与鲍威尔眼中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的这五种能力不断加强的过程。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于后来涉足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有一批政治学家投入到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研究之中。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格斯(Fred Riggs)在批判地吸取阿尔蒙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里格斯从政治系统中特别分离出这四个基本概念——行政部门、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并在给它们下专门定义的基础上，使它们配成几种基本的政体，分别是：1. 无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2. 有行政机关，但无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3. 有行政机关和官僚政治，但无立法和党派的体制；4. 有行政机关、官僚政治和立法，但无党派的体制；5.

⁵ 阿尔蒙德、鲍威尔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⁶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⁷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有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显然，在里格斯看来，政治发展或者说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政治系统的这四个组成部分的健全程度，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都健全的体制，无疑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政体，也就是最为现代化的社会。⁸

第三节 社会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变革，必然会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社会学家在探讨现代化时，着重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并且对这些变化划定出许多标准，力图使之模式化。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美国社会学在整个西方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开创的系统—功能理论曾风靡一时，并在研究现代化时被社会学家们广泛使用。在帕森斯看来，人类社会的演变可以分为原始阶段、中间阶段与现代阶段，西欧从17世纪开始朝着民主与工业化发展时，现代化社会就产生了，而且现代化是一个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扩展的普遍进程。帕森斯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整个社会趋向于分化为子系统（社会结构）”⁹、社会总体适应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因为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是为了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那么，当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势在必行。决定社会结构的四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政体子系统、统一子系统、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向着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方向运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增长、分化、容纳和价值概括化，由此造成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对后来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帕森斯的理论。斯梅尔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总结与发展帕森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斯梅尔瑟(Smelsh)看来，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结构分化可以更正式地定义为一个社会角色或组织分化成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的过程，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会更

⁸ 转引自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⁹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有效率。新的社会单位在结构上互不相同，但合在一起其作用等同于原来单位的作用。”¹⁰ 这种结构分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社会领域：经济活动的分化，从家庭手工业逐渐向相对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变；家庭活动的分化，“经济活动从亲缘联系或家庭单位中转移出来，这一事实意味着家庭丧失了一些它原先具有的功能，变为更加专门化的单位。”价值体系的分化，统治经济、政治、科学等领域的价值观不再是宗教信仰，而是自主的理性认可；社会分层体制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除了世袭性的先赋资格外，其他一些评价标准也成为分层的标准；通过在职业等级序列中的变动而发生的个人流动增多。”¹¹

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则借鉴了帕森斯的系统一功能论，来概括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艾森斯塔德看来，从微观上看，现代化是“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个人所有的不同任务——特别是职业和政治中的任务以及他们与家庭和亲缘关系之间的任务——发生了分离”。¹² 从宏观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各个领域内的结构变迁，主要有：社会动员与社会分化，社会动员程度不断提高，在主要领域内的角色分化与专门化得到加强；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在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组织体系；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而意义模糊的身份系统。”¹³ 在政治与教育领域内，广大群众被纳入中心领域，形成一种“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中心领域的趋势。”最后就是基本的大众谐同取向，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帕森斯的理论，对其他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詹姆斯·奥康内尔（James O'Connell）就是其中之一。在奥康内尔看来，“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名词用以指称

¹⁰ 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48—149 页。

¹¹ 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1—175 页。

¹²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普兰迪斯—霍尔出版公司 1966 年版，第 2 页。

¹³ S.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74 页。

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这个名词就是现代化。”¹⁴ 奥康内尔特别注重研究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中发生的变化，并强调现代化的三个方面具有普遍性：（1）对事务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维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和创造性的知识探索——换言之，便具有分析因果关系式的观念和创造发明的观念；（2）产生于第一种观念并加以促进的工具和技术的大量增加；（3）在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接受不断变化的愿望，与此同时又具有保留个人和社会特色的能力。¹⁵ 奥康内尔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包含的各种成份在有效功能的意义上是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需要所有其他成份也起有效的作用。这些成份在它们只有通过个别的人类活动才能产生作用的意义上说，是行为的。它们形成一个系统，意味着每个成份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都将与所有其他成份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有联系。”¹⁶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定义“现代化”概念时，特意将其与“产业化”进行了区分。富永健一认为，所谓产业化，就是指从产业革命开始一直不断地进行到今天的、使人类的生活形态同以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技术上经济上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把现代化理解为将产业化作为一部分包含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概念”。在富永健一看来，现代化至少“包含着政治侧面和社会文化侧面这两个方面，若把这两个方面再加以细分，那么政治侧面又包括法和政治。现代法的确立，现代国民（民族）国家的形成，摆脱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之形成等等，就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现代化；而社会文化的参面，正如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包括社会和文化。父权家长制的

¹⁴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载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20 页。

¹⁵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载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 页。

¹⁶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载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 页。

解体与核心家庭化，功能群体（组织）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和城市化，公共教育的普及，科学革命、合理主义精神的形成等等，则反映这一领域的现代化。这些项目都可以看作是摆脱各自领域的传统主义的过程，因而又可以将它们总结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¹⁷

第四节 心理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的学者从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方面对现代化进行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莱兰 (McClelland) 就把人们对业绩的追求看作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在麦克莱兰看来，在一个社会中，业绩水平是用有多少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这种术语来说明的：在传统文化中，则缺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家个人的高度进取精神可以打破各种经济上的束缚。为此，“业绩卓著的人将使他们找到通往经济成功之路，给他带来各种机遇并使他获得社会升迁。……这就使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不仅仅集中在历史的表面现象上，而是去注意那些决定历史事变的始终起作用的内在心理因素”。¹⁸

美国学者丹尼尔·莱勒 (Daniel Lerner) 在现代化研究中也突出了心理、思想因素的重要性。莱勒在认可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征。在莱勒看来，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参与型社会，它通过世袭的办法把人们安排在各个彼此隔绝和偏僻的社区中，它缺少使人们相互依存的纽带，人们的视野被局限在一个地方。”莱勒认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越是表现出情感移入性，它就越可能成为现代型社会。在此基础上，莱勒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某些明显特质的进程，这种明显的特质足以解释，为什么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确能感受到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它们是如此地密切相联，以致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算得上彼此独立的因素，换言之，它们所以携手并进且

¹⁷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 页。

¹⁸ D. C. 麦克莱兰：《业绩社会》(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纽约 1961 年版，第 105 页。

如此有规律，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实现。”¹⁹

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Inkeles)教授，也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在他看来，所谓“现代的”，不应该被理解成为一种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状态。基于此，英克尔斯提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这一著名观点，这是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²⁰ 在确立了“人的现代化”最为关键这一前提后，英克尔斯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并由此而勾勒出现代人 12 个方面的特征：“一、现代人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二、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三、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四、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五、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六、计划；七、知识；八、可依赖性和信任感；九、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十、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十一、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十二、了解生产及过程。”²¹

第五节 历史学视野中的现代化

客观地说，上面所提到的学者对于现代化的解释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由于他们都是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对现代化进行探讨，因而对现代化的理解都有一定的片面

¹⁹ 丹尼尔·莱勒：《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纽约 1964 年版，第 438 页。

²⁰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 页。

²¹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33 页。

性。这些学者往往强调现代化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打个比方说，这就有点雷同于“盲人摸象”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尽管学者们都认同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但这种转变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或价值观念等某一方面的变动，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的概念，它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变动，不但包括工业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变化。不少学者，尤其是历史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力图从一种综合的视角来界定现代化，由此而形成现代化研究中的综合学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教授，是现代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布莱克就对现代化进行过这样的界定：“‘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的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过能的过程。这种适应过程发源于西欧一些国家并开始产生影响，在 19、20 世纪，这些变革延伸到所有其他国家，并导致了一场影响各种人际关系的世界性转变。”²²

布莱克特别强调指出：“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合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70 年代中期，布莱克在论及现代化时，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代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扩增过程。……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有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

²²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 页。

现代化了。”²³

印度孟买大学的德赛教授也倾向于从一种宏观的综合的视角来认识现代化。德赛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若与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西方化或欧洲化等相比，现代化表达了一种更复杂的过程，并且表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形式的同样复杂的产物。……这个过程不仅局限于社会实体的某个领域，还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基本方面。²⁴ 具体来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即现代化表现为新知，它可能探求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即现代化造成了家庭结构、制度结构等各方面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政治变化，即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认可，政治权力广泛分布到各社会群体，现代民主或半民主政府的形成等；经济变化，主要表现为现代产业经济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经济；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即新文化观开始出现，新的人格定向、品质和特征开始形成等。²⁵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对现代化概念的总结与探讨颇具代表性。“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²⁶ 从心理层面看，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从智能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到人类对自身环境所具有的知识巨大扩展，并通过日益增长的文化标准、大众媒介及教育等手段将这种知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从社会角度来看，现代化一般会将它们和那些自觉组织起来并具特殊功能的高一级社团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和其他最基层组织的生活获得新的补充；从政治方面看，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通过这种动员，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其次表现为新的政治职能的划分并

²³ C. 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8—19 页。

²⁴ A. R. 德赛：《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载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4 页。

²⁵ A. R. 德赛：《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载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4—137 页。

²⁶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0 页。

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²⁷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还特别概括出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的现代化进程所包含的九种特征：第一、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必然涉及人类生活方式根本的和整体的变化，这种变大的规模之大，恐怕“只有一万年以前游牧民族向定居农民的转变才可与之比拟”。第二、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方面，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第三、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现代化的各种因素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第四、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十五、六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第五、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从传统社会中发生的变化来看，现代化确实是革命的过程，但从这些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来看，现代化又是进化的过程。第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进行现代化的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的水平或阶段，它显然是从传统阶段开始，以现代阶段告终。第七、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现代化在社会之间产生了集中的趋势，现代化意味着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趋向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各个社会趋向于最终结合的运动。第八、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基本上是个长期的趋向。第九、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冲击很多，也很深刻，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²⁸ 客观而言，亨廷顿所总结的九大特征，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较完备的总结和描述。

²⁷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2页。

²⁸ 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C.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7页。

第二章 国外研究状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兴起，并很快波及整个世界，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学术研究来源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现代化研究这一全新学科的诞生，从根本上而言，就是战后世界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在学术界的反映。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新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50年代的研究状况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 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即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当时的主编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茨（B. F. Hoselitz）。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先行一步，开始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54年，阿瑟·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期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因此荣获197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打破二元经济模型的过程，即扩大现代资本主义部分、缩小传统的农业部门的过程。²⁹ 由此看来，刘易斯给发展中国家设计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仿效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这在刘易斯看来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显然，这种发展的归宿就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

尽管刘易斯率先从发展经济学领域涉足现代化研究，不过，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斯托。罗斯托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先后在哥伦比

²⁹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讲学或任教，并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1959年，罗斯托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影响力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这部书中，罗斯托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经济理论完全相反的全新经济理论，并以此来概括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高频消费阶段。到了1971年，罗斯托认为高频消费阶段已经不能概括当时欧美社会的新特征，因此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既不是社会发展的循环论，也不是跳跃式的突进论，而是沿着其进程而依次递进的。罗斯托的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以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蓝本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除了发展经济学领域以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社会变迁问题，由此不得不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创立的系统一功能理论，以及其后继者运用该理论对现代化进行的研究。帕森斯从1931年起一直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曾长期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帕森斯一生著作宏富，早在1937年，他就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对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杜尔凯姆）、马克斯·韦伯这四位学者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这四个人的著述中“出现了一个单一的、基本上自成一体的理论运动”，³⁰ 从而为日后系统一功能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随后，帕森斯出版的著作包括《社会系统》（1951）、《社会学论文集》（1954）、《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60）等论著。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帕森斯提出了系统一功能理论，并且把系统一功能主义发展成为对20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思想运动。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功能的分化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最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帕森斯还提出了测定现代化的一些关键性变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五组模式变项：1、特殊性与普遍性；2、广泛性与转移性；3、品质与行为；4、易感性与

³⁰ T.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平装本序”，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冷漠性；5、自我倾向性与集体倾向性。³¹ 这些变项被帕森斯用来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具体到发展中国家，帕森斯认为，这些国家没能现代化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社会结构尚未达到一定分化程度的阶段，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社会制度。

第二节 60 年代的研究状况

如果说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话，那么，到了 60 年代，其他学术领域也纷纷涉足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研究由此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经济学方面，库兹涅茨在 1965 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一书特别值得一提。在书中，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源限制上的差别：一、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期；二、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的土地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三、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四、在今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要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而且这种不平等并不有利于资本积累；五、今天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阻碍发展的程度要比发达国家现代化时的情况更为严重；六、目前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发展以前，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殖民地时期，相反，欧洲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早就是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了。³²

在社会学领域，列维完成了《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等著作。列维非常关注现代化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三个主体章节来分析这种差异，即 1) 社会系统的各层面；2) 社会的组织关系；3) 共同要素、各种变项、问题焦点。列维在此将各社会的普遍要素和特殊要素作了区分，并讨论了现代化对稳定性的影响问题。在《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这本小册子中，列维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惟一普遍的出路，任何民族都没有理由怀疑它应不应该走这条路；在世

³¹ T. 帕森斯：《模式变项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62—85 页。

³² 孙立平：《现代化研究：理论与批判》，<http://upcpa1.blogchina.com/upcpa1/5707915.html>。

界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先行者”与“后来者”之分，尽管走先行者的现代化道路是必然选择，但后来者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不可忽视。

艾森斯塔德在 60 年代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出版，如《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5)、《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比较制度论集》(1965)、《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层面论集》(1961)。其中，《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作者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变迁的制度结构。艾森斯塔德指出，就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而言，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在所有的主要制度领域，这种角色分化和专门化的最重要方面可能就是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分析，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就身份系统与组织系统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造就了一种模糊的身份系统的形成；在组织系统方面，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确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赋—团结性的群体的重要性也在降低。³³

在 60 年代的政治学领域，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有着比较政治学之父之称的阿尔蒙德在研究政治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阿尔蒙德等出版的著作包括：《发展中区域的政治》(1960)、《比较政治：一项发展研究》(1966)、《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等。在借鉴了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以及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后，阿尔蒙德尝试着用行为主义理论来解释政治发展。阿尔蒙德提出用政治系统、功能、角色等新的概念术语代替国家、权力、职位等传统的政治学术语，他认为政治系统由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组成，如选民、利益集团、立法机关、官僚机构等，它依靠合法的强制力量支持，并与国内和国际环境持续发生相互作用；各政治结构又由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结构和角色这些术语是为了强调参与者的实际作为。通过比较不同政

³³ S.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71 页。

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阿尔蒙德提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具体来说，政治体系的专门的正规的结构创出了现代民主国家，其重要特点就是它具备高度的结构的分疏化，每一个政治结构都有其重要功能；而传统的政治体系则不具有这种高度的结构分化，它是混沌一片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依据政治功能的需要从传统的政治结构种分疏出来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³⁴

继阿尔蒙德之后，在政治学方面，还涌现了一批相当重要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中颇负盛名的有阿普特（Apter），其代表作《现代化的政治学》（1965）一书，这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不现代化社会”二者的区别，他更加关心的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促进变革的因素，作者分析的主要范畴包括完美价值与工具价值；等级式、金字塔式、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协调派和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³⁵ 值得关注的还有西尔斯（Shills）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二期的《新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文。作者认为，现代化过程首先要由传统体制来推动，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传统体制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就会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这些政治形式包括：民主政治、监护民主、现代化的寡头政治、极权式的寡头政治以及传统的寡头政治。³⁶ 他认为，虽然这些政治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都有由此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巴林顿·摩尔于1966年出版《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该书以世界现代化的政治演进道路为主线，梳理出世界各国三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这就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与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摩尔认为，这三条历史轨道不仅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摩尔的理论创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

³⁴ 岳世洲：《评阿尔蒙德的“政治结构分化”理论》，《理论学习月刊》1994年第3—4期。

³⁵ 转引自C.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266页。

³⁶ 转引自C.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

的变异与转换决定了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的三中不同类型的历史路线；第二、民主的观念不能泛化，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第三、暴力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民主进程的历史中，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³⁷ 摩尔对西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哈佛大学教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塞缪尔·亨廷顿在 1968 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针对二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在这部书中，亨廷顿首先列出几个事实：其一、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的重大差别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第二、新兴国家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但政治上却出现“衰朽”；第三、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针对这些事实，亨廷顿提出了强大政府论，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为此，这些新兴国家必须树立强大的政府，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互谅，而在于力量。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将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传统的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³⁸ 亨廷顿的强大政府理论的提出，与早期的各种政治现代化理论相比，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至今仍然是美国乃至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必读之作。

在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探究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人文心理学角度来研究现代化，这方面的扛鼎之作是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教授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一书。1962—1964 年，以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教授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受哈佛大学资助，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六个国家，走访了 6000 人，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调查，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人

³⁷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 页。

³⁸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6 页。

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英克尔斯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统计指数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为此，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现代性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就是严重的错误。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大大拓宽了现代化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后人从文化心理角度研究现代化提供了榜样。

从这一视角来研究现代化的绝非英克尔斯一人，戴维·麦克莱兰以及丹尼尔·莱勒等都在其著作中探讨了文化、心理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1961年，麦克莱兰出版《业绩社会》一书，把追求业绩看成是发展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丹尼尔·莱勒于1964年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以思想和心理因素为主线来解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莱勒确信，传统社会将通过吸收来自世界先进部分的文化而使自己向着现代社会前进。³⁹ 不过，麦克莱兰关于现代人成功欲望的描述特别值得关注。麦克莱兰认为，取得成功的欲望是人格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欲望的驱动力来自于价值观、信念、意识形态，这些是一个国家对成功强烈关注的真正重要源泉。麦克莱兰认为成功的欲望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成功关注水平较高的社会将会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是他们推动了更迅速的经济发展。”⁴⁰ 通过对相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麦克莱兰指出：“不同国家的n值（“成功关注”的水平）和随后的经济增长速率比较，都惊人地证实了历史研究的发现。1925年左右的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随后的经济发展也越快（22个国家中相关系数为0.53）；而且，在1950年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该国在1952—1958年间经济增长也越快。”⁴¹ 客观而言，麦克莱兰的分析虽然有利于人们重视心理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但他对于心理动机的过分关注，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的行为的角度来勘查现代化问题。迪奇（Deutsh）在1963年

³⁹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⁴⁰ D. C. 麦克莱兰：《业绩社会》（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纽约1961年版，第205页。

⁴¹ D. 麦克莱兰：《商业动机和国家成就》，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2页。

出版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交往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用控制论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来说明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政府如何实现对于保持一种有活力的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张力控制。哈根（Hagan）在1962年出版的《评社会变革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中，首先集中注意心态的变革，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在传统的社会中领袖把握经济机会潜能的能力是以这种心态变革为基础的。派伊（Pye）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人格和国家建设》一书，则生动地描述了领袖人物在离开相对稳定的传统生活方式之后发生的认同问题，以及他们一旦与其追随者取得有机联系之后寻求创造新的认同方式。⁴²

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历史学领域的学者试图对早期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布莱克教授。布莱克主编或撰写了《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比较现代化》（1976）。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布莱克对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1. 英国、法国；2.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 西欧、北欧、东欧；4. 拉美；5. 苏联、日本、中国；6. 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 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⁴³ 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

不过，历史学领域现代化研究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发挥历史学的专长，对各国现代化的个案所进行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日本、中国、土耳其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问题关注起来，而日本是学者们始终关注的研究对象。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日本史专家、后来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在探讨日本现代化方面贡献卓著。早在1957年，赖肖尔曾发表题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亚洲政策》的文章，认为“尽管人口过剩和缺少天然的资源，但日本自19世纪以来仍然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世界强国。”赖肖尔在将中日两国历史进行比较后，认为日本具

⁴²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0页。

⁴³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75页。

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使得其能够采取西方的模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⁴⁴

许多学者在研究日本现代化时，还把日本同中国、土耳其、俄国等进行比较。普林斯顿大学的詹森（Jasen）1965年出版《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一书，1969年又出版《对现代日本早期制度史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鲁斯托（Rustow）在1964年与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合作，出版《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该书对日本与土耳其两国的传统体制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传统体制对于两国今天的发展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1963年第4期发表了罗伯特·沃德的论文《日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豪特与约翰·特纳在《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一书中，以日本、中国、英国、法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国家从早期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了规模宏大的《日本现代化研究》系列丛书，这标志着美国学术界对日本现代化研究进入高潮。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分别在1960年和1970年各出版一套专门研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丛书。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的几位东亚问题专家赖肖尔、费正清、以及后来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都是现代化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1965年合作出版了一本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书：《东亚：伟大的转变》，力图表明中国、日本及其邻国的现代化是在传统领域里发生的，并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一个彻底的现代化了的东亚在其表层文化范型上或在其深层理念和价值上只是现代化的西方的反映。⁴⁵

作为欧洲的一个部分，俄国（苏联）的现代化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冷战的开始，使得美国学术界也加紧了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研究。在这方面，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布莱克编著的《俄国的社会转变：1861年以来社会变革的各层面》出版，该书的38个撰稿者力图弄清俄国自

⁴⁴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⁴⁵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农奴制解体以来整个历史发展中延续的因素和变化的因素，以及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特殊因素与普遍因素。值得一提的还有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与亨廷顿于 1961 年合著出版的《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一书，该书从比较的渠道考察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和政策的主要类型，并得出结论说：两国很可能沿着与各自不同的传统遗产相和谐的道路实现现代化。⁴⁶

第三节 70 年代及其后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科技革命后，西方国家开始新一轮的社会变迁，新社会的特点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标志着西方各国已经在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迈进。与之相对应，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关后工业、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形成对此前经典现代化的修正与拓展。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1973 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贝尔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认为在今后 30 年至 50 年间，发达工业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的五个特点进行了概括。⁴⁷

在 1976 年的《比较现代化》中，布莱克明确反对现代化即西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这样一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全盘抛弃自己的传统，多数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布莱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现代化过程中，“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⁴⁸ 1975 年，以布莱克为首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诸领域的八位学者合著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项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出版，该书引用大量材料，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增长、社会相互依赖以及知识教育等几个方面，对日本和苏联这两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异同做

⁴⁶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9—280 页。

⁴⁷ 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⁴⁸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 页。

了比较分析，并据以探讨了对现代化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因素。⁴⁹

70年代后，德国学者茨阿波夫就将部分现代化研究文献译成德文，附上自己的序论，以《社会变迁理论》为名出版，从而将现代化理论带入了德国学术界。此后二十多年间，茨阿波夫又发表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录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书中。⁵⁰ 茨阿波夫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现代化理论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与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无论是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还是这两类社会内部各国之间，都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向；必须把趋同性发展的进化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对现代化的不同层次、不同路向进行细致地探讨，才有可能构建起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⁵¹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80年代出版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非常值得一提。在这部著作中，富永健一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认真梳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化与产业化进程进行了综合探讨。富永健一认为，社会变迁是个长期的宏观的过程，它包括家庭和亲族的变迁，组织的变迁，社区的变迁，社会阶层的变迁以及国家和国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过程，产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部分。⁵² 在富永健一看来，不同类型的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非西方后起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走上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就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富永健一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以及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5年，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教授提出来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随后在西欧、北欧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能阻碍人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过，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⁵³ 如今，

⁴⁹ 详见西里尔·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项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⁵⁰ 参见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⁵¹ 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⁵²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域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⁵³ 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212页。

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针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指南。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化研究的热潮在西方逐渐消退下去，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方面，西方现代化理论都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从实践方面看，西方学者们所推崇的欧美模式在拉丁美洲遭遇严重挫折，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否可行，这越来越遭到人们质疑；而且，自 80 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转移到了发展问题、南北对话等问题，现代化理论因此受到冷落。从基础理论方面看，在社会科学界，用以诠释现代化的结构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人们发现结构方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在这一思潮最为盛行的法国，有人甚至宣布结构主义已经死亡。从现代化理论本身来看，它逐渐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如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基础上，但这种划分面临很多问题，就拿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来说，它依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东西，现代性与传统性兼而有之的社会比比皆是。这就表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而这意味着要突破现有的现代化理论。这样，各种批判、质疑、乃至替代现代化的理论纷纷涌现。尽管如此，现代化研究目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只要现代化还是地球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目标，那么现代化研究也将会持续下去。

第三章 国内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涉足现代化研究，虽然现代化研究的起步较迟，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目前正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一大批现代化论著相继问世。现代化战略的推行与现代化的学术研究交相辉映，这使得为中国的现实服务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特色。

第一节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兴起之际，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受到冷战时期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左”的思潮主宰了学术界，现代化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与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被抛置一边了。不过，从实践上看，政府却在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断努力。1954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一历史性目标在1963、1971年再次得到重申，举国上下也由此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中。但在学术界，由于受到特殊政治气候的影响，学者们对现代化研究讳莫如深，不愿提及。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以及西方现代化研究的诸多新成果，中国学术界一概漠然视之，没有人向国内介绍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状况，当然也没有人进行研究。

这是因为，兴起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形势下，被中国人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是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工具，研究或者介绍现代化理论的人，极有可能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理论”等帽子。为此，没有人敢去碰现代化研究这根高压线，对于西方学术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人们避而远之，有点谈虎色变之感。其实，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也很少有人能了解或知道国外的现代化研究学科，仅这种封闭本身，就使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化研究。

进入7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现代化研究逐步纳入学术研究范畴，而历史学家是首先涉足这个领域的。

史学家参与现代化研究始于 80 年代中期，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两个重点项目为标志：一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二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这两个项目的启动，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开始形成一个新局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两个项目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目前已经达到十多种，在推广与深化现代化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罗荣渠教授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也编辑出版了《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各类专著、论文集也将近十种，这些著作侧重于“从中国看世界”，运用比较方法，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以及中日现代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代化也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⁵⁴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如钱乘旦、杨豫、陈晓律等，也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研究。多年来，南京大学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与个案研究方面，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兴起后，立即成为一门显学。从社会发展背景来看，80 年代中期，“现代化”作为一种共识已被整个民族接受下来，因此学术界大张旗鼓地开展现代化研究，也就成为时代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除前文所提及的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以外，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涉足这一全新研究领域，除了对西方现代化论著及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并介绍外，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版，现代化开始成为学术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第二节 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20 多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涉及现代化研究的论著有数百部之多，而相关论文更是成千上万。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现代化的元理论，即现代化的概念、

⁵⁴ 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

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而且从多个视角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正在形成之中。概括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一，对现代化概念的探讨。研究现代化，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现代化。在中国学者涉足现代化研究之前，国外学术界对现代化的概念已有过专门探讨，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写过一本小书《从传统到现代》，在这本书中，金耀基虽然没有明确为现代化下定义，但却概括出现代化六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工业化。它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对传统结构与生产组织进行挑战的主角，它实际上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第二、城市化。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第三、普遍参与。它使人民自己在社会中扮演主动的角色。第四、世俗化。它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万物评价的尺度。第五、高度的结构分殊性。即社会的每一种结构，例如政党、学校等，都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专门化的功能。第六、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⁵⁵ 这一点是就个人而言的，因为现代工业对专门知识与技术的需要逼迫个人产生出对知识和技术的追求，从而使得成就成为衡量的标准。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是国内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罗荣渠教授认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化，自然形成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并非截然对立，有些观点实际上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在罗荣渠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罗荣渠将“现代化”这一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考察：“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

⁵⁵ 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⁵⁶

中国科学院的何传启研究员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有三个维度，犹如一个盒子的三个面。在何传启看来，从现代化的基本词义和习惯用法来说，现代化有两个基本词义：一、成为现代的、适合现代需要；二、大约公元 1500 年以来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现代化既可以表示一个成为现代的过程，也可以表示现代先进水平的特征。从理论涵义来看，现代化是指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经典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从政策涵义来说，现代化可以理解为政府根据需求和现代化理论制定的“现代化政策”，虽然不同政府和不同时期的“现代化政策”解释不尽相同，但都包涵的领域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在经济领域，就是要推进工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在社会领域，就是要推进城市化、专业化、流动化、社会保障、教育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⁵⁷

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于现代化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南京大学的杨豫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⁵⁸ 北京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强调，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过程，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整个

⁵⁶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7 页。

⁵⁷ 何传启：《现代化概念的三维定义》，《管理评论》2003 年第 3 期；又见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88—93 页。

⁵⁸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 页。

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时代。具体来说，孙立平将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2) 以效率和民主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3) 城市化；4) 以阶层制为起点的组织管理的现代化；5)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6) 文化和人的现代化；7) 生活方式的现代化。⁵⁹

对于现代化概念做出概括和总结的学者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从这些学者对现代化内涵的界定来看，他们基本上避免了西方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对现代化的片面性概括，即强调现代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的某一层面而忽略其他层面。尽管中国学者各自的表述不同，但他们眼中的现代化，显然都是一个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共识，主要原因有而：从理论上讲，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化强调单一层面而忽略其他层面，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从整体、宏观层面来认识现代化在西方已被普遍接受，中国学术界自然也接受了这种认识；从实践上看，注重现代化的某一层面，在政策操作方面造成诸多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关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学术界，都逐渐认识到，要从整体的多层面的角度来认识现代化，来推行现代化战略。学术界对现代化内涵的共识的形成，对于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推行意义重大。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政治现代化等，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第二，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模式、道路的探讨。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现代化是必然趋势，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模式各具特色。不少学者由此展开了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和道路问题的探讨。

钱乘旦教授在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早在 1987 年出版的与陈意新合著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中，钱乘旦教授就探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钱乘旦教授认为，走向政治民主是共同的终点，但方式因条件而异。钱乘旦教授对西方发达国家总结出这样三条政治现代化道路：第一条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改革之路，即通过不断的改革、妥协完成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第二条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之路，暴力色彩浓厚，反复而跳跃；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

⁵⁹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内容刍议》，《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 年第 1 期。

是其特点是新生社会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丢失主动权，旧的社会统治集团主导国家现代化，最终将国家引向错误的发展方向。⁶⁰ 政治现代化的这三条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大体遵循这三种模式，只不过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 21 世纪之初，钱乘旦又主编了《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按照国别或地区，对 50 多个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及其道路进行了探讨。在钱乘旦教授看来，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体现在：英联邦国家都经历过英国的殖民统治，且其现代化都是在殖民入侵的刺激下开始、被迫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个性体现在：每个国家的历史经历、文化传统、宗教等都不相同，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不同障碍，由此决定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宏观上考察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时，钱乘旦教授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是白人移民殖民地，其现代化过程开始较早，母国文明的本土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第二类型是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欧洲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冲突，如何调解这些冲突成为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第三类型是原有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殖民统治给这些地区强加了一部现代国家机器，在殖民者撤离后，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成为现代化的重要难题。⁶¹ 对不同类型英联邦国家现代化进行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与个性，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理解现代化，而且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罗荣渠教授也曾对现代化的几种类型进行了区分。罗荣渠教授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型现代化”与“外源型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资本主义发展类型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步趋于成熟形态；社会主义型发展是自

⁶⁰ 参见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⁶¹ 参见《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丛书总序（钱乘旦）。

上而下的发展，表现强大的国家作用；混合型则是前两种形式的结合，目前正处于成型之中。现代化的这三种类型都处在现代工业主义的影响之下，在相互影响之中发展。⁶²

浙江大学的丁建弘教授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书，独辟蹊径，采用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作历史学的纵向研究，又作社会学的横向研究，从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特点。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国现代化历程的考察，作者对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包括：发达国家的定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动力问题；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在 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新历史时代，发达国家是领头羊，二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先后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大潮之中；现代化道路又是多样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通向现代化之路。⁶³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对先行国家和成功国家工业化模式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南京大学的陈晓律教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该书从全球性发展的历史角度出发，用现代化理论和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书中涉及的工业化模式包括：英美模式，即内生型的自由放任模式；法国模式——曲折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延续时间长，变化的幅度也较为缓慢，其特征是“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德日模式，又称统制型工业化模式，政府对工业化起引导作用，但不直接涉足经济发展领域；最后印尼、韩国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突飞猛进、政治高度专制的工业化模式，军人政府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直接主导着整个工业化进程。⁶⁴ 通过对不

⁶²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161 页。

⁶³ 丁建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 页。

⁶⁴ 参见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

同类型工业化模式的分析，陈晓律教授认为，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不过，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对工业化的主导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尽力避免由此而导致的消极后果。陈晓律教授还特别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任何一个渴望发展成功的民族，都必须具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动力。

第三，对现代化理论的探讨与构建。在对现代化的概念、方法、模式等问题加以分析后，一些学者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之中。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学派，但一些学者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西方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单线演进的社会发展理论，罗荣渠教授在批判吸收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罗荣渠教授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大生产力形态：1. 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的生产力，这是自然力统治的时代；2. 农业生产力，即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是适应自然力进行物质生产的时代；3. 工业生产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三种生产力对应着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这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多线”是指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发展，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动态的。按照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现代化时代实际上就是人类运用工业生产生产力以及由此而进入的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在罗荣渠看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整体性进程，首先从英国开始，继而在西欧、北美等国展开，然后向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推进。人类社会的变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渐进式微变（弱式），突发式微变（强式），创新性巨变（强式），传导性巨变（弱式和强式）。至于现代化的道路，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内生性和诱导性两条，不同的道路也使得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方式截然不同。⁶⁵ 罗荣渠教授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为构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乘旦教授长期从事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在现代化理论的创建方面有独到见

⁶⁵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0页。

解。钱乘旦教授有关现代化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现代化的起点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从开展。专制王权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民族国家建立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并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打破专制王权，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关键所在。⁶⁶ 第二、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论。1500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无一不是在现代化的主题下进行的。以现代化为主题，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现代化准备或酝酿阶段（14—15世纪）；2、现代化启动阶段（16—18世纪）；3、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18世纪晚期以后）；4、现代化的全球扩张阶段（19世纪）；5、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20世纪中叶以后）——这就构成了世界近现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⁶⁷ 第三、在国内首先提出的反现代化概念及理论。“反现代化”并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取向，扭转现代化的方向，达到抵制现代化、回归传统社会的目的。从表面上看它采用了现代化的手段，但它的目标与现代化相反，是一种逆向的现代化。“反现代化”与现代化失误还不是一回事。现代化失误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错误，就运动的方向而言，其最终指向还是构建现代社会；“反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则恰恰相反，其最终目标是维护传统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反现代化”给一个国家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更严重。⁶⁸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何传启研究员长期注重于现代化的微观研究，他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18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人类文明进程的周期，世界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工业时代（1763—1971年）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知识时代（1971—2100年）的第二次现代化，完成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

⁶⁶ 详见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⁶⁷ 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⁶⁸ 钱乘旦：《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学术界》2001年第4期。

文明的转变。这两个阶段的现代化有着不同规律和特点，第二次现代化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将来还会有新的发展。第二次现代化既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部分消除和“反向”（部分是对传统性的“回归”），也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部分继承和发展，在有些方面是新发生的；两次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则是综合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两次现代化是相互作用的。根据两次现代化理论，实现现代化大概有三条道路，即争先恐后的第二次现代化道路、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现代化的追赶现代化、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综合现代化。⁶⁹

第四，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取得了大量成果。胡绳在 1990 年就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⁷⁰ 1995 年，他又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明确表示赞同用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题之一，并指出了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⁷¹ 刘大年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中国近代 110 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⁷² 中国近代史学界在认识到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性后开始付诸行动，将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与罗福惠教授，在 1993 年出版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把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的特征相结合，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变化，并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作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应对外国列强的不断挑战这个主要线索，并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深化而变化。

⁶⁹ 参见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⁷⁰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 年 10 月 17 日。

⁷¹ 胡绳：《再版序言》，载《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卷，第 8~9 页。

⁷²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年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 页。

尽管马克思谈到的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对于中国也是适用的，但外国列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危害不可忽视，它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功能的失效和社会失序，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折、缓慢与失衡。此外，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物质器物文化到组织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层层推演。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与理论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现代化进程。“我们的先辈曾经屡次见异思迁，不断地把多种外国模式先后引进中国，每遇挫折，即思更换，这样自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作者从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中得出结论：现代化从来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因此不能用西欧或者北美模式来衡量并套用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现代化有大体相同的指标体系，这是共相，而共相必须寓于殊相，殊相就是各自不同的道路与方法，以及已经或即将建成的现代化社会的各自特点。⁷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教授主编的三卷本、120 万字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对 1840—2000 年这 160 年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中国 160 年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三种道路的转化：1949 年 10 月前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以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主体；1949 年至 1978 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期；1979 年至今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展开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人民和政府如何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突出两个转变，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如何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书中强调中国现代化的三项主体内容，既论述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两个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又论述争取民族独立这一中国现代化所特有的内容；注意四种关系，即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⁷⁴ 该书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史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三节 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⁷³ 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⁷⁴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34 页。

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目前正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总体来看，国内的现代化研究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现代化研究已逐步摆脱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的依附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在学术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已经具有了自己特有的理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已具有一支稳定的专门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队伍，现代化研究独立的学科地位开始形成。这体现在，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以现代化研究为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现代化研究的专门机构也开始出现。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在扩大，社会认同程度也逐渐增强，这昭示着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仍在发展。

第二，随着现代化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现代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在我们看来，现代化学科体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现代化概念、理论、方法的研究，即对现代化本身进行探讨，前文已提到，在吸收和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学者着力提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次是现代化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结合，形成了一些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如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最后就是现代化个案或问题的研究，现代化的个案不仅涉及到成功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涉及到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更多的是关照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会引发种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也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现代化研究的这三部分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前者可以为后两者提供必要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后两者则可以从各自的独特角度或者从某些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丰富对发展问题的认识。⁷⁵

第三，注重对先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经验教训的研究，以便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学术研究要立足于现实，同时也要服务于现实。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过程，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它是一条必由之路，因此，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借鉴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或教训，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为此，研究他国的现代化经历及其经验教训，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使命。在探讨现代化的

⁷⁵ 吴忠民：《形成现代化研究的中国流派》，《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成功经验方面，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起源、发展、特征、经验等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概括；钱乘旦教授的《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一书从不同方面探究了英国工业化的基本经历及成功经验；李庆余、周桂银合著的《美国现代化道路》则把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归纳。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失败多于成功，挫折也多于顺利，同时成功的现代化也包含着许多不成功的因素。因此，对现代化进程中挫折与教训的研究，在世纪之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钱乘旦、刘金源合著的《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一书，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失误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出发点是：“我们希望前人的失误能为后人提供借鉴，别人的失误能为自己提供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⁷⁶ 尹保云的《现代化通病》一书也在这个方面做了工作。

第四，尽管现代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其关照点仍然是中国的现代化。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界一直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就现代化研究而言，这种学术传统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去关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种现实性色彩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是把理论与经验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⁷⁶ 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恰恰就是现代化潮流在西欧迅猛发展并急剧扩张的年代。作为现代化潮流的亲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现代工业的兴起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并提出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理论，如罗荣渠教授所言：“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早在他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⁷⁷ 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论著一度未注意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但在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否认马克思在现代化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人们经常喜欢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⁷⁸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论述绝非只有这一句话，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根本动力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理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⁷⁹ 此后，马克思又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无疑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范畴；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纳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范畴，它们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同阶段。在这

⁷⁷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1 页。

⁷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 页。

⁷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

一点上，后来的经典现代化学者无疑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如美国学者罗斯托就表示：“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列举的各阶段——传统社会、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动阶段、成熟阶段、高频消费阶段——和马克思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⁸⁰

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后，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商品经济与人际关系的互动出发，把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这样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⁸¹ 这就是说，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依赖关系，处于自然经济的社会状态中，这实际上就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阶段。在第二阶段，人已成为独立的人，人际关系被发达的商品关系所代替，并由此而形成全面的关系，使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成长起来。它不仅以发达的商品经济摧毁封建社会，而且为下一阶段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到来创造条件，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阶段。在第三阶段，一方面是人的个性更加解放，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是共同生产和占有财富，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阶段。⁸²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这几个阶段，是前后相继、不断演进的，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提供物质基础，但也必将为后一个阶段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化潮流席卷欧美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来临使得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

⁸⁰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64 页。

⁸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4 页。

⁸² 林志友：《论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等论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现代时期。在相关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一词的使用非常频繁，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等。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称的“现代”，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⁸³

上述这些变化，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时代的主要特征。而变化的结果，则是生产力的解放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⁸⁴

现代工业的兴起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彻底解体，在此基础上，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化社会开始生成，这实际上就是指现代化的过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

⁸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⁸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事实上是指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人类社会是如何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换言之，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成的根本动力何在呢？这实际上就牵涉到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在早年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并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⁸⁵ 具体到工业革命的实践，我们发现，每次产业的跃进都离不开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而且，每次产业的提升，科技的作用呈现更强的势头。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因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⁸⁶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潜在生产力，它可以通过转化而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物质生产力。不过，他们也注意到，科学技术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过程要受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制约，并且物质生产力反过来也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此，在后期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运用一个新的科学概念即生产方式来阐明其社会发展理论，并分析现代化的动力问题。

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互相结果，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追溯到16世纪初。他们共同指出：“在16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成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

⁸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⁸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218页。

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⁸⁷ 马克思对 16 世纪开始的历史运动的性质做了这样的概括：“资产阶级的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⁸⁸

“现代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种扩张性，它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到“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将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划分新时段的依据，而生产方式的变化促成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从这种角度看，马克思无疑把生产方式的变化看作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或者说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论著中所做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⁸⁹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⁹⁰

⁸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1—372 页。

⁸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73 页。

⁸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2 页。

⁹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的变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变革。后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理论家的基本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影响。因此，“即使那些怀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的现代化理论家也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⁹¹

第二节 市民社会与现代化的起动

在《共产党宣言》等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欧洲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先决条件进行了论述。在详细讨论欧洲现代化的历史先决条件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了连续与变迁的方法，他们没有简单地把欧洲的现代化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而是认为技术的变化与革新乃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所引起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出现看作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16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市民等级在王权的保护下获得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私人领域的独立开始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然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不受限制的王权对工商业经营和私人领域的侵犯妨碍了市民社会的顺利发展。“市民社会同国家相分离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初级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的产物。初级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都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活动摆脱专制政府的家长式统治；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尖锐，最终导致了政治革命的爆发。”⁹² 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先后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代议制民主原则，为私人领域的独立存在和工商业活动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

尽管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从16世纪就已开始，但直到18世纪，一些思想家才认识到国家和社会的区别。黑格尔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别开来，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

⁹¹ 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⁹² 王继、王浩斌：《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之间的一个分化了的特殊的伦理范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从社会结构上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市民社会指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狭义上的市民社会才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商业生活秩序。⁹³ 市民社会是同人类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相联系的，是以特殊的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分离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的，正是这种分离促成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与独立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⁹⁴ 但是这种物质交往形式并不发生在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而是指整个工商业生活。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和私人利益，市民社会就一定存在，这就是广义上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出现，在西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随着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而开始的。城市兴起以后，市民们往往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与领主进行斗争。在市民阶层与领主的斗争中，有的城市通过向领主缴纳赎金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独有的“自治城市”。有些自治城市甚至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和选举市政官员的权利。一般地说，城市的自治权是经过教俗领主和国王特许的，还要颁发特权证书，这种自治权是总体的专制社会中特许的自治。

城市自治运动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经济活动离开各种道德戒律而中立化，从而能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生产出比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伦理所允许的更多的商品。于是，与经济领域有关的惟一标准只是经济标准了。西欧现代化的根源，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是新教伦理，而在马克思看来，是比新教伦理还要早几个世纪的城市公社运动。⁹⁵

市民社会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格局。这样，我们看到，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

⁹³ 肖富群、李广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⁹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⁹⁵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的主流体制之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⁹⁶ 一个异己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兴起的原因。

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那里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力，社会自主性程度即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和地位大为提高。这种自主性程度的提高正适应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的需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展。市民社会的出现，因此成为西欧现代化兴起的先决条件。反过来看，在其他地区，由于没有出现市民社会，因而也就难以出现导致现代化的因素。

第三节 殖民主义与非欧洲国家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欧洲，尤其是西欧的现代化起源及其进行给予了充分论述，而且在相关著述中，对于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也进行了探讨。从很大程度上看，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及其全球扩散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扩张本性，促使西欧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殖民扩张，由此而导致了非欧洲世界的“未开化”社会走向现代化，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⁹⁷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时，着重探讨的是西方的殖民扩张行为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恰恰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而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便是东方的印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以东方的印度为例，来分析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

⁹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⁹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就西欧国家而言，导致现代化起源的要素来自于欧洲社会内部，那么，对于东方的印度而言，其社会内部是否也存在着导致现代化起源的要素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着力分析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认为，印度社会具有典型的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特征，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个人对群体的高度依附，以及村庄之间的分散和孤立状况，决定了国家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这种社会虽然也有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它是停滞的、不变的、非辩证发展的、特殊的、有局限性的，它缺乏社会变革的机制，因此就没有任何内部变化的可能。⁹⁸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创造先决条件的任何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连可能成为类似条件的因素也没有。为此，马克思指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 19 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有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始终没有改变”⁹⁹

既然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内部缺乏进行变革的动力，现代化的推行也缺乏制度上的推动力，那么，推动东方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因素必然要来自外部。因此，任何来自外部的、有利于打破东方原有社会结构、促成现代性因素的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扩张及殖民统治，是促成印度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力量。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理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¹⁰⁰ 马克思所提出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对我们理解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马克思首先对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进行了道义上的抨击和揭露，认为殖民者的野蛮掠夺、残酷统治破坏了东方原有的社会形态，给东方国家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灾难。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接管了财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但是完全忽视

⁹⁸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 页。

⁹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5 页。

¹⁰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0 页。

了公共工程部门，完全按照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原则来发展农业，由此而造成印度农业的衰落。“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不列颠的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¹⁰¹ 英国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¹⁰²

至此为止，马克思所论述的都是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所造成的恶果，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揭露和谴责上，而是关注起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即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建设性使命”体现在“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推动东方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作用。”¹⁰³ 具体到印度，则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英国人用宝剑实现了印度空前的政治统一，这成为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二、由英国人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三、英国人在印度创办了“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这成为“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四、英国人在印度推行了柴明达尔制和莱特瓦尔制，促成了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私人土地占有制的形成。五、在印度土著居民中，英国人逐渐培养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六、英国人在印度兴建起近代交通设施，“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铁路及轮船，将改变印度的历史，它使得印度“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¹⁰⁴

¹⁰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¹⁰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¹⁰³ 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¹⁰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1页。

“破坏性使命”与“建设性使命”，是英国殖民统治后果的两个重要方面。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现代性因素在印度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印度这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历史传统极为深厚的文明古国来说，其社会内部瓦解传统农业文明的因素基本上不存在，而现代化是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没有传统农业文明的逐步瓦解，就不可能有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导致农业文明瓦解的因素，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无论它有多么残酷，都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英国在印度完成的“破坏性使命”，瓦解了印度农业文明的根基，为完成“建设性使命”提供了重要前提。为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社会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¹⁰⁵

英国人在印度所完成的“建设性使命”，是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客观后果，这是由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¹⁰⁶

英国的“破坏性使命”破坏了一个古老的旧世界，而“建设性使命”就是要创造一个西式的新世界。从“建设性使命”的具体表现来看，英国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为印度“播下新的社会因素”，创造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建设性使命”就是英国人用强制的方式，推动印度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这是符合印度社会发展方向的，因此马克思预言印度“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不过，在论述“建设性使命”的积极后果时，马克思强调英国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出的果实只是“未来的后果”。马克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论断呢？我们知道，

¹⁰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¹⁰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只是从外部起到了一种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所产生的推动力，能否促成后发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在于后发国家能否成长起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具体到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有赖于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为此，民族独立就成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先决条件。没有民族独立，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民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出的果实的。”¹⁰⁷ 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¹⁰⁸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作为英国现代化进程的亲历者，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的影 响。对于现代化动力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有像后来有人所曲解的那样宣说“经济决定论”，而是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革这一点入手，指出“市民社会”的产生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同时也是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这一认识在现在看来依然没有过时。对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关注殖民扩张的外力对殖民地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出一种双刃剑效应，即一方面瓦解了殖民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对殖民地的掠夺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充分肯定殖民扩张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即它以强制的方式瓦解传统的农业经济，传播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快了这些殖民地国家迈入现代化之路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

¹⁰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¹⁰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428页。

义现代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有着深刻的认识，如贫富分化及其导致的阶级矛盾，工业化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仅仅是初露端倪，但目光敏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一针见血地进行了批判，以期起到警示作用。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这一理论对现代化诸问题的认识可谓全面而深刻，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研究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第五章 原初现代化理论

尽管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化研究兴起于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但此间产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并非无水之源，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根基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后叶的原初现代化理论。以涂尔干、滕尼斯、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起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起源问题，在他们提出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学派所继承。

第一节 涂尔干：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¹⁰⁹是 19 世纪后半叶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被称为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在涂尔干的努力下，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在法国正式确立起来。涂尔干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工业化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作为一位敏锐的思想家，涂尔干深刻地意识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场社会变革的特征和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前，涂尔干首先引入了“社会团结”这个概念。在涂尔干看来，所谓社会团结，就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¹¹⁰ 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与情感的综合。集体意识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它的存在依赖于个人意识中的情感与信仰，但又独立于个人意识，它依据其自身的法则而演变。接着涂尔干又把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这两种类型，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后来现代化理论家们所称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机械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它通常出现在低级社会，即传统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简单

¹⁰⁹ 英文为 Emile Durkheim，通常译为涂尔干，也有人译为杜尔凯姆、迪尔凯姆等。

¹¹⁰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 页。

的以家庭群体或宗族集团为基础的农业社区的范围内活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人们有着一样的或相似的社会规范、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承担着农业社区的简单的、相似的工作。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协同性，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纽带松弛，社会与宗教联为一体，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下，群体内部虽然有着简单的分工，不同的人在社会中分别充当种地、教育、管理、灌溉、防卫等不同的角色，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它却没有分工。¹¹¹ 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个彼此相似的群体，即“分社会”或“小社会”，它们可以不依赖于其他群体而独立生存和自我延续，即实现自给自足。在这种社会中，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很弱，而对群体的依赖性很强。人与人之间道德与行为的一致性的取得，基本上是靠“压制性法律”来实现的，集体意识涵盖了个人意识的大部分，个人处于共同情感的支配之下。

现代社会、即发达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每一个个人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专门的职能，“一种新型的团结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形成”¹¹²，这就是有机团结，即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正如涂尔干所说：“这些社会并不是由某些同质的和相似的要素复合而成的，它们是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¹¹³

有机团结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中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长。在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在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为什么又更加依赖社会了呢？涂尔干对此的解释是：分工越细，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深，个人的行动越是专业化，其个性也就越鲜明；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越鲜明，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¹¹⁴ 在

¹¹¹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 页。

¹¹²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¹¹³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42 页。

¹¹⁴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 页。

这种个人分化较为显著的社会中，集体意识所笼罩的生活面会减少，对于违反禁令的集体反应减弱，个人可以更有弹性的解释社会强制；集体意识部分失去其极度僵硬性，个人享有某种判断与行动的自主性，但集体意识不会彻底缺失，因为没有集体意识将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那么，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或者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动力是什么呢？涂尔干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分工。“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¹¹⁵ 由此可见，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促使个人、区域、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强，因而从总体上促使社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即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演进。

那么，推动社会结构发生转变的社会分工本身又是由什么来推动的呢？在这里，涂尔干抛弃了传统的“追求幸福”的这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之所以得到发展，是由于专业化每深入一步，就都会带来幸福的成长。”¹¹⁶ 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中分工的成长是社会容量、社会物质密度与社会精神密度增强的结果。“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¹¹⁷ 社会容量就是属于某一集体的个人的规模，社会物质密度是指某一地面上个人的数目，社会精神密度是指个人间的沟通、交往、贸易及其内在约束的强度。“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密度的提高，造成人们对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在进化论的原则的支配下，竞争产生出新的解决办法，即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和完善，结果就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高度工业发展和高水平的人口密度、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¹¹⁸

¹¹⁵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4 页。

¹¹⁶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2 页。

¹¹⁷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19 页。

¹¹⁸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5 页。

涂尔干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的转型很有意义。尽管涂尔干没有使用诸如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这样的术语，但涂尔干所界定的机械团结处于主导地位的低级社会，实际上就是后来现代化理论家所说的传统社会，而有机团结处于主导地位的高级社会，也就是完成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转型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相对于其前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学家涉足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肇始。不过，将现代社会的产生仅仅归结为社会分工的后果，这种单因素论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对于涂尔干理论的缺陷，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评判可谓一针见血：“迪尔凯姆（涂尔干）的学说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除了谈到人口数量与密度的增加外，没有解释清楚社会现代化的其他途径；他仅仅对现代化过程进行了描述，而未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此外，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思辨性，缺乏历史证据。”¹¹⁹ 虽说如此，涂尔干的思想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第二节 滕尼斯：从共同体到社会

菲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与涂尔干生活于同一时代，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滕尼斯提出了纯粹社会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共同体与社会，用来说明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类型模式，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滕尼斯据此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进程，特别是自中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公社走向社会的过程。

现在的学术界，人们常常不加分别地交替使用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但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与社会二者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滕尼斯首先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身体和血缘的结合，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并存，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不管作为事实还是作为名

¹¹⁹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6页。

称皆是如此。”¹²⁰

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血缘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如家庭、家族、部落、部族等，这种共同体是最为原始的，可以被理解为植物生活的相互关系；第二种是地缘共同体，即在血缘共同体之中或之上形成的由土地（地理位置）决定的复合体，比如农业地区、行政区或边区马克、村庄、城市等，可以被理解为动物生活的相互关系；第三种是精神共同体，比如劳动合作社、行会、迷信崇拜团体、结义、宗教教区等，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类最高形式的共同体。¹²¹ 这三种共同体都是自然形成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但是一个比一个高级。

共同体导源于本质意志，是由本质意志所决定的结合，其内部联系是自然的、有机的，每个人都作为单一的个体总是因血缘、地缘或精神与他人发生关系，因而他并不处于由多数人所组成的思想的联系之中。¹²² 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的亲属、邻里和友谊等都是共同体的主要形式，而体现共同体生活的现实形式是家庭、乡村以及凭借和睦感情、伦理和宗教而建立起来的城镇。共同体中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大，同一团体的成员彼此相近或相似，拥有同样的感情，赞成同样的道德准则，承认同样的神圣事物，成员间没有分化，是协调一致的。因此，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个人意志植根于整体（共同体）意志之中。

与共同体相对立的社会，在滕尼斯看来，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尽管社会成员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彼此分散和分离的，没有一种自然的、牢固的联结纽带。正如滕尼斯所说：“一大群自然的和人为的个人，他们的意志和领域在无数的结合中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而且在无数的结合之中也处于相互结合之中，然而他们仍然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对内部没有影响。”¹²³ 社会是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基础，以契约和法律作为联系的纽带，体现了自私自利。与共同体不同的是，社会不是天然的生物体，

¹²⁰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54页。

¹²¹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¹²² 张镛、唐宏强：《滕尼斯法社会学思想评介》，《河北法学》2000年第6期。

¹²³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8页。

所以没有“本质意志”；社会是“人为的”，只有“选择意志”。¹²⁴社会导源于选择意志，人们思考问题都是用一种尽量排除感情因素的纯理智思维，行动则源于个人目的性计划以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考虑。在社会里，“他们作为个人相互间是完全独立的，只有通过自己的选择意志，才进入相互间的关系。”¹²⁵

滕尼斯眼中的“共同体”与“社会”，分别代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时代，即传统社会的时代和现代社会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特点各不相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对此，滕尼斯形象地概括道：在社会里，“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分离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却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¹²⁶

就发展阶段而言，共同体和社会都会大致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共同体经历家庭生活、村庄生活、城市生活三个阶段，“它们是整个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的持久的类型”。¹²⁷ 社会也经历大城市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世界主义的生活三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共同体与社会所各自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个比一个高级，后者会逐渐取代前者。不过，这种取代或进化的过程，并不是后者出现后前者就消失了，而是后者出现后，前者还继续存在。例如，在共同体中，“家庭生活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它仍然保持在由于村庄生活和城市生活而得到的它的发展之中。村庄社区和城市本身可以理解为大的家庭。”¹²⁸ 在社会中，大城市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世界主义的生活三者之间，虽然后者在不断地取代前者，但三者在一定时段内的并存依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实。

从宏观方面看，如果把现代化看作是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虽然社会在不断取代共同体，即共同体的作用在不断减弱，社会的作用

¹²⁴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

¹²⁵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55—256 页。

¹²⁶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95 页。

¹²⁷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33 页。

¹²⁸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36 页。

在不断增强，但共同体在社会的时代依然存在。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变迁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传统性因素的瓦解和现代性因素的成长同时在进行，但二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并存是必然的。

第三节 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在现代化研究的鼻祖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其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问题的论述方面。

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及其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世界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而非东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涉足现代化问题的学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韦伯之前，学者们大多从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方面着手加以分析，而韦伯则独辟蹊径，认为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文化气质有关，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资本主义精神”由此成为韦伯现代化理论的第一个核心内容。

鉴于资本天生具有逐利的本性，那么，“资本主义精神”是否就单纯体现为对利润或财富的追求呢？韦伯在这里给予了解答：“对财富的欲望，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的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¹²⁹ 可见，在韦伯看来，获利的本能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由此一来，资本主义精神与非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重要区分，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在于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标准态度是在心理上排斥和谴责合理的获利，还是普遍认可这种行为是合乎理性的、正当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既体现在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身上，也体现在其“同盟军”的劳动者身上，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企业家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

¹²⁹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8 页。

但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就必不可少。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精神品质便应运而生。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¹³⁰ 企业家和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具备，保证了一种低工资—高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成。

不过，在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推动作用时，韦伯更多地关注具备这种精神的企业家所发挥的作用。由于这类新式企业家既然精打细算，又敢做敢为，他们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勤奋努力，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以“某种禁欲的倾向见撑于世”，“他们的财富仅仅为他们带来了一种自己业已做好了本职工作的极不合理的感受”；这种把事业成功、做好本职工作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即“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¹³¹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于是发展成为一种责任伦理，这种伦理观念传播并渗透于经济生活，就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西方呢？这是韦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韦伯从分析宗教及其教义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西方的独特背景。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韦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相关。以新教中的加尔文教为例，无论该教派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的结合”。¹³²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关联呢？韦伯开始从基督教新教教义中寻找答案。新教中

¹³⁰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45 页。

¹³¹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51—52 页。

¹³²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28 页。

的天职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源泉。德国宗教改革以后，“神召”一词开始被“天职”所取代，表面上看这仅仅是译名的变化，实际上却意味着新教在道义上开始关注世俗活动，“天职”一词意味着对世俗日常行为的肯定评价，即“把克己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首先行为的最高形式，从而使日常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¹³³ 天职观念要求人民以禁欲主义的苦修态度，履行和实现个人在世俗社会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新教教义崇尚德行、禁欲、节俭、勤奋、忍耐，并把完成今生的工作看作是“神灵的召唤”，是不可改变的“天职”。这就要求新教徒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而使其行为得到经常的自我控制，使其现世的生活变得高度理性化。

理性与理性化概念的提出是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组成部分，韦伯所说的理性及理性化，实际上是对现代化性质的高度概括和哲学抽象。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所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则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四种基本类型：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传统因素，前面二者属于理性行为，后面二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社会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理性行为包括目的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则包括传统行为和情感行为。¹³⁴ 韦伯所处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同时也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成为韦伯研究的重点。

对于目的理性，韦伯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¹³⁵ 目的理性是一种本能的理性，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是指人们的行为完全排除了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做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对于价值理性，韦伯这样定义道：“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

¹³³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9 页。

¹³⁴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72 页。

¹³⁵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6 页。

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¹³⁶ 与目的理性相反的是，价值理性并非本能的，也不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理性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甚至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功利目标。

为了对上述两种理性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韦伯又引入了另一对理性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对于这一对概念，韦伯是这样界定的：“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¹³⁷ 作为最典型的逻辑形式，计算对于理解这两种理性至关重要。一种行为是否是形式理性的，关键看它是否是由最有技术的方法指导的合理的计算，精确性成为形式理性的重要特征。至于实质理性，所注重的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实质理性也是经济行为的一种原则，它虽然也表现为可以计算的技术形式，但与形式理性所不同的是，它不仅仅以形式上的计算为依据，而且还要从伦理、政治、享乐、等级、平均主义等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对经济行为提出要求，故无法实现精确化，实质理性因此关注的是经济行为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不同的社会类型中，以上四种理性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在传统社会里，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现代社会里，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理性化过程，即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而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¹³⁸ 这一过程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主要包括人的理性化、经济组织的理性化、行政与法律的理性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这就构成了一幅现代社会的图景。

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韦伯始终关注西方社会的理性化特征，这

¹³⁶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1 页。

¹³⁷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6—107 页。

¹³⁸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 页。

一特征在韦伯看来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过程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以及禁欲主义，让位这暗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化过程的需要，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起源。由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的源起归结为一种被“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之内的“合理谋利”精神，他尤其强调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与“规范性”，认为这种精神和道德力量“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¹³⁹ 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韦伯也强调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特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还“依赖于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和一种依据于正式规章的行政管理制度对经济活动所起的规范作用”，在这里，“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¹⁴⁰

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以及理性化构成的论述，成为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韦伯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精神的、文化的因素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尽管韦伯所提出的命题因其含糊性而遭到一些后人的批判，但从宗教伦理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乃至资本主义本身的起源，以及从理性化过程来认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全新视角。对韦伯命题的研究至今仍旧盛不衰，这也说明了韦伯的现代化思想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总体而言，现代化原初理论的几位学者，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限制，其现代化理论的立足点与出发点都是西方社会，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都是西方社会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在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过程中，他们大多将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的东西加以普遍化与抽象化，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现代化的原初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法，这使得现代化研究具有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从共同体到社会，从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到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这些转变也就意味着社会从传

¹³⁹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63 页。

¹⁴⁰ 林德宏编：《经济哲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5 页。

统到现在的转型。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点，进而在现代化研究中首先做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这为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前提。

第五章 经典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兴起。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其道路指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站在不同立场上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典现代化理论。

第一节 经济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从经济学领域来看，涉足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有阿瑟·刘易斯、罗斯托、库兹涅茨等人，其中尤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最富盛名，该理论是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所提出的。罗斯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依次更替的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以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这几个经济增长阶段依次更替的过程。

罗斯托认为，传统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的结构是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起来的。”¹⁴¹ 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无论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最近时期，传统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尽管农业和制造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生产率水平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受到限制。农业生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一种分层式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狭小，家庭和宗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很大作用。从权力的分布看，虽然中央政治统治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存在，但政治权力的重心一般在地方，操控在那些拥有或控制土地的人手中。

第二个增长阶段包括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即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

¹⁴¹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段，这是传统社会和起飞之间的过渡阶段。起飞的前提条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 17、18 世纪之交的西欧为代表的内生型，此间，世界市场的侧面扩张和为之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产生了一个动态的环境，致使在这些地区，现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农业和工业中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在西欧国家中，英国由于地理、自然资源、贸易机会、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优势，而成为第一个充分发展起飞条件的国家。不过，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前提条件不是从内部产生的，而是由较先进社会的外部入侵产生的，这些入侵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动摇和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根基，促使传统社会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触及而且大大改变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从而有利于现代社会的生成。虽然强调起飞的经济条件，但罗斯托并没有忽视政治上的因素，在他看来，“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差不多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¹⁴²

第三个增长阶段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分水岭的起飞阶段，即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此间，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在过去只是产生有限的突破和现代活动的飞地）扩大了并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复利似乎变成为习惯和制度结构。起飞是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需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1) 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从占国民收入 5% 或不到 5% 增加到 10% 以上；2) 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增长速度发展；3) 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的存在，或迅速出现，这种结构利用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冲力和起飞的潜在的外部经济效应，并且使增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性质。¹⁴³ 起飞的开始通常可以溯源于一种特别剧烈的刺激力量，但重要的不是刺激力量的形式，而是这个事实，即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了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其结果是更高的潜在创新比例被人们经常性的接受和更高的投资率。在世界各国中，英国最早完成了经济起飞，大致时间为 1783 年后的 20 年，此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先后以不同方式完成了各自的起飞。

起飞开始以后，经济经历一段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大约 60 年后达到所谓的成熟

¹⁴²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¹⁴³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40 页。

阶段，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以及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的能力；一个经济显示出其拥有技术能力和企业家才能来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任何东西，而不是生产一切东西；一国经济可能缺乏原材料或生产一种特定类型产品所需要的其他供应条件，但它依赖的是一个经济选择或者政治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或者制度的必然结果。不过，在罗斯托看来，“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隐藏着使它自己改变的种子”。在成熟阶段临近结束时，往往会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劳动力的构成、实际工资、眼界和劳动技能都起了变化；第二，领导性质的改变，由具有“海盗作风”的企业主转变为高度官僚化和高度精细机构的有效率的专业化经理；第三，整个社会对工业化的奇迹开始感到有些厌烦。这样一来，成熟阶段既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的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¹⁴⁴

第五个阶段是大众高消费时代，美国在 20 世纪初率先进入这一阶段。此时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人均实际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消费成为可能；二是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城市人口比例及技术岗位人口比例上升。与此相应，在经济方面，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社会不再接受把现代技术的进一步扩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进入这一阶段的西方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换言之，到了这一阶段后，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在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发展可能的三个方向是：一、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即把增加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二、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即建立福利国家；三、提高消费水平，衣食住行之外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成为主流。¹⁴⁵

大众高消费阶段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呢？这是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罗斯托又修正了其原来的理论，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认为，这一阶段，除了可能观察美

¹⁴⁴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 页。

¹⁴⁵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77 页。

国之外，就无法预测了。那么，这一阶段的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罗斯托以美国社会为例进行了说明。在耐用消费品达到一定消费水平后，其相对边际效用递减开始；由于人们出生在经济有保障和大众高消费的制度中，所以对常规的方式获得实际收入的额外增加看得不很重要。至于该阶段的经济发展走向以及社会特征，罗斯托并未做过多预测。不过，罗斯托一再强调说，大众高消费阶段是个漫长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遥远的目标，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正在经历的阶段；尽管美国社会已经显露出高消费阶段之后的若干特征，但即便在美国，大众高消费时代也还没有到达终点。

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来看，传统社会阶段就是前工业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则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兼具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传统的结构逐步破坏、而旧体系的重要方面依然保存”；起飞阶段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阶段，此间，“新的现代因素、价值观念和目标获得了确凿的进展；这些因素逐渐控制了社会制度；在站稳了脚跟而它们对手处于退却或混乱之中以后，它们又努力使现代化的过程达到合理的结局。”¹⁴⁶至于起飞之后的几个阶段，则是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在罗斯托看来，任何社会都会经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像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那样，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起飞阶段，只有完成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发达的现代社会。

然而，尽管罗斯托是从经济角度着手来考察现代化问题的，但显然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虽然增长阶段论是从经济方面观察整个社会的方法，但是它绝不意味着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且惟一的是从经济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相反，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在最后承认的而恩格斯只是在晚年才完全承认的看法，即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虽然经济变化的确具有政治和社会后果，但……经济变化本身被看作是政治和社会以及狭义的经济力量的结果。”¹⁴⁷

¹⁴⁶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 页。

¹⁴⁷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 页。

第二节 政治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在政治学领域，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巴林顿·摩尔、塞缪尔·亨廷顿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涉足现代化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在这些政治学家看来，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其中，阿尔蒙德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尤其令人关注。

在阿尔蒙德看来，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政治发展及其导致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过程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体系。例如，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不过，“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¹⁴⁸ 这些分离出来或新建立的角色、结构之间应是一种以自主性为前提的相互依存、协调的网络关系。阿尔蒙德认为，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角色越是分化，新型角色越多；同时，各种次体系，如行政、司法、政党、利益集团、工会等等自主性越高，则政治发展的程度也越高。

从这种角度，阿尔蒙德将传统政治体系与现代政治体系加以比较：一个未经发展的传统政治体系，总是由少数结构担负着许多尚未分化的功能，由一小部分社会集团或个人承担整个政治体系的一切功能；而现代政治体系则存在着明显的分工趋势，愈现代的政治体系，其结构愈是分化，而分化的政治结构有其优越性，使任务专门化，具有效率高的长处，这一优越性总是随着政治结构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长的。政治结构分化由此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政治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

¹⁴⁸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各种政治态度、价值、感觉、信息和技能的独特分布。和人们的态度影响他们的作风一样，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也通过政治制度影响其公民和领袖的行为。”¹⁴⁹ 尽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变迁的过程，但阿尔蒙德坚持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强烈的世俗因素，而在最现代的文化中，也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因素。通过对这两种类型社会的研究，阿尔蒙德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结果，即所有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政治发展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其推动因素又有哪些呢？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包括进入政治体系的输入流程中数量和内容的某些重大变化。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¹⁵⁰ 从实践上看，导致政治发展的事件可能来自国际环境，来自国内社会，或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精英人物，这些都可能成为政治发展的推进剂。

外在挑战或问题往往引起政治发展，因为它们使“现存的文化和结构处于紧张状态”。阿尔蒙德将政治体系面临的挑战或问题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渗透和统一问题，亦所谓国家建设问题；第二类是忠诚和义务问题，或称之为民族建设问题；第三类是参与问题，也就是各种社会集团施加压力，要求参加政治体系的政策制订的问题；第四类是经济建设问题，即运用政治体系来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社会得到产品和服务；第五类是分配或福利问题，即国内社会种产生的，要求运用政治体系的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的压力。¹⁵¹

不难发现，阿尔蒙德眼中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成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推动着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变。

¹⁴⁹ 阿尔蒙德、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51 页。

¹⁵⁰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¹⁵¹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在政治学领域，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很快遭遇到后来者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巴林顿·摩尔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演进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全球性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摩尔追根溯源，梳理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及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民主道路是最早的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上，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的，因此摩尔也把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英、美、法三国意味深长地从各不相同的社会起点出发，相继进入了这一路线。¹⁵² 法西斯主义同样也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它在20世纪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得到明显的例证。摩尔将这条路线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同上述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相并列。在这类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如果它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革命势必夭折。这样一来，相对软弱的资产阶级，被迫与居于统治地位的旧的统治者，如土地贵族或容克地主，实施一种妥协。在准议会政府的支持下，促成了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例。第三条是共产主义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在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农业官僚主义严重禁锢着工商业的发展，挫败了现代化的动力，由此造成的双重后果是：其一、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甚至不能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充当旧的统治阶级的二流合作伙伴，尽管他们曾尝试这样做；其二、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由于最为软弱无力的步伐都难以迈出，这就积累起来自社会下层的不满的力量，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情绪在不断蔓延。¹⁵³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三条不同类型的历史发展路线呢？摩尔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摩尔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传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的影响。如果说，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变为法西斯主义道路的转折点，那么，共产

¹⁵²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¹⁵³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党人集合千百万对旧制度切齿盈愤的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¹⁵⁴

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对于摩尔的思想理论，人们很难用左、中、右的政治模式加以框定，但无论是哪个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来说，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摩尔雄辩地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它不具有普世意义，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是通往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

其二、摩尔认为，暴力和革命，无论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还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都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暴力革命虽然会使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它往往是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抉择。

其三、摩尔指出，政治现代化不只一条道路，他自己就归纳出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强调这三条道路不但相互并列和更代，而且彼此交汇和包融。由此看来，在摩尔那里，民主和自由并没有成为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惟一标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¹⁵⁵

在政治学领域，为现代化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当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这就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立足于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政治秩序论，或强大政府论，从而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构成了挑战。

传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主张，民主和自由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如何，就看民主和自由的深度和广度如何。亨廷顿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强调指出：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施政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

¹⁵⁴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 页。

¹⁵⁵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 页。

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¹⁵⁶ 那么，政治现代化又包含哪些内容呢？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内容。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到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里的任务。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¹⁵⁷

以上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分水岭，实际上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

人们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各种社会问题和压力同时涌现，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相继而来，导致欲望和期待的急剧高涨；另一方面，过渡性社会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却总是低于这些欲望的增长，“于是欲望和前景之间、需求的形成和需求的满足之间，或者欲望的函数和生活水平的函数之间出现了差距”，这种差距便引起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社会挫折感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的诱因。亨廷顿向我们描述了形成政治不稳定的如下过程：

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动员）→ 超负荷的欲望和需求 → 社会挫折感 → （社会流动性机会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加强 → （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不稳定。

在以上的诸多变项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是理解政治不稳定的关键。因此，现代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挫折感、政治参与的扩大，事实上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即使出现了前面这些压力，也会被政治体系所吸

¹⁵⁶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7 页。

¹⁵⁷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4 页。

收转换，而不会引起政治不稳定。¹⁵⁸

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动乱，亨廷顿开出的药方是：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有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政治动员下的政治参与已经不是问题，而政治制度化却还是个艰巨的任务。

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化是指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来衡量。一、政治组织的适应性。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二、政治组织的复杂性。一个组织越是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既包括组织分支在层次上或功能上的多样化，也包括不同类型的次级组织单位的分化。三、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即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它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四、政治体系的凝聚性。凝聚性指的是一个组织应该具有共识和独立的精神形态以保持内部的统一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凝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¹⁵⁹

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如果具备了以上四个特征，也就意味着具有现代性，也意味着它具有能够吸收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维持社会变动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过程，政治制度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稳定，就是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设定的目标。

尽管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仍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坚持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

¹⁵⁸ 张星久：《亨廷顿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

¹⁵⁹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21页。

宿，但不可否认的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更多地考虑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因而与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第三节 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从社会学领域来看，涉足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有帕森斯、列维·斯梅尔塞等学者。这些学者根据结构功能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来考察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在这些学者看来，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的传统性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变的过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与精细化、社会功能的专门化与多样化、社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法制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化与平民化、国家制度的理性化与权威化、政府能力的综合化与权威化。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视角来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当中，最富盛名的当属塔尔科特·帕森斯。

帕森斯首创了“结构—功能主义”，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结构表示着系统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它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务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而同时又各具特殊的属性；功能则是结构内部各种成分与外部情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¹⁶⁰ 帕森斯继承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从社会行动出发来界定社会系统，并“把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¹⁶¹

帕森斯认为，当各种倾向的行动者根据其行为和价值取向的构造互动时，它们逐渐形成了协定，并确立一种互动模式，当这种模式成为“制度化模式”¹⁶² 时，我们就称之为社会系统。不同的社会系统，其行动者可能的行动途径也不尽相同，这被帕森斯称为模式变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其模式变项在五个方面有着不同的区分：

在价值标准上，表现为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指的是在某一互动情境中，行动

¹⁶⁰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i 页。

¹⁶¹ T.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¹⁶² T.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二版序言”，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 页。

者对他人的评价和判断是否适用于所有行动者。在角色关系上，表现为专一性或广泛性，指的是互动中行动者之间的范围有多大。在行为动机上，表现为情感性或情感中立性，指的是互动中行动者表达许多情感还是无需表达情感。在利益取向上，表现为自我取向或群体取向，指的是行动者的行动倾向于自我的私人利益还是群体的公共利益。在角色评价上，表现为成就取向或先赋取向，指的是行动者评价他人是根据绩效还是根据性别、年龄、家庭地位等先天特质。¹⁶³

帕森斯所提出的行动的五组模式变项，把社会行动中任何可能产生的二选一的选择项都包含进来了，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情感性—情感中立性、自我取向—群体取向这三组抉择，反映行动者的取向方式；而成就取向—先赋取向、专一性—广泛性这两组抉择，反映社会客体本身的状况。¹⁶⁴ 帕森斯归纳出的五组模式变项，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的特征的概括：一个是传统的没有分化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系统，一个是现代的经过高度分化而又重新整合的个人主义取向的社会系统。这两个社会系统的结构不同，功能也不同。所谓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从模式变项的一极向另一极转变的过程。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由此构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社会变迁论也是帕森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帕森斯认为，当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势在必行，决定社会结构的四个子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向着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方向运动。¹⁶⁵ 社会变迁包含四个基本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分化，即一个系统或单位分解成两个或更多系统或单位的过程，“分化的过程包括一个具有从它在其中运行的系统来看比它所有分化出来的单位的功能等级更高的主要功能的单位的建立。”¹⁶⁶ 第二个过程是适应能力上升，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使社会单位的资源增加，束缚减少，从而增加了适应能力。第三个过程是容纳，即把以个人地位背景为标准的社会组织

¹⁶³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0 页。

¹⁶⁴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 页。

¹⁶⁵ 李鸿：《帕森斯现代化理论及其缺憾》，《社会科学战线》1998 年第 5 期。

¹⁶⁶ T. 帕森斯：《关于变迁的功能理论》，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99—100 页。

扩大为接纳各种各样人的社会组织。第四个过程是价值通则化，即社会对新分化出来的单位或系统加以承认或肯定。结构分化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最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即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首创了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研究现代化的先河。帕森斯触及领域广泛的多元视角、概括性极强的庞大概念体系，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分析工具。帕森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也被后来的社会学家所继承，从而推动了现代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继帕森斯之后，列维也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进行了区分，列维将二者间的差别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1) 组织的专业化：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 相互依赖性：在现代化社会中，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各单位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非现代化社会中亲属群体与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 伦理关系：在现代化社会中，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中，家庭与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紧密，伦理具有个别性质。4) 集权化模式：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度一样，即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仍然是专制的。5) 社会关系：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与感情中立，非现代化社会则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与具有感情色彩的。6) 交换的普遍媒介和市场：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与市场，非现代化社会的交换媒介与市场不发达。7) 官僚组织：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官僚组织，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官僚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关系基础上的。8) 家庭因素：现代化社会的家庭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其功能也在缩小，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是多重的。¹⁶⁷

¹⁶⁷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

在此基础上，列维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模式的转变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在相关社会的传统模式下先去实现现代化，或者将这些模式保持到相当的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和我们逐渐地相互类似——不是必然因为他们将更像我们现在，而是因为现代化的模式就是，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他们就越相互相似。”¹⁶⁸

在社会学领域，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同样值得关注。在斯梅尔瑟看来，现代化就是不同社会领域在结构上的分化与整合的过程。结构的分化，可以简单定义为从一个多功能角色结构向几个更为专业化的结构的演变。斯梅尔瑟着重探究了几个不同社会领域结构分化的过程，主要包括：

1) 经济活动的分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活动从家庭—社区模式中分离出来，如家庭手工业的兴起；同样的分化也发生在交换系统中，原来以非经济性基础进行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深入到市场中。

2) 家庭活动的分化。经济活动从家庭关系中转移出来的含义之一就是家庭丧失了一部分原有功能，其本身成为更专业化的机构。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庭活动更加集中在感情和社会化方面。家庭功能和经济功能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

3) 价值体系的分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价值观的世俗化，民族主义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经济、政治、科学等制度领域都建立了更接近于自身的模式。统治这些领域的价值观不再由宗教信仰直接认可，而是由自主的理性认可。

4) 社会分层体制的分化。在经济现代化条件下，结构分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其他价值标准对先赋因素的干扰，使得先赋标准越来越从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标准中分化出来；其二、通过职业分层的增加而导致的个人流动，标志着承认的功能地位与其原初地位的分化，逐渐增长的个人流动性，成为工业化的普遍结果之一。¹⁶⁹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3 页；M. 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17—123 页。

¹⁶⁸ M. 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32 页。

¹⁶⁹ N. 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不过，单有结构分化，对现代化来说是并不充分的。在斯梅尔瑟看来，“发展是作为结构分化（已确立的社会的分裂）和整合（在新的基础上联合分化了的结构）之间对立的相互作用而前进的。”对分化了的活动整合，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复杂的整合主要表现于下面几个制度领域：

1) 经济和家庭。在存在分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体系与消费的社会体系相分离，而家庭成员的生产角色也在地域上、时间上和结构上与其独特的家庭角色分离开来，这种分化立即产生了整合问题，现代化产生了许多联结那些新的整合问题的制度和组织，如工会、合作团体、存款机构等，所有这些都有专门的整合作用。

2) 社区。在城市本身中社会结合的最初标准可能是一般部族、等级或村庄；这种标准可能一直存在，也可能逐渐地被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更有效的“功能性”集团所取代。

3) 政治结构。在典型的前现代社会体制中，政治形式包括首领、国王、元老院、强大的地主、强大的巫师和神职人员等。随着社会体系日益复杂，政治体系也随之调整。工会、政治俱乐部、政党等新组织开始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¹⁷⁰

不难发现，相对于帕森斯和列维，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有所超越。斯梅尔瑟不仅强调社会结构分化之后的社会整合问题，而且还注意到社会结构分化组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动荡问题，这也正是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斯梅尔瑟认为不应该夸大从低分化社会向高分化社会转变的突然性，而是强调指出，“从经验上来讲，这种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有选择地影响到社会结构。”¹⁷¹

第四节 心理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49—155 页。

¹⁷⁰ N. 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55—157 页。

¹⁷¹ N. 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63 页。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方位变化的过程，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涉足现代化研究的同时，来自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也不甘示弱，投入到现代化研究的洪流当中。这些学者们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人格、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变化，其中，英克尔斯、麦克莱兰、哈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美国学者英克尔斯以提出“人的现代化”理论而著称，在与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个人的现代化理论，英克尔斯因此成为文化心理学领域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英克尔斯强调人的现代化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他说：“经济学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现代性，政治家以有效的管理制度机构来衡量现代性。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¹⁷² 正因为如此，英克尔斯认为，在研究国家现代化时，应该把人的现代化考虑进去。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理论”，其立足点在于对“现代人”概念或者说是“人的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人的现代性”是英克尔斯现代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其主要思想和研究结论的概念基础。英克尔斯指出，要探讨和回答是什么社会力量促使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以及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此类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哪种人是现代人，以及凭什么标志来判断他们是现代人。无论是作为一种心智素质，或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现代性”都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内容极为复杂的概念。英克尔斯指出：人的现代性，“可以并且通常也应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表现出来。……换言之，它是很多素质的综合体或

¹⁷²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455页。

复杂结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¹⁷³

那么，现代人具有哪些品质和特征呢？通过调查研究，英克尔斯从 12 个方面勾勒出一个现代人的形象：

一、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这是现代人特征中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传统的人则不大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

二、人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具体指的是能够接受社会组织中的改变，社会上大部分人开始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机会，过去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和年轻人与年老者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较自由起来等等。

三、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

四、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现代化的生产程序和管理制度，要求人们严格守时，珍惜时间，这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是非常普遍的性质。

五、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

六、计划。计划是与时间和效能密切相关的现代人的特制。凡是在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趋向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人，我们就认为他具有现代人的品质。

七、知识。现代人乐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充满着尊重知识的风气。

八、可依赖性和信任感。现代人对于“他生活的世界是可信的”与“可以信任他周围的人和社会组织能够实现他们的任务”这两个方面，怀有很大的信心。

九、重视专门技术，由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十、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

十一、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十二、了解生产及过程。现代人积极而又有成效地了解本职工作和与此相关的生产过程和原理，以及生产的计划和部署，边线出个人期望能在认识生产的过程中

¹⁷³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 页。

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与创造力的兴趣。¹⁷⁴

在对现代人所具备的特征进行了考察和概括之后，英克尔斯认为，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在在决定和培养一个人的现代性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其次，工厂是培养和促成人现代化的最重要环境，即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在研究者看来，工厂组织及其运转方式体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基本原则，来自传统背景的人们将会对它们抱赞成的态度。¹⁷⁵最后，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现代性的促进作用。英克尔斯认为，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精心设计的大众传媒，处于其中的个人有可能变得更加现代。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即促使个人现代化的实现。那么，个人现代化的实现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换言之，个人现代化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英克尔斯指出：

“确定个人现代性的态度及价值的改变同时有行为改变相伴随，我们相信这些行为的改变能导致国家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的改变，并支持这种改变。……我们能举出大量记录，说明在政治和公民行为方面，伴随着态度现代化而产生的改变。现代人对于政治事务有较大的兴趣，他随时对重要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有较大的信心，而且能认出他们，他常同政府和政治机构相接触，更加经常地参加许多组织，常常去投票——所有这些活动是很广泛的。在任何方面，现代人都是社会的积极的参与者。……与传统人不同，现代人在很多行动领域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使得社会一般的现代化易于实现。”¹⁷⁶

为此，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这一点，也就是英克尔斯研究人的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¹⁷⁴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34 页。

¹⁷⁵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6—127 页。

¹⁷⁶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1 页。

第五节 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在历史学领域，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理论特别引人注目。布莱克认为：把现代化看作为一个传统体制适用于现代功能的过程是很有用处的，只要对功能方法内在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就行了。虽然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应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可能是最富有成效的方法。历史学的出身使得布莱克有着非常广阔的宏观视野，对社会学结构功能方法的借鉴又使得他能够深入洞察社会的变迁，这样使得布莱克能够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而提出自己的比较现代化理论。

概而言之，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现代化过程的阶段划分。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会经历一个阶段性过程。同样，布莱克也把现代化的阶段划分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在 60 年代中期，布莱克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1) 现代性的挑战阶段——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而现代性的倡导者开始出现；2) 现代化领导的巩固——在持续几代人的往往贯穿着剧烈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手中；3)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4) 社会的整合——在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¹⁷⁷

经过改组后，一种整合社会开始形成，其实质是：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使得相对自主的地区化、组织化、职业化群体的社会结构转变成高度分散的社会，个人在其中是相对分离的。虽然对于现代化进程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但布莱克也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都会并驾齐驱地经过这四个阶段，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可能表现的更从容不迫，每一个相继进入经济社会转变阶段的社会，都是在较发达的社会不断促动的情况下实现转变的。而且，这四个相继阶段的逻辑联系必须要在发展水平相互迥异的领域里来考察，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传统遗产、资源和领导来理解。根据这些阶段来比较各种社会，对于形象地描绘作为一种世界

¹⁷⁷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 页。

性过程的现代化是大有用处的。

到了 70 年代，当布莱克对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考察时，又提出了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论”。第一阶段是现代化变革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与其说是静止不动的线或点，不如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延续期，此间，对现代化运动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趋势开始出现了。第二阶段是现代化变革的实施阶段，其表现是：为了对付内外的挑战，主张搞现代化的上层人士上台执政，他们考虑和制定了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和他们自己的促进这种改革的权力；经过初期的试验阶段后，马上过渡到巩固阶段。到了一定时期，当教育、工业和政治制度开始有了惯性并造就一批参加革新的新型公民时，变革的速度开始加快。第三阶段是高度现代化阶段。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日本和俄国通过不同道路进入到这一阶段，具体表现是人均收入、生活质量都达到很高水平，城市化过程加速，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增强。¹⁷⁸

就表面而言，布莱克对现代化阶段的划分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性，但通过认真研究可以发现，布莱克的上述两种阶段划分是基本对应的，而“现代化领导的巩固”不仅作为衡量“现代化变革准备阶段”向“现代化变革实施阶段”的转变标志，而且构成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次，在对现代化进程本身的认识方面，布莱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着重大的修正和超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方面，布莱克一方面认可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并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人类活动在各个方面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布莱克明确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做法。布莱克指出，在非现代（传统）社会内部，很多事情确实是有差别的，而且很复杂，很难用传统一词加以概括。布莱克说：各个民族都是重视传统的，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面，有些老传统仍然是重要的，而且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有些老传统仍然是重要的，而且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创造自己的、也许并不那么持久的传统。传统的形式对现代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传统的消亡并不证明取

¹⁷⁸ 西里尔·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6—29 页。

代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形式能生存下去。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¹⁷⁹ 从布莱克的论述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是交融在一起的，现代性并非无水之源，它可能来自于传统，特别是经过变革的传统；另一方面，传统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经过改造或变革以后，往往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成为现代的东西。

对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化”与“欧洲化”的观点，布莱克显然也不赞同。布莱克曾这样指出：“西方化”一词的含义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它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使用“西方化”和“欧洲化”这两个词还会出现其他矛盾：一方面，某些国家某一时期起作用的现代化领导力量，不一定是西方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欧洲或西方的某些国家仍然属于比较非现代化的行列。为此，布莱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根据以前几代人的社会传统来理解各个发展阶段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即使一个民族全部照搬一种外国宗教或法律制度，其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实行这些制度的环境的很大影响。布莱克因此提醒世界其他地方不要匆匆忙忙地“集中”效法目前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的形式，因为毕竟不是命中注定这些社会将永远如此。¹⁸⁰

最后，注重对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政治现代化的几种范型。布莱克认为，比较研究在对人类的问题进行系统概括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比较的目的之一，在于对复杂事物的整理和分类；比较的目的之二，在于解释与整理。布莱克等人曾专注于一百多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比较，而比较的标准是根据现代化领导者在获取权力以及在履行其纲领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的特征，具体来说有这样

¹⁷⁹ 西里尔·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3 页。

¹⁸⁰ 西里尔·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4—25 页。

五个方面：1) 一个社会所出现的政治权力从传统向现代化领袖的转变，相对于其他社会而言是早还是晚；2) 一个社会中现代性对传统领袖的直接政治挑战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3) 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热心于疆界和人口的连续性还是经历着领土和人民的重组；4) 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经受着拖延的殖民统治；5) 一个社会进入现时代是带着成熟的体制，还是带着实质上不成熟的体制。¹⁸¹

根据以上的划分标准，布莱克将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分为七种范型：政治现代化的第一范型是由英国和法国构成，它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为所有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旁枝，即白人殖民地或自治领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二种范型，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它们接受了母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政治现代化道路较为顺畅。政治现代化的第三种范型是由那些在法国革命后，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而发生了现代化领导强固的欧洲社会所组成，这些社会所进行的使其政治体制适应于现代功能的活动，稍晚于英法两国，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等。第三范型的欧洲社会在新世界的旁枝可以看作政治现代化的第四范型，该范型包括拉丁美洲二十多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民族独立的实现并未导致现代化领导权之权力的增强，相反却出现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政治现代化道路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那些未直接受外来的干涉，但受率先现代化的社会间接影响而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第五范型，构成这种范型的社会有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等。这些国家的传统政府强而有力，在现代化的长时期能够抵御外来统治，其政治现代化由在任的统治者和官僚策动，因此不可避免受到传统观念和体制上的影响。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一百多个独立的和依附的社会可以划分为最后两个政治现代化的范型。第六范型由 34 个独立国家和 29 个依附国家构成，它们充分发展的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能够与更现代的监护社会的文化相互作用。构成第七范型的是次撒哈拉非洲和大洋洲的 31 个独立社会，将近 20 个依附社会，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语言、政治体制，当它们面临现代性的挑战时，不容易适应现代条件，相反，它们发现原封不动地从更现代的社

¹⁸¹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 页。

会照搬现代观念和体制更实惠。¹⁸²

显然，布莱克对政治现代化范型的划分，其标准基本上是各国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即政治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在范型的划分上越靠前；政治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在范型的划分上越靠后。但问题在于，怎样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着眼呢，还是从政治民主化程度来着眼呢？布莱克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答，这也使得他对于政治现代化范型的划分存在着诸多模糊之处。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布莱克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理论，是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种综合，从这种综合的视角出发，布莱克的现代化理论在深度与广度上比起其他学者有着更大的超越。

¹⁸²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8—175 页。

第七章 从现代化修正理论到世界体系论

20 世纪 60 年代后，一度处于主流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从实践上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被经典现代化理论视为样板的新兴亚非拉国家，陷入政治上的动乱以及经济上的停滞或倒退，从而暴露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与此同时，人们在理论上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使其能适应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来自西方学术界左翼学者或第三世界的学者们，开始从国际经济结构的视角出发，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判或质疑，由此导致了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的兴起。

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陷入困境，一些仍然致力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如埃森斯塔特、德赛等，开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加以反思与修正，并由此而形成了现代化的修正学派，至今仍然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以色列学者埃森斯塔德是现代化修正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埃森斯塔德对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前现代或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遗产会对现代化或现代性构成挑战，而传统的消逝与现代性的增长往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埃森斯塔德通过多年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埃森斯塔德认为，传统的瓦解与现代性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很多国家，仅仅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不一定能保证新的、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框架的解体，不论是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有时甚至是传统政治背景的解体，往往导致更无组织、更懈怠和更混乱，而不是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由此看来，“传统社会遭到破坏和摧毁的变化过程与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

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种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另一种变化。”¹⁸³

在现代化研究中，传统应该放在什么地位上，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经典现代化理论遭遇后来者的批评最多，但是这些批评并不一定要否定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与现代的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差别，相反，这些批评使得这些差别有重新详细阐释的必要。埃森斯塔德承认现代性力量的扩张会对传统社会造成冲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性力量冲击了各种现存的传统制度领域内的一些基础——经济的、政治的或社区生活的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向它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其成员开辟了新的前景。其次，现代性力量造就了一个新的国际系统，其中现代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差别是国际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最后，现代性力量通过破坏传统的经济结构并建立分化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冲击不同的传统社会。

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向现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转变，首先在欧洲国家得以完成。现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特征包括：1) 疆域内的居民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2) 在象征性和实际意义上保持对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拥护，中央与人类生存的比较原始的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3) 明显地重视在政治上为全民确立集体的目标。¹⁸⁴ 这些特征 18 与 19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身上得到明显体现。

至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模式，在埃森斯塔德看来，即使在西欧也不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不过，与欧洲以外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相比，它又是相对一致的，至少在理想形式上如此。从当今的情况来看，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全世界崩溃，但这并不一定说正在形成中的体制和秩序将按照欧洲产生的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来效仿，实际上后传统的秩序之间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充分说明，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欧洲中心论及其社会发展的单线路径，都是缺乏实践检验的。

¹⁸³ 埃森斯塔德：《殖民地和传统政治制度对后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影响》，载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5 页。

¹⁸⁴ 埃森斯塔德：《殖民地和传统政治制度对后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影响》，载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2 页。

在后期发表的《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一文中，埃森斯塔德对于欧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现代性在欧洲首先产生，伴随着现代性而发生的重要转型包括中心的日益世俗化、对现存的内容和象征符号的不接受以及可以对这些内容和象征符号重新加以考察的假设的普遍流行；这种变化是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心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然而，在欧洲现代性基础上产生的欧洲文明，在向全世界扩张以后，并不是形成一个体系，而是多个体系。正如埃森斯塔德所说：“在欧洲产生的新文明后来传播到整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的每一个体系都是以这个文明中的某些逻辑前提为基础的，但在同时，这种文明也造成了一种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发生变迁的趋势。通过这种扩张，出现了一种形成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制度与象征框架的趋势，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框架都是新的，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伴随欧洲的扩张而来的，并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实际上也是世界性的体系，这些体系并不是来自同一个中心，而是来自于多元的或多极的中心，每一个体系都会形成自己的动态过程和自己对其他体系所做反应的方式。虽然这些不同的体系都是产生于同一个地方，即产生于西欧，虽然它们也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每一个中心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不同的。”¹⁸⁵

从埃森斯塔德的分析可知，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在向欧洲以外的世界扩张过程中，自身也发生变异，从而形成多元的或多极的世界性体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成长的方式有所不同。在西欧，现代性基本上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即“内生型的”——尽管在欧洲的不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换言之，这种发展主要是通过某些群体的内在潜质发扬光大以及通过这些群体持续不断的互动实现的。然而，现代性在欧洲以外的扩展则明显具有外部力量侵

¹⁸⁵ 埃森斯塔德：《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5页。

入传统社会和文明的性质——实际上西欧社会的逻辑前提已经构成对那些必须做出不同反应的社会的严重挑战。

在非欧洲地区，现代性的扩张及其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与本土社会与传统的一种互动与反应模式，即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文明定型化的动态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和反馈，造成了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制度和象征轮廓的定型化，他们的动态过程及其内部的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这些互动和反馈包括受到新的现代国际体系冲击的那些文明与社会的基本逻辑前提和这些社会进入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在这些文明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异端、造反和创新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和文明连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结合方式以及对现代性逻辑前提的重新解释加以定型化；将对此的象征反应方式加以定型化；形成各种现代制度模式和动态过程，或者反过来，将对这些文明的逻辑前提和历史传统的重新解释的方式加以定型化。¹⁸⁶

这样看来，埃森斯塔德所说的现代文明的定型化，并不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欧洲文明在非西方世界扎根成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欧洲现代性与本土社会传统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欧洲的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从这一点而言，强调欧洲文明的普适性与现代化道路的惟一性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埃森斯塔德这里就遭遇到了有力的挑战和修正。

印度孟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德赛教授对于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也提出了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德赛认为，当前现代化的著作存在着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范围极广的现象，非常有必要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仔细而批判性的重新评价。

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并且是全世界的最终目标。德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的害处是用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观点去看待发展，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道路的惟一性，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普世性，过于简单化与理想化了。

¹⁸⁶ 埃森斯塔德：《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68 页。

从现代化后来者的实践来看，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过程至少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它出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它出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推动力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下层的工人或农民阶级。德赛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我的看法是，以两种道路为基础划分现代化，有助于我们区别各个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的核心过程的性质，它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作努力和倾向的性质，它还将使我们消除谬误，这种谬误通常是由于我们在选择一些根本无法进行比较的研究单位时产生的”¹⁸⁷

德赛进一步指出：正在试图使自己现代化的欠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它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二战结束后不少国家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德赛的看法并不乐观：五十年代，若干学者对这条发展道路持乐观态度，但现在慢慢地变得怀疑起来，当前的潮流已经预见到这条道路的未来非常黯淡。因此，德赛呼吁学术界加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影响的研究，并认为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现代化修正学派中，虽然也有学者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发展单线论，批判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除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学者们并没有具体作答。在德赛这里，我们却找到了答案。德赛一方面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功之处，但另一方面，德赛又充分认识到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面临的不同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见，在德赛这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剥离了，现代化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不只一条，现实世界至少存在着两条，它们都能指引一个国家成功地迈向现代化。因此，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¹⁸⁷ A. R. 德赛：《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载 C. 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7 页。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现代化研究热潮逐渐消退，并为发展研究所取代，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他们潜心于现代化的理论的开拓与创新，并由此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这些学者当中，较为有名的有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德国学者查普夫、中国学者何传启。

富永健一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社会学教授，他以对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理论的卓越研究而享有盛誉。与其他学者相比，富永健一所关注的是现代化在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条件。富永健一首先认可现代化产生于西方这一点，他指出：“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科学革命、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以下将三者合称为现代化革命），用韦伯的话来说，是‘只在西方’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现代科学、现代产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只要与现代相关联，一切都产生于西方”¹⁸⁸

那么，西方现代化的动因何在呢？富永健一的解释显然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富永健一看来，现代化是社会系统发生结构变迁的过程，而发生变迁的动因，或来自系统内部，或来自系统外部，西方的现代化，是由内生因推动的社会发展，是“内在型”现代化。究其根源，这种推动西方现代化的内生的精神要素又是什么呢？富永健一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作为技术现代化之动因的科学精神。从科学革命到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是西方人发明并承担现代化、产业化的本质要素之一，其得以实现的动力就在于科学精神。

（2）作为经济现代化之动因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指推动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要素，这种精神也是诞生于现代西方的东西，而没有自生于东方。

（3）作为政治现代化之动因的平等主义精神。给向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社会变迁以动机的，就是平等主义的精神。这是西方人最先发明的，并由西方人最先发动了这一运动，是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之一。

（4）作为社会文化现代化之动因的合理主义精神。合理主义精神，实际上已把

¹⁸⁸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118 页。

科学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平等主义精神都作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包含于其中。因此，在其他三种精神都未充分发达的非西方社会，合理主义精神也没有充分发达。¹⁸⁹

与西方国家相比，后起国家社会系统的结构变迁的动因不是生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的文化传播，这属于一种由外生因素推动的“传播性”发展。当后起国家站到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时，其外部已有了更先进的社会，而且这些先进国家在社会文化上处于突出优势，因此，后起国家便被置于不得不通过文化传播来接受其冲击的地位。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有些后发国家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日本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为此，富永健一试图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寻找素材，并尽可能概括出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若干条件：

第一，输入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的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

第二，由现代化的杰出人物承担工业文明的输入和稳定。由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此只能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现代化智能“自上而下”地进行。

第三，出现使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即出现学会了外来的工业技术并将作为外来文明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再加上掌握现代技术的工程师；另外还必须具备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掌握熟练技术的人；在市场上以工业产品的购买者身份出现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以及对企业家活动的广泛的支持者等各个阶层的人物。

第四，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之间对立的消除。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的对立也存在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但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尤其不可避免，因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国粹主义的反感。¹⁹⁰

¹⁸⁹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193页。

¹⁹⁰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2页。

从以上论述可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西方现代化动因的概括以及对非西方后起国家现代化条件的总结。就前者而言，富永健一从精神因素视角，总结了现代化起源的若干因素，突出了精神动因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斯·韦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后者而言，富永健一所总结出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若干条件，虽然主要基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但其普遍意义依然明显。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是个被动型的发展过程，富永健一对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了相关的决策建议，对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制定，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查普夫，对现代化理论在当今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查普夫首先从多个方面对现代化进行了界定：“现代化可理解为在以下各社会领域（次系统）中相互影响的结构变化：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民主化，以及继之而来的福利国家的保障和在政治领域的再分配；工业化，自源性经济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三产业化，即：扩展服务行业并把它纳入经济领域的大众消费之中；城市化、发展教育、大众通讯（社会流动）和随之而来的更小的社会领域中流动性的提高；文化领域的世俗化、理性化和普遍主义，其原因之一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个人领域的个人主义化、成功取向。从系统角度观察，现代化即全体社会调适和自控能力的提高，即资源和负荷同时增长并出现顺差。从历史角度观察，现代化即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长期结果，革命促进了几个国家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模仿和赶超的进程。”¹⁹¹

不难发现，查普夫对于现代化的界定，基本类似于现代化综合学派的观点，但在此基础上，查普夫又加以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这体现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仅仅将现代化看作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全方位变迁的过程，而查普夫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超越，他明确指出：“我认为现代化有三种时间上的关联：首先，它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百多年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几个当今的现代社会发展起来；其次，可将其看作后进国家多种多样的追赶过程；最后，它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努力过程，通过创新

¹⁹¹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与改革迎接新的挑战。”¹⁹² 由此看来，查普夫眼中的现代化，是一个自 18 世纪以来起始至今尚未完结的过程，当今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查普夫将其推进工业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纳入现代化，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但就发达国家而言，查普夫不仅将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变迁纳入现代化的范畴，而且将西方在完成工业化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也视为现代化，即把我们熟知的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也纳入到现代化的范畴，这可以说是其现代化理论的独特之处。

也正因为查普夫对现代化的界定较为宽泛，尤其是将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社会迈进也纳入到现代化的范畴，所以其现代化理论的涉及面也较为宽泛，尤其是较多地涉及到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原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在确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查普夫对于现代社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大多数学者从表征方面来界定现代社会时，查普夫则建议从基本制度的几个方面来界定现代社会，即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发展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

首先，现代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体现为竞争制民主，其表现是政党和候选人按照宪法规定争夺权力，而这种权力将在一定时间内交付给他们。竞争制民主包括一个发挥作用的法制国家，也包括各利益群体间的争论和多元化的公共舆论。其次，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按照比如社会福利国家规定的范围不同而有所改变。最后，发展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大众消费意味着“所有人的富裕”和公民的选择可能性，福利国家则保证个人基本权利意义上的社会安全。¹⁹³

不仅如此，查普夫还从世界社会的三级模式出发，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为发展中国家探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查普夫认为，世界社会是一个明确分层的社会，其中，经合组织国家是上层，拥有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等，但其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多种政体。转型社会当中也有通向现

¹⁹²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4 页。

¹⁹³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6 页。

代社会的不同道路，只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与西方竞争最激烈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才渐渐丧失了竞争力。世界社会中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群体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仍然在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奋斗。除了上述三个阶层外，还有两个特例就是中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社会也可以成为向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转型途径的理论起点。

世界社会的不同分层，决定了世界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查普夫明确指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也不是直线、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几个被界定的发展路向区别开来，并且对这些不同路向进行常识性的阐述。”¹⁹⁴ 这种理论创新，为现代化研究打开了一组多维界面。

第二节 依附论的兴起

谈及依附论的渊源，首先就涉及到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该组织于 1950 年发布一份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¹⁹⁵。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源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以及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使得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无法进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恰恰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首要动力。在普雷维什等经济学家看来，“外围资本主义主要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实施改造。在改造过程中，要综合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素，“根据一项技术上协调的、并以民主方式通过的计划，将剩余合理地用于积累、消费和国家的开支。”¹⁹⁶ 普雷维什等推荐的具体方案包括：合理分配和使用稀有资源，搞出口多元和进口替代，加速工业化，实行全国经济一体化，用国家机器推动制度改革等；惟有如此，才能消除落后的边缘

¹⁹⁴ 李鹏程：《茨阿波夫（查普夫）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意义和启迪》，《国外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

¹⁹⁵ 劳尔·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R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纽约 1950 年版。

¹⁹⁶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82 页。

地区对发达的中心区的依附。¹⁹⁷

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所提出思想主张，从实践上看，在 50 年代拉美一些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中得到推行，而且在理论上为后来依附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际经济体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前提，二是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重要的政策的开放性方法。¹⁹⁸为此，尽管后来的依附论五花八门，但普雷维什仍然被誉为该理论的先驱。

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不仅在拉美及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大批学者开始沿着普雷维什等人所开创的道路，从国际经济结构这一外部视角，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并试图给出解决的方案，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依附论。严格说来，依附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理论，而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或者说是一个理论的集合。依附论内部流派众多，代表人物庞杂，理论观点各异。为论述上的方便，这里我们从价值倾向上将依附论划分为这样三种类型：激进的依附论；正统的依附论；改良的依附论。

激进的依附论，又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巴兰（Paul Baran）以及智利学者桑克尔（Sunkel）。1942 年，斯威齐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出版，这一著作被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1968 年，斯威齐与巴兰合作，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之间的关系。出生于俄国的保罗·巴兰则明显受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是 1957 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¹⁹⁹ 以及 1968 年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巴兰显然借用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结构分析模型，不过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零和游戏规则，即一些地区的发展必然会以牺牲另一些地区为代价。在巴兰看来，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

¹⁹⁷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55 页。

¹⁹⁸ 查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5 页。

¹⁹⁹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纽约 1957 年版。

主要障碍，并不在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小，而是在于这些经济剩余的被利用方式极不合理；当然，如同其他依附论者一样，巴兰依然强调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

激进的依附论的后期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弗兰克的代表作是《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²⁰⁰、《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²⁰¹等。弗兰克把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看作它们不发达的根源，他明确指出：“我坚决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过去造就了不发达，现在仍然造就不发达。”²⁰² 资本主义为什么造就不发达呢？弗兰克认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宗主—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弗兰克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帝国主义阶段，在每一阶段，外围与宗主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依附关系，不平衡的贸易格局使得资本积累从外围流向宗主，这造成了宗主的发达与外围的落后。弗兰克的这一观点是对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直接挑战，因为他不仅否定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判定，而且也否定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不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技术“二元结构”的观点。²⁰³

萨米尔·阿明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思想体系以精细与复杂而著称。从20世纪60年代起，阿明不断有著作问世，但其依附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世界规模的积累》（1971）、《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与不平等发展》（1976）等著作中。对当代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模式的研究，构成了阿明依附论思想的基础。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边缘”两种不同模式，阿明将资本积累相应地划分为“中心型资本积累”与“边缘型资本积累”，前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模式，以“自我集中”为核心，受到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所驱使；后者是处于资本主

²⁰⁰ 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纽约1967年版。

²⁰¹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²⁰² 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前言，纽约1967年版，第11页。

²⁰³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

义“边缘”地带国家的积累模式，具有外向性和依附性的特征。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并存，使得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造成边缘国家的贫困与落后。²⁰⁴

对于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阿明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甚至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延续，而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外壳。外围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外向性和依附性。外向性是由殖民地贸易、外国投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等因素造成的，这使得外围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依附性则是指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一种全方位依附，它表现为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还包括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这种依附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而得以延续，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按照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程度来加强不发达的特征，必然导致阻碍增长，换句话说，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增长。”²⁰⁵

激进的依附论，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即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总根源，或者归结于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归结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与此相对应，在激进依附论者看来，第三世界要改变这种依附或不发达局面，就必须脱离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种单纯强调外因的做法，遭到后来学者的质疑，如“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²⁰⁶ 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正统的依附论随之产生。

正统的依附论，又称主流依附论，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他曾在巴西政府的经济部门供职，在军事政变后旅居国外，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多斯桑托斯对于依附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依附论中的核心概念“依附”做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与阐释，给出了依附论学者中最为清晰的阐释。多斯

²⁰⁴ 张雷声：《试论阿明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3期。

²⁰⁵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9页。

²⁰⁶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桑托斯这样定义道：“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²⁰⁷

其次是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在多斯桑托斯看来，二战结束后，几种新的依附形式表现为：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他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当然，这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都具有可能性和局限性，而“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多斯桑托斯“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²⁰⁸

作为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发展实践的一种反映，正统的依附论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这意味着无论在殖民时代，还是在后殖民时代，附属国对统治国的一种依附性关系依然没有改变，这也是导致不发达长期延续的原因；另一方面，正统的依附论除了关注这种外在依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以外，还特别关注外在依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扭曲，因为这是不发达状态延续的重要内因。

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正统依附论的修正，其代表人物是巴西社会学家卡多索（Cardoso）、智利历史学家法勒多（Féletto），其代表作是卡多索的《依附与发展》以及二人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从理论倾向来看，卡多索既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根源归结于内部因素的观点，也反对弗兰克等激进依附论者将其归结为外因的观点。激进的依附论与正统的依附论将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状态归结为依附状态，认为打破依附状态才能实现发展，卡多索则对这一观

²⁰⁷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2 页。

²⁰⁸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中译本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²⁰⁹

卡多索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加速了不发达，但在依附状态下也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卡多索承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不发达地区的依附状态，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发达地区有限度的发展，这造成了不发达地区的社会利益分裂成“二元结构”，即与跨国公司有联系的利益和被它们边缘化的利益。²¹⁰这使得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亚层次的“中心—边缘”结构，一些地方由于发展而成为中心，另一些地方由于被边缘化而更加落后，“二元社会结构”由此而产生。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中，卡多索与法勒多二人特别关注依附国内部各社会势力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各个阶级如何与不同的外国势力结盟或发生冲突、组成不同的政府形式、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努力实施不同的政策或确定不同的战略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帝国主义的挑战。”这种对依附国内部因素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依附局面形成的根源。²¹¹

在政策主张方面，卡多索与法勒多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依附与工业化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但依附性发展会带来很多局限，如收入分配上的更大的不平等。为此，依附国家推行进一步的工业化，就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或“进行一场转向社会主义的剧烈的政治运动”。²¹²显然，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一种折射，它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论内部派别庞杂，观点众多，但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依附论者的观点还是基本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基本一致的观点，构成了依附论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

²⁰⁹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3 页。

²¹⁰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2 页。

²¹¹ 欧曼、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3 页。

²¹² 卡多索、法勒多：《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加利福尼亚 1979 年版，第 155 页。

涵，人们据此能勾勒出依附论的总体架构。总体来看，无论属于哪个派别，依附论者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从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外部因素出发，提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并从二者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不发达的根源。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这些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依附论者则对此进行严厉批判。在依附论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其根源并非在于内部的社会结构，而是在于其所处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为了进一步展开分析，依附论者对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了二元化的划分，即划分为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即发达国家，而边缘即发展中国家，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第二，依附是不发达的表现形式，又是造成不发达的根源。²¹³ 在依附论的思想体系中，依附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对于什么是依附，不同学者的阐释不尽相同，但学者们基本认同的一点是，依附是指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一种依赖关系或状态，这是二者之间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它造就了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局面。中心—边缘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等依附关系，是依附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学者看来，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当今时期，也不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而是贯穿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这样一来，依附就成为一个近代以来延续至今的历史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依附的形成及发展，由此成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主要根源。

第三，为不发达国家在依附条件下的发展指明道路。同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样，为当今不发达国家找到一条发展道路也是依附论的最终目标。从这些学者提出的方案来看，他们所强调的有如下几点：其一，强调在依附国内部推行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涉及到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其二，突出国家的作用，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权的力量，依附论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干预；其三，依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是所有外围国家经济的共同特征，虽然早期依附论者曾主张走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道路，但后

²¹³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0 页。

来的依附论者都修正了这一主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脱离国际市场而谋求自身发展是不可能的，为此，大多数依附论者依然重视国际市场，只不过号召外围国家团结起来，为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面貌而出现的依附论，俨然成为一棵“常青树”。在实践方面，依附论在拉美一些国家被上升为官方的政治哲学，并成为这些国家推行结构性变革的指导思想。但好景不长，到六、七十年代，经过了十多年的繁盛之后，依附论因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而面临危机。尽管依附论在 70 年代后风光不再，但依附论兴起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将国际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而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合理的框架之中。在分析不发达的原因时，依附论注重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寻找，这种开放性的视角比起经典现代化理论更加深刻。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依附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依附论否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普适性的推崇，而明确提出：不发达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依附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节 世界体系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依附论因遭遇挑战而陷入全面危机之际，在继承与发展依附论基础上的一种新理论悄然兴起，这就是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

总体来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论点：第一，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²¹⁴

世界体系是世界体系论的基础概念，那么，什么是世界体系呢？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

²¹⁴ 程同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 6 期。

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强弱。”²¹⁵ 世界体系“是一种世界经济，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最基本的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²¹⁶

16 世纪以前，即早期的世界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这些帝国拥有单一的政治中心，但几乎没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性经济”，所以极其不稳定。到了 16 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起源及其发展，以西北欧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欧洲延长的 16 世纪便已产生了，它促进了一种特殊的再分配或纳贡式的生产方式，即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布罗代尔所说的经济上的旧制度）向一种性质极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转化。”²¹⁷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着内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间的竞争及国家间的竞争，它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就经济间的竞争而言，这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上。沃勒斯坦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思想，不仅强调资本积累是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个剥削和压迫的过程，而且更强调剩余价值的积累是在世界体系中进行的。

第二、现代世界体系呈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²¹⁸

16 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西北欧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不过，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而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并呈现放射状，中心—半边缘—边缘由此成为现代世界体

²¹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0 页。

²¹⁶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的政治学》（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剑桥 1984 年版，第 15 页。

²¹⁷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²¹⁸ 程同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 6 期。

系的结构特征。中心是世界体系的轴心和主导，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由于体系的开放性，生产技术的传播也比较迅速和自由，由此导致中心的不稳定性，中心不断地随着技术先进性的转移而更迭。在世界体系中，中心地区经济上的优势确保了其对贸易市场与金融市场的控制。边缘地区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在纳入到世界体系之前，一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与中心区建立经济联系后，虽然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被打破，但生产形式依然保持，贫困落后状态依然延续。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划分，显然借鉴了依附论学者的观点，不过，沃勒斯坦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最富有成果的概念。沃勒斯坦认为，在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区域，即半边缘区，该区域兼具中心区与边缘区的经济特征，“它们是中心区的边缘，又是边缘区的中心。”²¹⁹半边缘地区具有半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们今后的两种发展方向：要么维持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制度，从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不断扩张中进一步边缘化，最终沦为边缘区；要么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从而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中心—半边缘—边缘这三种角色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没有边缘，就没有中心，没有中心—边缘，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²²⁰这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地区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所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²²¹由此看来，由于引入了半边缘的概念，沃勒斯坦所构建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完全区别于依附论的那种僵化的二元体系，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和可变性，该体系内部的流动性确保了其整体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边缘区域、

²¹⁹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剑桥1979年版，第96页。

²²⁰ 特伦斯·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论》（Terence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贝维利·希尔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3页。

²²¹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中心区域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区存在着向上攀升的可能性，而中心区也存在着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这种前景使得边缘地区的反体系运动很容易被同化，由颠覆体系的企图转变为谋求内部发展的努力。²²²

最后，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未来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预测。

在沃勒斯坦的眼中，世界体系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也会经历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从16世纪形成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走过了500年的路程，它从最初的西北欧，一直扩张到当今全球每个角落，因而成为第一个覆盖全球的历史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由于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而在过去五百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20世纪末，世界体系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动乱将会有下列几种根源：1) 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支配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规范，从整体上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 以萨达姆·侯赛因为代表的力量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来挑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统治地位；3) 整个世界体系中，从南到北的国家都可能出现的由于贫富分化等造成的大规模人民运动。4) 国家结构的弱化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动乱。²²³

面对这幅大动乱的前景图，沃勒斯坦并没有感到悲观失望，他预测了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三种可能性：1) 新的封建主义，世界将被分为细小的主权体，成为高度自足的地区和地域性等级系统；2) 民族法西斯主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上层对完全无力反抗的劳动阶层进行统治和压迫；3) 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一种高度分散又高度平等的世界秩序，市场不再发挥作用，生产为使用价值而进行，实行平均分配。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沃勒斯坦最看好第三种可能形式，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但这并不是一种现存的形式，即不是当今世界少数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²²⁴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未来前途的构想，但是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后的状况怎么样，沃勒斯坦自己也说不清：“我们还不知道，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即一个急剧缩小所有人之间物质生活差距和实际权力鸿沟的

²²² 安然：《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²²³ 赵自勇：《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²²⁴ 郭尚鑫：《简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观》，《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2期。

世界秩序，将会怎样运行。现存的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运动对未来提供不了多少指导意义。它们是当前的现象，即，是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象，因此必须在这个框架下对它进行评价。”²²⁵

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对现代化问题的几点创见。首先，沃勒斯坦认同经典现代化学者们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区分，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性，进而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沃勒斯坦指出：“要对‘现代’的性质和特征下定义，肯定会引起很大争论。而要探寻这一变迁过程的原动力，认识上的分歧就更大了。然而，社会科学家看来普遍认为，在以往几百年内，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存在着质的不同。甚至那些拒不同意确认进步的进化论假说的人们，也承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差异。……由于缺少更合适的概念工具，我姑且把这个过程构想为现代化过程。”²²⁶可见，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及其扩张，使资本主义的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关系的全球扩展的过程。

第二，从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来考察当今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对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关系的探讨，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中心议题。经典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是不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而依附论关注的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外在因素，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将“依附论的外因论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内因论结合起来，静体系运动的根本原因规定为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整个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体系内部各个国家、地区发展的直接原因，则要到世界经济体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运行状态中，即各国社会经济结构（内因）和外部生存环境（外因）的总和中去寻找。”²²⁷

最后，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前景持一种历史悲观主义态度。在当今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如何呢？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一视角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尽管中心—半边缘—边缘之间存在着双向流动的可能性，

²²⁵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7页。

²²⁶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²²⁷ 安然：《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发达国家整体的社会转型问题。解决当今不发达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建世界体系，即以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来取代当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单靠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世界性的努力，各国同时行动，才能完成整个体系的转化。在这里，沃勒斯坦对未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状况没有具体描述，实际上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一体系的实现途径，沃勒斯坦同样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因为全球行动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总体看来，世界体系论的提出，是在现代化经典理论与依附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现代化理论深入发展的标志。世界体系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驳，从侧面为现代化经典理论的自身修正和发展，乃至为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兴起，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八章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以及全球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欧美等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到“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80 年代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 90 年代后两极对峙格局的终结，促使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便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开始逐步为发展研究所取代。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发展理论纷纷出台，它们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修正，并从后现代视角对发展问题提出新的解说。这实际上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兴起，90 年代趋于成熟，至今仍然兴旺不衰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节 后工业社会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后，西方国家开始经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后工业社会的若干特征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起这种社会变迁，并力图勾画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对未来社会做出预测是否可行呢？贝尔这样解释说，社会发展预测具有两个客观基础：一是规律性与重复性，二是连贯性与持续性。“只要存在规律性发展和重复出现的现象（那都是罕见的），预测就有可能；或者存在持续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方向（不一定是确切的轨道）可以用统计的时间系列加以测定，或者可以排列成历史发展趋向——那么，预测也是可能的。”²²⁸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贝尔提出了其“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理论。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最主要的不同就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改造和职业体制改组的方式，而且也涉及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科学与技术之

²²⁸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8 页。

间的新型关系。贝尔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后工业社会在如下五个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

二、职业分布方面，表现为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从职业分布来看，后工业社会最惊人的变化就是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增加——这通常要求具备大学程度的职业——其增长率是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三、中轴原理方面，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贝尔指出：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存在，都依靠革新以及社会对变革进行管理，并力求预测未来，以便作计划。承担管理社会的这种任务，使得社会有了制定计划和进行预测的需要。正是由于对革新的性质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才使得理论知识变得如此重要。

四、未来的方向方面，表现为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一个现代社会为了避免停滞，就必须开辟新的技术领域，以便维持生产能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技术变革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五、制定决策方面，表现为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贝尔认为，发展一种新的智能技术，到 20 世纪末有可能像机械技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那样，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同样突出的地位。²²⁹

在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后，贝尔还总结了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三个方面：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从中轴结构或中轴原理而言，后工业社会意味着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而且，在知识方式上抽象的中轴从经验主义或者试验失败的修修补补转变为指导发明和制订政策的理论和理论知识的汇编。

总体而言，“贝尔对工业社会的未来——后工业社会的研究，是对西方现代未来

²²⁹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0 页。

研究在社会预测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²³⁰ 贝尔关于工业化完成以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未来社会有一定启发。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事实上就是现代化完成之后的后现代社会，而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出现。贝尔敏锐地体察到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了预测和研究。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已充分显露，贝尔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相当一部分已经被验证了，体现了贝尔思想的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在分析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时，特别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最新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当今已经被证实。这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机遇，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要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实践意义。

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美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虽然贝尔声称自己所研究的后工业社会是对现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种超越，并且也一再提出苏联也将会出现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征，但贝尔的研究，尤其是他对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概括，基本上来源于美国的社会图式，进而在不知不觉中把美国的图式普遍化，变成后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观，依然没有脱离美国中心论的窠臼。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评述道：“无论我们还要对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说些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后工业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一步”²³¹

第二节 新发展观

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传统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观，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开始质疑、批判传统的发展观，

²³⁰ 秦麟征：《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信息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1 页。

²³¹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 页。

并由此形成新的发展观。在破除旧的发展观、形成新的发展观的过程中，佩鲁的成就尤为引人关注。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长期以来从事发展问题研究。在佩鲁看来，传统的“增长优先”或“增长第一”战略在实践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恶果。这种发展战略尽管会带来产品总额的增长，但同时也会造成自然资源状况的恶化，造成竭泽而渔的结果，这已是今日人所共知的常识。佩鲁对于这种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有力批判，并主张在改造旧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

佩鲁的新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它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新发展观是一种“整体的”的发展。在佩鲁看来，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这种整体性的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并不带有任何现行国际贸易理论意义上的“外部”成分。按照这一发展观，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要实现世界各国之间的平等合作、共同繁荣。

其次，新发展观是一种“内生的”发展。具体来看，内生的发展计划是建立在对潜在人力资源鉴别的基础之上的，它把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不同职责作了划分，试图把地区计划与国家目标加以等级区分，并在向上的信息流与向下的信息流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联系。按照这一发展观，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本国的内部力量和资源，通过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实现。

最后，新发展观是一种“综合的”发展。佩鲁认为，综合的发展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和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增强的内聚力。综合的发展计划可以使对外贸易与内部的生产体制，贸易体制和分配体制有机地协调起来。按照这一发展观，综合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个经济增长

过程，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²³²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以外，佩鲁还特别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文化价值的作用。佩鲁强调指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或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²³³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尺度相一致，偏离了这种价值尺度，也就偏离了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偏离了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向。正如佩鲁所言：“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深入到人们所设法永久保持的但常常又是虚弱的社会的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²³⁴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佩鲁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其基本特点在于：它强调的不再是物质的静态增长，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克服了单一的经济增长论的弊端，强调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的一致性，强调探寻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价值的发展模式；它突出了人在发展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即发展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应该包括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精神生活的丰富；它强调发展应该是个综合的过程，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政治、社会发展以及财富分配等方面也应该包含其中。佩鲁的这种“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首开西方发展理论自身反思和批判现代性之先河，它强烈冲击了传统的发展理论，为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生态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环保主义者极力抨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现象，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互相对立，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到 80 年代后，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些在国际上有

²³²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²³³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

²³⁴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9 页。

着影响力的工业家、政策制订者以及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发展是可行的，它们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是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在 80 年代初由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勃（Joseph Huber）提出，胡勃也因此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该理论首先在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国产生较大影响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理论的创建当中，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马丁·詹尼克（Martin Janicke）、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 Mol）、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默瑞·柯汉（Maurie Cohen）、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等。这些学者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替代性思路，将理论关注的重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以及如何通过市场手段来克服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接受了生态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并在制定其政策目标时加以贯彻推行。这样一来，生态现代化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而是已经在逐步付诸实践的理论，其理论的经验研究不仅仅限于西欧，而且扩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甚至在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种仍在发展中的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较为庞杂，其体系还没有完全定型，而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现代化本身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胡勃将生态现代化定义为一种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在胡勃看来，生态现代化的精华是“经济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过程。资本主义的动力能够被用来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绿色资本主义”），而国家的作用只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引起环境改革的多样化的创议和战略中的一个要素。环境运动不需要国家来实现它的目标，80 年代环境运动与受到限制的工业部门，有时甚至孤立的公司之间的一些“直接谈判”形式变得流行，这些都使得生态现代化的推行成为可能。²³⁵

²³⁵ 克里斯托弗·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9 页。

德国学者詹尼克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补救性策略是指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失给予修复或补偿并采取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环境污染，预防性策略则是通过技术创新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时通过社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生态化使得那些引发环境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被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所替代。詹尼克对于这两种策略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国家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詹尼克指出：没有国家干预的生产和消费的绿色是不可能的，生态现代化必须得到国家以绿色工业政策和目标团体方法等政治干预新形式的积极支持。在这一方法中，公民角色和国家进入谈判，有关各方尝试就内容相关的标准和措施在自愿接受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由此看来，詹尼克这里所讲的生态现代化过于表面化，偏重于其实践方面，它仅仅为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处理生态问题时给出了一条规划策略，并没有揭示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也没有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方面做出努力。²³⁶

荷兰学者哈杰尔对于生态现代化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在哈杰尔看来，生态现代化可以被设想为是在商业、科学的重要部门（自然的和社会的）、改革主义的进步政治家和环境运动的大部分之间的话语联盟，话语联盟中的不同伙伴引入了使环境退化议题可计算和量化的概念，从而为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哈杰尔进一步指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政策研究的出现将统一学界，将有利于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为工业政策的制订者和政府领导人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从实践层面看，哈杰尔认为，虽然要想精确说明我们朝着生态现代化方向到底走了多远还比较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现代化的理念对于造纸、汽车制造和化学等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²³⁷

荷兰学者摩尔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内涵有着自己的看法。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环境改革的实情、机制和动力，在这些国家里，生态现代

²³⁶ 郭熙保、杨开泰：《生态现代化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

²³⁷ M. A.哈杰尔：《环境议程的政治学：生态现代化与决策过程》（M. A. Hajer,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牛津1995年版。

化包括一系列的机制转变：一、改变科学和技术在环境决定和改革中的作用。科学技术不仅是环境问题的成因，而且是治理和防止环境问题的潜在的和实际的工具；传统的生态治理和恢复方法将被更强调预防的社会技术取代，这种技术是针对环境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科学和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科学技术是环境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不应减少科学技术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二、增加经济和市场因素、经济组织在生态重建和改革中的重要性。三、政府在环境改革中的传统的核心地位在发生变化，这包括：更加分散、灵活和协调的政府管理，较少从上到下的命令和控制；非政府部门更多地取代政府的传统作用；超国家组织代替国家在环境改革中的某些作用。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新观念和新做法，如经济和环境利益不是固定不变的，代际协调被看成是核心原则。五、生态观念的转变、角色和位置的调整，如环境非政府组织直接与政府、经济部门谈判，参与环境改革。²³⁸ 在此基础上，摩尔给出的结论是，生态现代化不仅提供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新思路，而且使企业和社会都看到了新希望。

英国学者柯汉则总结了生态现代化的六个基本原则，这包括：第一，“超工业化原则”。生态现代化采用“超工业化”原则，改善工业技术的设计程序，这个原则包括：清洁的、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和生产过程，减少对昂贵的、附件的尾端技术的需要，大幅度减低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的关联性，使现代工业进入新的轨道。第二，政府管理原则。生态现代化注意到过去企业自主污染管理的无效，要求更严格的政府环境管理，这种管理将促进“先行者优势”和经济可行的绿色产品以及创新的生产系统。第三，综合污染管理。生态现代化认为，通过发展“综合污染管理”战略，可以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这种战略是生产过程和管理的再设计的一部分。第四，预防原则。生态现代化要求工业部门通过建立“预防计划”，更多、更及时地处理它们产生的健康和环境灾害。第五，环境责任制度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所有组织内部建立环境责任，所有公私部门都关心环境质量，把环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²³⁸ A.J.P. 摩尔：《生产的精细化：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化学工业》（A.J.P. Mol, *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乌特勒支 1995 年版。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13—214 页。

第六，决策网络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建立广泛的机构网络进行决策，对付环境政策的生态对抗和冲突。工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需要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使决策建立在良好信任和自由信息交换的基础上。²³⁹

以上就是西方生态现代化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彼此交融，相互补充，它们大致反映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于：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改变人们对环境政策难题的看法，从而使得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像 70 年代那样被视为是对立的或冲突的。综合以上学者的思想观点，这里我们总结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几个基本要点：

第一，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认为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对立或冲突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在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的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的政策一体化完全可以导致一个环境、经济和商业三方“共赢”的理想结果。

第二，强调技术革新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推动作用。技术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而技术改革同样对环境改善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当前环境问题，从实践上看不可能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不断更新的技术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来缓解。

第三，在生态现代化推行过程中同时强调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生态现代化的学者们呼吁政策制订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并在相关决策中体现出来；而政府决策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市场杠杆的力量来引导工业界执行环境标准，如政府要更多地使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比如税收、生态商标和排放交易计划来实现其目标。在欧盟的第五个环境行动纲领中，就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性工具比如环境税费来抑制污染与废弃物的相关规定。²⁴⁰

²³⁹ 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12—213 页。

²⁴⁰ 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2 期。

综合而言，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实质可以理解为在“反省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在这里，“反省式现代化”是指，不仅要以往对现代化成果进行反省，还要对今后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重新认识。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构建一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共生共存的双赢战略，并且从理论及实践方面论证了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环境主义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相对温和得多，为此也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工商界及其政治组织的支持，这也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一步步走向实践层面。作为一种仍在发展中的动态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及其发展，不仅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为当今后发展国家探寻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与此同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人类社会开始面临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枯竭、南北差距加大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有所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花费4年时间，在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出版了《寂静的春天》²⁴¹一书。在这本书中，卡逊阐述了DDT等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卡逊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作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之间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人类的发展应当走一条“别的道路”。²⁴²《寂静的春天》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

²⁴¹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²⁴² 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3页。

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端。

十年以后，即 1972 年，由世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令世人警醒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²⁴³，该报告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有限的地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报告提出了五个基本问题：即人口爆炸，粮食生产的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化及环境污染。报告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 100 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报告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²⁴⁴

报告进一步指出：由于过去 300 多年来的一系列惊人的技术进步，人类已经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极限拖后了。人口和资本不仅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而且已经暂时超过了它的极限。今天，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比较慢。因此，应对增长规定限制。报告认为全球保持现在的均衡状态是最可取的，即人口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资本与人口的比例安排，必须与社会价值一致。也就是说，实现“零的增长”，以保持一种不断调整、具有社会自由的动力学的平衡，使人口、经济、社会维持 70 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而均衡运动，以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地球生态不再恶化。《增长的极限》直指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困境，并为传统发展战略敲响了丧钟。

1972 年 6 月，联合国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 60 年代以来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危机的种种思考，并向全世界发出呼吁：“现在已经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目标。……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

²⁴³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²⁴⁴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英文版序，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18 页。

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²⁴⁵ 这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一种为缓解人类社会困境的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而兴起。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割裂开来，只顾谋求自身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性，带来的只能是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经济性甚至灾难。伴随着人们把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的加深以及范围更广的、影响更深的、解决难度更大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形成。²⁴⁶

198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人类要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²⁴⁷ 可持续发展思想随后被联合国所接受，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呼吁说“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²⁴⁸ 《联合国环境方案》还用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来警告世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 1981 年，当代科学家、思想家莱斯特·布朗（Leister Brown）在其代表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大力呼吁人类猛醒，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稳定全球人口规模，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自觉地改变价值观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系统研究了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从保护和发展环境资源、满足当

²⁴⁵ 万以诚等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页。

²⁴⁶ 钟茂初：《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阐释》，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 页。

²⁴⁷ 李来胜：《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探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²⁴⁸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 页。

代和后代的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这份报告的出台，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式形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²⁴⁹ 尤其是《21世纪议程》强调，“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人类必须现在“就得改变政策。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光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联合在一起，……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²⁵⁰ 《21世纪议程》，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为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十多种，但最为权威并且得到联合国正是认可的，还是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给予的界定。“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²⁵¹ 从其概念而言，可持续发展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原则²⁵²：第一，公平性原则。即社会全体成员在利用有限资源方面和享受物质消费品方面应当享有公平性，其实质是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的时空公平，具体包含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两个层次。第二，协调性原则。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相协调一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人类的发展，因此，这就要求人们根据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条件和限制因子，来调整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对资源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三，质量原则。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要以尽可能低的资源代价去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是，还要提高经济运

²⁴⁹ 胡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²⁵⁰ 万以诚等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²⁵¹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²⁵² 罗慧等：《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行的效率。第四，整体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关于全球整体发展的理论，它要求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因为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是密切联系的整体，某一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会影响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质量，而且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地球、一个家园”的口号，充分说明国际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认为，世界必须尽快拟订战略，使各国从目前的经常是破坏性的增长和发展过程，转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其主要目标应该包括：恢复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可以概括为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1) 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要求停止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逐步改善发展质量，才能满足全体人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2) 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它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有效参与等。3) 生态可持续发展。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保护整个生命与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预防和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积极治理和修复已遭破坏和污染的环境等。²⁵³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支持生态发展，生态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引导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了由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所倡导的发展观，在当今世界已经被普遍接受。当代人类最终理智地选

²⁵³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91页。

择了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发展观，它已经得到联合国的确认。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它不仅指引着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且正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 资本主义形成前的世界格局

尽管在现代化的定义和内涵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但现代化发端于西欧，以及英国率先走上现代道路，则是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事实。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大转变，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看法也基本一致。按照历史思考的逻辑，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提出：为什么现代化起源于西欧，而不是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其他地方呢？长期以来，不同学科或相同学科不同角度的观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人们普遍承认，现代化最早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脱胎于西欧的封建社会。因此，现代化的启动因素应该回溯到中世纪去寻找。这样，我们就要看一看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世界文明的格局。

第一节 四大文化圈

在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时候，世界上存在着四大文化圈，从东往西数，它们是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中东文化圈、西欧文化圈。四大文化圈之外还散布着一些边缘文明，如南美的印第安文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明等，但作为体系的文化圈尚未形成。当时，各文化圈都处在农业文明阶段，同一文化圈内部缺少交往，不同文化圈之间更是彼此隔绝，相互并不了解。在四大文化圈中，西欧是最落伍者，特别是西欧，其发展不仅落后于其他几个文化圈，甚至落后于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东西部，即拜占庭帝国。然而，现代化却发轫于西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四大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1、东亚儒学文化圈

东亚文化圈以古代中国为中心，向日本、朝鲜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地区辐射。东亚文化圈的共同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二是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型为楷模的社会运行机制；三是接受或吸收汉语的文字范式、创造各地区的文字语言。这个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有学者说，从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战国时期开始涌动，至公元7世纪左右基本形成。²⁵⁴我们认为，儒学的出现是其形成的基础。

儒学传统认为：天下本来就是统一的，不存在所谓分合现象。所能分合的只是世俗政体。世俗政体基于天下，作为天下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现实政体有分有合，但天下却是一统如故。统一是合乎天地之理的常态，分裂则是人为造成的一种暂时的不合理状态。即便是群雄割据时代，天下一统仍然是人所共奉的。事实也是如此，

²⁵⁴ 李喜所：“中华文化圈”的时空解读，<http://news.sohu.com/20061122/n246552870.shtml>

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数经亡国之灾，却终能恢复一统。中国历史自三皇五帝时代，直至近代，数千年延绵不绝，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永恒现象。可以说，大一统观始终没有被打破。

而且，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具有掌管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双重功能，导致的文化结果是：“民族的主导思维方式中，其认知功能与宗教的信仰功能没有分化”。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官学化的儒学作为士绅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其认知功能与信仰功能实际上合为一体而没有分化，这就使得深受儒学浸淫的士大夫官绅阶级很难摆脱儒学的类似宗教教义的思维方式和信仰。”²⁵⁵

传统儒家思想与东亚传统社会现实极其吻合。作为结果，自秦汉之后，中国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一直属世界先进水平，直到西欧爆发工业革命时，其综合国力长期雄居世界，甚至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十分雄厚。²⁵⁶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无论它多么繁华，也只属于农业社会，它与工业文明完全是两回事。以现代价值观衡量，儒家传统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等级尊卑观念压抑社会，很难出现自由平等的理念；以私德至上观念压抑公德意识，难以培养公民意识；以亲情至上观念压抑法制，阻碍了以法治国意识的形成，及至近代，它会严重干扰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如果不是外来影响的冲击，传统中国还会在其强大的惯性中长期存在下去。

2、南亚印度教文化圈

南亚文化圈包括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在很长时期中，这个地区都被叫做“印度”。

宗教是印度悠久文明的重要因素，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内核。婆罗门教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文明核心价值的形成，后来，从婆罗门教脱胎而来的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显著特点，它与婆罗门教—印度教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它将社会划分为四大等级，每一个等级下都有许多不同种姓，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体系。在古印度人的观念中，种姓制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宇宙图式中的一部分，甚至连《薄伽梵歌》也默认了种姓制度。

印度教有超脱尘世的特点。古印度人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力图摆脱围建界墙以图扩展的欲望，人生目的不是获得而是亲证，去扩展自己的意识，达到人与周围事物的契合。他们认为真理是包容一切的，证实真理的途径是使生命融于身外的对

²⁵⁵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6~7 页。

²⁵⁶ 有一种说法是：1820 年主要经济大国的 GDP 总量（单位：百万 1990 年国际美元）如下：中国为 199212，占世界总量的 28.7%，为世界第一。印度为 93125，居第二；法国为 38071，居第三；英国为 34829，仅居第四位。后三者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 26.6%，尚低于中国 2.1 个百分点。这些说法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专家的估计，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附录 C。

象之中。²⁵⁷在印度文明熏陶下，人们形成梵我合一的宇宙观、直觉领悟的思维方式和寻求解脱的人生目标。²⁵⁸

在笈多王朝（320~570年）时期，印度的领土包括北印度全境，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很高水平，成为西方和中国贸易交换的中心，与罗马的贸易处于优势地位，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公元612年，戒日帝国形成后，其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唐代玄奘在到访印度的14年中，有8年就是在戒日帝国度过的）。在东西方贸易中，印度输出商品主要是棉布、金银首饰、珠宝、香料、象牙、靛蓝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中国丝绸、瓷器、阿拉伯马匹、西方的金属制品等。佛教产生在印度，虽未能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却向东南亚传播，约10世纪前后在东南亚各国占据了主导地位。

印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但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成为印度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印度教的“梵我合一”的目标和因果业报、灵魂轮回的思想与现代价值观背道而驰，它宣扬个人精神的解脱，漠视物质生活的改善，主张听天由命而不是积极创造。种姓制度则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成了维护印度传统社会的固化剂。印度几千年的发展是自成体系的，如果不是外力的作用，它是不可能自行走向现代社会的。

3、中东伊斯兰文化圈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差不多与中国文明并驾齐驱。如果说中国文明在实用技术和人文学科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伊斯兰文明则在科学理论和试验上领先于世。阿拉伯在数学、化学、医药学、航海等方面的研究遥遥领先，物理、天文、光学、建筑、音乐、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也处在前列。由于伊斯兰世界处于欧亚非大陆的交接地带，它自然就成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中继站，并以其特有的合成文化给世界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就是在中世纪通过伊斯兰世界传入西欧的。为了传播信仰，阿拉伯人鼓励穆斯林学习文化，甚至让战俘承担教育儿童的工作。教育和学术在伊斯兰文明中一直受到重视。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由穆罕默德创立，《古兰经》是其圣典。起初，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建立了一个以宗教为纽带的“乌马”，即穆斯林公社，这使得阿拉伯民族从氏族社会中摆脱出来，形成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军队进驻麦加，这是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的标志。穆罕默德去世后，经过四任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的多次大规模征服，到8世纪前半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已横跨亚、欧、非三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阿拔斯王朝的早期，

²⁵⁷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人生的亲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页。

²⁵⁸ 梵我关系问题是印度哲学、宗教及一切文化的核心。《歌者奥义书》中说：（他）包容着一切业，一切欲望，一切气味，一切味道，环绕着整个世界，他就是我心中的“我”，他就是梵。

阿拉伯帝国的工农业发展加快，帝国特有的地理优势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首都巴格达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商业城市。

蒙古军队消灭阿拉伯帝国后，中亚、南亚和北非地区兴起了一批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奉哈里发为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13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崛起，其迅速扩张，到16世纪，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地跨三大洲。奥斯曼的苏丹（土耳其皇帝）也取得哈里发的称号与权位，奥斯曼国家成了伊斯兰传统的正宗继承者。奥斯曼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伊斯兰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文化影响力再次感染世界。

伊斯兰社会的最大特点在于，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它也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还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司法制度，甚至是军事、文化的基本规范。伊斯兰社会最典型地体现政教合一的原则，在这里宗教和世俗之间完全没有界线。

4、西欧基督教文化圈

西欧文明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翻开西欧文明史，荷马诗史中的英雄人格和自由理念，米利都学派的自然观念和辨正思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和道德伦理，以及贯穿希腊文明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等，都作为智慧的结晶成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正如汤因比所说：“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就“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样。”²⁵⁹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地区，从中吸取了希腊文明的精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因而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罗马为后来的西欧奠定了基础。²⁶⁰

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为官方所承认，成了唯一合法的宗教，这为基督教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链接点，基督教会作为一种新生的机制遍及罗马社会。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尔曼“蛮族”成为罗马土地上的新主人，然而，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日耳曼人虽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却归顺了罗马天主教会；而在西欧东部，斯拉夫人威胁着拜占庭帝国却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西欧东、西两部分虽在政治上分开，却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共同的“西欧”，而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也转化成真正的“西欧文明”。西欧文化圈的成型并固定下来是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的，基督教扮演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角色。

西欧东、西两部分后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在西部，起先出现地域庞大的“查理曼帝国”，但在843年一分为三，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后来的法、意、德三个国家。东罗马帝国则在西欧东部继续存在下去，后来转变成“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一度地跨欧、亚、非三洲要冲，在经济、文化发展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拜占庭也长期抵御着伊斯兰世界的进犯，成为保卫基督教世界的桥头堡。而1453年君士坦丁

²⁵⁹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²⁶⁰ 陈乐民、周弘：《西欧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页。

堡（拜占庭首都）的陷落，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西欧在中世纪是相对落后的，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都不如其他的文明地区。基督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枷锁，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整合社会分裂的一道粘结剂。在西欧，皇权（国家）和教权（宗教）处于双轨状态，它们既合作又争斗，这是处在罗马天主教会影响下的西欧亚文化圈的一个独特的特点。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各文化圈都沿着自身的逻辑轨道发展，相互间很少有交往，除了偶忽出现的军事征服，彼此也很难干预其他文化圈内部的事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农业文明，只是在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在 1500 前后的世界，从农业文明的角度考察，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都走在西欧前面，西欧的东部也比西部发展得更好。按照历史的惯性，各文化圈仍然会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下去，充分表现自身文明的辉煌。但四大文化圈平衡的局面后来被打破了，西欧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导致西欧农业文明的瓦解、一个新文明则逐渐形成；在农业文明中处于劣势的西欧引导了近代文明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取得强势，并最终冲击了整个世界。由此，我们要看一看西欧的中世纪，看看它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

第二节 中世纪西欧的几个特点

1、封建形态

封建形态（feudalism）是中世纪西欧最明显的特征。在罗马帝国的后期，由于土地所有者雇佣自由人当佃农比养活奴隶更为合算，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罗马帝国衰亡后，大庄园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为“封建”成为一种“制度”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布洛赫对西欧封建主义作出这样的定义：“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制的广泛使用——薪俸制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威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国家将获得复兴的力量——这些似乎就是西欧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²⁶¹通俗地说，“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²⁶²这和中国人一般的理解不一样，因为中国人会把秦汉以来皇权大一统的社会形态也称为“封建”，而皇权大一统是集权的，西欧封建社会是分权的。由于我们需要讨论西欧为什么孕育了后来导致资本主义首先出现的内部因素，因此我们只能在西欧的历史背景意义上使用“封建”这个词。

²⁶¹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04~705 页。

²⁶²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03 页。

“封建”这个词 feudalism 源于拉丁文 feudum，意思就是将土地分给有军功的陪臣。在西欧，封建是与领地分封制联系在一起，国王将土地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对方的军役义务。进而，土地是可以逐级分封下去的，大封建主封给中等封建主，中等封建主封给小封建主，以此类推，最后及至农民，这是封建主义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内容，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是封建社会其他方面的基础。

这样的土地分封制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世袭的君主，其下是一层一层的封建主，农奴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封建化的程度越高，自由农越少，“人各有其主”是其基本特色。但是，这个金字塔不是一个标准的有机体，它只在相邻两个层次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在典型的封建结构中，高一层的封建主只对他的直接受封人有号令权，而低一层的封建主也只对他的直接封主（即封君）有服从义务，这意味着国王并不一定能号令所有的贵族，大贵族也不见得能号令比他小的贵族。“我的附庸的附庸不一定是我的附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理论上说，封主与封臣的关系有契约形式的确认，彼此间都有权利和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之下并同意效劳，主要是为大领主打仗；大领主则以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回报，承诺对其封臣主持公道。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就违反了封建规范。²⁶³这种规范使下级封建主可以找到理由反对他的封主，封建时期战争频繁，封建主之间相互缺乏整体性的隶属关系（比如大家都要服从国王）以及封臣可以反抗封君是直接的原因。

这种土地分封方式必然造成封建社会的结构分散。封臣在自己的采邑拥有独立的政治权，每一个领主都行使完全的司法和行政权，每一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司法、行政单位，正如恩格斯所言：“领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判决执行人，他成了自己领地上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者。”²⁶⁴当然，领主审判权的施用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封建主与国王权力的力量对比，法兰西的领主审判权最大，英格兰最小。但无论在哪里，领主的审判权至少涉及有关份地、劳役、赋税和耕种的一切问题。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庭，由农民组成，领主的管家是庭长，按照“庄园的惯例”进行裁决。²⁶⁵

在这种以庄园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下，国家内部没有高度整合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也没有常备军，封主与封臣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以互惠的忠诚纽带联结在一起。国王的经济来源多数需出自于他作为领主的个人庄园，他需要依靠他自己的庄园生活。贵族领地从理论上说是不受国王管辖的，君主权力有限，往往不超过王室领地的范围。

²⁶³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12 页。

²⁶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81 页。

²⁶⁵ 亨利·皮朗：《中世纪西欧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6~57 页。

显然，西欧之外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这种封建主义与“蛮族”入侵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古典奴隶制残余（罗马）与原始部落公社残余（日耳曼原始部落）影响相差不大而且并存的地区才会产生一种新的综合——封建主义。²⁶⁶封建制度的根源在于罗马世袭的所有权制度和日尔曼个人忠诚的古老概念。罗马贡献了财产的关系，日尔曼人贡献了人身关系，它们的结合形成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²⁶⁷“蛮族”的入侵彻底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而罗马文明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缺陷（即罗马帝国其实是一个多种异质文明的政治捏合体）又使得帝国的架构无法恢复，这是西欧历史的特殊性。蛮族入侵中止了古典文明的发展轨迹，为一种多元性质的新文明开辟了道路。西方资本主义是在这种多元性之中生长起来的，它是个“决定命运的全球性唯一例外”。²⁶⁸

布洛赫认为，西欧的封建主义不能涵盖日本，更不能涵盖中国，它只属于西欧。虽然西欧的封建社会也会以十分相似的形式在其他国家出现，日本就是其中的特型。但日本经历的这个相似阶段，与西欧相比，两者之间“带有一些必然的、根深蒂固的差别”。²⁶⁹中国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制在形式上也和西欧封建形态有很大相似处，但它们仍旧有很大的不同。

西欧封建制度下的权力分散受制于生产发展的状况，西欧的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在政治上自然也就容易自成一统。经济上自给自足，权力分散，地区间联系松散，这些就中世纪西欧的特色。这些特色使西欧文明在 1000 年中发展迟缓，失去了古希腊罗马的光辉。但是，中世纪的西欧并不真是一个停止和野蛮的“黑暗时代”，而是有一个从封建制度确立到鼎盛再到向资本主义变化的动态过程。汤普逊认为，“封建制度，可能在它的最盛的时候，差不多和近代社会同样有效力地、同样廉洁地实施法律……我们不该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文明必然比我们的文明低劣。”²⁷⁰

2、商业和城市

在西欧封建制度下王权有限性，使商业和城市始终没有成为封建体制内的力量。罗荣渠教授指出：“正是这种西欧式封建等级结构，而不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为新生产力因素提供了活动空间，……使新兴生产力因素以自由城市为依托而较易发展。”²⁷¹

西欧中世纪的商业和城市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就连西欧东部也不具备

²⁶⁶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²⁶⁷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出版社 1963 年版，325 页。

²⁶⁸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22 页。

²⁶⁹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05~706 页。

²⁷⁰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29 页。

²⁷¹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 页。

西欧的这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是表现在城市繁华和商业发达上，与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和商业或许最多只能用“低度发展”这个现代词汇来形容，即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诺亚，也根本无法与比如中国的泉州和扬州、阿拉伯的巴格达或大马士革相比。西欧的城市与商业之所以特殊，在于它们始终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未成为社会基本结构内的一个部分。

“蛮族”入侵后，西罗马帝国原有的商业与城市迅速衰落，领地贵族居住在城堡内，以庄园为生，这是一个完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10世纪后期，商业才开始在西欧复兴，由于商人时常遭受各种危险，所以从一开始就寻求城堡的保护，城堡外逐渐形成“外堡”，这就是新出现的城市。商人的聚居地在教堂或城附近兴起，其重要性渐渐超过了封建城堡。在这些新兴的“外堡”中，商人和工匠的生活不再取决于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这就在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脱离土地的阶层。这个阶层后来从国王或贵族手里争取到“自治权”，结果是，城市和商业不仅脱离了土地，而且从主流的封建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形成了早期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²⁷²

城市吸引了许多逃亡农奴，他们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算“自由”了，就摆脱了封建人身关系的约束。随着商业的发展与扩大，城市变成了一个年轻有力的有机体，它不断地用新鲜地血液来丰富自己，在这个有机体中，经济作用支配了一切。²⁷³

贵族发现向市镇颁发特许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但这样做就等于免除了城市对庄园领主的封建义务。自治城市享有完全的自由权，由市民选举官员，并委以财政和行政上的很大权力。城市建立自己的法庭，自行处理司法案件。城市建立自己的税所，自己向市民征收税款，而这就是市政府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城市不接受土地的分封，它也不向任何人封授土地，由此它置身于以土地封授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之外来了，并缓慢地培育出一种与主流社会意识不同的新型文化，发展出一套完全异化的价值观念，这就是雏形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于不受封建关系约束，市民都是“自由人”，他们在经济上不依赖于封建主，在政治上独立于封建主，市民成为与僧侣和贵族不同的一个特殊等级，这个等级后来便被称为“第三等级”。²⁷⁴

于是，在一个庞大的封建的农业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中世纪

²⁷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²⁷³ P·布瓦松纳：《中世纪西欧生活和劳动》，商务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²⁷⁴ 亨利·皮朗：《中世纪西欧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50页。

的城市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成长，后来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汤普逊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商业与城市的兴起，认为它们是西欧现代化的主要原因：“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生活的产生，新的城市生活又使中世纪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²⁷⁵厉以宁教授也认为，西欧封建社会是一种刚性体制，它的权力结构固定，权力的行使方式僵化而不易改变，由此各权力结构之间便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和成长，而后发展壮大成体制外的力量，并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²⁷⁶

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东方，日本的“中世”和“近世”（约 12 世纪末至 19 时期中叶）与西欧封建社会很相象，曾任日本历史学会会长的坂本太郎认为，江户幕府时期是“最完善的封建制度”。²⁷⁷布罗代尔也说过：“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惟一例子。”²⁷⁸但是，日本的城市和商业并不像西欧那样游离于主体社会结构之外。即使在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城市依然处于传统主流社会的控制之下。²⁷⁹

中国的商业与城市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约束。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的作用。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是把城市与商业纳入到国家体制内去的准衙门机构。²⁸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诸如西欧中世纪的那种城市经济和市民阶级等新因素无从发展。²⁸¹杜维明推测，中国即使朝自己原来的方向发展，也不会走向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市场经济等。²⁸²其中的原因，或许就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不同，体制内的新力量可以为该体制所吸收，也可能被扼杀，很难成长为取代这个体制的社会力量。

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和城市与中国比较相象。阿拉伯的商业在中世纪非常发达，阿拉伯商人曾垄断东西方贸易，活跃在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中，并把商业活动向南推进到非洲的莫桑比克沿海地区。但阿拉伯的商业始终处于政权力量的控制下，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于体制之外。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才是商业和手

²⁷⁵ 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西欧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7 页。

²⁷⁶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2 页。

²⁷⁷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67 页。

²⁷⁸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8 页。

²⁷⁹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9 页。

²⁸⁰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 页。

²⁸¹ 庞卓恒：“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

²⁸² 杜威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2 页。

工业中心，统治力量在城市比在任何地方都强。类似的情况在西欧东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区也多少如此。

在印度，商业和手工业是融合在种姓制度之内的，职业本身就是种姓，被很好地嵌在作为主流结构的种姓制度中。与经营相关的事务都会放在种姓内部处理，种姓既是经济管理部门，又是社会管理机构，起着双重作用。印度的商业与城市不可能脱离主流体制存在。

只有西欧的城市与商业超出于主流体制之外，这确实是西欧特有的现象。

3、基督教

基督教在西欧文化圈中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封建结构中最大的封建主。据汤普逊考证，在 787 年，圣汪列尔修道院拥有 4264 个庄园；在 12 世纪，佛尔达修道院在萨克森、条麟吉亚、莱茵兰各有 3000 个庄园，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也有 3000 个。即使很穷的圣鸟尔立喜修道院也有 203 个庄园，每一个庄园有 1 至 6 所村庄。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是集行政长官、地主、收租人、征税者、物质生产者、大规模的劳动雇主、商人、手艺人、银行家和抵押掮客、道德监护人、教育者、信仰的强制人等等于一身的奇妙组织，它的权力如此普遍和多样化，“所以有人常常很正确地说：中世纪历史基本上是中世纪教会的历史。”²⁸³

有人将中世纪的教会看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而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教会虽然保存了封建制度并从中获得好处，“但它有时却严峻地管理它，有时还明显地力求破坏它的完整性。”²⁸⁴教会的神父们常异口同声地把商业斥为对灵魂有害的职业，比如，圣·奥古斯丁曾认为所有商业活动都是罪过，因为它使人们的心去追求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获得的真正安定。但是，随着 13 世纪开始的商业活动的扩大，教会内部对商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到阿奎那时代，商业被认为是增加一个国家财富的两种方式之一。商业的盈利行为本身并不有悖于道德，也不意味着罪恶。²⁸⁵此外，科学的背后有基督教的预设，基督徒是科学探索的先锋。²⁸⁶比如，哥白尼一生任神职，一直做到僧正这个中级职称，《天体运行论》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他花了近 30 年时间才写成。可以说，西欧近代科学思维方式脱胎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者确立了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即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规则之中。²⁸⁷

²⁸³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10、262 页。

²⁸⁴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97 页。

²⁸⁵ 奥布赖恩：《西欧中世纪关于财产权利和商品交换的思想》，巫宝三主编：《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2~383 页。

²⁸⁶ 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0、187~188、201~202 页。

²⁸⁷ 张绪山：“经院哲学：近代科学思维之母体”，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85~186 页。

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对近代文明的出现更做出重大贡献，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²⁸⁸韦伯认为印度教、佛教、儒学、伊斯兰教也都或多或少含有禁欲主义的成分，但却不具备新教的理性主义的内容，而理性主义是通向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否则就会形成某种障碍。韦伯虽然不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于基督教这一单一因素，但他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观点却很鲜明，他认为在任何场合，“新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²⁸⁹韦伯的说法引起很大争论，但他从文化方面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却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第三节 世界各文化圈比较

下面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几大文化圈的异同作一些比较，由此可以对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出现有更多的理解。

1、经济方面

相同点：农业是经济的基础，也是人们生存或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各文化圈都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其中心区域的农业生产水平都达到或接近达到前工业社会的极限。当然，在农业生产方面，西欧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生产能力都不如其他文明中心。但不管其发达程度如何，各文化圈都属于农业文明，农业社会的分散、缓慢、封闭、保守是共同特点。商业和手工业只是建筑在农业生产大海中的小岛，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共性特征，虽然这并不排斥在某些主要商道地区出现以商业为主的经济方式，但商业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不同点：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占有形式不同。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相当牢固的小地主所有制，土地可以继承，可以分割，也可以买卖，土地似乎具有“私有”性质。但是，土地是国家交付给农民的，随时可以由国家收回或重新分配。而且，国家可以任意调用全国的劳动力，可以没收任何人的任何财产。国家对土地有最终的决定权，私有财产并不具备“神圣”的性质。在形式上，印度的土地归村社使用，但事实上，印度的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手里，马克思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²⁹⁰按马克思的说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私有土

²⁸⁸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0 页。

²⁸⁹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3 页。

²⁹⁰ 莫卧儿时期有 3 种土地占有形式，即直属国王的封建领地、贾吉尔达尔的非世袭领地（贾吉尔）和柴明达尔

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²⁹¹马克思认为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而伊斯兰世界虽然有多种土地占有形式，从埃及的土地国有制到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制，但究其根本，确实可以说“……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²⁹²。

西欧对土地的占有却是纯个人的，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当然，中世纪西欧也不具备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否则分封制也就没有意义了。但君主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而是以最高领主的私人身份分封土地的，各级封建主再以私人名义对土地进行再分封。没有参与国家的所有权很容易转化为完全的私有制，有学者认为，西欧的崛起在于确立了完全私有的产权体系。这种产权体系的形成，不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在900~1700年间。²⁹³

2、社会方面

相同点：各文化圈都是呈垂直排列的等级社会。等级之间有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分，但等级的结构状态并不一定相同：西欧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阶梯结构，印度是种姓制度，中国有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及官与民的显著划分，伊斯兰世界也因为部落、血统、宗教、职位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在等级社会中，“上”和“下”的区分表现在方方面面，人与人之间在财产上不平等，在社会权利、政治地位、司法待遇、税收特权等方面都一概不平等。

不同点：西欧是一种宝塔式或阶梯式的等级结构，每一级都受制于它的直接上一级，又制约它的直接下一级，任何一级一般只对直接的上级或下级尽义务或责任。即使是佃农，“由于大量约定俗成和法定的权利、有组织的村会以及佃农对土地和生产的直接控制，使佃农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使他们拥有有力的武器，可以和领主们讨价还价，甚至敢于抵制领主的要求。”²⁹⁴

东方社会是一种大殿式或覆盖式的等级，一切等级都覆盖在同一个大屋顶下，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权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同等级之间则是一种横向的联系，彼此只有地位尊卑之分，不一定有受制约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

的世袭领地。16~17世纪中叶，贾吉尔成为莫卧儿印度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贾吉尔的持有者称贾吉尔达尔对其贾吉尔没有所有权，只有征收规定的田赋和各种杂税的权利。贾吉尔达尔持有贾吉尔虽然也以服军役为条件，但贾吉尔是非世袭的，甚至是非终身的。但是到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贾吉尔同柴明达尔制领地渐趋一致。然而，从总体上讲，柴明达尔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一定数量的占有权和使用权。

²⁹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²⁹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4页。

²⁹³ 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²⁹⁴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²⁹⁵

由于等级制度在结构上的这种差别，西欧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而其他社会的基本单元则必须是团体，比如，中国社会是家族，印度社会是种姓，伊斯兰社会是部落、氏族等。在阶梯式的结构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上下左右都有约束，同样身份的个人由此而结成块状整体，再把这些块状按一定顺序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等级社会。而在大殿式的结构中，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从理论上说都是可移动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可移动性的典型。但如此一来，可移动的个人如同流沙，而流沙式的社会自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只有把流沙先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块，把它们束缚在一起，大殿才不至于随流沙倒塌。这些团块就是家族、种姓、部族等等。群体意识由此而产生，这是大殿式结构的结果。

3、政治方面

相同点：各文化圈的统治者都位居社会等级结构的上层，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统治方式。西欧的封主对封臣，亚洲的君主对臣民，一概以超越的姿态高居于上，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统治只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排斥于政治之外，其职责就是服从，这种服从呈等级向上的趋势，一级服从于另一级，与社会的等级结构完全一致。

不同点：东方“大屋顶”笼罩一切，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为有效地行使权力而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这官僚体系使东方国家在中世纪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都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亨廷顿曾经说过：传统制度越接近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²⁹⁶他指的就是这种中世纪近乎完美的东方“大屋顶”。相比之下，西欧在中世纪却是等级君主制，这是一种权力分散的政体结构，它建立在土地分封之上，任何一方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等级君主只是领主们的头，它不能对所有的臣民直接发令，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家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相反领地和庄园更重要。西欧中世纪一直存在着分权机制：教会与君主的分权，贵族与国王的分权，城市自治的分权，领主在每一个庄园上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在每一块领地上半独立的治理权等等。

4、意识形态方面

相同点：各文化圈都确立单一学说的正统地位，并且以这种学说控制社会，认为思想一致是统治的必要前提，而思想分歧被看作是政治混乱的原因。因此，为了达到思想一致，就使用思想禁锢的种种方法，包括鼓励愚昧、实行文字狱、宗教裁判所。异端虽不一定受到残酷的肉体消灭，但正统之外的集团与个人一定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由此而保证价值体系的延续性以及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被确定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正是最能体现某种文化模式中基本价值观念的学说，统治者必须

²⁹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²⁹⁶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0页。

利用这种学说进行统治。政权与正统学说相结合，严密控制社会，这是当时各文化圈的共同现象。

不同点：因为社会基本结构不同，“东方”需要“群体”，西欧则有赖于“个人”，由此就产生一种矛盾现象：在中世纪西欧，看起来被严格束缚在固定位置上的个人其社会存在却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农奴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权利，领主主要保证其份地不受侵犯；而东方社会中，个人看起来可以有更大的流动性，但社会却只承认群体的存在，而把个人放在群体之中来对待。反映这些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很大的差异性，最强调个人的价值体系就应该在西欧出现，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同时，“东方”（包括拜占庭）的教会都是国家的教会，受到世俗政权的控制；而西欧的天主教会却超然于国家之外，形成超国界的二重性实体。这种情况也是由不同的等级结构造成的，西欧不存在无所不包的“大屋顶”。

资本主义发生前的人类文明尚未超出地域的界限，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相对小，因此除开在基本的共同点，各文化圈的差别就相当显著。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世纪的西欧在许多方面是落后的，它的农业发展落后，生产力不高，城市和商业不发达，政治机构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东面的三大文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西欧（特别是西欧）则显得比较独特。看来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情况是普遍的，西欧的情况是特殊的。正是西欧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使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果，西欧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的特殊性之中的观点应该是站得住的。但也许正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欧的特殊性之中，因此当西欧最先用资本主义方式闯开现代世界的大门，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时，其他文明却要寻找不同的途径，才能走进那扇大门。

第二章 现代化在西欧的酝酿

在近代世界到来之前，文明的基调是农业(牧业包括在内)，文明的指向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社会，西欧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然而，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推动了西欧的文明转化，为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开辟了道路。这些事件构成了现代化的准备阶段。

第一节 人的解放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的所有社会机制的目的就是束缚人。等级分封制度束缚着人的身体，强制的宗教信仰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僵化的神学教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蒙昧的社会规范束缚着人们的行动，整个封建社会如同巨大的鸟笼，把人禁闭在静态的社会环境中。现代社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某种程度的人的解放。现代化“意味着人们相信凭借理性行为可以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人的束缚。”²⁹⁷亨廷顿所指的外界束缚具有丰富的内涵，但人的解放是第一步。

1、取消农奴制

中世纪西欧存在大量农奴，封建制度是这样的：领主拥有大大小小的领地，由农奴为他耕种；作为回报，领主为农奴提供庇护，并给他一小块份地。为了确保领主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农奴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²⁹⁸

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恩格斯指出：“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²⁹⁹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³⁰⁰

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自由可想而知！比如，在比较典型的英国庄园里，农奴的一生被庄园劳役和份地上的农活所占用，除了逃跑，就没有可能摆脱庄园的束缚。英国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小土地持有者，其中包括自由土地持有者和具有维兰（一种农奴）身份的茅屋农、保达尔以及 1/4 农。这些小土地持有者的共同特点是，仅凭土地无法维持生存，因此也要承担一定的劳役。虽然与农奴相比，他们偶尔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但是，一旦他们的自由与领主的意志发生冲突时，他们的有限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农奴制限制了人身自由，阻碍了劳动力向农业外的转

²⁹⁷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版，第 98 页。

²⁹⁸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9 页。

²⁹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71 页。

³⁰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87 页。

移。³⁰¹而在中世纪的西欧，英国却是“农奴化”程度比较低的一个国家。

西欧农奴制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黑死病”这个偶然事件。14世纪中期，黑死病从中亚发端，通过意大利的商船很快席卷整个西欧。大约有1/3共两千多万的西欧人口死于黑死病。黑死病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当疾病过去需恢复生产时，有田无人耕种的现象极为普遍。很多领主开始放弃劳役制，改用土地出租的方式吸引劳动力，大量农奴转而成为租地农民，那些未被解放的农奴则大量逃亡。货币地租逐渐成为主流，劳役地租折算成货币，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农奴也开始从人身束缚的状态下逐渐摆脱出来。到16世纪，英法等地的农奴制已彻底解体了，农村市场随之兴起和不断扩大。“只要绝大多数人口还被严酷的农奴制度束缚着不能为工业所雇佣，工业化就不会发生”。³⁰²正是在较早取消了农奴制的地区，如英、法、莱茵河西岸，资本主义最先发展，现代化也最早起步。

1. 文艺复兴

在人的思想解放方面，西欧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并扩展到西欧各国。

意大利是当时西欧与东方贸易的枢纽，佛罗伦萨、热诺亚、米兰、威尼斯等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这是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城邦国家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了许多财富，逐步产生了一种与封建主体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而这些不同的东西似乎能够从古代意大利甚至希腊找到证明。于是，怀古之情蔚然成风，古代艺术、建筑被刻意模仿，诗歌、戏剧重新流行，文学和哲学又一次时髦，许多意大利人甚至不承认自己是“蛮族”的子孙，硬要把自己说成是罗马人的后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些都是人文主义的思想表现，其代表性作品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在北欧，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斯谟，而英国的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等。莎士比亚的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在法国，文艺复兴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另一派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在

³⁰¹ 参考谷延方：“封建农奴制与英格兰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29~30页。

³⁰² 格尔申克隆：“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绘画和雕塑创作上，涌现出乔托、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罗等一大批杰出的大师，他们的作品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但在中世纪被神本主义所取代，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征：“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³⁰³但古代的哲学家是非常重视人的，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都把人看作是哲学思考的主要目标；修昔底德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³⁰⁴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³⁰⁵苏格拉底也说：“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³⁰⁶

人应当像基督教要求的那样“轻视自己”，还是像古代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充当“万物的尺度”？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思考的根本问题，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发展起来了，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天文学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由于产生了人体解剖学，医学也向前进了一大步。哥白尼 1543 年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不同的日心说体系；伽利略在 1609 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人们的地理知识日趋丰富，“地”开始被看成是一个“球”，“天”和“地”的真实结构被认识到了。英国人培根提出科学的实证方法，为现代实验科学打下了基础。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一书，向盖伦的“三位一体”说提出挑战。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的流动方向。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主张享受现世，以理性取代神启，长期受基督教禁欲主义压抑的人性欲望得到了释放，由此确立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为后来西方启蒙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基础。

2、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但人的精神却仍然受教会控制。中世纪的西欧人都是基督教徒，但很少人能够自己看懂圣经，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人是不懂的。这样，就给教会一种威权，让它来解释上帝的意旨，实际上就是垄断了真理权，对人的精神实行控制。中世纪教会站在人与上帝之间，不摆脱教会的精神扼制，人的解放就无法完成。教会还在现实过程任意解释《圣经》的话语，以此来谋取自身的私利。此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言行不一致、贪乐享受等等丑恶现象，也层出不穷。

³⁰³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52 页。

³⁰⁴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103 页。

³⁰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38 页。

³⁰⁶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 2 卷，第 67 页。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为契机，随后迅速在西欧和北欧发展，其最初的诉求只是革除天主教会的弊病，后来则发展成反对教会控制的精神解放运动。在宗教改革中，《圣经》被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普通人于是也可以看懂《圣经》，在新教取得胜利的地区，人们通过阅读《圣经》而直接与上帝交流，其实就是根据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解释《圣经》，由此得到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新教各派都不承认教皇的权威，因此也就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束缚，尽管新教各派在那个时代也表现出狭隘心理，不承认其他教派的信仰权利。但宗教改革终究打开了自由思想的大门，为不同观点的互相尊重提供了逻辑的归属。

此外，宗教改革改变了神权与政权的相互关系，此后教会与国家已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教权超于王权之上了。这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为西欧最终走出分裂、混乱的中世纪增加了砝码。宗教改革在许多国家还成为凝结现代民族的粘合剂，民族意识在新宗教教义中找到认同感，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马克斯·韦伯还认为，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新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证明这一点，需要以上帝的恩宠为证据，而上帝的恩宠就表现在事业的成功上。一个人聚敛的财富越多，就越能证明上帝的恩宠。因此，当一个人聚敛财富是为尽天职，而不是为自己享乐时，他的发财欲望就是合理的，符合上帝的伦理标准。于是，新教徒一方面聚敛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所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³⁰⁷

综上所述，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通过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束缚。农奴制解体使人摆脱人身的束缚，文艺复兴使人摆脱思想的束缚，宗教改革使人摆脱精神的束缚。虽然经济束缚、政治束缚和社会束缚仍然存在，对它们的摆脱还留待将来；但中世纪的全面束缚已开始解除。后来西欧向外扩张，凭借的不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能力，而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冒进，为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在其他地区，个人所承受的限制太多了，个人的追求受到强烈的压制。由此可知，解除人的束缚对西欧来说是何等重要，它把原本落后的西欧一下子转变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

1、民族与民族国家

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近代社会的转型要从民族国

³⁰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页。

家的形成开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有形的载体。那么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国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比如霍布斯鲍姆说：“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³⁰⁸在西欧封建社会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民族国家。

为理解这种说法，需要回到西欧中世纪的现实之中去。

如前所述，在封建西欧，领地是政治的基础，庄园是社会的单元。一切人都和领地与庄园有直接关系，他们隶属于领地，依附于庄园，效忠的对象是领主，人们的身份认同与土地分封制度一致，即认同于分封的土地，同一封地上的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意义。像英格兰、法兰西这些概念，基本上是一种地域的概念，表明某个地理范围；而英格兰人、法兰西人这些概念，如果存在，也基本意指在这些地域范围内生存的人，其意义并不比某某村、某某乡更为重要。现代人脑子里的“民族”观念，在中世纪西欧是很模糊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说封建的西欧不存在“民族”——当然，这个“民族”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同时，“国家”的概念也一样模糊，它离普通人太遥远。一切人——无论领主还是农奴，都清楚要对“主公”（即土地所由来者）效忠，例如封臣要对封主效忠，农奴要服从领主的指令，等等。即使对作为一切封建主之首的“王”，由于他也是以个人的身份取得这个地位的（即他是一切土地最初的封授者）；所以人们对他的效忠（如果存在这种效忠），也是对最高领主的效忠，而与“国家”无甚关联。因此人们说，在中世纪西欧，只有领地，没有“国家”——当然，这指的是现代国家。事实上，如果说在中世纪西欧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是个天主教大世界，天主教是所有人共同的身份认同；而在世俗的领域，则只有领地，没有“国家”，每块领地都有自己的经济权、司法权、政治权和治理权。“country”和“realm”是存在的，“state”和“nation”则不存在。

跨出这种状态，就跨出了封建时代，因为它意味着摆脱由土地分封制度所建构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而形成政治与社会的统一。

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王权会起重大作用。王权的演变使“state”和“nation”出现了，最终催生出现代的国家形态，即“nation-state”——民族国家。

2、西欧专制王权的形成

在13世纪的时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出现，民族国家已经在孕育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是专制王权的建立。

从现代化的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步点。最早的专制王权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

³⁰⁸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从公元 8 世纪开始，阿拉伯人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将先进的灌溉技术、牧羊业、手工业等引入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756~1031 年）统治期间，穆斯林国家进入历史发展的鼎盛阶段。首都哥尔多瓦在 10 世纪时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长安并称为世界四大都市。

不过，穆斯林并未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全境，被驱赶到北部边陲的一小部分基督教居民就未被征服，它们在北部形成几个独立的封建领地。11 世纪，倭马亚王朝走向衰落，分裂成 20 多个小王国。与倭马亚王朝的衰亡同步，这些封建领地在相互攻击中开始向独立王国方向发展。到 12 世纪的时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有了三个基督教王国：卡斯提尔、阿拉贡、葡萄牙，依靠这三个基督教王国，基督徒将穆斯林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在西欧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还很模糊的时候，葡萄牙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12 世纪，葡萄牙小王国成为西欧最单一的民族。1179 年，罗马教皇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然而，女王贝娅特丽丝与卡斯提尔国王的婚姻严重危及了葡萄牙国家的主权，1383 年，若昂一世（1385~1433 年在位）通过起义夺取了王位，1385 年由议会推举为葡萄牙国王。同年，在阿尔茹巴罗塔之战中，葡萄牙大败入侵的卡斯提尔军队，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383~1385 年的起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成为葡萄牙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旧贵族垄断国家的局面被打破，一批出身较低但有丰富经验的法律学家和官僚聚集在新国王的周围，给葡萄牙的政治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若昂一世时期，国王拥有极大的权力，正如葡萄牙史学家萨拉依瓦所说：若昂一世时期与其他王朝不同之处“是强烈的集权主义……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最大权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³⁰⁹

在葡萄牙集中精力进行近一个世纪的海洋探索之时，邻国西班牙光复国土的战争还在继续。1469 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萨贝拉和阿拉贡王子费尔南德结婚。1474 年，伊萨贝拉成为卡斯提尔女王。1479 年，费尔南德也继承阿拉贡王位，卡斯提尔和阿拉贡正式合并为西班牙王国。作为联合登基的西班牙的女王和国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实现西班牙的统一。1492 年 1 月 2 日，西班牙结束长达 8 个世纪的“收复失地战争”。与此同时，伊萨贝拉与费尔南德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剪除了分裂割据的大贵族势力，国王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很少召开国会，专制王权得以建立。国王有权推荐担任西班牙各主教区主教的人选，西班牙国家也不再听命罗马教廷的指使。正如西班牙学者指出的那样，“国王们的手无处不伸，眼睛无处不到”³¹⁰在葡萄牙之后，西班牙成为西欧的又一个民族国家。

英国的专制王权形成于都铎王朝时期。其实，在中世纪的西欧，英国王权比其

³⁰⁹ 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中国希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3 页。

³¹⁰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他国家要强大一些。这是因为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时，把土地划成小块向贵族封授，并结成“索尔兹伯里盟”，要求所有贵族首先向他宣誓效忠。在相对有力的王权下，贵族们尽管时常反叛，但力量终不足以撼动王权。当然，国王也不是至高无上，他必须在封建规范约束下行事，否则就会遭到贵族们联合的反对，而大宪章和议会就是斗争留下的两项最重要成果。

英国由于与法国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失败而退出大陆事务，这反而为它组建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百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两派贵族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历时30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年）在战争中，旧的军事领地封建贵族在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而王位落到了来自威尔士的亨利·都铎手里，在他的统治下，旧贵族被消灭了，国家得以统一，专制王权也得以建立。都铎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的英格兰国家的正式出现，在亨利七世之后，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父女完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任务，英国从一个偏远的小小岛国一跃而成为西欧强大国家之一。

法国的王权也因为百年战争而加强。九世纪，法国的封建制已经确立，全国不再有无领主的土地，国王的权威变得非常有限。加佩王朝时期（987~1328年），国王实际控制力仅限于巴黎周围的王室领地约3万平方公里地区，一些大贵族的控制范围比国王还要大。路易六世（1108~1137年）以后王权才有所回升。1302年，腓力四世首次召开由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和城市市民共同参加的三级会议，封建等级君主制由此确立，促进了王权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百年战争之后，国王们力图克服地方分裂势力，法国向君主专制制度方向发展。

但法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的路程是十分曲折的，法国大贵族太强大，其地位由于在百年战争中发挥作用反而有所提升。而法国争夺意大利的长期战争也削弱了王权，及至16世纪中叶，因宗教纷争，法国再次陷入长达30余年的胡格诺战争，致使国家统一又一次面临威胁。这以后，波旁王朝出现了，专制制度终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最终完成，并得以巩固。但即便如此，国王们还是要经常应付贵族们的反叛，有时王权甚至受到威胁，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1648年，法国发生最后一次内部大动荡——投石党运动，贵族乘机而起，再次威胁国家的存在。运动失败为专制制度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亲政后决心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在亲政的54年中，他从未任命首相，一切国务均由他一人拍板，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都是他的执行工具。他剥夺巴黎高等法院的职权，从不召开三级会议，并加大对教会的控制。他花费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将大批贵族召入宫中，让他们挥霍享受，很快使他们丧失了抗衡国王的意志和能力。路易十四认为，“构成国王的伟大和尊严的，不是他们手中的权杖，而是他们手执权杖的方法。如果由臣民决定一切，君主只是受到他们的尊重，这就歪曲了事物的本来

面目。只有君主才有权思考和决策，其他人的职责，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而已。”³¹¹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成为西欧大陆最强大的国家。

奥地利属于较早建立专制权力的国家，15时期末、16时期初，奥地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专制体制。正是因为专制权力形成较早，奥地利从过去的一个不起眼的德意志东南边陲领地，变成了一个大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欧的强国。哈布斯堡家族从1273年起，就几乎不间断地担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起帝国皇帝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其继承人又不断加强这种努力。不幸的是，奥地利未能将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国家，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只能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集权的努力，而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即哈布斯堡君主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在地域范围上却是不重叠的，这使得哈布斯堡家族最终只关心自己的家族领地，而无心力求德意志统一。其结果，无论对奥地利还是对德意志来说，都是致命的。

北欧的民族国家也在形成中。10世纪，瑞典、丹麦、挪威都成为独立国家，但后来又都落入丹麦统治。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当上瑞典国王，他发动了反丹麦的民族战争，使瑞典脱离丹麦，并建立专制王权，把瑞典推到了走向现代国家的起点上。1697年，在查理十一世去世之时，瑞典的专制王权已经达到鼎盛；而查理十二时期的瑞典，君主成为无所不在的国家象征，这在斯德哥尔摩新修建的王宫国王的雕像上都能表现出来。³¹²

瑞典独立后丹麦人痛定思痛，将一切过失全部推到贵族身上，认为贵族的分裂是国家虚弱的原因，于是希望建立君主专制制度。1660年，腓特烈三世抓住这一机会，宣布王位的世袭制度，打击贵族特权，任用“文官”管理行政区。他接受路德教派，实行宗教改革，宣讲君权神授，强化国王的权力。相对而言，专制王权在丹麦的形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国王与国内一些头面人物协商之后就确定下来了。³¹³君主专制制度形成后，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就诞生了。

尼德兰（低地国家）在中世纪曾先后属法兰克、德意志、勃艮第等地的领主；16世纪，尼德兰归西班牙管辖，其一半的收入要上交西班牙。1588年，尼德兰北方7省宣布成立“联合省”（也称荷兰），联省议会是这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共和国的权力机关。但联省议会的决议必须经各省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因此这个国家并未能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状态在拿破仑战争中充分暴露其弱点，荷兰在战争中被灭国。战争结束后，荷兰没有恢复以前的联省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立宪的王国，这才使荷兰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³¹¹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³¹² 安德生：《瑞典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册第316页、325页；下册第354页。

³¹³ 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9页。

俄罗斯的专制王权也形成很早，一般认为在留里克王朝时期就开始起步，伊凡四世（1533-1584 在位）是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曾进行一系列行政和军事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彻底铲除了分裂势力，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后，沙皇们迅速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到彼得一世时，俄国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彼得一世亲政后进一步加强专制权力，并且用近似野蛮的方式推行“西化”，把俄国强制拉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沙俄帝国不是一个西欧类型的民族国家，它是个多民族的大帝国，这对它后来的发展造成影响。

3、民族国家的意义

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西欧许多地区在相距不远的时间内建立专制制度，从而站到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起跑线上。专制王权的历史意义是：它把统辖范围内的人民强制捏合在一起，让他们形成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下经历各种事件，培养起相同的情感，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以民族为支撑的国家把自己的疆界封闭起来，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原先基督教的大世界消失了，中世纪各个地区基本拉平的社会经济状况被拉开差距，地区之间出现反差，并形成竞争，那些已经形成民族国家的地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家比领地有更大的凝聚力，也具备更多的人和物的资源。由此就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各地区都要形成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就成为潮流，从而破坏了以领地、庄园为支撑点的中世纪政治、社会结构。第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争夺土地、资源、人民和发展的优势，以及国家的生存权，它们便征战不已，使天下越来越不平安。中世纪的贵族战争让位于国家间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激烈，新世界的格局由此表现得越来越清楚，即：这是个民族国家的时代。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化的起点，民族国家也就是现代化的载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根本转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没有这个支架，现代化就不能发生。³¹⁴

西欧国家现代化起步的时间相差很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先后不一。德意志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其原因就是长期没有解决统一问题。“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是真正的政治实体，它既非德意志，也不神圣，更称不上“罗马”，德国始终处于分裂状态，王公诸侯是德意志的真正主人。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拿破仑入侵的 160 年中，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一共有 360 个诸侯国、1500 多个独立骑士领，几十个帝国自由市，皇帝对它们都没有权威。在西欧东部，除俄罗斯之外，其他地区都成为近邻列强的控制范围，连波兰这样一个在中世纪曾经强大的地方，也因为未能消灭贵族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王权，进而转变成近代民

³¹⁴ 钱乘旦主编：《西欧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5 页。

族国家，最终却落伍了，被其他国家所瓜分。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起点上落伍的例子，它们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第三节 地理大发现与商业精神的形成

1、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是西欧走向现代的另一个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³¹⁵

自古以来，西欧人到东方走的是马可·波罗的那条路。由于西欧通过阿拉伯中间商购买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商品，致使西欧国家形成对近东、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贸易赤字。³¹⁶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通往东方的陆路被切断。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又控制了东地中海，威尼斯丧失了在地中海上的制海权。而此时的西欧人对到东方去发财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东方对他们来说是富裕的宝库。鉴于此，他们决定到大西洋上去寻找海上的通道。

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处在西欧大西洋沿岸的最南端，从而为远洋探险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最早形成强大的国家，远洋探险可以得到民族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坚实财源的保证。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像横渡大西洋和远涉印度洋这样耗资巨大的冒险是无法进行的。

葡萄牙没有向大陆发展的实力和空间，挺进大洋是其唯一的出路。若昂一世在巩固了王位之后，就把眼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1415年，若昂一世和亨利王子亲自率领一支由19000名陆军、1700名海军和20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军队，攻占了非洲西北角的重要城市休达。从此，向外扩张成为葡萄牙的一种持久活动，列入国家行动达五百年之久。³¹⁷若昂一世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海上发展重要性的葡萄牙政治家，但他是第一个将之确立为国策的国王。在若昂一世的支持和鼓励下，亨利王子创办了航海学校，网罗了西欧各国的航海人才，修建海港，改进海船，为葡萄牙奠定了海上霸权的基础。亨利王子死后，葡萄牙国王继续支持航海活动，从而为发现新航路打下了基础。

葡萄牙的成功刺激了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率领一支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发现新大陆是地理大发现的标志性成果，它意味着世界各部分都为人类所知，而从此以后，世界也成为一整体，不再分割成各

³¹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³¹⁶ 哈特穆特·埃尔森汉斯：《发达与不发达：南北关系的历史、经济和政治》（Hartmut Elsenhans,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e Histor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North-South Relations*），新德里1991年版，第21页。

³¹⁷ 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中国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124页。

个文明区域，即文化圈了。各文明圈开始明显地互动，而这最初的动力，来自西欧。它也意味着西欧走上人类历史的最前台，开始把其他几个文明圈抛到后面，而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它还意味着西方国家世界性扩张的开端，西欧的殖民活动开始了，并试图瓜分世界。第一次瓜分世界发生在 1494 年，那一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教皇的主持下划定势力范围，这条分界线，叫“教皇子午线”。

2、西欧的早期扩张

从某种角度上说，地理大发现与西欧早期的对外扩张其实是同义词。到 16 世纪中叶，伊比利亚人海上新航路的征伐基本完成，建立了最初的东西欧殖民帝国。

葡萄牙占领休达是葡萄牙海上扩张政策的正式起点，海外扩张从此成为葡萄牙的国家事业和基本国策。14 世纪末、15 世纪初，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仅局限于大西洋。在西欧至印度的航线被彻底开通之后，葡萄牙的扩张开始逐步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发展，除了寻找和占领黄金、香料及宝石出产地，还要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建立葡萄牙的东方帝国。葡萄牙人为了保证从西欧到东亚的航线补给，从 15 世纪起就在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刚果、安哥拉等地设立了据点，16 世纪又占领了东非海岸的莫桑比克、索法拉、基尔瓦等地。在 16 世纪，葡萄牙确立了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1511 年，葡萄牙占领通往东南亚的咽喉要地马六甲，继而夺取中国的澳门。在占领南美的巴西后，一个更广大的葡萄牙帝国建立起来。凭借向外扩张，一个弹丸小国竟然成为垄断欧亚贸易的海上霸主。

对美洲的征服行动主要是由西班牙完成的，它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比葡萄牙的大得多。到 1550 年，西班牙已经征服了整个中南美洲（巴西除外），1565 年，西班牙征服佛罗里达，又开始它向北美大陆的殖民扩张。

利比里亚人从殖民扩张中挖掘了第一桶金。在当时，“整个西欧贪婪地注视着源源不断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伊比利亚国家遭遇强大挑战，“法国、荷兰和英国正日益成功地侵犯葡属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³¹⁸而这些都是很早就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地方。

3、商业革命与商业精神的形成

西欧的商业革命是由空前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贸易所带动的，地理大发现的精神动力就是到东方去寻找财富。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而找到了生长点，进而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革命。

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西欧本身的资本流通、贸易种类和数量与过去相比发生

³¹⁸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0、148 页。

了惊人的变化，商业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国王和贵族的需要，商业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改变，市场交易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人们获得日常生活物品的手段，商业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发生变化，“公司制”、“契约”及近代的货币与信贷体系被纷纷建立与流行起来。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比如，至16世纪初，从16个工人起步的法国丝绸业已经发展到800个师傅、4000个工人的规模，到了16世纪中叶，人数又增加了几乎一倍。³¹⁹

在“地理大发现”的所有航行中，君主都给予大力支持。君主支持远洋探险，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目的是寻找新的商道，开辟通往东方的新的贸易线路，为发展本国贸易建立垄断地位。许多国家的君主直接参加探险中的商业活动，比如，给予探险者在某一地区的贸易垄断权，以此收取回报；甚至直接投资参股，从中分红。这样，一种新的商业风气在西欧兴起，它引发的则是商业的精神。

人们对地理大发现的兴趣源于对财富的追求，哥伦布曾说：“谁有了黄金，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上天堂。”³²⁰15世纪末以后的100多年中，葡萄牙从非洲运走黄金27.6万公斤；1521~1544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每年运回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在1545~1560年运回的黄金和白银达到平均每年5500公斤和24.6万公斤。大量黄金和白银刺激了西欧的“价格革命”，商业活动变成最有利可图的活动，任何东西只要变成商品，就能赚取成倍的利润。于是，粮食作为商品销售，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西欧各地的庄园经济被逐一打破，随之而起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农村市场。当生产是为销售而进行时，商品经济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起领头作用的往往是土地所有者阶级，英国的乡绅最为典型。

在这种氛围中，重商主义成为最流行的学说。³²¹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国家的富强与其积累金银的多少成正比，在贸易活动中卖多买少，由贸易顺差而产生金银的积累。为此，国家鼓励商业，保障商人的利益，成为商人对外贸易的坚强后盾。到了重商主义后期，国家开始鼓励制造业，多生产就可以多卖，为国家挣回更多的金银。16~18世纪，重商主义是许多西欧王朝的基本国策，商业精神在西欧各国空前高涨。在商业大发展的刺激下，重商主义也逐渐从“重商”转向“重工”，人们意识到商业的基础是生产，没有本国的生产基础，重商主义本身就不牢靠。这种从“重商”到“重工”的转向，最早出现在英、法两国，而这两国也最

³¹⁹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³²⁰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³²¹ 很多历史学家将重商主义界定为一种经济思想体系和特定类型的经济政策，甚至被看成是构建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实践。正因如此，重商主义被视为君主专制兴起及经济现代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见拉尔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早走上工业化道路。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里斯本、塞维尔等城市地位上升。后来，北海两岸的港口取而代之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世界日趋成为一个整体，整体世界形成了整体的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人们一般将 15、16 世纪交接时看成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远洋探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商业革命将世界各部分连接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此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在世界上确立起来。

总结一下：1500 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为西欧酝酿了现代化的因素。其中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现代化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都是以此为依托而进展的。商业精神的发展造就新的价值观念，农业文明从根本上受到冲击。这段时间中，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许多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如中国的满清入关，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建立，奥斯曼苏里曼大帝的征战等。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对农业文明造成冲击，相反，却使农业文明更加巩固了。这样，西欧积聚了社会转型的条件，即农业文明开始瓦解，使它在发展的趋势上而不是在发展的水平上走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虽说从发展水平来看，它可能还不如其他一些地区。现代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首先在西欧起步的，因为我们在前面就说过：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转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第三章 现代化在西欧启动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已经启动，而是表明现代化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开始了。此时，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还不充分，克服君主的个人独裁专制是现代化启动的内在要求。

第一节 启动的三个条件

如上所述，1500年前后是欧洲新纪元的开始，前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对西欧至关重要。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西欧最先走向整个世界，它的领先优势就在这时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人在“人”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继而发生，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欧的领地分封时代结束，统一的民族国家兴起，为西欧强大创造了政治条件。专制王权建立后，许多国家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站在了冲向现代的起跑线上，但只有英国最早起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有些国家的经济率先起飞，有些国家迟迟不动呢？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许多争论。³²²

我们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它应有合适的政治结构来保证，就好像给“起飞”的经济安装一台发射架。对一个希望自己能够“起飞”的国家来说，它在政治上至少要求有三个基本条件：（1）这个国家是统一的；（2）这个国家是独立自主的；（3）这个国家克服了个人专制。

前两个条件在专制王权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专制王权正是在完成了国家统一和摆脱了外国干扰之后才确立的，因此当专制王权完成前两项任务时，已经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部分条件。专制王权时期的民族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致力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力开拓海外贸易。在国外，持有国王特许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开拓殖民地市场的先锋。在国内，国家鼓励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商品生产的扩大。许多国家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进步很大。比如在英国，16世纪毛织业成了国家的基础工业，手工毛纺织作坊遍布各地农村。采矿，冶金、酿酒、造船等也都成为重要的行业，对外贸易则迅猛发展，出现了许多从事远洋贸易的大商业公司。法国的工商业也发展很快，到18世纪初，法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他开办大规模的手工场，开凿运河，修建道路，奖励出口工业，建立庞大舰队，成立了许多贸易大公司。类似的经济在西欧其他地区也纷纷出现，专制王权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正

³²² 依据罗斯托的观点，起飞阶段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阶段，这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大约需要经历20~30年的时间。起飞阶段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投资率大幅度增长，从国民生产总值的5%提高到10%；二是先导部门发展，成为带动工业发展的龙头；三是有一个推动生产扩大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的运行机制。参阅，华尔特·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

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西欧的专制王权时期是资本主义或近代社会的准备阶段，³²³其特征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重商主义的实行。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16、17世纪的专制王权，“为现代化的开端创设了一个方便的虽说是专制的契机”。³²⁴

然而，专制王权却不能造成经济“起飞”。实际上，任何时期的王权都会行使一些有利国家发展的事情，只要这些符合或至少不侵犯自己的利益，即使是专制王权的形成也不能全部归因于国王的个人利益。在14世纪至15世纪时期的西欧，君主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国王为了增加国家财富，扩大工商企业，满足人民需要，试图确立中央集权的制度，依靠中等阶级的支持，迫使教会、封建贵族和自治团体服从国王的权威。国王通过建立行政机构，法庭、财政和正规军来维持或恢复公共秩序，在生产组织和阶级关系方面也或多或少地继续进行调节。法兰西的查理五世甚至允许农民鞭打那些企图行使不付代价而征发货车和饲料的皇室官吏。但是，正如法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布瓦松纳指出的那样：“它是很小心地维持有特权地社会阶级地主要特权的；它的经济政策一点也不是革命的；一般说来，它甚至是胆小的和犹豫不决的，它是那样专注于在它的不同阶级的子民之间，在传统精神和进步精神之间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均衡。”³²⁵

专制王权可以使国家变得初步强大，但暂时的强大不意味着现代化的真正开始。例如，在16世纪前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强大的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发生现代化起步。西欧专制王权鼓励工商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而那些增加的收入又被国王用在挥霍、战争以及维护贵族的特权上，结果开支越来越大，最后把国家推向破产的边缘。比如，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是法国最强盛的时期，通过科尔伯的努力，法国预算在1675年达到了收支平衡。然而，1688~1715年，法国几乎始终处于战争之中，战争造成国家财政危机，一个人的专政可以最终把国家推倒灾难的边缘。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留下了25亿里弗的国债，而1700~1706年法国国家的收入为3.5亿里弗。1774年，路易十六继任国王，国家债务达到45亿利弗尔。在西班牙，有人曾说，由于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野心而毁坏了国家，“是他想要西班牙富裕确实使西班牙贫穷”。然而，这位国王有许多好的个人品性，他忘命工作，节俭刻苦，遵守时间，临终遗言是“你们不要对穷人的诉冤感到厌烦！”³²⁶法王路易十四的个人品行也是无可厚非的。可见，专制国王个人品质再好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富强与平安。

³²³ 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雷吉娜·佩尔努指出：“16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度，有着专制的特征，与封建制度不同。”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³²⁴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波士顿1967年版，第417页。

³²⁵ P·布瓦松纳：《中世纪西欧生活和劳动》，商务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287页。

³²⁶ 让·德科拉：《西班牙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0~371页。

专制王朝还常常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增加收入，如把许多商品都列为专卖品，结果就严重地限制了生产发展。为了王朝的利益，国王可以任意选择是扶持还是压制某种工业。马克思指出，在西欧，“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同时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是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么现在的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³²⁷韦伯认为：“国家的重商主义法规也许促使工业发展，但却不能或者光靠它们肯定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哪里的法规具有独裁、极权特征，哪里的法规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阻碍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³²⁸韦伯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专制不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严密控制社会，使社会缺少活力，而缺少活力的社会是难以进行现代化的。

第二节 政治现代化在西欧拉开帷幕

从专制王权取得胜利的最后一刻起，西欧各国就面临新的任务了。这一次，是全民族与王权的对抗，民族要战胜曾帮助它取得独立和统一的工具。但正因为王权是在一种历史的前进运动中取得专制权力的，因此战胜它显然很不容易。这不仅因为它手里掌握着统一国家的机器，更因为它曾经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而且，向王权开战还必须有合适的国内外形势，如果分裂的势力和外敌入侵有可能出现，克服王权可能会让民族倒退到分裂混战之中去，这就使得民族有可能在推翻还是维护专制王权的交叉路口徘徊不前。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在克服专制王权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遭遇。其结果，各国现代化的“起飞”不仅有先有后，其现代化的发展路线有不同。自中世纪以来几乎在同一个方向上齐头并进的西欧各国，就在这现代化的起点上，开始有先有后，并分道扬镳了。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保障下，经济会发生飞速的发展。美国和法国是紧接其后的国家，它们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政治变革，工业化“起飞”也就接踵而至。英国、法国、美国之所以领先其他国家，就在于它们为经济起飞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

1、英国的事变

纵观历史事实，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现代化比经济现代化更早起步，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克服专制制度，布罗代尔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宛如天造地设一般，而这正是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所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这场革命也是现代历史最大的断口。它到底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呢？”³²⁹原

³²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页。

³²⁸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³²⁹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3页。

因是英国最早克服了专制的制度。17 世纪，它完成了政治变革。

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初步强盛之后，专制王权的历史作用也就完成了，君主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开始出现冲突。国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国家的法律，力图完全凌驾于民族之上。到这时，专制制度就成为民族的赘瘤、国家继续前进的障碍了。英国为了克服专制，先是发动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暴力革命没有解决问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最后，英国用“光荣革命”的非暴力手段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光荣革命后，英国政体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虽然君主立宪制在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贵族寡头制，但相对于西欧大陆国家的君主专制统治，英国的新制度营造出一种宽松、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发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巴林顿·摩尔指出：议会民主的原则与那些于内战中在很大程度上被战胜的原则是直接对立的，“后者主张在政治上对权威的神圣支持……没有新的原则在 17 世纪的成功实施，就难以想象英国社会如何能够在 18、19 世纪和平地实现现代化。”³³⁰

事实证明，在专制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丧失之后，谁先摆脱专制制度、先推翻专制的王权，谁就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走到其他国家的前面。15、16 世纪发生的那些事变：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发展、民族国家等，都不是首先发生在英国。英国只是在克服专制王权这一点上先走出一步，结果就第一个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英国学者哈巴库克认为，类似于西欧大陆的制度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的英国曾经存在过，“但内战把它摧毁了”。³³¹直到 18 世纪晚期，西欧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英国的那种突破，即使在它们认识到英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与巨大的经济优势后，它们也未能效仿英国的成功。³³²

英国思想家洛克对“光荣革命”作了最充分的理论阐述。他在《政府论两篇》中指出，人人应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但为保障社会的安宁就必须组成政府，交出个人的一部分权利给政府。因此，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政府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假如政府违反契约，对人民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拿起武器，以暴力抵抗暴力。但暴力的抵抗只能是最后的手段，人民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在事情还来得及收拾时更换立法机构，因此设立新政府。坚持人民有暴力抵抗的权利，是防止发生暴力革命的最好手段，“向那些最容易做出祸害之人指出这样做的

³³⁰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页。

³³¹ H.J.哈巴库克：“关于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历史经验”，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5 页。

³³²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44 页。

危险和不公正，是防止祸害的最好方式。”³³³洛克主张通过分权机制建立最合理的政府，它既有自由的崇高地位，又有王权的适当作用，相互制约而取得平衡，任何一种权力都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洛克学说把自由和王权结合起来，两种传统同时被继承，自由虽然占了优势，王权却也被保留。洛克的学说成为后来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石，对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人来说已不是一种激进的学说，但却成为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思想文化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³³⁴

2、美国建国

紧跟英国之后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在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光荣革命使北美殖民地和母国一样摆脱了专制王权的束缚，在独立之前，北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同英国一起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但是，在殖民地的状态下，北美的自由权必然遭到宗主国的干涉，这种宗主国干涉下的不自由压制了北美经济的发展。所以，北美需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美殖民地具有民主的传统。第一批来到这里的英国清教徒们，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平等的理想，在登陆北美之前，他们就签订了“五月花公约”，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份未受任何外力要求或权力机关授权而制定的带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文本。在殖民地早期，英国政府并不看好北美殖民地，所以也不认真实行有效的管理，对于殖民地的自治倾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北美殖民实行的是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在当时13个殖民地中，除了纽约和佐治亚外，其他殖民地的特许状上都写有：所有立法均须取得“自由民的同意”。³³⁵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这是西欧大陆国家不具备的，其宽松程度甚至超过了母国——英国。

但是，北美没有解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问题。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自然要受到它的巨大影响。在北美独立之前，英国对其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与北美之间的商业互动，很快促进了北美经济的发展，为工业化或经济起飞准备条件；另一方面，英国又限制了北美经济的全面发展，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按照宗主国的需要开展，在经济种类上受到宗主国的强烈制约。在疆域上也不被允许大幅度地向西部扩展，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英国毛皮业。此外，当时的13个殖民地都只与母国保持直接系，而彼此间的联系相对就很少，各地自成一统，仅货币就有20多种。

18世纪中期，北美的农业、工业、商业发展加快，在这个基础上，各殖民地居

³³³ 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纽约1952年版，第127页。

³³⁴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3页。

³³⁵ 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美国历史简介》，1982年5月版，第18页。

民之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利害感，美利坚民族意识开始出现。七年战争中，各殖民地之间的交流增加了，“美洲人”的意识更加增强。七年战争后，英国对北美加强控制，税收加剧。1763年，英国政府颁布法律，禁止北美殖民地人进驻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纸、证明文件都必须贴上印花；1767年颁布“唐恩森德法令”，规定对卖给殖民地的玻璃、纸张、茶叶等物品课以入口税，以此支付殖民地官吏及官兵的薪金。这些都使殖民地认识到与母国的利益不同，最终引发了独立战争。

北美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独立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统一的任务尚未实现。1777年邦联议会通过《十三州邦联永久联盟条例》。然而，邦联条例设立的只是一个权利极为有限的邦联政府，在国防、公共财政、贸易等重大事务方面，邦联政府都要遵从各州议会的意志，每个州都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任何决定必须有九个州的同意才能生效。可见，13个州都拥有主权国家的所有权利，并不存在一个具有主权性质的全国性政府。因此，新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混乱。这样的联盟如同乔治·华盛顿所言，13州只是由“一条沙绳”结合起来。³³⁶

1787年5月25日，13州的55位代表在费城举行了制宪会议。1789年3月4日，《联邦宪法》正式通过。联邦宪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选政府。尽管这部宪法没有解决奴隶问题，妇女也不享有选举权，但它依然使美国成为那个时代最民主的国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联邦宪法规定，联邦政府的权力高于州政府，各州必须遵守联邦政府的宪法、法律。因此，联邦宪法创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是它与邦联条例最大的区别。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对美国政治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不仅拒绝担任国王，而且在连任两届后坚决引退。接任的杰弗逊同样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也作出了坚决引退的决定。由于美国的政治理念十分独特，华盛顿和杰弗逊等人又能够坚守，所以，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出现克伦威尔或拿破仑那样的军事独裁领袖。这个新国家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国家采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即平等、自由、民主、法制、权力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美国不仅解决了独立和统一的问题，而且使源于英国的民主和自由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法国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虽人均产量明显落后于英国，但堪称总产量世界第一。³³⁷但是，法国此时的发展经历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它在本质上属于原工业化经济，即

³³⁶ 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美国政府简介》，1981年10月版，第2页。

³³⁷ 沈坚：“法国大革命与法国现代化”，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在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之间的过渡形态。原工业化是西欧 16~18 世纪的一个普遍现象，布罗代尔认为，这些“前”工业在当时遍地开花，“它们就像成千个微弱的火星，同时把辽阔的干草地点燃。这些火星可能燃成燎原之火，也可能熄灭，然后在别处死灰复燃。”这些工业“不具有所向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在 18 世纪初显示出来，并在 19 世纪最后确立”。在布罗代尔眼里，“前”工业化与工业化不可同日而语。³³⁸政治上，此时的法国人依然生活在“旧制度”下面，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僵化社会结构与现代工业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一度使法国成为西欧的强国，但专制主义下的强盛却不能使它走向工业化。

大革命前的法国正值启蒙运动的中心，在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法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平等意识，专制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在国家财政压力之下，路易十六被迫实行改革，决定向第一、第二等级征税。但是，人民要改的不是法国制度的外表，而是专制王权这一实质，路易十六不愿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贵族虽然不满国王对他们传统特权的削弱，但恢复路易十四时期以来失去的政治权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以前的社会，他们在本质上憎恨社会出现的一切新变化，不愿意看到那些非贵族出身的资产者通过各种方式跻身于贵族行列。

法国大革命就是为国家的现代化扫清道路。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拿起武器，摧毁了象征着专制主义统治的巴士底狱。8 月份颁布的《人权宣言》从根本上确定了现代社会的原则。1791 年 9 月 3 日颁布的宪法规定了立宪君主制，废除了侵犯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封建制度参与，废除了贵族特权和等级差别。

然而，革命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并没有得到保守派的承认，革命者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结果产生了长时期的宪政不稳定。虽然从原则上说，法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人们在思想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法国的国王和贵族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团结起来，希望利用国外力量将革命镇压下去。于是，国王与贵族采取了与外敌勾结的做法，完全站在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上。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它所需要的就是克服专制制度。但是，在法国人努力实践这一伟大任务之时，国家的独立性却遭到了外国敌对势力入侵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法国为了一致抗拒外敌，将革命与恐怖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暴力压制内部的不同声音，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极端的独裁者。在法国第一共和国成立和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1793 年宪法显然比 1791 年宪法的民主色彩更强烈，但这份宪法只能停留在文字上，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格宾派实行地地道道的专政，行政权高度集中在罗伯斯比尔一人手中，反对他的个人意志就是反对革命，也就意味着死亡。

³³⁸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627 页。

有学者认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工业化的开端。³³⁹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它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等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则。拿破仑实行税收体制改革，建立法兰西银行，建立了一整套的财政、司法、军队、教育管理制度。但拿破仑仍旧实行一个人的统治，法国大革命的伟大目标并没有实现。同时，拿破仑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法国的经济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也出现下滑。事实证明，拿破仑的个人统制依然不能解决法国的问题。

1830年的七月王朝建立后，法国才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七月王朝是英国议会制的一个翻版，是一种寡头政体。七月王朝降低了选民的条件，男性选民从10万增加到20万。议会权力得到加强，众议院可以选举议长，与国王共同拥有法律的初创权，可以修改法案、推翻政府，真正实现了议会权力与行政权力平衡的二元制政体，路易·菲利普是资产阶级形象的国王，中等阶级则是这次社会变革的主要受益者。到这时为止，法国基本完成了克服专制的任务，走上了立宪的道路。

第三节 早期工业化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政治与社会最宽松的国家。政治上的宽松保证了英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自由，鼓励他们追求财富，这就为发明创造提供了条件。由于棉纺织业的供需矛盾最为突出，技术变革最先从这个行业开始。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一个织工就可以完成织机上的所有工作。³⁴⁰1766年，“珍妮机”使一个工人纺出十多支乃至几十支棉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³⁴¹1779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十年后，克隆普顿综合“珍妮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一台机器可以同时带动300多个纱锭，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而又结实。1800年，英国使用骡机的纺纱厂达到600家。³⁴²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水力织布机，提高织布速度40倍。而当时的世界各国，流行的依然是手工纺纱机与织布机，这些机器价格高昂，生产效率低下，质量不高。英国的棉纺织品一举垄断了国际市场，此前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的中国与印度的棉纺织品的销量一落千丈。

³³⁹ 布罗代尔和拉布罗斯：《法国社会经济史》，转引自，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³⁴⁰ 皮特·莱恩：《工业革命：近现代的开端》（Peter La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伦敦1978年版，第179页。

³⁴¹ 安东尼·伍德：《十九世纪的英国，1815—1914》（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伦敦1982年版，第12页。

³⁴² 菲莉斯·迪恩：《1688至1959年英国经济的增长》（Phyllis Deane &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剑桥1969年版，第191页。

技术变革促成了机械化在纺织行业的推行，动力问题成为纺织业技术突破的核心。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气机。十多年后，复动式蒸气机研制成功。蒸汽机的发明是英国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大标志，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大规模的蒸气机的使用标志着工厂制度的诞生，蒸汽取代人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此时，一台机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相当于几十、上百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而且价廉物美，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英国的物质财富空前增加，英国工业品畅销全世界。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短短几十年间，我们很难再看到田园诗般的“快乐的英格兰”，英国到处是机器轰鸣和烟囱林立，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是一副全新的工业化社会的图景。

纺织、煤炭、钢铁、机械是工业革命的代表性行业。1785~1850年间，英国棉纺织品产量由4000万码增加到20亿码，增加49倍；煤炭产量由1770年的600万吨增加到1850年的4950万吨，增加7倍多；生铁产量在1788年不到7万吨，1847~1848年达270万吨，提高了38倍多。³⁴³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煤炭产量则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以及西欧总人口的10%，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工业品的40~50%，占西欧工业品的50~60%。³⁴⁴1688年，英国的国民总财富为4800万英镑，1855年增长到7亿英镑。1700年，人均年收入8英镑，1750年增长到12英镑，1800年达到22英镑。³⁴⁵一些过去只为贵族阶层所特有的奢侈品，比如，棉织品、毛织品、长袜、床单、毯子、水壶、烹饪器、火炉以及铁制壁炉等，现在几乎被所有社会阶层所享用，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技术，大多数也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³⁴⁶

1851年5月1日，英国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博览会中心水晶宫内陈列着约1.4万家厂商提供的展品，其中英国厂商约占一半。而且，英国提供的几乎都是工业品，包括自动纺织机与织布机，海船引擎，火车头，水压机，各式各样的起重机、压力机、汽锤、机床，隧道、桥梁以及汽船模型，以及引人注目的蒸汽机等。在当时的世界，几乎只有英国才能生产这些物品，其他国家只能从英国进口。英国这种空前的繁荣与富足，完全依赖于英国人首创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在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却无一例外地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工业社会与

³⁴³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524页。

³⁴⁴ 弗朗索瓦·克鲁泽：《维克多利亞时代的经济》（Franc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纽约1982年版，第4~5页。

³⁴⁵ 皮特·莱恩：《工业革命：近现代的开端》，第248页。

³⁴⁶ A.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763—1793》（第八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是天地之别。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的力量，其他国家必须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样涌入西欧和美国。³⁴⁷

法国是第一个受英国工业化刺激而开始变革的国家。七月王朝建立后的二、三十年中，法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到19世纪四十年代末，法国已有绵织厂566家，纺纱机11.6万台，机器纺锭35万枚。机器织布机3万多台，家庭纺纱业基本绝迹，工厂制度在纺织业各个部分广泛运用。1839年，法国的机械师发明了缝纫机，一个崭新的服装工业在法国崛起。蒸气机也从1810年的200台增加到40年代末的6000台。1832年修改了第一条从里昂至纪埃河的铁铁路。这一时期，法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以上，法国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工厂制度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³⁴⁸

新英格兰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工业化早期的大多数工厂就建在这里，因为该地区拥有可以提供动力资源的大瀑布。1804年，美国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发明了高压蒸气机，很快被运用于航运、纺织、印刷等部门。由于英国政府对棉纺机等技术专利方面的控制，于是，美国人通过刊登广告来招聘技术人才。1790年，英国青年斯莱特只身来到美国，完全凭记忆设计出24锭的棉纺机，办起了棉纺厂。1792年，轧棉机的发明解决了大面积种植棉花的技术难题，棉花产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834年，马拉收割机的发明，保证了西部地区可以大面积种植小麦，西部也渐渐地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大粮仓。从18世纪末开始，东部的美国人不断地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移居，掀起了广泛的西进运动。³⁴⁹西进运动在19世纪逐步进入高潮，并为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思想认识和物质基础上的双重保证。从1810年到1860年的50年间，美国的工业产值增加了10倍多，工厂制度在各个工业部门中已占支配地位，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³⁵⁰

美国即没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包袱，又在立国之初就已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创造并从上到下都认可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国家制度。南北战争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而充满活力的美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产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

³⁴⁷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³⁴⁸ 刘笑盈：《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1页。

³⁴⁹ 李庆余、周桂银：《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0页。

³⁵⁰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约是苏联的 3 倍；1948 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 2 倍多，苏联的 6 倍。³⁵¹

第四节 早期进入现代化的其它国家

还有一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起步相对较早，而且发展道路与英国比较接近，都是在政治上采用和平渐进的方法，在经济上使用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些国家包括低地国家和北欧国家。英国几个白人殖民地也较早进入现代化过程，它们的情况留待以后再谈。

在当时的西欧，联省共和国（荷兰）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第一个“由第三等级——中等阶级建立并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共和国“自始至终都带有这种起源的特征”。³⁵²所以，独立战争实际上一举完成了三项任务：国家独立、统一、确立寡头政治（消除西班牙专制），这使荷兰在 17 世纪走在了世界的前列。³⁵³

独立后的荷兰很快成为经济大国。1670 年，荷兰已拥有商船 57 万吨，这是当时英国的 6 倍，法国的 7 倍，荷兰成为十七世纪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当时荷兰约有 250 人居住在城市，这是荷兰总人口的一半。³⁵⁴很多学者认为，荷兰、英国和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大国，当然，英国和美国的大国是全方位的，而荷兰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依靠商业以及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金融业，世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就诞生于阿姆斯特丹。但是，荷兰与当时的英、法相比，国土和人力资源是无法与这些大国相提并论的，作为因素之一，荷兰占据的海上贸易霸主地位的时间也比较短暂。1652~1674 年，英国三次发动对荷战争，荷兰的商人遭到沉重打击。1672 年，法国为了报复荷兰反对其吞并南尼德兰，挑起对荷战争，企图吞并荷兰。为了挡住军队强大的法国，荷兰被迫放水淹没瓦泰尔利尼洼地。尽管如此，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荷兰周旋在各强国之间，即使是路易十四也不能奈何荷兰，而在路易十四最辉煌的时期，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也具备了大君主的威望，成为反对这个咄咄逼人的“太阳王”的同盟的领袖。当然，荷兰被法国征服的危险依然存在，威廉三世因此最终同意应邀到英国做国王。荷兰因此得到英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但这也让英国后来超越了荷兰。

从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上分析，荷兰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其独立地位一直处于他国的威胁之下，而统一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出在联合省是一个七省共治的政治体，任何重大问题都需要经过各省协商一致才能做决定，而“执政”一般只在军事方面有强大的决策权，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事实上非常虚弱，各省都会因为各自的地方利益而不顾整个国家的利益——

³⁵¹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 20 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6 页。

³⁵² 房龙：《荷兰共和国兴衰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³⁵³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 1995 年 12 月版，第 215~217 页。

³⁵⁴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 页。

这是它未经过专制王权锻造阶段的代价。不过，即便是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国，由于基本具备了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荷兰依然凭借着其巨大的商业优势和综合实力，曾让西欧的所有强国望其项背，成为 17 世纪最强大的海洋国家。荷兰后来在拿破仑战争中被法国吞并，拿破仑战争后荷兰痛下决心修改国体，改建为王国，设立了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府；1848 年革命之后，荷兰实行立宪整体，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过这时它早就失去其大国地位了。

相比之下，南尼德兰（比利时）地区长期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又先后归属于奥地利、法国和荷兰。从属的地位使它经济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 1830 年，比利时摆脱外国控制，建立独立的比利时王国，而正是这以后，比利时的工业突飞猛进达持续 50 年之久。在发展铁路、采煤和工程建设方面，比利时在西欧大陆处于领先地位。1835 年 5 月 5 日，布鲁塞尔与梅克林铁路线正式开通，它是西欧大陆上最早的定期客运货车，第一年的运客人数超过了英国的全部铁路的客运量。重工业也出现惊人的发展势头，在 1835 年至 1845 年间，比利时的煤产量增加了 1 倍，铸铁出口量增加了 8 倍。1840 年，比利时拥有了当时西欧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和铸铁厂，雇佣了 2500 多名工人。比利时首创了尼德兰民族工业促进总公司，它掌握的资源比一个商人或一家私人银行多，灵活性和自由度也好。在银行投资的业务方面，比利时也是领先的。有人甚至说比利时是“第二个工业化国家，在某些领域如铁路和财政方面，甚至超过英国。”³⁵⁵

卢森堡原是比时的一个省，1839 年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由荷兰国王兼任国王。在 1848 年西欧革命中，荷兰作出让步，同意卢森堡制定独立的宪法。这以后，卢森堡的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出现飞跃发展。以生铁产量为例：1855 年是 60 吨，1865 年是 12.5 万吨，1873 年是 25 万吨，1891 年是 50 万吨，1900 年是 100 万吨，1913 年是 250 万吨。由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卢森堡这个区区小国曾被划入 6 个主要现代基础工业国家的行列。³⁵⁶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现代化道路上基本上走的是英国的和平和渐进的道路，在工业化方面，它们是领先的国家。相比之下，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这四个北欧国家的历史发展与英国更相像。

瑞典在 14 世纪末被丹麦吞并，到 1520 年通过战争摆脱丹麦统治，古斯塔夫·瓦萨成为瑞典国王，这标志着瑞典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专制王权的确立。在专制王权领导下，瑞典一度成为北欧最强大的国家，曾一度与法、俄等国家抗衡。1718 年，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中弹身亡，由于他身后没有直系继承人，黑森的世袭选帝侯菲特烈和他的妻子乌耳里卡·埃累沃诺腊入主瑞典，瑞典开始进入一个自由年代。1719

³⁵⁵ 弗兰克·哈格特：《现代比利时》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1 页。

³⁵⁶ 保罗·韦贝尔：《卢森堡大公爵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65~155 页。

年和 1720 年的通过的“政体法令”，特别是 1723 年的“议会组织条例”使议会（四等级）成为国家权力中的最有效的机构，“王室开始丧失它在瑞典政治生活中的传统地位……国王变成只不过是参政会中的主要成员，他的权力只限于在重要问题上行使两票表决权”。³⁵⁷显然，专制王权已经被克服，至少在制度上如此。

从 1772 年开始，瑞典政治现代化出现了一次大倒退。是年，古斯塔夫三世上台后开始恢复国王个人的权力，议会由国王随意召集，国王的意志左右着政府的决策。³⁵⁸1796 年继位的古斯塔夫四世继续执行其父的专制统治。但是，国王试图恢复专制的做法一直遭到瑞典人的反对。1800 年在诺尔彻平的议会上，专制体制受到猛烈的反对，有的贵族议员甚至以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的方式抗议。1809 年，古斯塔夫四世被放逐国外，一部按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新宪法被确定下来，瑞典恢复了古斯塔夫三世之前的制度。1809 年瑞典宪法是西欧最早一部成文宪法，该宪法确定国王是王国的惟一统治者，但征税权归议会，民法、刑法和宗教法的制定及修改由议会和国王共同负责，国王在作出决定前，应同参政会协商，而参政会对议会负责。从此以后，瑞典的专制制度再无恢复可能。

很快，瑞典的制铁工业的陈旧技术得到改造，各地纷纷建立现代化的铁厂，自由主义经济原则成为主导。1823 年开始，议会发动了经济改革运动，到 1846 年，工商业的限制几乎全部取消，瑞典经济进入了新纪元。19 世纪 30 年代初，木材每年平均出口 19 万立方米，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木材出口增加了 6 倍，1885 年达到 375 万立方米；生铁的平均年产量，19 世纪 20 年代是 8 万吨，1861~1865 年上升到 20.5 万吨，1880~1890 年年达到 44 万吨。1858 年，瑞典制铁工业家 G·F·耶兰逊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将空气注入熔化的生铁中，成功地将铁中的炭含量降低到理想值，为世界第一座贝氏炼钢炉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机械化的织布机也在 1850 年前后传入瑞典，诺尔彻平成为毛纺业的主要基地。1862 年，瑞典第一条铁路通车。1856 年以后，一批与工业关系密切的现代化银行纷纷创立。造船工业快速发展，瑞典火柴的销路大大拓展。与此同时，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也在进行之中。1844 年，取消了对出版自由的各项限制；1845 年，规定男女具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1864 年颁布了新刑法，废除了酷刑；1865 年的议会改革，中等阶级取得了绝对的政治领导权。³⁵⁹

丹麦的现代化道路与瑞典相似。丹麦的专制王权在 1657-1660 的丹瑞战争后建立，民族国家已基本定型。由于丹麦专制王权的形成比较容易，取消这个专制制度也比较轻松：1848 年西欧革命影响下，丹麦的市民代表去王宫请愿，要求颁布自由宪法，国王菲特列七世爽快地答应了立宪要求。丹麦的民主政体自 1849 年宪法的签

³⁵⁷ 安德生：《瑞典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369 页。

³⁵⁸ 安德生：《瑞典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414 页。

³⁵⁹ 安德生：《瑞典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512~536 页。

署而确立，这以后，丹麦的经济也进入顺利发展的阶段，1854年，丹麦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不管一切挫折，不管整个领土的减少，丹麦正开始找到了她的道路。”³⁶⁰

挪威在历史上长期依附于他国，14世纪末开始隶属丹麦，1814年转归瑞典。于是，其政治制度的走向相对简单，即从丹麦的君主专制制度转为瑞典的君主立宪制度。长期以来，瑞典的国王就是挪威的国王，挪威并没有自己的国王，但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和政府。1884年，挪威建立了英国式的议会责任制政府，1913年基本实现了普选制，到1905年独立时，挪威的民主制度已基本确立。

芬兰长期隶属瑞典，但芬兰人拥有瑞典本土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在瑞典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代表。在1809年芬兰被割让俄国以前的700年中，瑞典与芬兰从未发生过战争，这在西欧历史上极其罕见。换句话说，瑞典对芬兰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芬兰愿意接受这种影响。由于这种原因，处于减少芬兰人敌意的考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让芬兰保持它以前的宪法、法律、行政和宗教体制不变或基本不变，芬兰的地位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而是自治和立宪国家，拥有国家必不可少的一切基本权利。在1809年3月29日的建立自治的芬兰国家正式仪式上，沙皇首先宣布一项保证敕令：“我，亚历山大……愿以本敕令确认和批准此邦的宗教信仰和各项根本法，并确认和批准上述大公国根据宪法每一等级迄今所特别享有的、以及不论地位高低全体居民迄今所一般享有的各项特权和权利。我允予维护所有这些权益和法律，使之固定不变并具有充分效力。”³⁶¹于是，芬兰虽然在1809年划归俄罗斯帝国，但政治上依然保留了从瑞典带来的立宪制度。这种制度与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制度还不能相提并论，但与当时的沙皇专制制度相比，它确实已十分开明了。芬兰的元首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兼任芬兰的大公），在帝国范围内仍然是专制君主统治，但芬兰却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度。根据芬兰宪法，亚历山大不能以命令统治芬兰，必须接受芬兰议会在制订重要法律、征税、改变宪法等方面的权力。有趣的是，在被割让俄国之前，芬兰人是名副其实的瑞典臣民和公民，但在1809年之后，他们真正成为了芬兰人，俄国人对芬兰来说却是外国人。隔断几个世纪以来与瑞典的联系，从而激发了芬兰人的爱国心并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芬兰终于在1809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北欧的政治地图上。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言：“没有人想到恢复以前与瑞典的联合，也没有人要与俄国融合一体……我们认为芬兰是……我们的祖国，并且感到芬兰本身是一个实体，它不再可能变成瑞典的，也永远不应当变为俄国的。换言之，我们感到我们是芬兰人，是芬兰民族的成员。”³⁶²芬兰此时已基本具备现

³⁶⁰ 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6页。

³⁶¹ 约翰·伍里宁：《芬兰史》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9页、191页。

³⁶² 约翰·伍里宁：《芬兰史》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8~229页。

代化起飞的三个条件。

于是，芬兰的工业化从1809年开始起步。到1850年，工厂总数达到140家，主要包括铁、纺织、玻璃、纸张和烟草行业。1850年以后，芬兰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1856年，政府成立了两个委员会来研究发展工业和矿业的措施，1856年、1863年、1864年和1867年四次修改关税条例，取消或减少了对进出口商品的限制。1860年，芬兰有了自己的货币单位——马克。货币独立加强了芬兰的独立地位，同时刺激了工业和银行业的发展。1862年，第一条铁路通车，第一家商业银行建立。赛马运河则在1856年完工，随之而来的是运输和交通的现代化。1879年全部废除对自由经济企业的任何限制。然而，1899年开始，芬兰遭到俄罗斯化的威胁，在是年发布的帝国文告中，芬兰的立法几乎全部置于俄国政府的监督之下。芬兰的宪法和法律此后将仅仅是地方法律，并将受到圣彼得堡的任意决定。1906年，芬兰乘俄国发生革命之机修改宪法，以平等和普选（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为基础的一院制议会取代了陈旧的四个等级的议会。但1908年开始，俄国对芬兰的干涉又加大，俄国公民被授予芬兰公民同等的地位，对芬兰的税收是横征暴敛，宪法失去了它的意义。³⁶³1917年十月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从此，芬兰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节 争霸与战争

随着现代化在西欧各国发展，大国争霸行为也愈演愈烈，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太平。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国际性战争一再把全西欧都席卷在内。每个时代都产生它自己的战争，甚至它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战争。³⁶⁴国际性战争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并不断升级的，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的一大抱憾。

1、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

在法荷战争后（1672-1678），路易十四欲在欧洲作出大规模的扩张，完成其称霸欧洲的梦想。1686年7月9日，为了遏制法国，奥地利、荷兰、瑞典、西班牙、萨伏依、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国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建立同盟。1688年9月24日，法国侵入普法尔茨，同盟战争爆发。战争迅速扩大到德意志其他地区和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成为英王威廉三世。因此，英国在1689年也加入奥格斯堡同盟。因交战双方均无力取得决定性胜利，在1697年9-10月，双方签署了里斯维克条约。根据条约，法国放弃了侵占的大部分欧洲土地，荷兰军队驻守西属尼德兰的要塞，英国舰队获得了深入

³⁶³ 约翰·伍里宁：《芬兰史》中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0~342页。

³⁶⁴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81页。

地中海的权利并开始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已经具有争夺民族国家霸权的性质。

2、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3）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也起因于争夺民族国家的霸权。1700年11月1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没有子嗣承继王位，而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都有继承权。查理二世在遗嘱中决定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普，但前提是腓力普不可以成为法国国王。然而，法国路易十四不仅提出割让西属尼德兰的要求，还正式宣布，已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腓力普有权成为下一个法国国王，这意味着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当时的西班牙除其本土外，还有意大利的大部分、西属尼德兰，以及遍布美洲、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法国本来就是西欧的超强大国。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当然不能容忍法国势力的再度扩张，因为这不仅使势力均衡被破坏，而且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利益也将受到威胁。1701年9月，反法联盟成立，次年5月对法宣战。这场战争削弱了法国的西欧霸主地位，表明王位的合并不再是中世纪那样的家族事务，没有其余西欧国家的同意，这种合并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而遭到讨伐。

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类似，起因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绝嗣。1740年10月2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逝世，根据1713年的《国事遗诏》，其长女玛丽娅·特蕾西娅将承袭其奥地利大公之位，而玛丽娅·特蕾西娅的夫婿弗兰茨·斯蒂芬则可承袭神圣罗马帝国帝位。可是，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撒丁、皮埃蒙特、那不勒斯王国并不承认《国事遗诏》；奥地利、英国、捷克、匈牙利、荷兰、西里西亚、俄国则全力支持玛丽娅·特蕾西娅夫妇的继承权，而德意志三大诸侯国：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更极力协助玛丽娅·特蕾西娅的表姐夫，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位。1740年12月16日，反奥阵营里最积极的一方普鲁士正式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则联合英国、波希米亚、匈牙利、荷兰、西里西亚及俄国，抵抗反奥阵营的入侵。以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为骨干并且长达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成为欧洲大战。根据1746年签订的《亚琛和约》，普鲁士得到西里西亚大部领土；西班牙得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转归萨丁；法国放弃在荷兰和印度的征服地。然而，《亚琛和约》只不过是七年战争爆发前的一次休战，西欧列强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4、七年战争（1756~1763）

七年战争的本质是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为争夺殖民地和西欧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法国在《巴黎和约》中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从印度撤出，法国的声望显著下落，路易十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成

为法国的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英国成为海上霸主，但英国将战费转嫁在北美殖民州身上，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七年战争结束后 13 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奥地利痛失西里西亚这个富庶地。俄国加强了强国的地位，更趋于向西扩张。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特殊地位得到巩固。

5. 拿破仑战争（1799~1815）

拿破仑执政时代，法国为了在西欧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同英国争夺贸易和殖民地的领先地位，而与奥、普、俄、英为核心的反法联盟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拿破仑帝国在连续不断的侵略战争中形成，1811 年，帝国居民达到 7100 万。1813 年，法军在莱比锡战役失败后，开始向莱茵河对岸撤退。1814 年初，同盟军攻入法国。同年 5 月 30 日，在巴黎签订和约，法国丧失了 1792 年以来征服的所有领土，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1815 年 3 月拿破仑卷土重来，在法国登陆，恢复了帝国统治。1815 年 6 月 18 日，盟军在滑铁卢再次打败拿破仑。1815 年 11 月 20 日，法国和同盟各国在巴黎签订新条约，拿破仑战争结束。拿破仑战争是英法争夺霸权的最后一次大战，这以后，英国就稳操世界霸权了。

民族国家一方面保护了各国现代化，为现代化提供了有形的载体；另一方面却从一开始就把战争变成了国家间的战争，各国都通过战争来争夺国家利益，一直到 20 世纪，欧洲国家都把战争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为争夺领土、资源、财富等不惜发动战争。而国家间的战争破坏力是极大的，中世纪时战争在领地或领主间爆发，那时的战争规模不会大，涉及面并不广，动用资源也很有限；但一旦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规模就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直至把整个社会都卷入在内，并且从几个国家的战争变成欧洲战争，最终发展成世界大战。战争的手段也日益残酷，武器越用越先进，杀伤力越来越大。欧洲大战和后来的世界大战都是民族国家后果，因此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面性：它的利己动机一方面推动了本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造成大规模的国家间的战争随之而起。

第四章 现代化在欧美的发展

工业化的西欧先行者为全世界树立了样板，现代化的效应(effects)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当先行国家的工业化汹涌澎湃之时，其他欧洲国家便感到了压力，被迫实行变革，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而形成了追赶现代化的浪潮。1848年革命，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波兰独立斗争，俄国革命等，这些都是追赶现代化的表现，为经济发展创造合适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化变革已经触及到早期工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各个方面都必须作出调整，按照工业社会的要求进行重组。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巨大的变化中，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势在必行。在完成这种整合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又经历了许多社会动荡，诸如工人运动，民众造反，种族冲突，利益集团的冲突等等。与此同时，阶级社会出现了，各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争夺政治话语权。

第一节 现代思想在西欧的扩散

1、拿破仑战争的政治遗产

拿破仑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导致其失败的最终原因。但拿破仑战争将大革命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现代价值观传播到全欧洲，进而传播到全世界。它还涤荡了德意志诸邦、意大利诸国、波兰、比利时等国家的封建残余制度，结束了历时八百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它唤醒了西欧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力流向全球。欧洲到处都滋生出民族主义，而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也在全欧洲开花。一位意大利爱国者这样说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是，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³⁶⁵

2、1848年西欧革命

1848年革命是欧洲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其主要任务可以归结为消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现代化扫清道路。由于发生革命的各个国家历史条件不同，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国革命的具体任务也有所不同。法国要求让工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造；匈牙利、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各族人民要求推翻外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在德意志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家，推翻各邦国的专制制度。在意大利是为了消除国家分裂状态，去除外国势力，建立民族国家。

³⁶⁵ 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革命火花首先在意大利迸发。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揭开了革命的序幕。起义者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建立了自由派的临时政府。维也纳、米兰、威尼斯等地随后爆发起义。在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撒丁、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的统治者对奥地利宣战，开始为统一国家而斗争。但法国、奥地利和两西西里王国的联军很快镇压了人民运动，统一运动也无所作为。8月，意大利革命完全失败。

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王朝反对派”主张扩大选举权，实行有限的议会改革；共和派主张扩大选举权，建立共和国，其左翼还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全面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冲击总理官邸。24日晨，工人和革命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向王宫进攻，国王路易·利浦仓惶出逃。2月25日，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为第二共和国。11月12日，制宪议会颁布了《1848年宪法》。但在12月1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开始侵占革命果实。到1851年，他已经登上皇位，成为又一个独裁者。法国革命也就此结束了。

革命前的德意志四分五裂，分裂状态严重地阻碍着国家的发展，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德意志几百年来一直落后，现代化很难起步。当其它西方国家已经在工业化道路上顺利前进时，德意志只在若干地区开始了工业化。1848年，在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南德的巴登公国首先发难，迅速向西部和西南诸邦扩散。3月13~16日，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革命，18日晨，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取消书报检查和尽快召开制宪议会的命令。但这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他们在王宫广场筑起了街垒。国王调动大批军队，向起义中心地区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迫把军队撤出柏林，同意召开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议会。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在人民的压力下，奥皇于3月17日改组了内阁，4月25日颁布帝国宪法。5月15日和26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奥皇及皇室逃出维也纳。但是，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5月18日，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6月29日，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组成了帝国政府。但这个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形同虚设。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某些自由、民主权利，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拒绝加冕，普鲁士和奥地利各邦君主也不接受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并且开始武力镇压，扑灭了各邦的革命。5月，德意志西南发动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但无果。在此期间，大多数议员被各自的邦政府召回，剩下的议员迁到斯图加特，6月18日又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瓦解，德国1848年革命完全失败。

1948年3月11日，布拉格3000群众集会，通过了致奥皇的请愿书，要求召开

捷克各地区统一的议会，有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是用捷克语和德语享有平等的地位等。3月19日，奥皇拒绝了捷克代表呈交的请愿书，引起布拉格等城市的抗议活动，并于3月28日再度提出请愿书。在压力之下，斐迪南一世满足了捷克人民的部分要求，同意捷克语与德语平等，允许捷克成立责任内阁。但居住在捷克的德意志人则希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主张把捷克合并于德国的版图。与此同时，奥地利境内的其他斯拉夫人也提出自治权。于是，捷克掀起了泛斯拉夫运动。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会议，大会宗旨是团结所有斯拉夫人反对德意志统治者。但是，大会对当时的捷克革命运动没有起到推动作用，不久就中断了活动。维也纳五月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捷克以后，布拉格于6月12日举行起义。起义者同奥地利军队进行顽强的战斗。6月17日，起义失败。

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首府佩斯的革命者在裴多菲·山道尔的带领下，通过了实行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奥皇畏惧维也纳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继续发展，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1848年12月，奥皇调集军队向匈牙利进攻。1849年1月5日，匈牙利首都佩斯陷落，国防委员会和国民议会迁至德布勒森。不久，匈牙利军队展开反攻，连续取得胜利。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废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宣布匈牙利独立。5月21日，匈牙利军队攻克佩斯，光复了首都。然而，在奥皇的请求下，俄国于5月27日出动14万军队入侵匈牙利。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匈牙利军队遭到惨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总指挥阿尔图尔向俄军投降。9月27日科马罗姆要塞陷落，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西欧1848年革命告终。

第二节 现代化在西欧的延续

1、中欧国家：旧势力领导下的现代化

1800年，德意志还是一个农业国，人口的3/4以上居住在农村，仅柏林一个城市的人口就比德意志2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总数还多8万多；德意志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有6500万英镑，英国是23000万英镑，法国是19000万英镑。

在德意志各邦中，普鲁士的工业水平处于领先地位，通过19世纪法国占领期的进一步发展，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经济霸主地位得到巩固。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制度，促进了德意志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与发展。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国家走到了灭亡的边缘，面对绝境，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作出了愿意改革的让步。而在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之后，只有普鲁士才可能承担起统一的大任，普鲁士改革因而具有全德的意义，它为德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走向现代的时代。³⁶⁶

³⁶⁶ 李霞：“德国现代化的普鲁士道路”，丁建弘 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的目的是使普鲁士走上现代化道路，并成为争取德意志解放和统一的旗帜。改革中废除了普鲁士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容克地主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赎金。普鲁士改革与英国、法国不同，它“不是一场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是由古老的庄园主阶级或者说它的国家所操纵的改革给它做好了准备。”³⁶⁷容克地主是改革的主导力量，德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由旧统治集团控制之下的“保守的现代化”。³⁶⁸

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意志正式启动了工业革命。德意志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到30年代末，纺织业几乎全部实现了工厂化。1846年，毛纺业的机械化程度达到40%。从4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重工业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1839年，德意志铁路公里数超过法国。不过，1848年之前的德意志工业革命尚处于早期阶段，在总体上与西欧、北美国家尚有不少差距。

德意志全境（不包括奥地利）此时尚没有具备现代化起步的三个条件。1848年革命对于德国来说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统一德国，二是推翻专制。然而，西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依赖于专制王权，过早的克服专制必将造成内部的分裂，而分裂是德意志感受最深的落后根源。这两个目标在德意志是相互矛盾的，在1848年革命中，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这是德意志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但革命失败后，普鲁士政府保留了宪法，它让人民享有“人权和公民权”，赋予众议院具有批准新赋税以及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力。但实际上，议会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因为宪法是钦定的，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不久后，德国在容克政治家俾斯麦领导下通过对外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坚信专制制度是德国统一的条件，因而说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而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³⁶⁹。

当然，此时的德国专制主义已不同于15-17世纪的西欧专制主义，至少在程度上已有很大区别，德皇一个人不能说了算，容克地主是共同的统治者。德国的资产阶级以统一为交换，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克服专制的努力。在普奥战争胜利后，一位曾激烈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公开认错：“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³⁷⁰。

统一后的德国解决了统一问题，政治体制属于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寡头统治，

年版，第355页。

³⁶⁷ 卡尔·博恩等：《德意志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3~504页。

³⁶⁸ 查尔斯·蒂利：《从民众动员到革命》（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纽约1978年版，第44页。

³⁶⁹ 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³⁷⁰ 汉斯·科恩：“自由主义投降了”（Hans Kohn, 'Liberalism Surrenders'），哈默罗编：《奥托·冯·俾斯麦：历史评价》（Theodore S. Hamerow, *Otto Von Bismark, A Historical Assesment*），波士顿1962年版，第34页。

议会民主在形式上是存在的，并拥有一个皇帝陛下的政府，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皇帝与中央政府手中。这些条件已足以使德国大踏步实行工业化，统一之后的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它动用国家的力量，创造了赶超先进国家的新的发展模式。到世纪之末，德国已超过法国和英国，工业生产能力跃居世界第二。1870~1913年，德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 4.1%，英国只有 2.1%。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新技术产品大多是德国人的发明或改造。德国采取最新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行业。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是西欧总产量的 2/3，煤产量是西欧总产量的 1/2，发电量高于英、法、意的总和，机械和化工行业均领先于西欧其他国家。1914年，德国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其综合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

奥地利没有较早地实现从专制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其主要原因：一是在形成专制王权时，奥地利没有抛弃中世纪以家族领地为核心的基本结构，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多个地区共戴一主的家族共同体。二是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处于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第一线，历史上成功的抵抗和反击，为奥地利专制主义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三是天主教的教权主义与皇权主义的结合，成为奥地利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核。

在拿破仑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奥地利更加推进家族世袭领地事务，致力于构建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而奥地利也不断呈衰落之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1900 年，奥地利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 60%，英国是 6%，德国是 16%，法国是 43%。奥地利的工业产值的最快增长率未超过 5%，而落后的俄罗斯在 19 世纪也达到了 8%。最后，这个早已空虚的奥地利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彻底倒塌，帝国解体了，奥地利不得不在现有奥地利的领土框架内构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它已不属于德意志大家庭了，它需要一个现代的奥地利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工业生产 1955 年比 1937 年增长 119%，1954 年的铝产量是 1937 年的 13 倍，煤炭和石油的开采量大幅上升。³⁷¹

意大利在中世纪也是分崩离析的，这与德意志情况相似。一直到 19 世纪，意大利既不统一，又不完全独立，内部有许多王国、公国、城市共和国和一个教皇国，其北部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南部受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分支的统治。因此，意大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均先于西欧，但意大利的现代化起步却非常晚。1848 年革命未能拯救意大利，统一的任务留给了邦国王朝。1852 年加尔富出任撒丁王国首相，撒丁王国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它用战争进行统一，取得了卓越的成果。1859 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实现了统一，南部通过“人民表决”也并入撒丁王国。1870 年，在法军因普法战争爆

³⁷¹ 埃里希·策尔纳：《奥地利史》，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690~691 页。

发撤出罗马后，意大利终于完成统一。不过，意大利的近代发展的领导权因此就落到旧的统治者手中，统一后的意大利一直到一战前，从未实现真正的议会制。但统一和立宪的任务完成了，寡头形式的政治体制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安定局面。铁路、纺织业、冶金、机械、采矿、造船、化学等工业开始出现，虽然起点低，发展缓慢，但它标志着工业革命的起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始。³⁷²

2、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停顿后的起步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但巨额的财富几乎都被王室和贵族挥霍一空，剩下的则为殖民扩张而进行战争，财富没有留下来发展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工商业，当西欧其他国家纷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后，两国的大国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专制王权阻碍了两个国家的发展，此后，这两个昔日的世界霸主沉睡了几个世纪。这说明：克服专制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

这种情况到拿破仑战争后才开始变化。战争中，葡萄牙王室逃往巴西，在巴西统治整个帝国。但1820年12月葡萄牙进行大选，国王唐·若昂六世于次年6月返回葡萄牙，宣誓效忠于宪法，成为第一位立宪君主。1822年的宪法肯定了国家的主权，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独立，国王仅仅拥有“中断性的否决权”，即享有一次将法律退回议会的权力。这部宪法在当时看来显得有点超前，引起国王、贵族、教士的反抗，而且损害了地主和商人的利益。1826年的第二部葡萄牙宪法引入了反民主的条文，国王可以任命上议员、召开会议、解散众议院、任命或解散政府、中止法官的职权、发布大赦和否决议会颁布的法令。这部宪法持续使到1910年共和国的成立，葡萄牙发生革命。这以后才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民主的体制。工业发展是君主立宪时期葡萄牙的特征。1822年，葡萄牙有15000名工人，1031家工厂；1881年，工人增加到180000人，工厂增加到1350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工人增加到200000人，工厂增加到5000家。纺织工业发展最快，其次是烟草、磨面业、陶瓷业、软木业和玻璃制造业。³⁷³

在西班牙，拿破仑战争中西班牙发生革命，王室则被掠往法国。1814年3月，国王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又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发起多次革命，西班牙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然而，西班牙经济发展无法与其他多数西欧国家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西班牙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³⁷⁴

此后一个多世纪，民主与独裁反复较量 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是最后一次

³⁷² 陈钦庄：“现代化强国的后进者——意大利”，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9页。

³⁷³ 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葡萄牙历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29页。

³⁷⁴ 滕藤主编：《海上霸主的今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百年强国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181页。

群众大革命，却仍未能推翻独裁制度。佛朗哥控制政权后，将国家大权操于一人之手。但他从 1959 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于是 60 年代成为“发展时期”，西班牙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7%，逐渐向工业国家发展。佛朗哥去世前决定将政权交于王室后裔胡安·卡洛斯之手，新国王顺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委托阿道夫·苏亚雷斯发动了民主改革。改革使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为西班牙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³⁷⁵现在，西班牙已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

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形成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促使一个新的现代社会的来临。欧美国家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社会各个方面随之发生全面变化，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步形成。

1. 现代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基本完成，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在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

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内燃机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 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19 世纪 90 年代，世界各国生产的汽车每年有几千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的汽车年产量猛增到 50 万辆以上。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1859 年，美国已在宾夕法尼亚州钻出第一口油井。随着内燃机的广泛应用，对燃料油的需求猛增，石油的产量迅速增长。1870 年，全世界生产了大约 80 万吨石油，到 1900 年猛增到 2000 万吨。从 80 年代起，人们开始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燃料等化学产品，塑料、绝缘物质、人造纤维、无烟火药也相继发明并投入生产和实际生活。

原有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以及交通运输、电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加速进行。比如，冶炼技术的不断改进，大大提高了钢的质量和数量。1880~1914 年，英国的钢产量由 200 万吨增加到 700 万吨，德国从 100 万吨增加到 1500 万吨，美国从 160 万吨增加到 2800 万吨。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³⁷⁵ 秦海波：“论西班牙 1975—1986 年改革”，《世界历史》2006 年第 3 期。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等高新技术。科技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科技进步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科技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各国经济联系加强，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科技竞争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是1.7%，在1950~1972年高达6.1%。1953~1973年的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此前一个半世纪的工业总产量的总和。科技进步引起的产量值在欧美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20世纪初为5%~10%，20世纪70年代增长至60%。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使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走完了工业化的最后发展阶段。

2、现代政治

英国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源地。1688年光荣革命后，由于国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否定，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就成了政治实践的需要，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制度安排，就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成熟。

议会民主。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这在当时的世界是最为开放的政治制度，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国家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在选举上存在着议席分配不合理、选举权狭小以及选举手段腐败现象，而工业革命孕育的两个新的阶级（工厂主阶级和工人阶级）却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这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因而被当时的人称为“旧制度”。

1832年议会改革标志着英国迈出了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改革使中等阶级有了选举权，削弱了贵族的政治基础。1867年议会改革扩大了选举权范围，基本消灭了“衰败选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得到了选举权。1884~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又先后取消了议员的财产限制和实行议员带薪制，为工人阶级竞选议员打开了大门。第三次议会改革后，英国的贵族制日薄西山，民主原则已经胜利。³⁷⁶。1918年的议会法案使年满30岁的有产妇女有了选举权，1928年最后一次议会改革，英国实现了全体成年公民的选举民主制。

法国在1830年的七月王朝建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国王的权力依然很大，

³⁷⁶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他不仅拥有行政权，还拥有部分立法权，大臣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选民受到年龄、性别和财产的严格限制。宪法规定的权力，如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受到各种限制。1848年革命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但权力最终却落到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手中。民主改革的任务并未完成。1870年法国爆发最后一次革命，这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事变，共和国体制被确立了，基本结束了内部的强烈碰撞，旧势力开始瓦解，民主力量得以巩固。

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后也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帝国国会由全国普选产生，与联邦议会并存。然而，政府不对议会负责，帝国首相掌握行政权，它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则掌握军事指挥权。这使得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一个披着议会外衣的、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强人政权，并将德国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企图建立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但以失败告终，1933年希特勒上台，再次将德国引入世界大战。

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民主化趋势，比如奥地利于1896年实行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意大利在1882年进行了议会改革，增加了选民人数。俄国在1905年革命后，在罢工等压力下，沙皇发表了十月宣言，许诺建立杜马。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政体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霍布斯鲍姆指出：“1880～1914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从此，问题就变成如何操纵它了。”³⁷⁷

政党政治。随着宪政民主的确立，政党组织开始普遍出现。所以，政党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化的结果。传统政治不需要政党，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政治体系内部，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必须有政治组织来使其制度化，由此出现政党这种现代政体特定的政治参与工具”。³⁷⁸一方面，议会政治的确立使议员们感到有必要结成组织以协调行动，增大力量；另一方面，选举权扩大，政治家们也感到有建立组织的必要，以向选民推荐介绍自己的候选人。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英国在是否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的辩论中，形成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法国是最早建立多党体制的国家，也是现代典型的多党制国家。大革命期间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中间派；拿破仑时期的保皇派、温和派、激进派，到第二共和国时变为保皇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第三共和国以后形成左、中、右三党，确立了政党联盟或单独一党夺得多数

³⁷⁷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³⁷⁸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84页。

议席进而组织政府的政党制度。这些派别是西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以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现代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至今，政党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政党发生关系。

官僚体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国家管理的任务日趋加重，官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而与此相关的各项改革都走上了前面，不仅是议会的改革，行政、司法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如此。

1850~1870年的英国文官改革意义重大，它清除了吏治方面的很多不合理现象，确定了现代文官体制的基础，并且为其他欧美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是英国19世纪议会改革的附属品，也是改革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改革也蜂拥而起。比如，1873年《司法权法》统一了混乱的司法体系，简化了手续，降低了费用，克服了原有司法制度中的许多弊端，使司法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国家的又一公务机关。该法律不仅是英国司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奠定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通过19世纪持续不断的司法改革，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加强和普及，依法治国成为一种共识，标志着英国进入现代法治社会。³⁷⁹

其他欧美国家紧跟英国之后，纷纷进行相关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力量不断渗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发挥治理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承担起社会服务的功能。于是，一方面，国家机关膨胀，部门增加，官僚习气产生并成为社会的一大弊病；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向专业化和分工化方向发展，每一个部门只管一个方面，无所不知的国家形象不再存在了。政府、企业、社团、政党等各自发挥自己的特殊功能，由国家或宗教等包揽一切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3、现代社会

社会流动性是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和必然结果，人的自由迁徙和社会等级的变迁，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造平等的社会机遇。强烈的成就取向意识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从个人方面说，这意味着依靠自己而不依赖他人；从社会方面说，意味着以能力和成就而不是凭借社会背景或亲疏裙带关系取人。

在精神生活方面，世俗化与理性化是明显的特征，人彻底摆脱了神学或类似神学的精神控制，用世俗的眼光观察和认识世界，每个人都通过他独立的思考对外部

³⁷⁹ 程汉大：《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18~423页。

的存在做出他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当然，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会被保存下来，但教会与国家脱钩，信教或不信教成为个人的私事。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科学、文化、教育水平都很高，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4、现代经济思想

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斯密认为：谋取暴利是资本的唯一目的，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³⁸⁰ 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要求生产在自由竞争中求生存，经济在自然状态下发展。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行为的根本动力。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国家对于私人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会起妨碍作用。

上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遇到了挑战，垄断企业的出现，社会两级的分化，劳资矛盾的激化等，致使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遭到质疑。在1870年以后，西欧各国对自由主义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等措施。政府干预逐渐成为与市场调节相配合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发挥作用。

从经济理论上讲，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影响工业增长是有道理的：一是只有政府的措施才能改革或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而只有在经过改革的环境里，私人企业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社会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权益之间产生重大差异，需要国家采取行动来统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即所谓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而且，像某些特殊行业和项目，如技术训练、教育、水利工程、电力网等，私人投资者可能从中得不到优厚的利润或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它们具有降低其他企业的“外溢经济”的作用，应该由政府加以倡导和支持。其实，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也不反对国家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³⁸¹在现实层面上，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依靠国家的支持迅速发展起来。自由贸易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不

³⁸⁰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³⁸¹ 奇波拉：《西欧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4~245页。

利的影响。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它们会建立贸易保护关税，从而对自由贸易思想形成巨大冲击。

到 1880 年时，那种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外和对内的最高职责的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³⁸²密尔最先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提出了质疑。密尔认为，每个公民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知趣的自由和个人之间相互交往和联合的自由。政府具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体现这些自由，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³⁸³不过，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格林教授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1881 年，格林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也许都会同意，正确意义上的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恩惠；实现自由是我们公民所有努力的真正目标。然而，当我们言及自由时，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它的含义。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驱除了限制或强迫。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顾这些事情是什么。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它意味着拥有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去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去做和享受的事，而这些事也是我们与其他人共同努力或分享的事。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同伴那里得到帮助和保护的力量。当我们用自由增长方式来计算一个社会的进步的时候，这种自由是指所有的有利于道德善发展和运动的力量，我们相信这种道德善赋予给了社会成员；一句话，自由是指通过市民团体的最大力量，实现他们自己的最大价值”³⁸⁴

格林认为，这种道德善或共同善的实现不仅需要人们彼此互助、共同追求，而且需要外部环境提供有利于道德发展的各种条件，国家则是这些条件的最好提供者。很明显，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利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国家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相反，国家的积极作用是真正自由的需要，是道德善的需要。³⁸⁵因此，格林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哲学向德国、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靠拢，而黑格尔哲学本质是国家主义的。³⁸⁶

霍布豪斯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自由也将随之增加。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活动为自由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他在《自由主义》一书

³⁸² 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2 页。

³⁸³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5 页。

³⁸⁴ 罗伯特·埃克尔希尔：《英国自由主义：从 17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自由思想》（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伦敦 1986 年版，第 180-181 页。

³⁸⁵ 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8~419 页。

³⁸⁶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9 页。

中指出：“19 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³⁸⁷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突出的威胁，它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将剥削、专制和战争带到世界各地，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带来了威胁。只要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扭转“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帝国主义是可以避免的。霍布森认为，社会福利问题是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现在的自由主义已经正式承诺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³⁸⁸

1936 年，约翰·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引起了一场经济学上的“革命”。该理论否定了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利用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进行干预，即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进行调整，当经济萧条时，应该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起到促进生产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则采取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的相反措施。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理论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彻底结束。

5、现代意识形态

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清晰的脉络就是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进化论、民主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思想都和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它们是现代化的支撑思想观念。有学者甚至认为，“意识形态都是比较近代的思想形式，出生于紧随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那一段时期。”³⁸⁹

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社会的最基本的思想之一，没有理性主义，变革与发展就没有合理性。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最高的思想境界，人依照理性的指导，能够合理地安排好自身的生活，也能管理好社会和自然。理性主义否定人的一切遭遇都是先天预定的看法，这也就否定了无所作为的生活态度，否定了人的被动心态，从而为人的奋斗和人的主动性提供了心理动力。理性主义还提倡人世万物的合理安排，这就为否定“无序”、创建“有序”的社会奠定了合理基础，只要符合“理性”，一切社会变动都是合理的，而不管这种变动是采取革命的手段还是采取战争的手段。

科学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自然延伸。科学主义提倡实证观察，在实验的基础上进

³⁸⁷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08、114 页。

³⁸⁸ 罗伯特·埃克尔希尔：《英国自由主义：从 17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自由思想》，第 204-205 页。

³⁸⁹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 页。

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客观”规律。科学主义首先在自然观察方面发展，形成一门科学，使人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并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手段。科学主义随后在社会生活中也提倡“科学”观察和“科学”概括，试图将人的一切知识都纳入到“科学”的范畴中去，将社会变革也归结为“科学规律”。这些理念是现代人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思想框架，它一方面提供了追求“客观真理”的无穷动力，同时也使人确立一种信念，即人一定能战胜自然。应该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另一块基石。

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进化论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进化论原是达尔文解释生物形成的理论，《物种起源》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作之一。后来，达尔文的信徒把进化论推广到社会观察中来，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从低到高、从落后到先进排列的，低级社会一定要让位给高级社会，落后社会后也一定要让位给先进社会。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崇尚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种学说为各国的竞相发展提出了紧迫感，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更起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催促其奋起直追；但它直接的影响却是为种族优越论提供论据，为“先进”淘汰“落后”找到了方便的借口。

在政治学方面，霍布斯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推翻君主或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威不具有合理性。在他们看来，“自然状态”并不美好，甚至非常危险，民众与政治权威之间应该签订社会契约，据此，人民将效忠某个专制政府，放弃他们的反抗权利，作为回报，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政府的保护。霍布斯的学说为专制主义的存在提供理论基础。18世纪的爱德蒙·柏克是现代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肯定了英美主流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强调传统和保护现有制度的重要性，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完美性提出质疑。这种哲学不信任理性的个体公民，极度怀疑民主政治，认为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必须得到尊重。权威在本质上表现为父权制和独裁主义，它们比平等、自发和变化重要。但柏克并不反对一切变革，相反，他认为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只能顺势而上，让变革发生，这样才能最好地保护传统的体制。这种理论又叫“有限变革论”。

18世纪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它反对专制君主制度。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二个主要理论家是亚当·史密斯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开路先锋。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转而强调社会责任和社区，但在公民自由区域，自由主义者依然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而多数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的社会单元有优先权，比如，家庭、教堂和国家。

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民族与国家吻合，在国家疆域内建立单一民族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民族主义

恰恰起了调动民众凝聚力、动员民众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作用，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产生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能否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几乎就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只有形成了民族主义，才有可能抗拒“先进国家”的欺凌，在民族自卫的基础上保存和发展自己。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先进国家”也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为侵略和压榨寻找借口。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伸张正义，又可以庇护邪恶。但民族主义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因此它无论是善是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的信念是近代世界的产物，随着现代化发展，民主是一定要出现的。作为多元社会的典型表达，民主是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也是使多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维持其整合的最合理的方法，民主的理念由此而形成。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思潮，它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一般来说，在现代国家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最重要的两股政治思潮，这两种思潮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强弱对比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内外政治走向。

20世纪，社会主义成为一大思想潮流，在很多国家成为指导思想。从某种角度上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思想本源就是对法国大革命后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继续。因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证明这种继续是必要的，只要少数人享有财富、教育和经济自主权，大多数人的境况则与贫困、无知和社会边缘化相联系。³⁹⁰托玛斯·迈尔认为：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傅立叶和圣西门，英国的欧文，德国的魏特林、赫斯，经过工人运动早期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和后来的卢森堡，直到世纪之交时期的伯恩斯坦和饶勒斯为止，都是源于这样一个本源思想。³⁹¹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出现的一种更高的社会理想形式，但在现实中，它是落后国家追求高速发展、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方式。它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某种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则在后现代时期日益成为一种不可轻视的思想潮流。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其叙述似乎依然是现代话语。

以上这些主流的意识形态相互间有吻合，也有分叉，甚至会互相冲突，比如，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可以发生冲突，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吻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等。但所有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服务于现代化，带着现代社会的深刻烙印。这些思想意识或者因其产生而引导了现代化的出现，或者因其存在而推动着现代化的进展。

³⁹⁰ 刘成、马约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³⁹¹ 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前言，第8页。

6、现代国际关系³⁹²

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标志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也是民族国家在西欧兴起的标志，现代国际关系与现代化的关联可见一斑。在和约签订之后，西欧各国间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馆，正式的国际关系逐步建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单元是民族国家，其特征是国家主义，和约在西欧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的国家体系，同时也为以后西欧列强发起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拿破仑战争结束建立的新的维也纳体系试图维持西欧大陆的均势和平，保卫正统秩序。在该体系建立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局势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但自19世纪中后叶以后，西方国家的新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实力，西欧的均势结构不断受到冲击，国际关系体系随之发生变化。随着欧美日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外的殖民扩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被纳入到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基本完成。

如果我们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为线索，1648~1945年以来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每个体系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主要矛盾、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力量的分化组合等等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现代化不同时代的产物。民族国家以各自利益为目标而制定对外关系的政策，为此，它们需要进行合作、谈判、协商，在必要的时候，也常常不惜诉诸武力与战争。

第四节 西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

工人运动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以工会罢工为主要形式的斗争在19世纪以后的西欧司空见惯。社会主义运动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目的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从影响上讲，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并称为19世纪30、40年代的三大工人运动。

1、19世纪三大工人运动

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向议会提出的一份请愿书，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普选权，选举投票应秘密进行，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国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全国划分300个选区，选区人数尽量接近相等。次年5月8日，这份请愿书公布后，被称为《人民宪章》，由此拉开了宪章运动的序幕。《人民宪章》立即得到广大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热烈支持，宪章运动很快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宪章运动经历过三次高潮，1842年5月2日，宪章派全国协会的负责人向下院递交了

³⁹² 国内学术界一般将现代国际关系分为近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前者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开端，其下限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以1919年的巴黎和会为起点，下限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全国宪章派第二次请愿书。这份有 300 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签名的请愿书再次要求把《人民宪章》定为法律。³⁹³这是第二次高潮。1848 年，宪章运动在西欧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再度高涨，在第三次全国请愿书中进一步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然而，三次高潮都被政府镇压下去。1848 年后，宪章运动逐渐衰落，在 50 年代末期结束。

里昂是法国当时的丝织中心，拥有 3 万名丝织工人，他们每天劳动 15~18 小时，劳动报酬却极为微薄，且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所得工资只能买一磅面包，难以维持生计，纷纷向工厂主提出要求增加工资。1831 年 11 月 21 日，成千上万的法国丝织工人在里昂市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0 月初，6000 名丝织工人迫使工厂主答应为工人增加工资。但是过后，这位工厂主违背诺言，拒不执行和工人们达成的协议。愤怒的工人向里昂的省长请愿，省长出于对工人的同情，更是为了里昂的秩序，答应了工人的请求。然而，政府决定派出士兵镇压工人罢工游行，省长被免职。

当 2000 多工人高唱《巴黎进行曲》向市中心前进时，立刻遭到军队的阻拦，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军队突然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示威游行的工人气愤已极，纷纷拿起了武器。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经过两天多的战斗，武装工人打退了政府军，控制了里昂全城，占领了市政厅，拘捕了省长，起义达到了高潮。12 月 3 日，政府向里昂派来大批军队，把这场历时十几天的起义镇压下去。

1833 年的 4 月 9 日，里昂爆发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这一次起义，工人们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他们在一面旗帜上写着：“不共和，毋宁死”的口号。第二次武装起义坚持了 6 天 6 夜，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马克思在评价里昂工人起义的意义时说，“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³⁹⁴

1844 年 6 月 4~6 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剥削举行起义。他们捣毁了厂主的住宅、厂房机器和货栈，焚毁票据和帐簿，拿起武器同前来镇压的地方军队展开了搏斗。经过两天血战，起义被普鲁士政府调来大批军队镇压下去。

2、社会主义运动

工人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最初的社会主义者憎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制度，相信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是能够为人类造福，只要

³⁹³ 《人民宪章》全文参见，R·G·甘米齐：《宪章运动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附录二。

³⁹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86 页。

克服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将生产资料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就可以使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分享工业革命的丰厚果实。在他们看来，社会原本是平等的，人类本性也是善良的，只是人为制定的制度不合理，才使天然的平等权利遭到破坏，产生了贪婪和竞争现象。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责任就是消除这些人为的弊端，重新激发人们善良的本性。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从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上，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而是坚持这样的普遍信念：消除了某些社会弊端，人性的善良必然回归，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实现。³⁹⁵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在 1848 年欧洲革命以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主流。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内部就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以后的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最能说明这个事实。

由于十月革命的冲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理论分野逐渐清晰，组织上的彻底分裂随之发生。1923 年 5 月 21~25 日，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及其所属 40 多个党派的代表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大会宣布自己推行的是与俄国“专制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这次合并大会为标志，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正式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和一种运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两种理论和两个运动之间的长期对立和竞争。共产国际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社会主义革命成为 20 世纪的一个主流。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因而被落后国家效仿，成为它们赶超西方国家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现代化的经历有先有后。经过几百年的变化，到二十世纪，西欧北美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缔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这种变化把全世界带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多样化使利益的不同显得分外显眼，阶级意识出现了，阶级相继形成，各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最后又都进入政治领域，体现为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争夺政权。十九世纪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阶级间的战争前所未有；但争取权力的斗争最后又都指向议会，在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各阶级学会了用和平的方法协调利益。整合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充满艰辛，充满动荡。民主化的历程非常艰难，政治转型看起来是最痛苦的转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迈出的，其最终完成可能也是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建构出独特的社会经

³⁹⁵ 刘成、马约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济制度，用国家的全面控制来推进发展，其目标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失误，在落后国家快速推行现代化。

第五章 现代化在全球扩张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冲出西欧北美的地理范围，一个全球现代化的时代开始了。现代化具有扩张性，因为现代化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它使旧的文明无可招架，迫使它发生文明的转换。亨廷顿明确指出：“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在的社会要么是现代社会，要么是正在成为现代社会过程中的社会。”³⁹⁶英国的现代化立刻对周围地区形成压力，使现代化如同水的波纹一样持续向世界扩散开来。“大工业在其发源地继续发展下去的同时，全世界大工业也已经开始发展，它在大陆上出现了。它的历史不再是英国的历史，它的历史已成为西欧的历史了，后来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³⁹⁷现代化的扩张最初在具有异质文明的欧洲东部（俄国与东欧）推进，并且在非常落后的地区，比如黑非洲、南北美洲、澳洲等地进行征服。早期殖民扩张为西欧集聚了资本，使其以后的发展更为迅速。工业化开始后，西欧的力量变强大了，最终形成绝对优势。这时，西欧的殖民扩张就不限于最落后地区了，它逐渐向世界各个已有文明的核心区推进，西亚北非、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也相继落入它的控制，随着世界各文明区连成一体，现代化慢慢地推进到全球扩张的阶段。

第一节 俄国与东欧的现代化

1. 俄国的现代化：现代化第一次真正波及“东方”

在彼得大帝决定“西化之前”，现代化的准备工作和初期发展都是在西欧进行的，西欧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历史经历。然而，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属于另一个亚文明，与天主教—新教为特色的西部欧洲有很大不同。因此，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现代化第一次真正向“东方”推进。由于文明的差异，就有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激烈相撞的问题，这就使得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困难不仅大于西欧国家，也大于世界上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如前欧洲殖民地。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传统影响，在拜占廷，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54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实际上就是“凯撒”。

在彼得一世登基的时候，俄国虽然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但是，除了广袤的国土，俄国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经济完全依赖于农业，到 17 世纪末，俄罗斯全境只有 30 个手工工场，商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彼得大帝的“西化”方案是全方位的，但也是有选择性

³⁹⁶ 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5~45 页。

³⁹⁷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89 页。

的。在政治上，他学习法国模式，调整和加强中央集权制体系，指定 9 名大臣组成参议院，废除大贵族杜马，分州为省，将全国 50 个省的省长直接隶属中央；在经济上，他大力兴办工业，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统一度量衡；在文化教育上，他鼓励翻译西方著作，建立科学院、医学校、海军学校、炮兵学校，提倡西方生活方式和礼仪。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议会制度不在模仿之列，农奴制不仅保留，反而成为彼得一世兴办起来的工场中的主要劳动力。彼得一世的改革促进了俄国的强大，俄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但是，彼得一世自上而下的改革触动沙皇制度，一旦改革涉及到制度层面，改革就到此为止。

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回到彼得一世改革前的状态。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将俄国拉回到彼得一世的改革道路上，使俄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然而，当叶卡捷琳娜考虑是否进一步推进改革时，遭遇到农奴制与工业化的矛盾。农奴制与工业化是相矛盾的，但农奴制与沙皇制密切相连，如果废除它，必定危及沙皇的统治。1768 年 12 月，立法委员会宣布无限期休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最重要的立法改革措施失败。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各种因素的巨大压力下，1861 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地方自治、司法、教育、出版、军队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也开始起步。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它为俄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机器工业开始在俄国出现。但是，这次改革仍然不触动沙皇专制制度，中世纪的东方村社制度也没有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结束。维特执政（1892~1903 年）后期试图触及村社制度和土地问题，但遭到普遍的、包括农民在内的激烈反对；斯托雷平时期（1907~1913 年）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来摧毁村社制度，为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后果则更为糟糕。

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沙皇的专制制度。³⁹⁸沙皇的专制制度制约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到 1897 年，俄国依然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的 5/6，工业生产水平和产量远远落后于西欧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制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战争的指挥不力、军队无效力、军事生产落后、后勤供应欠缺，沙皇本人的迷信、无能，等等，这一切都导致战争失利。前线和后方都民怨沸腾。1917 年终于爆发革命了，沙皇制度彻底被推翻。但是，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太深厚，所以在很长时间中权力仍然高度集中。³⁹⁹

³⁹⁸ 海仙：“改革与俄国现代化”，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67 页。

³⁹⁹ R.本迪克斯：“工业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638 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实行现代化，这是一种非西方的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使苏联快速实现了经济飞跃。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9%。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苏联采取独特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后来战胜纳粹德国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但计划经济内在的缺陷使苏联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递减趋势，1951 至 1955 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 11.4%，1986 至 1990 年已下降到 1.8%，到 1990 年出现负增长。由于长期忽视民生产品，苏联人的实际购买力最高也只达到西方国家的 1/3 左右，很多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远非是一个理想和成熟的模式。”⁴⁰⁰

2、东欧国家：欧洲现代化的迟到者

19 世纪中叶，东欧多数地区在几个欧洲大帝国的统治之下，现代化虽说有所开始，但国家不独立的状态使其难以发展。

波兰在 1795 年从政治地图上消失，直到 1918 年才恢复为一个独立国。⁴⁰¹权力分散及地理因素，导致波兰被瓜分削弱，长期处于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其他东欧国家，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长期依附于奥地利的统治；罗马尼亚各公国长期以来是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沙俄帝国的争夺和掠夺对象；保加利亚在 1908 年摆脱土耳其后独立，但在许多方面仍受制于德、奥、俄；阿尔巴尼亚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达五个世纪之久，后又被俄、法、德、意、奥等国瓜分，1912 年 11 月宣布独立，但仍受国际监督委员会管辖，由德国人担任国家元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纷纷取得独立，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基本障碍被扫除，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总的说来，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间越长，其经济、文化发展就越落后；受沙俄控制和统治的地方则略为开化一些，因为俄国的现代化程度相对高一点。最为发达的是受奥地利统治的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因为奥地利的发展程度更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水平已同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差不多，是世界最发达的 10 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一。⁴⁰²然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未能动摇社会根基，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尝试

⁴⁰⁰ 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5、246、267 页。

⁴⁰¹ 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6 页。

⁴⁰² 王义祥：“东欧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俄罗斯研究》1995 年第 6 期。

犹如昙花一现。而且，独立后的多数东欧国家真正保持独立的时间相当短暂。如，统一后的罗马尼亚实行君主立宪制，但由于不能控制政局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领土又被俄国等肢解。1928年，阿尔巴尼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被推翻，阿尔巴尼亚全面投靠意大利。随着二战的临近，它们又先后成为强国的附庸：保加利亚依附于德国；阿尔巴尼亚依附于意大利；南斯拉夫国土被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瓜分；捷克被德国吞并；波兰被苏联和德国肢解；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被德国军队占领。此时的东欧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名符其实地成了‘夹缝中的国家’”⁴⁰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东欧各国普遍实行了人民民主制度，这是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现象，是东欧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探索。然而，由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对东欧的控制，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模式选择，在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潜力的情况下就过早地夭折了，苏联模式被强行地移植到这些国家，并且事实上它们成为被苏联所控制的依附国。从某种角度上说，“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就是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失败。⁴⁰⁴

第二节 西方移民殖民地的现代化

对世界的殖民征服是欧美现代化向外扩张的产物。⁴⁰⁵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曾经是英联邦移民殖民地，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就是通过将西欧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海外移植和再造，形成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身份，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它们的工业化体制直接嫁接在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和技术之上，其起点高，进步也较快。

在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的民族再造就已经开始。随着殖民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加强。1867年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生效，加拿大自治领的身份得以确立。根据该法案，加拿大政治结构由总督、联邦政府、议会组成。英国女王是加拿大女王，是加拿大联邦的最高行政长官，并由英国王室派出的总督代行职权。联邦政府实行英国的议会内阁制，议会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政府，其领袖担任内阁总理。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也主要仿效了英国的议会模式。在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问题上，加拿大注重中央政府的权力，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政府，加拿大这样一个多种族的集合体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就可能遇到更多困难，现

⁴⁰³ 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9页。

⁴⁰⁴ 杨焯：“20世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5期，第50～52页。

⁴⁰⁵ 1415年，葡萄牙舰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侵入北非的休大城，解开了殖民主义的序幕。艾周昌：“关于近代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5页。

代化的进程就会受阻。在建国后的最初 20 年，加拿大将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爱德华王子岛并入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开始摆脱英国的控制，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国家逐渐走向成熟。从 1896 年劳里埃政府上台为标志，加拿大进入经济起飞阶段。1900~1920 年，加拿大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从 10.57 亿加币上升到 55.43 亿加币，提高了 5 倍多。

澳大利亚的情况与加拿大比较类似。早期澳大利亚实际上只是英国的“越洋监狱”，英国的财政拨款和物资供给是早期英国人的资本和生活品的主要来源。从 1788 年开始到 19 世纪中叶，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系统地照搬英国的各种制度和体系。⁴⁰⁶ 随着英国对羊毛需求的增大，澳大利亚这块最适合牧羊的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得到关注。从 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牧羊业在澳大利亚开始逐步成为支柱产业，澳洲的经济也因羊毛出口而从落后的原始状态，迅速融入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1850 年，英国羊毛进口总量的一半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⁴⁰⁷ 由于澳洲境内又发现了大金矿，在 1851~1861 年，澳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淘金热”。于是，大量西欧移民（英国人为主）涌向澳洲，自由人的数量迅速增加，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与牧羊业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冶金业、制造业、银行业等行业也得以建立起来，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1840 年 11 月，英国宣布在新西兰建立单独的殖民地。早期的新西兰各方面主要模仿英国和澳大利亚，很多新西兰的经济机构中由澳大利亚人担任，新、澳两地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实际上，新西兰的经济条件与澳大利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牧业和黄金开采是其早期经济的支柱和社会发展的刺激因素。因此，新西兰从一开始就有着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是新西兰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原因。否则，按照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像新西兰这样偏离工业化中心、资源相当有限的农业国家注定会成为一个依附性的国家。⁴⁰⁸

在 1907 年的殖民会议上形成决议，英国正式同意改“殖民地”为“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先后成为自治领（南非联盟和纽芬兰后来也成为自治领成员）。自治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这些殖民地脱离母国走向最终独立的过程，自治与独立仅一步之遥，这些自治领实际上就是未来的一批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殖民地的快速发展，他们为自身利益的考虑就更加明显。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一旦自治领感到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

⁴⁰⁶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 页。

⁴⁰⁷ R. 杰克逊：《19 世纪的澳大利亚经济发展》（R. Jackson, *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堪培拉 1977 版，第 7 页。

⁴⁰⁸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9~300 页。

自己的事务的时候，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就会产生，有了新的认同，脱离母国并成立独立国家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1931年，英国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在法律上承认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自由邦和纽芬兰的独立与平等地位。

此后，加拿大的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到20世纪中叶，加拿大摆脱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对初级产品的严重依赖，成为一个平衡发展的成熟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列。1950年，它的制造业仅落后六七个其他发达国家，而生活水平仅次于美国。⁴⁰⁹1914年以后，澳大利亚的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以冶金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带动了制造业的广泛发展，经济独立性也不断增强。1942年，联邦议会批准《威斯敏斯特法案》生效，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澳大利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经济以接近5%的速度增长，超过同时期的英国和美国。1969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值位居世界第八，人均达到世界第七。1947年，新西兰接受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45~1970年，新西兰农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更快，到60年代中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到18%。70年代初，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国家之一，从英国的一个依附性殖民地发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大洋洲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还有一批小国，这些国家在殖民时期也被卷入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独立的国家开始改变殖民时期的“单一经济”的状况。例如瑙鲁从1970年起控制对磷酸盐的开采和出口，积极发展农业，提倡远洋捕鱼，兴办航运事业。7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很迅速。现在，旅游业在太平洋岛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收入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汤加的旅游业已成为该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入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3以上。斐济旅游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的1/4，仅次于蔗糖的出口，占第二位。关岛、法属波利尼西亚、西萨摩亚、图瓦卢、瓦努阿图等也大力发展旅游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专门建立了旅游机构。该地区的民族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瑙鲁的磷酸盐工业，斐济甘蔗制糖工业，汤加、图瓦卢等国的椰子加工业，所罗门、基里巴斯、瓦努阿图等国的渔产加工以及西萨摩亚的木材加工等部门也有一定的发展。

南非也是英联邦中的自治领，但它具有独特的黑白二元性文化结构，白人和黑人分别占全国人口的12.8%和76%。从17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的白人移民成为南非的统治者，南非的现代化是由西欧的白人移民启动的，仿照母国的模式将这个定居点建成一个新的母国的翻版，将母国文化延伸到这里，其作法与西欧人开发北美和澳洲殖民地的方式相类似。⁴¹⁰南非工业化的启动以1867年的金伯利石矿的发现和

⁴⁰⁹ 洪邮生：《加拿大——追寻主权和民族特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⁴¹⁰ 潘兴明、李忠：《南非——在黑白文化的撞击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开采为标志。1899年，南非的黄金产量已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27.55%，这反过来促使南非的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工业的建设和市场的形成。但南非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出现在二战以后。1949年，南非以立法形式将英国人列为外国人。1957年，取消英国国旗作为南非并列国旗的地位，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不再是南非第二国歌。一年后，南非政府公文上端的印文“为女王陛下效劳”的字样被取消。南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1940年南非的净国民收入是4亿英镑，1960年升至20亿英镑，1964年达到32亿英镑。1995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70亿美元，人均产值2771美元，远远高出其他非洲国家，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⁴¹¹然而，南非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却在南非的现代化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一直到1994年4月27日，南非才举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可以说：南非现代化是白人主导下的现代化，它们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用这个国家的力量靠暴力统治和奴役有色人种，迫使他们为工业发展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现代化方式是很反常的。

第三节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拉美是欧美之外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地区，原因在于拉丁美洲被发现之后就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此统治了三四百年。除葡、西之外，英、法、荷也在拉美占有少量殖民地。

西、葡殖民地属于非移民型殖民地，西、葡宗主国采取了与英属移民型殖民地完全不同的管理手段——专制统治。18世纪下半期，拉丁美洲的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殖民地占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种遭受殖民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一致要求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从1804年海地的独立开始，到1903年巴拿马的独立，拉丁美洲在一百年中先后有20个国家独立，它们成为继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后，全世界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一大洲。⁴¹²

然而，拉丁美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⁴¹³独立并没有使国家统一。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与北美独立战争不一样，它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军队的“解放”，它不仅用强制手段引进外来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而且成为军事强人实行控制的“关键力量”⁴¹⁴。社会内部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权威，

⁴¹¹ 潘兴明、李忠：《南非——在黑白文化的撞击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⁴¹² 广义上的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地区的13个国家，国际上正式的称谓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习惯上仍简称拉丁美洲，但本文所指的拉丁美洲概念不包括加勒比地区的国家。

⁴¹³ 塞尔索·富尔塔多：《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⁴¹⁴ M.J.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9页。

而是宗派林立，地区纷争。在经济上，拉美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在独立战争后的三、四十年间，对外贸易又遇到了巨大困难，除了贵金属、皮革、毛皮之外，其他产品都找不到市场。拉美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造成出口业上的障碍；而出口渠道的困难，致使一个稳定的政权无法得以建立。⁴¹⁵

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启动于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 25 年。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不同，拉丁美洲的现代工业不是在原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以大量破坏和消除手工业为前提。政治权力基本上掌握在传统寡头手中，社会变革和政治民主进程步履蹒跚。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启动并没有带来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变革和转型，而是出现了两者之间的断裂。⁴¹⁶

拉丁美洲是一个多样化的地区，拉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也有所不同。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是以印第安人居多、印加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过去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矿业比较发达；墨西哥受美国的影响较大，现在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的大部分人口是白人，主要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它们的现代化起步相对较早，发展也较快；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现代化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嫁接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出要靠农业发展起来，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很发达，但哥伦比亚的毒品贸易则一直是件麻烦的问题；中美洲国家是在战后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起来的。⁴¹⁷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是拉美的三个最大国家。墨西哥在 1880 年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在矿石开采上得到充分运用，煤、铜等金属产量大幅度提高。1890 年，石油工业建立起来。1903 年，拉美第一个使用焦土法的现代炼钢厂在墨西哥开工。1910 年，国家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2.3%，纺织厂有 146 家。巴西的铁路在 1889 年达到 6000 多英里，19 世纪 70 年代的咖啡出口年均 4 亿磅，1895~1899 年的年均出口增加到 11 亿多磅。1875~1890 年，工厂数从 175 家增加到 600 多家。1905 年，纺织工厂有 100 多家，工人 4 万人。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是拉美国家中最快的，1870 年有铁路 458 英里，1900 年达到 1 万英里；1895~1914 年，工厂数从 22204 家增加到 48779 家。工人数从 17.5 万增加到 41 万。1913 年，阿根廷的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6.6%。1913 年，阿根廷的人均 GDP 达到 3797 美元，高于同期的德国和法国。其他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上都有所发展。

⁴¹⁵ 塞尔索·富尔塔多：《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 页。

⁴¹⁶ 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39—242 页。

⁴¹⁷ 张森根：“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编印：《智慧之光》，2000 年 10 月，第 185~186 页。

但是，拉美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为特征的出口增长模式完全依靠欧美订单以及国际分工的需要，早期工业化因而表现出依附性、畸形性和脆弱性。到 20 年代末，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业依然是出口导向模式的小伙伴。⁴¹⁸

而且，内部的政治动荡始终没有停止。据统计，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 150 年时间里，共发生了 550 多次军事政变。⁴¹⁹ 军人执政或控制国家成为拉丁美洲国家最典型的特征，这种军人的统治又不断地更替，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宪法也是朝令夕改，独立后的 150 年中，拉美国家共制订了约 180 部宪法，如，委内瑞拉从 1811 年以来颁布过 22 部宪法。⁴²⁰ 西班牙把专制统治的传统留给了拉丁美洲，宪法并没有在拉美国家发生应有的作用，它只是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新领袖的个人宣言，“从来不要求认真执行”。⁴²¹ 1923~1966 年，拉丁美洲发生的“非宪法夺权行动”超过 350 次，其中海地发生了 58 次，多米尼加 56 次，厄瓜多尔 54 次，秘鲁 54 次，玻利维亚 52 次，萨尔瓦多 42 次，巴拉圭 42 次，危地马拉 42 次。⁴²²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相继出现了以军权还政于民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化进程，并出人意料的出现民众主义的复兴。⁴²³ 于是人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始终在军人统治和“民众主义”之间摇摆，而两者都带有个人的专断的色彩，只是军人依靠纯粹的暴力，“民众主义”领袖依靠个人魅力。与此同时，由于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的内向型发展不得不停止，国家只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企业被迫与进口商品展开竞争。于是，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又成为拉美国家的主导政策，出现了新民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存的怪现象。然而，无论如何，贫困和不平等是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的一个恒定不变的特征。⁴²⁴

拉美国家独立后的工业化缺乏内部需求和动力，现代工业的起步几乎完全是由农牧业产品的出口带动的，工业发展强化了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农村大庄园制经济体制。虽然农矿产品出口的繁荣促进了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但这种城市化并没有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更难以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这不仅不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且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赖于国外市场。⁴²⁵

⁴¹⁸ 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6 页。

⁴¹⁹ 米尔斯基：《“第三世界”：社会、政权和军队》，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05 页。

⁴²⁰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2 页。

⁴²¹ 坦南鲍姆：《拉丁美洲精要十题》（Frank Tannenbaum, *Ten Keys to Latin America*），纽约 1996 年版，第 147 页。

⁴²² 邓肯：《拉丁美洲政治》（W·Raymond Dunca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纽约 1976 年版，第 202 页。

⁴²³ 董经胜：“拉美民主化巩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民众主义”，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56 页。

⁴²⁴ 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0 页。

⁴²⁵ 陈才兴、陈宏：“近代拉美与美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结局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如果我们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与北美殖民地相比，独立之时，前者无论在资源、经济状况、发展潜力方面都比北美强。但美国现在早已是世界超级大国，而拉丁美洲至今尚无一个发达国家。1995年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2.8%，几乎与1900年时的比重相同。1990年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10。比如，拉美经济发展最好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人均收入列世界第六位，到21世纪初，人均GDP下降到2100美元，比近100年前下降了45%，正从一个被认为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沿着“第四世界”的下坡路滑落下去。⁴²⁶

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两个世纪是一个失败的历史记录。⁴²⁷拉美国家一直处于现代化的边缘，在贸易周期、投资和消费、债务积累和技术水平方面，拉美始终遭到一种自己无法控制力量的驱使，国家看似独立了，但外部的情况一有改变就会严重波及拉美内部。拉丁美洲的历史轨迹，似乎印证了一位波多黎哥总督的话：拉丁美洲“要么独裁，要么是混乱”。⁴²⁸究其所以，拉美国家在独立时未能及时建立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国家，权威缺失，致使各拉美国家花费太多精力来构建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在美国这个强大“邻居”的不断干预下，拉美一步步落入“现代化的边缘”。正如埃尔纳·奥尔纳所言：应该从结构性因素中寻找拉美工业没有“起飞”的根源。⁴²⁹

第四节 亚非国家的现代化

19世纪初，世界现代化向亚非大陆推进，自西而东地掠过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由于“传统”与“变革”之间力量对比配置不同，各自的社会、文化状态也不同，因此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在多数情况下，现代化都从模仿西方的技术开始，比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奥斯曼帝国的马哈穆德二世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等等。这些改革接受西方的器物而拒绝西方的制度，结果往往造成深刻的二元现象，引起更大的社会紧张状态。而随着西方渗透的加剧，器物的现代化往往被证明无效，于是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就开始了，社会发生大动荡，革命与内战接踵而起，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伊朗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20世纪，几乎整个亚洲和非洲北部都经历了建

第4~6页。

⁴²⁶ 曾昭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阿根廷发展危机的理论思考”，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5页。

⁴²⁷ 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中文序。

⁴²⁸ 徐文渊：《走向21时期的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⁴²⁹ 埃尔纳·奥尔纳：“铁路建设与19世纪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45页。

立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实行制度变革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追求工业化，而接下来，又面临着进一步实行制度变革的考验。到 20 世纪末，许多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在亚洲，出现一批经济高速成长的地区，政治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现代化方面成就斐然。

1、西亚北非地区

地处西亚北非的奥斯曼帝国（包括其属地，比如埃及）最早经受西方的冲击，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它们是顺时而变，还是固守抵制，或是另辟蹊径？对此必须作出解答。伊斯兰有光荣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战场上曾一再打败基督徒；奥斯曼帝国有辉煌的历史，这些都使伊斯兰世界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对基督教不屑一顾。“凡是有关基督教西欧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⁴³⁰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就成为摆在伊斯兰国家面前的一个障碍，很难在西方刚崛起时就正目以待。

到了 18、19 世纪，西方国家在战场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奥斯曼开始意识到改革，但改革的目标是回到伊斯兰的传统中去，恢复两百年前的奥斯曼的纯洁！⁴³¹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成效不大。而战场上的失败和国家财政的破产给改革更沉重的打击，结果，1876 年阿卜杜拉·哈密德继承皇位后废除改革，使奥斯曼国家失去了自我改造的机会。这以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奥斯曼国家也失去了活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站在德奥同盟一边，战后帝国解体。

战后的新诞生的国家土耳其决心与帝国的过去决裂，而在图尔奇民族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它成功了。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在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行六项改革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在这些原则中，我们看到了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独立、统一和克服专制。改革后的土耳其“一方面是关死过去的门，同时又打开一道通向未来的门”⁴³²。从此，土耳其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

埃及是具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国家，是阿拉伯世界的宗教中心。然而，埃及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一开始却是世俗主义的，这与 1798 年的拿破仑征服有关。埃及因被占领而无法避免殖民化的命运，但却较早地被拉进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为以英国为主的西欧国家原料产地，苏运士运河更是促进了埃及与西欧国家的联系。从 1805 年开始，埃及就正式启动现代化，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时期，埃及成为欧洲之外第一个试图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

⁴³⁰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 页。

⁴³¹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31 页。

⁴³²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93 页。

但埃及一直是英国的附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及更沦为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埃及在华夫脱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36年，英国承认埃及的完全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却暴露出：埃及的独立并不完整，于是在五十年代爆发了纳塞尔领导的革命，此后埃及高举反帝反殖的大旗，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

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伊斯兰一直是一个因素，人们看到的是：每当世俗国家的力量取得成功，宗教的因素就消退；而每当国家遭受种种挫折（比如战争失败、经济衰退等），宗教的因素就会扩大。就连世俗化最强的国家土耳其也并未能真正解决好世俗国家与宗教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中东“世俗化走得最远的国家”又开始回过头来尝试“伊斯兰化”道路。⁴³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从传统伊斯兰国家“决定性地”演变为初具现代民族国家特点的国际体系，政治合法性基础也从传统君主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二战后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发展也各建特色。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仍然漫长而曲折，它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热点。⁴³⁴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特殊国家，它信仰犹太教而不是伊斯兰教。以色列国家的现代化阻力，内部主要来自于以宗教人士为核心的传统势力；外部主要是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使现代化进程常被战争打断。⁴³⁵

2、南亚和东亚国家

南亚东亚曾经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其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6、17世纪。17世纪开始，西方殖民国家已经向亚洲沿海地区进行扩张了，到18世纪，文明的中心区印度、中国等先后开始面临危机，经受着西方殖民主义剧烈的冲击，而现代化过程也在这种冲击中被迫开始了。其特点是：原有的农业文明被强制解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也遭受冲击。

印度是亚洲最早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的地区，它被誉为英“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⁴³⁶ 1846年，英国完成了对整个印度的征服，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印度在被征服过程中，逐渐变为英国的原料产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而在此之前，印度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国家，拥有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匹配的乡村手工业和纺织业。这种平衡被英国的殖民政策彻底打破，因为英国人对发展印度农业丝毫不感兴趣。⁴³⁷

⁴³³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⁴³⁴ 参阅，黄民兴：“论20世纪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⁴³⁵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注①。

⁴³⁶ 肯尼斯·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23页。

⁴³⁷ 南达·夏尔马：《政府与经济发展》（Nand k. Sharma, *Government & Economic Development*），斋普尔1996

从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印度实际上已经被英国强行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司法体系、教育文化等由英国殖民者引入印度。这种殖民统治对于印度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大，正如马克思所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⁴³⁸从客观效果上说，英国在印度的 2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不仅在经济上奠定了印度工业化的基础，比如，1861 年，印度的铁路总长度达到 3.5 万英里，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铁路系统⁴³⁹，而且长期建立起来的西方政治制度、司法和行政管理体制、教育制度等，推动了印度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经过长期的反抗与斗争，印度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独立，同时独立的还有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印度立即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期间，印度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为 3.6%，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 25%。⁴⁴⁰1950 年，印度政府颁布宪法，确立了一套具有印度特色的议会民主体制。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印度现代化取得重大成果，其经济力量已引起世界注意，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目前是“金砖五国”之一，大有做“世界大国”之抱负。但是，印度传统社会的内在隐患（种姓制度、村社制、宗教冲突等）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它们在本质上不能与现代性兼容，阻碍了现代化的顺利发展，使印度背上了沉重的二元性包袱。印度在现代化道路上每跨一步，都要为克服传统的惰性而付出昂贵代价，结果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

与印度同时独立的巴基斯坦现代化道路更加曲折。1971 年，巴基斯坦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上并不接壤，而共同的伊斯兰信仰又不足以把它们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但巴基斯坦国家基本上执行世俗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出色的成就。至 2002 年所谓的“反恐战争爆发”，它属于南亚一个发展不错的国家。

孟加拉迄今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当然人口太多，但国家始终未能整合好，“民主制度”徒有其名，国家不能领导现代化，社会处于高度分散之中，这些是更深层的因素。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类似的现代化进程的一再延误和中断。

在东亚，中国是“东亚文化圈”或东亚古典文明的源头，在历史上形成了以朝贡贸易和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中华帝国。虽然中国很早就有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天下”

年版，第 1 页。

⁴³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0 页。

⁴³⁹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451 页。

⁴⁴⁰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7~758 页。

观念，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却形成很晚。中国至 18 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建设都卓有成就，形成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古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领先地位是众所公认的，“盛唐”时的辉煌，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一页。但明中叶以后世界的格局变化了，中国却恰进入明清“锁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和紧跟潮流的机会。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大举进犯中国，在一百多年中，中国国势衰微，一再落伍，几乎落入亡国之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一再摸索救国救亡的道路，而现代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启动。辛亥革命是一个重大标志，表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终于在形成之中；而只有在这个国家完全巩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其光辉成就已经让整个世界震惊！如今，中国是欧美国家之外，在现代化方面表现最出色、也是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为世界各国摸索各自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迈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迅速取得成功。这在当时世界上引起震惊，因为在非白人社会中，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西方”那样进行“现代化”。日本明确提出要“脱亚入欧”，也就是脱胎换骨，丢弃它原本的文化，向西方学习。这种态度使它能全面学习西方，也取得显著成效。但完全丢弃本身的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也很快修改方针，而变成“和魂洋才”了。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有“拿来主义”，它的古代文明得益于中国；幕府锁国后它仍能开放一隅，让“兰学”传进来，并与当时正统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当中国等亚洲国家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节节败退时，它却能很快调整政策，通过明治维新，不仅适时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改造，初步创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民族国家；而且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并且取得成功。这些，都是日本的长处。但日本的问题是走错了路，明治维新不久就对外扩张，侵略四邻，建立殖民地。此后愈演愈烈，1937 年发动侵华战争，1941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种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并没有帮助日本的现代化，反而使日本真正的现代化发展遭受重大挫折。日本的经历既留下经验，也留下深刻的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韩国现代化真正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朴正熙政府上台后，利用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威，把国家推上了现代化的“战场”，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先导，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为核心。朴正熙政府认为，60 年代韩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社会传统、旧生活习惯、旧价值观、旧职业观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现代化则是排除它们的最有效的方式。⁴⁴¹经过 3 个五年计划，韩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亚洲第二工业国。1996 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4870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

⁴⁴¹ 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47 页。

产总值高达 10548 美元，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 11 位。⁴⁴²目前，韩国处于从精英政治向市民政治体制过渡的阶段，其现代化经历引起世界高度重视。

17 世纪的最初几年，英、荷、法等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随之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逐一建立殖民地，到 19 世纪，除泰国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整个东南亚成为西方殖民地。西方的殖民统治将这些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很大破坏，地方农业社会开始瓦解，而现代性因素也开始进入这些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这为它们各自实行现代化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此后，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力量分布不同，独立后政府的行为也有正确、有错误，所以时至今日，它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各不同，结果也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更好一点，社会也相对稳定；菲律宾、印尼等至今仍比较乱，影响了它们的发展；缅甸一直在军政府统治下，内部整合差，经济也落后；越南、老挝、柬埔寨一直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其中越南已开始显现自己的特色，有望取得重大突破。

东亚、东南亚现代化似乎体现一种特色，即所谓“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是一种“亚洲模式”，或者它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理论界已在多方探讨这个问题了，它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作用——或者说，某一阶段上的国家作用问题，因此是很重要的。

3、撒哈拉以南非洲

黑非洲从西方开始其殖民扩张，就饱尝殖民主义的痛苦，几百年的黑奴买卖，就是在西非地区进行的。后来，葡萄牙占领莫桑比克、安哥拉沿海地区，荷、法、英则在其它地区沿海开辟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部非洲的开普殖民地。19 世纪，随着工业力量的积聚，西方的力量已经能够深入非洲内陆，丛林、沙漠、大河已挡不住西方人了，而非洲丰富的自然矿物资源，则使西方的庞大工业为之馋涎，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一股脑儿冲进黑非洲，在几十年时间中就彻底瓜分非洲，其中英国得到最大份额，法国次之，德、比、意、葡等各得一杯羹，黑非洲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很快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各国的非洲帝国都开始出现松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整个世界的殖民体系予以重大打击。战后非洲处处燃烧民族独立的烈火，终于到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的殖民帝国逐个瓦解了，形成了现在存在于非洲的各个独立的国家。

然而黑非洲一直是多元的部族社会，部落制度是基本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单位，在许多地方，“国家”事实上从来没有形成，酋长制（或酋邦制）是其惯用的政治结构。现代非洲国家则是殖民主义者“创造”的，它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即非基

⁴⁴² 王汝强：“近年韩国现代化研究述评”，《当代韩国》2006 年夏季号，第 37~42 页。

于民族，又非基于文化或传统，也没有经济的共同性、或生活习惯的共同之处，甚至连地理依据也没有。现代非洲国家的疆界，是殖民者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在谈判桌上用尺画出来的，所以一旦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就面临着艰巨的内部整合的任务：它们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而我们知道，这些恰恰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出发点。所以，尽管说，长期的殖民统治确曾给黑非洲带来某些现代性因素，比如某些现代经济企业、某种城市化、某种当地现代型人才的出现，等等，但从根本来说，殖民统治给黑非洲带来的是完全的结构性的破坏，不利于它的现代化过程。

因此，独立后的黑非洲国家派别林立，部族主义严重，国家看似一个而实质完全破裂。如此来看待二战后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延绵不断的部族战争，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就不会感到无法理解了。黑非洲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一种部族的生活，黑非洲的政治其实是部族政治，它的政党、军队、政府都是部族的属性，比如，20世纪90年代，扎伊尔出现了274个政党，分别代表250多个部族；刚果出现40多个政党，其中大部分政党及候选人都有部族背景。要把这样一社会改造成现代的民族的社会，非一时一刻之功。

但黑非洲国家中也有整合较好的，比如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等。凡是整合较好的，其内部比较稳，经济发展有较好的环境，文化教育易于发展，现代化得以稳步推进。尼日利亚是一个通过残酷的内战而最终走向内部整合的例子，所谓的“比夫拉战争”让所有各方都意识到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共处与协商才是出路。尼日利亚面临的问题迄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但一个统一的国家却是大家都接受的。所以说，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独立后非洲各国的第一要务。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随着现代社会在西方走向成熟，现代化浪潮波及全球。二战以后，现代化席卷全世界，没有哪一个角落是不被它卷入其中的。二战后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化”，而现代化是它真实的内容。罗荣渠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自动力、自组织、自主性的新机制已形成，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才可能扩散为全球性的大趋势。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及其内在合理性。”⁴⁴³ 19世纪，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核心地区”，它们向外输出工业品、技术和资金；亚非拉组成的“边缘地区”，它们输出农产品和原料，接受“核心地区”的掠夺。尽管“核心”和“边缘”今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达”和“正在发展”则是明显的分野；但“西方”发达和“非西方”不发达的态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今天的世界，西方的“核心”地位已受到冲击，“非西方”正在迎头赶上，这种局面，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一定是现代化的始作俑者

⁴⁴³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西方国家，所始料未及的。然而这却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五百年前，西方凭籍现代化的启动从落伍走向领先；五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又发生逆转了。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与“后现代”

“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现代化发端于 15 和 16 世纪的西欧，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所有社会“或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或是处在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过程中。”⁴⁴⁴在发展中国家为现代化拼搏之时，新的现象却在西方出现了。

第一节 危机和战争笼罩下的欧美世界

1、资本主义与战争

罗莎·卢森堡说：“如果我们按照实际发生过的情况——而不是按照可能发生的情况或想当然——来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⁴⁴⁵

从 16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小型火器的普遍使用，渐渐抵消了游牧民族和骑兵在战场上的优势。贵族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也失去了，一枚子弹就能穿透昂贵的盔甲，也能阻止训练精良和精心饲养的战马。16 世纪的西欧军队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人数很少超过 2 万人。17 世纪军队人数一般约 5 万人，1000 人口中有 3 名士兵，比例与罗马帝国时期相同。18 世纪腓特烈大帝和马尔博罗公爵的军队约 10 万人，路易十四军队近 20 万人。19 世纪中，拿破仑投入一次战役的兵力达到 20 万。在 20 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军队数量则以百万计算。⁴⁴⁶

19 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又成为激化民族意识的根源，欧美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加剧。⁴⁴⁷狂热的民族自尊心与强烈的超越领土的意图，驱使工业国家争夺原材料和市场，夺取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拿破仑战争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试图用大国协商和多极治理的方式来化解西欧的矛盾，但西欧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尚在进行之中，完全意义上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各国的自我控制力也不可能超越国家的发展之上。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科技的发达又注定了未来的战争将更加残酷。极端民族主义一定造成战争，产生的破坏力也特别强。⁴⁴⁸

⁴⁴⁴ 塞缪尔·亨廷顿：“关于现代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205 页。

⁴⁴⁵ 《卢森堡全集》第 3 卷，第 58 页，转引自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3 页。

⁴⁴⁶ 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和平与冲突研究》（David P. Barash and Charles P. Webel,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伦敦 2002 年版，第 63、69 页。

⁴⁴⁷ 德尼兹·加亚尔等：《西欧史》，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0 页。

⁴⁴⁸ 钱乘旦、王宇博主编：《换个角度看世界——现代化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0 页。

在资本主义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的过程中，西欧大国与其他地区之间也不断产生冲突，在 1870~1914 年期间，现代化的先行国家与非工业民族之间在世界各地开战，亚洲、非洲、中近东的大部分地区被置于西欧的统治之下。于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兴起了，非西方国家的反抗又引起西欧国家的镇压，他们动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手段，即飞机、大炮、毒气、坦克、化学武器等杀戮和压迫弱小民族。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文明人变得比任何时代都更野蛮。人们从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等于战争。⁴⁴⁹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要，得到财富的最大化。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在西欧、非洲、中近东、亚洲等各个地区，小的纷争从未间断，其冲突程度曾螺旋上升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种消极后果。

战争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20 世纪因战争死亡的人数是以往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1900~1990 年，1 亿多人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在 1900~1995 年的各类暴力冲突中，550 万人失去了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⁴⁵⁰1993~1996 年，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员中，16 岁以下的青少年（包括孩子军）占到 45%。截至 20 世纪末，战争迫使世界上的 4000 万人口流离失所。⁴⁵¹战争让越来越多的无辜百姓失去了生命，战争对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人的生命虽然还不能说是不值钱，但不再是无价的了，核武器的发明更是让人类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难道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却是这样的一条不归路？

2、第一次世界大战

巴尔干半岛地处地中海东北部，是西欧的东南门户，也是西欧大陆通往中近东的必经之地。当时间跨入到 20 世纪的时候，这里却是矛盾丛生。首先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巴尔干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列强的矛盾，再次是巴尔干人民与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矛盾，还有巴尔干各国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西欧，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争取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这种可能扼杀王朝的独立的迫切愿望也是不可避免的，俄国支持斯拉夫人的动机又很难阻止。奥地利担心不用武力消除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就会使奥匈帝国崩溃；德国害怕盟国奥地利屈服于俄国的武力或逐渐解体，或由于不支持奥地利使德国陷入孤立地位；法国认为，不支持俄国，在受到德国袭击时，就得不到另一个强国的

⁴⁴⁹ 刘成：《和平学》，南京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7 页。

⁴⁵⁰ 何园贞：《和平与冲突研究》（Ho-Won Jeong: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艾迪索特 2000 年版，第 56-57 页。

⁴⁵¹ 丹·史密斯：《战争与和平的地图》（Dan Smith, *The Atlas of War and Peace*），伦敦 2003 年版，第 42 页。

支持；英国认为，如果坐视德国消灭法俄两国力量，就完全违背大陆均势原则，这等于让英国承受无法容忍的危险。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军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而拉开了战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被卷入战争的有五大洲的38个国家，人口达13亿以上。双方动员的兵力达到7000万人以上，死于战场的约1000万人，受伤约2000万人，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以上。许多城市和乡村被夷为平地，大量工厂，铁路，桥梁、隧道遭到破坏。在战争中，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大英帝国在战后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受到严重的削弱。战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在战火中，俄国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经历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争，它冲击了西方文明，动摇了西方的自信心。

3、经济大危机与国家干预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和调整彼此关系的基本完成。在经历了战后短暂的经济危机后，欧美国家从1924年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内部潜伏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股票证券市场的投机性狂热活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五），发生了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事件。由于美国是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又是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市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危机很快蔓延到德、日、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又使危机波及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寻找各自的对策。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试图使美国摆脱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一是在金融方面，恢复银行的信用，刺激出口；二是在工业方面，通过工业复兴法，规定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生产过剩；三是在农业方面，奖励农民调整生产结构，稳定农产品价格，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四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积极推行“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为资本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本来就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定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心怀不满，经济大危机进一步促使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国家占据上风。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极右派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恐外症，将战争与暴力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对自由主义、反民主、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

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的价值体系。⁴⁵²日本为了摆脱危机，加强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将日本的民间企业纳入军事轨道，实行军部与资本家的联盟（军财抱合）。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后，军部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地位，确定了扩大对外侵略的方针。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迫使各国寻找出路，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各种新趋势。法西斯国家的出现将历史的车轮引向战争，最终把人类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4、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凡尔赛条约、大萧条因素，极端民族主义也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⁴⁵³希特勒认为，保证德国物资供应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欧洲大陆获得“农业方面有用的空间”，波兰和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目标地。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首先须把居住在中欧的德意志人合成一体，兼并奥地利的近700万德意志人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苏德台地区的350万德意志人。

与希特勒的咄咄逼人气势相反，英、法等西方国家却普遍实行了所谓的绥靖政策，希望通过谈判、和解、让步等手段，化解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缓和西欧的紧张局势。法英两国对德国军事复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主要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痛苦记忆，认为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几乎任何一种妥协都比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要好得多。张伯伦甚至愿意牺牲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控制欧洲大陆。

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先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宣战。几个月后，12月7日，日军秘密袭击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2194天，军事行动遍及欧、亚、非洲和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战争，西欧战场造成的物资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交战各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占其国民总收入60~70%，军人死亡1690余万人，平民死亡3430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雷达、火箭炮、喷气式飞机、飞航式导弹和弹道火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动用了核武器。空军、国土防空军、潜水舰队、空降兵兵团、工程兵和技术兵在战场上的作用增大了。这些都是现代工业的产物。

第二节 战后欧洲的变化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西方国家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副作用。确实，西方现代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优势与弊端都已经十分清楚。二战后，人们企图修补西方社会，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两个方面都需要对几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进行反思。

⁴⁵²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⁴⁵³ 罗伊·T.马修斯等：《西方人文读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8页。

修补资本主义有两重含义，一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即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力图补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并且在资本所有权方面实行“人民化”，制造大量小股民、小私有者；二是国家制度方面的“福利化”，这同样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站在“中立”立场上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所有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实行修改，即私有制仍然“神圣”、但不再“不可侵犯”：国家以社会的名义“侵犯”资本。经过许多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有产”和“无产”间的对立变得模糊了，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两极社会逐渐变形，中间集团膨胀，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社会，据说这个社会是很稳定的。。在社会“福利化”方面，国家介入分配过程，使财富的巨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缩小，同时又为最广大的国民拉开了一张安全网，使其基本生存得到保障。这张安全网其实对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只不过资本主义到 20 世纪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推行。由于以上两方面的修补，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变得比较平等了，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合理，每个人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人都能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好处，资本主义自身似乎经历了“现代化”。但是，当资本主义变得“现代”之后，它又面临新的问题：这些修正是否在修正“现代化”？而修正现代化的结果，是不是会出现“后现代”？西方在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调整后，正在面临新的困惑。

在修补资本主义的同时，西方也企图修正民族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民族主义有偏狭性，民族国家这种形态也不完美。民族国家出现时，它是为现代化提供有形的载体的；但是当现代化完成之后，民族国家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人们一再看到：国家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现代战争又都是巨大的战争。这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使战争的危险性不可避免，因为在国家间不存在仲裁机制。正是出于这种认识，20 世纪出现了两次建立世界性组织的努力，国联和联合国就是其成果。但两次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原因是它们试图把全世界都放在同一个标准下。但世界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统一的仲裁标准到现在仍建立不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在地区范围内实行“一体化”，实行一定的超国家机制。欧洲一体化起源于 1950 年的法德煤钢联营。1958 年，它发展为西欧经济共同体，由 12 个成员国家组成，人口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欧共体后来又发展成现在的欧盟，它拥有共同的货币（欧元）、共同的护照、有一个欧洲议会，有“欧洲政府”——欧盟委员会，最近又选出了“欧洲首脑”——欧盟主席。欧洲一体化过程使人们思考：当民族国家在西欧几百年历史上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之后，人们是不是不得不去修正它，以实现民族国家的一种超越？在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时，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超国家机制在发达国家

间有可能形成？⁴⁵⁴

联合国也在客观上弱化了国家角色。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根除了天花，并协助消灭了西半球的小儿麻痹症。1974 年，在发展中国家，只有 5% 的儿童没有患过小儿麻痹症、破伤风、麻疹、百日咳、白喉、肺结核等疾病，到 1995 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努力下，儿童的免疫率接近 80%，每年挽救 300 多万儿童的生命。仅在 1996 年，就有 2700 万难民（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从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得到食品、庇护所、医疗援助、教育和遣送归国等援助。通过发起签署相关的国际条约，联合国在保护臭氧层、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限制砍伐森林、安全饮用水等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联合国还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妇女的识字率。像霍布斯、洛克、罗素等西方哲学家都一以贯之地强调所谓的“社会契约学说”，即假定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来自于这样一种交换：国家为平民提供某些利益，作为回报，人民以某种方式支持国家。但是，如果接种疫苗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来完成，新的拖拉机是从世界粮农组织的技师那里获得，识字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师来实施，那么国家对国民忠诚的要求和人民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至少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从功能主义角度上说，通过促进跨越传统的民族和国家边界的合作，人民能够摆脱险隘的、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变得更加富于合作性和具有超越国家的精神。

“全球化”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什么关系？对西欧国家而言，其含义应该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意义有所不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层面，正如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一样。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自 1945 年以来，经济一体化趋势逐年增长，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国际贸易、资本、劳力、劳工、技术市场已把全球经济联成一体。⁴⁵⁵这种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跨国化”：跨国商务，劳动力国际间分工，生产向第三世界转移，国际间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高速增长，跨国的媒体、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相互作用等。⁴⁵⁶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大概念。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⁴⁵⁷日本学者初濑龙平教授认为，全球化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含义：第一，

⁴⁵⁴ 钱乘旦、王宇博主编：《换个角度看世界——现代化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1~163 页。

⁴⁵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42 页。

⁴⁵⁶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8 页。

⁴⁵⁷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 页。

全球性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在许多领域中不断增加；第二，世界各地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第三，全世界流行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第四，人们流动性不断提高，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第五，这些变化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⁴⁵⁸阿兰·伯努瓦认为，全球化包含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资本的垄断。资本家具有流浪性、跨国性，资本一体化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出现了全球规模的工业公司；二是大众的困难。各国间的经济不平等加剧，殖民主义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中等阶级扩大的趋势已不存在，资本收入上升，劳动收入下降；三是国家的消融。即国家主权的削弱；四是现代主义的结束。⁴⁵⁹

全球化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贫富分化加剧、国内民族与社会的分裂、生态环境恶化、侵犯人权、国际犯罪、国际游资投机、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疆域的范围，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直接与人相关的新主题——社会安全（human security）。⁴⁶⁰阿兰·伯努瓦直言：“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民族国家由于常遭到超过自身能力的外界的束缚，“因而再也不能依靠自身解决全球问题。那种认为民族国家还能够决定它的边界对金融流动是开放抑或关闭的想法，那种认为有可能重构一个整合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将它的居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的墙所保护的，要么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要么是一个谎言。”⁴⁶¹有学者甚至认为，一旦所有国家的农民和工人在国际组织中联合起来，它就可能重构社会经济，为全人类带来福利，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保证。⁴⁶²

依据这些解释，小布什总统觉得可以实行“超国界打击”，因为国家利益必须置于更高的利益之下（小布什举例说比如“人权”、“反恐”），由此而发动伊拉克战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企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西欧各国却众口一声地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攻打伊拉克的却是完全不准备放弃“民族国家”地位的美国。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如何？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世界面前。西欧人企图建立超国家机构，解决它们在现代化几百年中所积留的问题，这是西欧

⁴⁵⁸ 初濂龙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亚洲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

⁴⁵⁹ 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⁴⁶⁰ 汉斯·布劳赫：《全球化与环境挑战：21世纪安全的重新诠释》（Hans Günter Brauch and others eds.,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Re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柏林2008年版，第7~15页。

⁴⁶¹ 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第16、25页。

⁴⁶² 格拉尔德·克鲁杰：《通过解放的发展：第三世界的问题与解决方案》（Gerald J. Kruijer, *Development through Liberation: Third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麦克米兰1987年版，第231页。

国家现代化走到今天这一步，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这一趋势前景如何？现在还很难下结论；但如果民族国家真的被超越，超民族的政治体和社会实体一旦出现，那么以民族国家为起步点的现代化过程是否就此结束、西欧要进入“后现代”？

由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西欧在这一点上出现的新变化并不在其他地区出现。将西欧的现象推及于整个世界，明显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节 发达国家的“后现代”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社会出现一些新的转向，似乎预示着一种“后工业”趋势的转变。

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降到10%左右，包括通信、金融、保险、旅游等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所占比重升至60%左右。即大多数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是服务业，而不再是传统的农业或制造业，这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1969年英国服务业产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0%，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到全体劳动力的49.7%。同年荷兰两项分别是51.6%、49.8%，意大利分别是51.7%、45.1%。⁴⁶³1994年，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进一步增加，分别达到69%、66%、60%、59%。⁴⁶⁴美国是“后工业”特征最明显的国家，美国的白领工人人数在1956年就超过了蓝领工人，第三产业在1995年已上升到70%以上。⁴⁶⁵

在“后现代”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上层与中等阶级下层之间的界线已很模糊。英国在1972年的一次社会调查中，20%的体力劳动者将自己划在了中等阶级圈内。⁴⁶⁶这些中等阶级以及中等阶级化的工人收入较高，工作环境好，生活情趣和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后西方国家的现代福利国家制度也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1970年，英国、丹麦、比利时、法国、爱尔兰、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九国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是18.1%，1981年上升到27%。1980年，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18.2%。⁴⁶⁷富裕成为发达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原先在财富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失衡现象得到缓解。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即福利国家来最大限度地消灭贫困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从70年代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向

⁴⁶³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表二。

⁴⁶⁴ 罗肇鸿：《高科技与产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6页。

⁴⁶⁵ 克尔伯特·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⁴⁶⁶ 亚瑟·马威克：《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Arthur Marwick, *Britain Society since 1945*），伦敦1996年版，第208页。

⁴⁶⁷ 胡连生、杨玲：《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新的高潮，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产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与此同时，教育、医疗保健、休闲娱乐、旅游等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后现代”被视为一个消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关注生产转向重视消费。企业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消费手段的发明上，营销和广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消费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和象征性消费之类的文化行为。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看中的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形式与品牌。⁴⁶⁸

“后现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大量适合于女性工作的岗位，家庭生活的内部机制随之逐渐发生变化，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上升了。随着有关维护妇女权益法律的颁布，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地位也日趋改善。与此同时，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功能逐渐消失，离婚率的上升使得单亲家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未婚同居现象非常普遍，家庭结构日趋简单，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传统的父权制动摇了。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女权、政治参与、社会救助、战争与和平。“后工业”政治也因此更加关注非经济问题。新中间阶层既希望社会有所变革，又担心激进的变革会造成对他们现有物质生活基础的破坏，因而主张采取渐进方法解决社会矛盾。20世纪末，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重新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条道路”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变化，其理论能否可行，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从目前情况来看，它确实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果。一是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下降。如，1998年英国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9%，1999年为39.9%，2000年为39.1%。通货膨胀率也呈下降趋势，英国通货膨胀率前几年一直维持在2.5%。⁴⁶⁹二是人均收入增加，失业率下降，就业率上升。法国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在1998年增长了2.5%，经济出现缓慢增长，从1997年的2.3%增长到1998年的3%，失业率也缓慢下降，从1997年的12.6%降为1999年1月的11.5%。⁴⁷⁰三是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也存在许多共同的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化引起的空间拥挤问题；过度工业化引起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流动造成的社会控制、治安问题；物欲横流、道德松弛引起犯罪问题；高度竞争与工作紧张引起的生活压力问题，人完全为工作环境所控制、成为其生存条件的完全附属品的问题；物质生

⁴⁶⁸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10页。

⁴⁶⁹ 李宏：《另一种选择：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第204页。

⁴⁷⁰ 奥利弗·施米特克：《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转变》（Oliver Schmidtke edited, *The Third Wa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Democracy: Normative claims and policy initiatives in the 21st century*）汉普郡2002年版，第143页。

活过度充实、精神生活反而空虚，于是出现吸毒、文化趋俗、寻求感官刺激等问题；宗教束缚解除后，原有的性价值观念全然松懈，由此也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包括两性关系、家庭稳定、离异夫妻的子女、单亲子女、单身母亲等问题，还有爱滋病问题，性变态问题，其他有关家庭与婚姻的问题等等；普遍的社会流动及广泛的选择机会使子女在成年之后必然离开父母，这又引发凄凉的老年问题；强大的生产力本身及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也会产生问题，例如：人类资源的耗尽，生存环境的破坏，高杀伤力武器对人类生存安全的威胁等。

现代社会的问题是广泛而严峻的，现代化并不是理想的天国，把现代比看作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是不现实的。在现存种种问题中，有些可能是由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误造成的，有些则可能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必然属性。当然，发达国家在“后现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正在对“现代化”提出挑战——这些难道不是“现代化”引发的逻辑结果？但“现代化”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了，历史已无法逆转了；有些人设想人类从文艺复兴就不走“现代化”的路，那么现在的人类社会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历史只是这样走过来了，“现代化”已不可抗拒。若以这样的叹息而标榜“后现代”、也就是否定现代，这种思潮是不值得取的。若以“现代”的种种弊端为威胁否定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阻挡他们的现代化要求，持这种说法的人，就应该怀疑一下他们的动机了。然而，现代化的确伴生着许多问题，发达国家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努力避免现代化的弊病。

最后，我们要问：“后现代”到底是现代化的结束、新历史时期来临的预兆；还是说：它仍然是“现代”的当代表现？这个问题，要留给未来去回答了。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专题讨论

第一章 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

我国世界史学科长期以来基本上沿用苏联体系，苏联体系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曾经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体系有它固有的弱点，一是其时代性很强，而其时代背景现在已基本消失了；二是它包容性较小，容不下当代历史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探讨建立新的学科体系的问题。本文主张以现代化为主线建立世界近现代史的新学科体系，因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现代化。本文提出若以现代化为主线重新观察，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

第一节 “世界史”的含义

什么是“世界史”？这个问题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但为了讨论世界近现代史的体系问题，似乎还需要从这里说起。

关于世界史的含义，向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把它理解成“世界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这是一种“整体史”(universal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观念；另一种把它看成是各国历史的相加(history of all countries)，事实上是一种组合起来的国别史。持第一种理解倾向的国内学者可以吴于廑为代表。吴先生在逝世前曾多次表达世界史是一种“整体史”的思想。他曾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也就是说，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过程。⁴⁷¹ 齐世荣也主张这样看待世界史。齐世荣先生说“人类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然后才有世界史。”按照他的想法：在世界成为“全球一体”之前不可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他说：只有到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日益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历史》2003 年第 3 期，原题目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

⁴⁷¹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薛国中、安长春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的撰写到这时才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⁴⁷²

在西方史学界最能代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这种思想的大概要算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还特意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说法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卷头语：“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就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⁴⁷³有趣的是：巴勒克拉夫又以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加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他自己那本名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全书卷首语。赫伊津加曾经说：“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对此，巴勒克拉夫评论说：“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史学界)的主要特征之一。”⁴⁷⁴

作为著名的史学史专家，巴勒克拉夫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20 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必须用“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由此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世界历史”，确实只在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马克思曾经对“世界的历史”和全球化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⁴⁷⁵。如果说在 19 世纪，大工业还仅仅“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到 20 世纪，它就算真正完成了世界史的形成过程。20 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卷入到世界的整体中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0 年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第 19 次大会上提出的会议主题，就是如何研究“全球史”⁴⁷⁶。

从理论上说尽管如此，在实践中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其指导历史研究的人却并不多，成功的作品就更少。对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国别研究是他们的专长，而且在国别研究中，他们感兴趣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专题。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努力构建“整体的”世界史，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世界史”只不过是组合起来的国别史。书写真正的“世界史”并不容易，“世界史”要求把握世界各地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的逻辑关联，关联的缺失使多数“世界史”作品

⁴⁷² 《齐世荣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7、329 页。

⁴⁷³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 页。

⁴⁷⁴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卷首及第 242 页。

⁴⁷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7 页。

⁴⁷⁶ 该次大会的三大主题是：1. “全球化的视野：概念和方法”；2. “千年纪、时间和历史”；3. “对历史的应用和滥用及历史学家的回应”。见《国际历史科学第 19 次大会简报》(Proceedings of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奥斯陆大学 2000 年版；并见拙作：《探寻“全球史”的理念》，《史学月刊》2001 年第 2 期。

流为一团散沙。

实际上，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撰写“世界史”的努力自古就有，被尊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其《历史》就称得上是西方第一部“世界史”。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阿已经把“世界”看成了“整体”，在他看来：各地方发生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以，“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⁴⁷⁷。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所谓世界史，按照我的理解，它不同于一切国家的历史组合，不是脆弱的拼凑，而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它贯穿古今，各民族在其中只起辅助的作用。各民族的历史，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叙述，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序列的从属关系，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的时间和程度来叙述。”⁴⁷⁸这种“理想的”世界史很少有人真的能写出来，比如波利比阿的作品基本上是当时“世界”的国际关系史，而阿克顿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则是典型的各国历史的堆砌，并且以西欧为中心。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世界史”在专业圈子里，是历史这一大学科范畴下的分支学科，它是有严格的学科含义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而不仅是一个个单个的“国家”。但是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里，同时也在一般的公众理解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而且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国外决不会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任何一本西方人编写的“世界史”著作中，绝对不会没有他本国的历史，而且一定对它大书特书。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的《世界通史》，现代人普遍承认，实际上在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历史”中，普鲁士中心论是他的基本主题。

中国人把“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世界”的概念，其“天下”观把中国视为中心，在它周围有一些番邦蛮国。这种视野使中国的史学虽有记载“异域”的传统，但这不是书写“世界史”，而是对异邦风物的注意，常常出于猎奇心理加以记录。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雄独霸的局面相当少见，自希腊以降诸强并立的情况就几乎不断。如此之下，西方文化从来就承认多民族、多国家的“世界”格局，西方史学传统也就更多地承认“世界”的存在，因此更多地关注它们各自时代的“世界历史”，比如希罗多德、波利比阿记载希腊、罗马时代的“世界史”，兰克和阿克顿则记载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史”。

中国人关注“世界”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的介绍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最早介绍西方历史的是一些翻译书籍，直至1949年，研究性的工作仍旧少而又少。专门研究“外国史”

⁴⁷⁷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

⁴⁷⁸ 《齐世荣史学文集》，第329页。

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是站不住的，许多在国外留学、以所在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回国后几乎全都要改做中国史⁴⁷⁹。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特殊背景，1949年以前，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国，因此“西洋史”这个名称又盛为流行，取代了具有较大内涵的“外国史”。长期以来，非中国的历史都由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西洋史”来表示，可想而知，这个概念和“世界史”的应有含义相去有何等之远。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历史学界何以把“中国史”和“世界史”截然分开，并且不能够形成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史”概念。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得益于建国初期“全盘苏化”的政策导向。在苏联，“外国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研究“外国”历史而享誉学界的人不在少数。并且，苏联存在着公认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苏联科学院耗时十年编撰的《世界通史》10卷⁴⁸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的历史，其涵盖面包括俄、苏在内的世界各地。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在引进苏联的“外国史”之后，一方面接受了“外国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又给它冠以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即“世界史”。这以后，“世界史”在中国就专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历史，它既做不到涵盖整个“世界”，又不具备西方“世界史”的严格定义，实在是词不达意，因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很特别。但在引进这门学科的本意即建立统一的历史学体系方面，它却是完全成功的。下面就来谈谈世界史的体系问题。

第二节 “世界史”的体系

德巴里说：目前撰写世界史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世界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巴勒克拉夫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的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实际上，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堆积在一起，写成一部“世界史”，这并不难；难的是形成一个体系。有体系的“世界史”就能最低限度地体现历史的整体性，没有体系的“世界史”哪怕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最事无巨细地复述出来，它仍然是一团散沙。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编写的《人类史》，这部动用了大批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集体创作的鸿篇巨著，由于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果虽然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史料”，但“显然没有提供令人清晰易懂的模式”⁴⁸¹。齐世荣曾这样评论20世纪国际史坛出现的几部超大型世界史著作(包括《人类史》、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等)：这些著作虽内容丰富，撰写者都学有所长，但却“缺乏

⁴⁷⁹ 参见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⁴⁸⁰ 俄文本1955—1965年在苏联出版，1977年又加编出版第11卷。

⁴⁸¹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0页。

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⁴⁸²。实际上，缺乏体系的“世界史”一向并不少见，18世纪英国曾编过一部几十卷的《世界史》，但其破碎的程度，一如两个世纪以后的《人类史》。19世纪兰克和阿克顿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倾向，只不过大小程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见，“体系”是世界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体系”？在我看来，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换句话说，体系制约对历史的解读，同时将散乱的历史细节组合成整体。没有体系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堆积，其中堆积的知识越多，内容就越破碎。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巴勒克拉夫曾经问：如果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拼凑”，不是知识的堆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件应该写进“世界史”，因为它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事实又不具备这种重要性呢？他还问：如果如塔尔蒙所言：重要不重要取决于它是否关系到“有意义的整体”，那么衡量有没有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⁴⁸³这个问题似乎把世界史学家推进了因果循环的绝境；但事实上，以“体系”为角度观察历史，有意义和没有意义都排列得清清楚楚。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穷尽这些细节；使用哪些史实来叙述历史，以及能否把历史重建为整体，其关键都在于“体系”。唐纳德·凯利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一种视野的意识，在这种视野之内进行历史探寻”⁴⁸⁴；建立体系就是自觉地运用这种“视野的意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因此可以说：建立体系就是建立判断的标准，确定“历史重要性”的依据；同时，建立体系也意味着对某些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解答，比如说，历史是否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否有发展的方向等等。由此可知，体系问题不仅对世界史重要；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都存在着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要体系还是不要体系的问题。任何历史学有体系就能做到条分缕析，没有体系就会变得庞杂无章。

西方“世界史”编纂并不缺乏建立“体系”的传统。在中世纪，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形成一套用神学来解释历史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人类历史只是上帝的意志在尘世的展现，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用历史本身来揭示人类历史是如何无可回避地按照上帝的安排在人间展开的，从而证明上帝无所不在⁴⁸⁵。启蒙时期，世界史的神学体系被打破了，伏尔泰用他的著

⁴⁸² 《齐世荣史学文集》，第332页。

⁴⁸³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4、247、248页。

⁴⁸⁴ 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页。

⁴⁸⁵ 中世纪神学历史学家认为《圣经》中的《但以理书》隐含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但以理书》曾预言“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它们在但以理的梦中表现为四只怪兽，被解梦者说成是四个相继出现的“国”。基督教历史学家说这“四个国”就是古代世界相继出现的巴比伦、亚述、波斯和马其顿，后来则有人解释成是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拿破仑帝国甚至“苏维埃帝国”，他们用这些说法来编制其世界史的“体系”。参见《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

作(如《论通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来确立以人类社会自身为线索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企图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⁴⁸⁶。这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后一个历史阶段必然超越前一个。这种历史观成为18、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使它显得更加有道理。在众多历史学家中,还有人把自然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连成一条线,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自然进化的必然延伸。在这方面,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个例子,他的书从宇宙和地球的形成写起,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⁴⁸⁷。顺便提一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属于进步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低到高循序递进,物质生产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以马克思的方法来书写历史,也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20世纪,有人对进步的历史观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历史未必是直线发展,文明有生有死,就如人的生命一样。各种文明生的生,死的死,相互交替,此生彼灭。因此历史运动毋宁说是循环的状态,并非随时间进展就一定进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文明生死的原因,寻找规律,揭示历史变迁的规律。这样,就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史体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斯宾格勒曾经这样概括循环的历史观念,他说:“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丰富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⁴⁸⁸

汤因比则构建了21种“文明”的生死循环轨迹,他同样试图说明,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⁴⁸⁹。依照这种逻辑书写的“世界史”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尽管汤因比并未能避免堆积各国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的“世界史”起步很晚,而且在含义上与国际学术界不尽相同,在“体系”构建方面也有其特殊背景。总体而言,中国的“世界史”形成后基本借用外来体系,尚未来得及创建自己的体系。迄今为止,中国世界史学界认真尝试建立体系的是吴于廑,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连续发表论文,阐明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最终把世界连接成一体。吴于廑的思想明显具有独创性,可惜他来不及将它付之一部《世界史》。

第三节 苏联体系

⁴⁸⁶ 转引自张广勇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所作前言,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18页。

⁴⁸⁷ 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⁴⁸⁸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页。

⁴⁸⁹ 汤因比批判“关于‘统一文明’的错误概念”,认为这种错误有三个思想根源:即“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45页。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 1949 年以后建立的⁴⁹⁰，当时引进苏联的学科，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体系。引进苏联体系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整个历史学乃至思想界建立统一的概念，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苏联体系是一个大宏观系统，它确信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无一例外地遵循共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逐一更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遵照这个体系，苏联历史书(不仅是“世界史”、而且是一切历史书)都以阶级斗争为纲⁴⁹¹，因此判断历史事实是否“重要”并应否收入史书撰写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体现了“阶级斗争”。这样，历史书写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书，历史变成了完全的阶级斗争史。这个体系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最终形成的，在斯大林时代，这是不可背离的官方意识形态。

苏联体系在中国盛行几十年，曾经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有这个体系，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它的存在及重要性也得不到学界及社会其它方面的承认。没有这个体系，以及对这个体系的社会认同，我们就不可能形成一支专业的世界史学科队伍，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也难以明确地分工。没有这个体系，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成就是不可能这么大的，建国后数以万计的论文、专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大批学术成果就都没有存在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世界史学者都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因为这个体系而从中国史学科中正式分离出来。但这样一来就形成中国世界史学科独特的含义：它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历史，它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的”历史。时至今日，“世界史”仍然与“中国史”相对，在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和人们的一般概念中都是这样。

尽管苏联体系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这个体系有其明显的弱点，现在，它已经不能够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代的要求了，因此应该对它做重新的审视。苏联体系的弱点如下：

(一) 这个体系是在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十月革命刚完成不久，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苏维埃政府需要一种历史学说，为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同时，苏共党内也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正当性似乎也需要得到历史学的支持⁴⁹²。因此，在一个以“斗争”

⁴⁹⁰ 这是我国史学界的共识，如齐世荣说：“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见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

⁴⁹¹ “阶级斗争贯穿于对抗性社会的全部生活中，时而表现为公开的阶级冲突形式，时而表现为隐蔽的形式，蒙上了思想体系的外衣，宗教的外衣和他种外衣。”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13 页。该书认为一切历史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比如科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的进步过程”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千丝万缕关系中完成的”。见该书第 18 页。

⁴⁹² 《联共(布)党史》说：“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做原则斗争中，在党内则是同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做原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而“研究联共(布)的历史，研究我党同马克

为主题的时代就形成了一个以“斗争”为主线的学科体系，阶级斗争几乎成为整本历史教科书的惟一内容。类似的历史条件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存在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阶级斗争”一直是国家生活的主题，因此苏联体系的流行有其合理的时代背景，体系的建立和占优势与这个时代背景切切相关。但现在，这些背景都已不复存在了，本来让人感到很有道理的说法已经与社会的现实相距太远，体系丧失了它的时代性，其现实吸引力也大为缩小。

(二)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个体系的涵盖面不广，伸缩性不大，难以作自我调节。体系的基线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来贯穿整部历史。人类自从有阶级以来，一切时代都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但若把这个命题解释为“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阶级斗争”，这样说就未免太狭窄，把过多的内涵从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抹煞掉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张，人类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无数新研究对象落入历史学的视角，本来很狭窄的历史研究范围，如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至多再加上经济史等等，已容纳不下膨胀的历史学研究了。苏联体系在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围内似乎能够以一条线(阶级斗争的线)贯穿历史教科书，现在则因其容量小、伸缩性不够，而无法适应新的研究需要，无法把人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如妇女史、环境史等等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线条上去，因此，苏联体系的适用性受到了挑战。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苏联体系受到冲击并被突破，应该是正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本文将探讨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问题，因此在以下叙述中，将仅限于谈世界近现代史问题。中国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做出多种尝试；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建立体系，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基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时代，同时现代化又是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共同发展的趋势。因此我认为，用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就此，我想做进一步发挥：

第一，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对此人们已无可异议。中国的现代化来自历史的不可规避性，来自中国自身的觉醒。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而世界史学科恰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思考。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正反映当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一个有价值的学科体系要么具有时代的特征，要么具有民族或地域的特色。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新学科体系，就有可能创建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从而使这一体系成一派之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长久以来一直是沿用外来体系的；现在它已达到

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作斗争、同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作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确保“列夫斯大林党的伟大事业必将最后胜利。”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相对成熟的阶段，可以尝试创建自己的体系了。

第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确实是现代化，这是创建新学科体系的科学依据。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但我们一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引发了社会的整体变动，从而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现代化是新文明取代旧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全方位变革⁴⁹³。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五六百年时间里，世界确实是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在运动的。

以上两点理由就为我们以现代化为主题创建新的学科体系奠定了时代与学术的基础。

四、构建新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

下面谈一谈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下，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就是构成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现代化的产生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只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才逐渐成熟，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瓦解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中世纪西欧，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这种结构的存在，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生⁴⁹⁴。中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不断瓦解农业文明。这些事件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精神的扩展，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等。其中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只有民族国家形成后，现代化才得到有形的载体，才有可能起动。与西欧相比，世界其它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些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比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莫卧儿王朝的建立、满族的入关等等，但这些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因此在历史的这个分界线上，西欧已经潜在地(虽然还不是实质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在我看来，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当准备阶段的各种因素大体上具备时(这在西欧各国都差不多)，谁先在政治领域迈出第一步，谁就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对西欧多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克

⁴⁹³ 参见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章。亦可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序言”。

⁴⁹⁴ 详见拙作：《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代序”。

服专制王权。于是我们看到，从英国革命开始，继之以大量的政治革命、解放战争、政变、战乱……所有这些摆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无非是争取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起步早，有些国家起步迟，有些国家比较顺利，有些国家相对艰难，于是在现代化的时机与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政治条件的成熟给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工业革命是在这种背景下起动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但工业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压力就形成了，迫使与它相邻的所有国家紧紧跟上。18、19世纪，随政治革命逐一进行，工业革命也全面铺开，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一浪推一浪，社会经济全面变动，现代化在动荡中迅猛推进。

当现代化正在欧洲国家推进时，殖民扩张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地区卷进一个“世界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现代化就是一个世界现象。为争夺殖民地，欧洲国家激烈竞争；同时，征服与反征服又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愈演愈烈，世界形成为一个整体，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⁴⁹⁵。总之，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第二个阶段上，由于西欧的某一个角落开始现代化，整个世界都被拉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的主流逐渐被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来，一个“现代”世界注定要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此时，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生产能力几十倍增加，物质财富惊人地积累，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现代化的优势至此充分地体现出来，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但同时西方社会又出现许多新问题：贫富不均，价值失衡，社会冲突频起，自然资源遭受破坏……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否则社会就永远处于不稳定之中，于是各种“修补”问题的尝试不断出现。总之，在这个阶段上，社会进入全方位变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的商业化、大众化……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汇聚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尽管各国变化的方式和道路可以不同，但发展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一两个国家的特殊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民主化体现为以阶级为依据扩大政治参与权，经济发展体现为不同的阶级获取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按阶级组建，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息息相关。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的政治，阶级的社会结构，阶级的文化，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冲突与整合中完成的，而冲突与整合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色彩。由此我们理解诸如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骚乱与抗议，社会改良活动等等。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就在西方国家向“成熟的”的现代社会迈进的时候，现代化的浪潮也冲向全世界，造成了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西方国家从地理大发现时期起就开始

⁴⁹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原有的文明形式(通常是农业文明形式)和社会结构(通常是农业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起到了为现代化作铺垫的作用。殖民主义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新出现的工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进它所征服的地区，使其取得谋求现代化的手段，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重的使命”⁴⁹⁶。

不过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西方的侵略激起剧烈的反抗，在反抗中，西方的优势得以体现，非西方国家被迫承认西方的优势，于是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学习西方，改造自己，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原有的文明积淀越深，转变的过程就越艰苦，“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越加剧烈，社会动荡的规模也就越大、越悲惨。这就是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源，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更大！

但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这是一种反方向的“现代化”，我把它叫做“反现代化”⁴⁹⁷。“反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发生，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却最常在非西方国家中出现。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这个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从那个时候起，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标志着“现代社会”可能正在发生质变。从经济结构看，工业生产的比例显著降低，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服务”正在成为主导性的经济部门。从政治结构看，超国家的政治层面已经出现，工业社会赖以形成的基本政治单元即民族国家已遭遇挑战，主权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民主的内涵也在悄悄转变。从社会方面看，变动的趋势也很明显，社会分层、阶级结构、婚姻关系、工作方式以及生活、娱乐、购物、饮食等等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特征，“全球化”更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总之，西方社会是不是正在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发展？这是个人们正拭目以待的问题。也许，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也将成为过去？

总之，回观世界五六百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我认为现代化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应该是一件可行的事。

⁴⁹⁶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⁴⁹⁷ 参见拙作：《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学术界》2001年第4期；《再论“反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例分析》，《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第二章 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格局问题*

一、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发展

资本主义最初发生在 14、15 世纪的西欧，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已经历了长期而缓慢的发展过程。

大约在 7000 年前，尼罗河流域率先点燃文明之光，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相继出现远古文明，这些就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起初，这些文明波及的范围都很小，随后逐渐扩大，开始了文明扩散的过程。某种较高级度的文化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散，使周围较低发展水平的文化受其影响而融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地区性的变化。当地区性的文化固定下来并继续向外扩散时，它可能碰到两种情况：如果他周围没有比较发展的人类文化，那么它就像一支蜡烛，很容易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熄灭。如果它的扩散遇到了其他发展的文化，那么这些文化就会互相交融，并且在交融中继续发展。古代地中海地区及西亚地区显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地中海周边出现了许多文明中心，彼此相互影响；西亚地区，从地中海岸到伊朗高原，也接连出现远古文明，都曾经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成就。此外在东亚，中国古代关于黄帝、炎帝以及其他许多远古帝王的传说以及夏商周的相继出现，似乎也说明了这种情况。总之，大凡在文明延续并扩展起来的地区，往往都不只一个文化中心。许多地区性的文化通过接触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及战争等等）融汇出共同的特征，最终形成一种“模式”，这时候，文化圈的雏形就形成了。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模式”主宰着地区文化，使这些文化多少相似。“模式”的核心是“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文化必须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体系，由此而构成一个文化圈。

但“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只有借助于有形的载体才能固定下来，并向外扩散。这些有形的载体就是社会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主要就是借助于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凝固并向外扩散的，这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一个社会的凝聚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凝聚，而成功的社会扩散归根到底也必须是文化的扩散。

在资本主义发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文明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文明产生到地区性文化扩散再形成文化圈的过程。到资本主义发生时，全世界已形成四个文化圈，从东到西排列，它们是“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历史》1991 年第 2 期，原题目为《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欧洲文化圈”（也可称“基督教文化圈”）。除这四大文化圈之外，应该说还有一个准文化圈正在形成中，但还没有完全成形，特别是还没有出现作为价值的高度体现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我这里指的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这些文化是在完全隔绝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的状态下发展的，但它们已经形成了地区性文化了，而且有继续扩散的趋势。

国家与宗教既是文化的载体，用它来观察四大文化圈，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现象：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及两河流域，国家的出现虽然很早（公元前四千纪中期在埃及出现，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在两河流域出现），但统一的意识形态却形成得很晚，因此文化圈的定型也就相对较晚。古代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都曾一度幅员广大，但他们都只是在军事力量强制下形成的政治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没有出现统一的文化模式。换句话说，这些政治集合体不是靠文化的扩散，而是靠强力形成的。在这个阶段上，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地区都只完成了地区性文化形成的过程，在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内部，实际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很大的地区性文化，比如犹太文化和意大利半岛上的希腊-罗马文化就截然迥异，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这些政治实体很容易崩溃，崩溃之后便荡然无存，再也不可能恢复起来。地中海地区出现能够使地区性文化融合起来的统一的宗教，是在罗马帝国后期，当时罗马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使它成为国教。从此以后，基督教文化就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世界（但不是罗马世界）的文化模式，基督教价值也成了欧洲文化圈的共同价值体系。更晚一些时候，伊斯兰教出现之后（公元 7 世纪），另一个文化圈才最终形成，这个文化圈囊括了欧亚非三洲交界处绝大数的文明发源地。到伊斯兰文化圈形成后，地中海-西亚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才算完成。从此之后，有两个泾渭分明的文化圈彼此对峙，自远古时期就开始的多种文明冲突交融，争雄不下的局面终告结束。

与地中海-西亚地区不同，在东亚及南亚的文明发源地，国家的出现虽然较晚（中国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印度则更迟），但同一的价值观念却形成相当早，因此文化圈也较早定型。古印度文明的价值观念核心是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婆罗门教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文化圈的核心基本形成，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共同意识形态成为维系印度社会的主要文化纽带。尼赫鲁曾以赞许的口气谈到别人一句话：“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的条件之下，印度终归是印度；但是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⁴⁹⁸婆罗门教主要价值观念后来融合到印度教中，它的正统地位也由印度教取而代之。佛教曾企图打破种姓制度，但最后则必须与之想妥协。

⁴⁹⁸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15 页。

中国也出现类似情况。在中国，以宗法关系为出发点的家族主义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并成为中国文化圈的显著特色。⁴⁹⁹这种价值体系形成于西周，孔子的学说则是这种价值体系的集大成者。自儒学出现后，无论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统治，都必须尊崇儒学，否则他就站不住脚。儒学在中国文化圈中相当于其他文化圈中统一的宗教的地位，起着使文化特征凝固下来的有形载体的作用，并且承担文化扩散的功能。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就因为这种价值体系相当坚固。儒学不仅是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自爱中国周边的民族与国家中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圈确实是借助儒学的传播而形成起来的。

总之，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东方两个文化圈先于西方两个文化圈形成。

不管怎样，到资本主义发生时，世界的格局基本上是：经过长期的凝固与扩散，四大文化圈都已扩张到各自的极限，由于受地理障碍的限制而不能再扩张了。基督教文化已经扩散到整个欧洲，它唯一可以继续扩展的出口在东部，但那里是西伯利亚无人的寒冷大森林。伊斯兰文化已渗入北非沙漠，再往南，是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在那里文明似乎还没有睡醒。印度次大陆三面环海，北面则被喜马拉雅山拦住了去路。中国文化圈东面抵达大海，背面已到荒漠，西面进入戈壁，南面正对丛林——里面是中国人自古就害怕的“瘴气”。在每两个文化圈之间，还有一些文化的过渡区或缓冲区，比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是东南亚（印度支那），在中国与伊斯兰之间是中亚沙漠，在伊斯兰与欧洲之间是东南欧；过渡区中两种文化的影响都有。除了四大文化圈所覆盖的这些地区以及中南美的准文化之外，文明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了，它们分得很散，全然不成体系。但由于太孤单了，因此在充分发展并扩散之前，就遇到麻烦而消失了吧？这些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一支烛”的文明。⁵⁰⁰

由于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各文化圈要克服面临的地理障碍，继续扩散是很难

⁴⁹⁹ 范文澜说：“宗法与土地的分配法关系如此密切，因而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唯一重要位置……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特征之一。”《中国历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39页。余英时说：“在（中国）各层社会集合之中，‘家’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国’与‘天下’也是以‘家’为范本的。所以有‘国家’、‘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可见学术界虽有不同观点，但在家族主义问题上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⁵⁰⁰ 比如现在津巴布韦丛林中有古代“石头城”（音即“津巴布韦”）的遗址，这就是一种古老文化的有力证据。这种文化隔离于其他文明中心，长期独立地发展，但后来却未能发展下去，“石头城”也就埋在荒草密林之中了，到1868年才重新被发现。这类神秘的文明遗址在南部非洲还有多处，巴兹尔·戴维逊曾说：“漫长的（非洲）东海岸以内的大陆，在文化上并没有，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09页。这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非洲腹地，文明曾经发生过，却没有能扩散并延续下来的原因，类似的情况在太平洋岛屿及南美洲也有。

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⁵⁰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世界性文明。

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它所召唤的科学技术发展打破了各文化圈间天然疆界的限制，而把人类带入一个共同文明——现代文明中来了。然而，现代化文明并不是哪一种文化的自动延续，而是各文化圈交融的过程。现代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世界性，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成就。布莱克说：“近代较先进的国家对较落后的国家确实有有很大影响，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因为“它不仅未能考虑到先进国家本身最初的转变，而且也未考虑到较落后的国家对更落后的国家的影响。”⁵⁰²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毫无例外的都有一个改造自己的传统使之进入现代文明的过程，再先进的国家也都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现代化”。我们在谈论“现代文明”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点。

二、中古西欧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的发生

但现代文明一开始是在欧洲萌发的，当它最早出现时，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上文所引用的《共产党宣言》那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

欧洲为什么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显然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我们仍可以把欧洲在资本主义发生前的社会状态作一简单的回顾，并将与其文化圈进行比较，这样，也许就可以对这个问题看出一点端倪了。

欧洲文化模式起源与古代希腊社会，这一点是世界上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汤因比说：“我们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样。”⁵⁰³战后美国一本流传很广的大学教科书在谈到希腊文化时也这样说：“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其文化最能体现西方人精神的是古希腊人。”⁵⁰⁴的确，古希腊社会以个人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和商业精神以及其他种种特征不仅流传给罗马，使古代罗马文化具

⁵⁰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⁵⁰²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C.E.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纽约1967年版，第6页。

⁵⁰³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⁵⁰⁴ 伯恩斯：《西方文明》（Edward M.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第1卷，纽约1973年第8版，第113页。

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特征，而且影响到后来欧洲整个的历史发展，至今欧洲（特别是西欧）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社会。

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欧洲文化圈成形并固定下来却应该从基督教传播算起。

基督教扮演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角色，同时也担任欧洲文化扩散的工具。接受基督教意味着野蛮人皈依文明，同时也意味着对超国界的欧洲文化的认同。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日耳曼人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却归顺了罗马天主教会，斯拉夫人威胁着拜占庭却接受了东正教洗礼。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欧洲文明从地中海扩散到整个欧洲。到资本主义发生时，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大世界。但这个世界一分两半，最早的资本主义是在天主教的西部地区发生的，因此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当特别关注，找出它的特殊之处。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它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既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封建主义在欧洲有严格的含义，但这个词后来被广义化了，用来泛指世界许多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欧，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整个欧洲，封建主义与领地分封制联系在一起，“土地不再作为私人财产分出去，而是由国王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军役义务。封臣们在自己的地产上征集受过训练的人，带领他们去打仗。”⁵⁰⁵土地的占有与军役义务相关联，而且可以一级一级分下去，由大封建主封给小一点的封建主，最后及至农民，这就是封建主义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内容。

土地分封制造成相应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成金字塔的社会。在金字塔的顶端坐着世袭的君主，其下是一层一层的封建主，农奴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封建化的程度越高，“无主的”自由农民就越少。“人各有其主”，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但这个金字塔并不是浑然一个整体，它只在相邻两个层次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中，高一层的封建主只对他的直接受封人发号施令，因为他的土地是封给这些受封人的。反过来说，低一层的封建主也只对它的直接封主有服从义务，因为他直接从封主手中得到了土地。这意味着国王并不一定能号令所有的贵族，大贵族也不见得能号令全体小贵族，“我附庸的附庸不一定是我的附庸”。

这种情况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是封主与封臣用契约的形式固定其相互关系，彼此都有权利，彼此也都有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之下并同意效劳，其性质往往是军事的；大领主则同意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

⁵⁰⁵ 祖勃里茨基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简史》（Y·Zubritsky, U·Kerov & D·Mitropolsky: *A Short History of Pre-Capitalist Society*），莫斯科，第95页。

回报”，“并答应对其封臣‘主持公道’”⁵⁰⁶。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便违反了封建契约，因而封建秩序也就遭到破坏。

其二是权力极为分散，每一个领主都行使完全的司法、行政权，每一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司法、行政单位。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不符合“国家主权”的原则。但在西欧封建社会，它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时交通很落后，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彼此间很少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权力集中而不能行使，倒不如分散权力，实行比较有效的治理。

权力如此分散自然也受制于生产发展的状况。在当时西欧，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各地在经济上既然没有多少联系，在政治上自成一统当然也就有可能。

自给自足的经济、分散的权力、松散的社会联系，这些就是中世纪欧洲的特色。这些特色使欧洲文明在一千年中发展迟缓，失去了古希腊罗马的光辉。举一个例子：欧洲古代发达的医药学在中世纪失传了，相反却在阿拉伯人的药典里保存下来。与其他几大文明相比，欧洲（特别是西欧）明显地落在别人后面，西方有些学者把这一千年称作是“暗黑的中世纪”，显然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感。

但资本主义最终在欧洲（严格地说在西欧）萌发，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异己的力量——商业和城市。

西欧的商业和城市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就连欧洲东部也不具备西欧的这种特殊性。说西欧特殊，并不是说它的城市特别繁华，商业特别发达。相反，无论与古代的希腊罗马相比，还是与同期的东方世界相比，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与商业都显得相当凋蔽，十分冷落，即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也大不如中国的诸如泉州和扬州。无怪乎一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要感叹东方城市的繁华富庶。而马可·波罗回国后写的游记，刺激起西方人到东方寻宝的热望，正式这种热望，导致了后来地理大发现，以及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世界面貌的改变。

西欧的城市与商业之特殊，就特殊在它们始终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未成为体制内的力量。西欧的城市从封建主手中赎买（或夺取）自由，发展出一套完全异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封建社会内部的特殊体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种特殊性。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城市的生产与销售均由市民自行组织，不受封建主干预，城市还有征税权，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形成自治，不存在封建制度下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它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同时对别人也没有封授土地的关系。它可以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而

⁵⁰⁶ 海斯和克拉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Carlton J·H·Hayes & Fredrick F·Clark,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纽约1966年版，第91、92页。

且有独立的司法权，城市法庭与封建主的庄园法庭有同等地位，不受领主法庭制约。这些情况意味着西欧城市在经济上不依赖于封建领主，在政治上则独立于封建领主。城市的这种独特性还可从个人的社会关系上看出来，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他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了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人各有其主”在城市是不适用的。于是，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的主流体制之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蕴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⁵⁰⁷一个异己力量在封建社会中受默认的存在，是西欧萌发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在世界其他地方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很发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⁵⁰⁸与欧洲中世纪盛期同时的唐代，都城长安就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东西两市有 108 坊，400 多个行，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互相交通，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宋代词人柳永咏杭州为“烟波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而且“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⁵⁰⁹这显然比同期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不知繁华多少。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商人发了财总是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商官合流，又使商业与政权勾结在一起。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⁵¹⁰与其说它起自治的城市经济的管理者的作用，不如说它是把城市与商业纳入到体制内去的准衙门机构。

在印度，商业也明显地融合在体制之内。商业（包括手工业）本身就是一种种姓，很好地嵌在种姓制度的框架中。工商事务一般是在种姓内部处理，种姓既是经济管理部门，又是社会管理机构，起着双重作用。因此种姓（特别是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第三级种姓吠舍）虽然表面上很象是其他社会中的自治兴业公会，它却把工商业纳入到主流体制之内去。

⁵⁰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2 页。

⁵⁰⁸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44、245 页。

⁵⁰⁹ 柳永：“望海潮”词。

⁵¹⁰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 页。

伊斯兰世界的商业与城市与中国很相象。阿拉伯的商业在中世纪非常发达，阿拉伯商人一度曾垄断东西方贸易，活跃在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中，并曾把商人活动向南推进到非洲的莫桑比克沿海。但阿拉伯的商业始终是在政权力量的控制下，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于体制之外。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才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统治力量比任何地方都强。类似的情况甚至在欧洲东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区也多少如此。可见，城市与商业滞留于体制之外，实在是西欧特有的一种现象。

三、共性与特殊性

看出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不妨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几个文化圈的其他方面再做一些比较，以求找出其中异同。

相同之处即资本主义发生前人类文明的共同特点，大约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经济方面，各文化圈都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在各文化圈的中心区，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力都发展到前工业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或接近极限。如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印度河流域，中近东的两河流域等等。有趣的是，西欧在农业生产方面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方面都不如其他文明中心。西欧后来在资本主义发生后出现的农业技术改良，如人工施肥、作物轮种、条播播种、牲畜越冬等技术，在其他文化圈中可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不论其发达程度如何，各文化圈都只是农业文明而已，商业和手工业建筑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业社会是全世界的共同特征，而其分散、缓慢、封闭、保守等特色，在各文化圈都完全一样。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在主要商道途径的地区出现以商业为主的经济方式，但这种商业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二）在社会方面，各文化圈的呈现出等级社会的阵态，社会是垂直排列的，有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分。等级的结构状态未必相同。比如欧洲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阶梯结构，印度是种姓制度，中国有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及官与民的显著划分，伊斯兰世界也因为部落、血统、宗教、职位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在等级社会中，财产不是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标准，血统和身份对个人来说更重要。人与人之间不仅在财产上不平等，而且在社会权利、政治地位、司法待遇、税收特权等等方面都一概不平等，“上”和“下”的区分时时处处表现出来。

（三）在政治方面，由于社会的等级结构，都表现出居高临下型的统治方式。欧洲的封主对封臣，亚洲的君主对臣民，一改以超越的姿态高居于上，要求被统治

者服从。统治是统治者的职业，统治只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排斥于政治之外，其唯一的之职责就是服从。而且这种服从往往呈等级向上的趋势，一级服从于另一级，与社会的等级结构完全一致。

（四）在意识形态方面，都确立单一学说的正统地位，并且以这种学说控制社会；把思想一致看作是统治的必要前提，而思想分歧被看作是政治混乱的原因。因此，为求思想一致，就使用思想禁锢的种种方法，包括鼓励愚昧和实行文字狱，以及宗教裁判所。异端虽不一定受到残酷的肉体消灭，但正统之外的集团与个人进不得权力结构，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由此而保证价值体系的延续性以及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被确定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正是最能体现某种文化模式中基本价值观念的学说，统治者必须利用这种学说进行统治。政权与正统学说相结合，严密控制社会，这是中世纪各文化圈的共同现象。

但直到这时，人类文明尚未超出地域的发展，文化圈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都相当小，因此，各文化圈之间的差别也就很容易清楚地显示出来，从而体现出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经济方面，虽然都是农业经济，但土地的占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所有制）有很大不同。比如说，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相当牢固的小地主所有制，土地可以继承，可以分割，也可以买卖，土地“私有”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往往遮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国家对土地有最终的决定权。土地被看作是国家交付给农民的，因此随时可以由国家收回，或由国家进行重新分配。全国的劳动力都可以由国家任意调拨使用，事实上无需给予报酬。任何人的任何财产都可以由国家“籍没”、“归公”，因此，私有财产并不具备“神圣”的性质。在小土地私有后面站着国家，私有权的发展并不充分。⁵¹¹印度的土地归村社使用，尼赫鲁称这是印度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⁵¹²事实上印度的土地所有权最终仍在国家手里，马克思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按马克思的说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⁵¹³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适用于整个“东方”，也包括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内。⁵¹⁴事实上，伊斯兰世界虽然有多种土地占有形式，从埃及的土地国有

⁵¹¹ 有人说中国在明代就出现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在私有权未能充分发展前，资本主义的确立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的讨论（田居俭、宋元强编，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75-102 页。）

⁵¹²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16、327 页。

⁵¹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91 页。

⁵¹⁴ “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45 页。

制⁵¹⁵到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制⁵¹⁶都有，但究其根本，确实可以说“……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⁵¹⁷这正是东方世界土地占有形式的隐秘的本质。

相比之下，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土地占有形式却是纯个人的，国家并没有参与在内。中世纪西欧虽然也不具备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否则分封制就没有意义了），但君主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土地，而是以最高领主的私人身份分封土地的，各级封建主再依次以类似的名义对土地进行分封。这样一种不由国家参与其间的所有权，很容易转化为完全的私有制。而这正是西欧后来所发生的事。

在社会方面，虽说都是等级社会，但西欧是一种宝塔式（阶梯式）的等级，每一级都受制于它的直接上级，又制约它的直接下级，一级只对直接的上级有服从的义务，对间接上级却不一定服从（“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相比之下，东方存在的却是一种大殿式（覆盖式）的等级，一切等级都覆盖在同一个大屋顶下，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权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彼此间却很可能是一种横向的联系：只有地位尊卑之分，不一定有受制约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⁵¹⁸

由于等级制度在结构上的这种差别，就很容易看出：欧洲社会的基本单元可以是个人，而其他社会的基本单元则必须是团体（如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族，印度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种姓，伊斯兰社会的基本单元是部族等等）。因为阶梯式的结构可以把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上下左右都有约束，同样身份的个人由此而结成块状整体，再把这些块状按一定顺序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等级社会。而在大殿式的结构中，社会的每一分子从理论上说都是可移动的（这就解释了东方社会在中世纪为什么比欧洲社会有更大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社会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可移动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清除这种流沙式的不稳定性，就只有把流沙事先就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块，让它们受到相当的束缚，才不至使大殿建筑在稀疏的流沙之上。而这些团块就表现为家族、种姓、部族等等形式。反过来说，正因为已经把个人捏在一个一个的团块中，因此只需要一个大屋顶，就能把整个社会覆盖住；而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则首先把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不让他们有太大的活动余地。

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东方”意识形态就必须强调“团体”，而欧洲（特别

⁵¹⁵ 郭应德：《阿拉伯中古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章。

⁵¹⁶ 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3页。

⁵¹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4页。

⁵¹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是西欧)却可以提倡“个人”。这是由社会的基本结构造成的。由此就产生一种矛盾现象:在中世纪西欧,看起来被严格束缚在固定位置上的个人,其社会存在却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即使是西欧社会最底层的农奴,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权利,即领主主要保证其份地不受侵犯);而东方社会中,个人似乎有更大的流动性,但社会却只承认团体的存在,而把个人放在集团中来对待。反映这些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于是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可想而知,最强调个人价值的思想体系应该出现在欧洲,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外,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东方的教会都是国家的教会,受政权的控制;而西欧的天主教会却超然于国家之外,形成超国界的二重性实体。这种情况也是由等级结构的不同形式造成的——西欧不存在那个无所不包的“大屋顶”。

最后,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到东方“大屋顶”笼罩一切,国家对社会的一切方面加以控制。这个国家是专横的,表现为君主的绝对权力和臣民的绝对顺从。国家为有效地行使权力而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这官僚体系使东方国家在中世纪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都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但同时,它也产生巨大的周期性破坏力,把社会抛进由腐败而造成的震荡与大解体之中去。亨廷顿曾经说:传统制度越接近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⁵¹⁹他指的就是这种中世纪近乎完美的东方“大屋顶”。相比之下,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中世纪却存在一个由权利与义务所制约的、与土地的封授关系相呼应的权力分散的政体结构,即等级君主制。等级君主只是领主们的头,它不能对所有的臣民直接发令。因此,欧洲历史上很早就出现分权机制:教会与君主的分权,城市自治的分权,领主在每一个庄园上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在每一块领地上半独立的治理权等等。

总之,欧洲在中世纪是最杂乱无章的,社会在每一个方面似乎都表现出混乱,以个人为本体的社会的确很难纠合在一起。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许多方面落在后面,它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相对低下,城市和商业相对不发达,政治机构显然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很难用“繁荣”两字来形容。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的历史上,东方三大文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欧洲(特别是西欧)则显得比较独特。看来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情况是普遍的,欧洲的情况是特殊的。从发展趋势看,欧洲好象在向其他地区靠拢。站在14、15世纪时,情况就是这样的——土地分封慢慢过时了,领主经济变成地主经济,“国家”渐渐形成起来,一个“大屋顶”以专制王权的形式开始出现。然而欧洲终究没有走东方的路,它独特的社会状态使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了。结果,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把世界推进到现代文明中来。

⁵¹⁹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0页。

看来，说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的特殊性之中，这是站得住的。但也许正因为它产生于欧洲的特殊性之中，因此当欧洲最先用资本主义方式闯开现代世界的大门并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时，其他文明却要寻找不同的途径，才能走进那扇大门。

第三章 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问题再次提出

第五节 期待与展望 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趋势终成定局时，西方世界舒舒服服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西方世界庆贺胜利，自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时，一些危险的信号却从不同的角落发出，预示着未来的欧洲并不太平。人们看到：巴尔干半岛烽火连天，冲突不断，波黑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其无目标、无原则的性质使全世界感到吃惊。人们看到：解体后的苏联境内埋藏着许多冲突的种子，各新独立国家不仅内部潜伏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冲突，而且相互间心存疑虑，彼此戒备，有些已发展成为公开的抗争。在俄罗斯联邦，骚动的因素已经公开表现在车臣冲突中，如果车臣分离成功，新一轮领土分裂有可能使俄罗斯成为巨大的动荡根源。在东欧，改变了政治颜色的各国之间并不亲近，相反，几十年销声匿迹的民族问题又开始露头，边界、领土等等争论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回顾苏东巨变后的欧洲局势，人们突然意识到：共产主义退却了，民族主义却可以卷土重来。目前，欧洲所有动荡的根源几乎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就连前苏联自身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民族问题造成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使人们有理由感到忧虑——毕竟，自19世纪以来，欧洲历史重大的战争都起源于民族的冲突：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诸次统一战争、德意志诸次统一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哪一场大战不是如此？人们于是担心，新抬头的民族冲突是否会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再次拉进一场大战？

然而就是在东欧的民族问题趋向严峻，引发诸多冲突时，西欧的民族矛盾却似乎在缓解，民族间出现一种亲和的趋势，往日的互斥心理正在被一种彼此接近的倾向所取代。这不是说民族间的分歧都已经消除了，而是说，许多重要的差距正在缩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在接近，相互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感情，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感到了“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必要性：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不相互依存，就不能生存。“相互依存”的思想在伊奥内斯库的书中表达得很清楚，其中说：过去四五十年中，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新纪元，这个纪元体现着“20世纪中叶出现的科学信息革命对人们在国内国际事务方面的行为的影响，这场革命将这些事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协同作用，它们形成一体又高于并不同于全体相加的总和。”⁵²⁰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

⁵²⁰ 伊奥内斯库：《相互依存世界上的领导人：阿登纳、戴高乐、撒切尔、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治国风格》（Ghita

在现实中，这表现为战后西欧的“一体化”，英、法、德三国几百年来连横合纵的循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来已告一段落，三大国鼎立的状态让位于欧共体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西欧的联合好像已难以逆转，人们憧憬已久的一个“欧洲的联邦”似乎就要从梦想成为现实。1991 年 12 月，正当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日益深陷在内战之中时，西欧国家却在荷兰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的“统一”制定了时间表。西欧联合是“相互依存”思想在现实中最突出的体现，它为一个迷茫的世界提供了希望。“欧盟”的实践使理论家们倍受鼓舞，他们认为：长期使人类社会困扰不安的民族冲突有可能得到最

后解决，其途径是让一个超国家超民族的实体接管“国家”的大部分功能。按历史学家比迪斯的说法：“由民族主义唤醒的热情有时会致力于解放，有时会效劳于压迫，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禁要问：民族国家再维持自一战以后在欧洲的状态，即作为对内进行治理、对外从事外交的正式实体，现在是否合适？相信这样一个实体仍应该行使完整的主权、而这个主权又必定不可分割——这样看是否还明智？换一种表达方式：假如一个民族的政府放弃某种程度的主权，它是否就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切？”⁵²¹

当然，西欧并不是完全沉浸在民族和谐的蜜汁里，民族间的齟齬仍不时发生。比如说，爱尔兰共和军刚刚（1996 年 2 月）宣布终止为时 17 个月的“停火”，新一轮暴力活动似乎又要在英伦三岛蔓延。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主义”或“巴斯克主义”仍不时发出强烈的呼喊，至少在文化上，它们将长期存在下去。比利时的民族问题虽然处理得颇有技巧，但明确划分的语言地域界线和按语言划分的政党结构却在清楚地提醒人们：事关民族问题的大小事务都必须谨慎从事。意大利和德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运动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却足以使人们感到担忧……种种现象表明：在西欧，民族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人们并不可高枕无忧。

不过当前欧洲民族问题的现状仍然是：东欧趋向恶化，西欧趋向缓和；东欧趋向“分”，西欧趋向“合”；东欧前途难卜，西欧则有成功的希望。如何解释这种东西两面差异鲜明的现象？这正是我们探寻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的目标所在。

第二节 古典时期的“民族”

Ionescu, *Leadership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Statsemanship of Adenauer, De Gualle, Thatcher, Reagan and Gorbachev*), 伦敦 1991 年版, 第 5 页。

⁵²¹ 比迪斯 1994 年 4 月 8 日在英国历史协会上所作的发言：(Michael Biddiss's Presidential Lecture given to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Swansea, on 8 April 1994, titled as "Nationalism and the Moulding of Modern Europe"), 讲稿的第 22~23 页。

已知最早的欧洲居民，是使用粗糙石器的远古人类，考古学家称之为尼安德特人。后来克罗马农人取代了他们，克罗马农人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是一种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再后来，新的人群在欧洲大陆上来来往往，过往交替，渔猎采集也过渡到半游牧半耕作的生活，但漂泊移动始终是这些远古人群的共同特点。为争夺猎物和牧场，远古人类经常发生激烈的打猎，争夺的过程现在当然不可能知道，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但争夺一定是很壮烈的，争夺的结果是一些人被驱逐，另一些人占据丰腴的生存空间，在史前几十万年时间里，欧洲大地上就流动着一群一群这样的人，有一位作者在想象克罗马农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经过时说：“这些高个子的猎人，是不是入侵了尼安德特人的土地，占据了他们的洞穴，并把矮胖的尼安德特人杀掉了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场残酷的战争，用棍、木矛、手斧相互厮杀，尼安德特人勇敢地捍卫他们的家庭、居处和猎物，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了。那些儿童们是不是被战胜者所收养呢？妇女们是不是被劫为妻室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确实发生过什么事情，这就可以写成一段很好的故事。”⁵²²

远古人群虽然一拨一拨的，却绝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即便拿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比较经典的定义去衡量它们，它们也完全不符合标准。⁵²³现代民族学家更强调“民族”对它自身的意识，强调文化对民族的积淀作用，⁵²⁴如果拿这些标准去衡量它们，它们就更不是民族了，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作为“民族”的一种共同体，即使是在与古罗马帝国同时、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日耳曼人那里，情形也仍然如此。日耳曼人尚且不以为自己是“民族”，⁵²⁵而在他们之前那些早已消失在史前茫茫烟霾之中、跌落在攀登文明的悬崖之下的更古老人群，⁵²⁶当然就更不会有民族的意识。

“民族”的概念形成于文明之光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时。有意思的是，“民族”这个词的西文形式（*nation*）所包含的意思除我们所理解的“民族”之外，还可以指一

⁵²² 海斯、穆恩和卫兰：《世界史》上册，三联书店 1974 年版，第 21 页。

⁵²³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卷二，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94 页。

⁵²⁴ “民族这个概念体现着主观态度与客观政治意愿环境的结合，这是一种永远变化着的结合，其形式对每一历史事例都是独一无二的。”彼得·奥尔特：《民族主义》（*Peter Alter, Nationalism*），1989 年，第 16 页。民族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同族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见过他们，甚至不可能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一种想象中的交流。”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中的群体：论民族的起源与扩散》（*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第 1983 年，第 15 页。

⁵²⁵ 参见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

⁵²⁶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

个巨大的独立的地域，在这个地域内居住着许多有不同民族属性的人；它也可以指部落或部落联盟，比如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等。⁵²⁷nation的词源是拉丁文natio一词，它既带有地域、又带有部落的暗指。罗马的疆界越大，它就越要和更多的“异族”发生正面冲突，而这些异族在罗马人眼里又都是“蛮族”，因此他们与罗马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明”与“野蛮”冲突的性质。所以严格地说“民族问题”更关系到“文明”与“野蛮”的差异，这是古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最大的特点。在“文明”与“野蛮”各自的内部，民族问题并不那么显眼：在“文明”的罗马，被征服“民族”沦为奴隶，他们与罗马的矛盾成了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蛮族”方面，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西徐亚人之间更无一致可言，况且作为史前的人群，他们各自都还离“民族”很远，最多也只是一些比“民族”松散得多、尚未产生相同认同感的群体，可以把他们叫作“族群”。族群内部尽管有些共同特征，但人们以部落为单位，部落是认同的对象，也是效忠的对象。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过部落间的许多交融，以及这些部落和其他族群间的复杂交混，才形成了今天欧洲的各个“民族”。（在此应该提醒一下：nation本来就有“部落”的意思。）

比罗马更早的希腊其情况也多少相似。在希腊城邦时期，城邦的差异是主要的差异，城邦的认同是主要的认同。城邦以部落为基础，希腊人在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时候，只是在部落之上安一个“城邦”。城邦间的分歧使人们很难把希腊人看成是一个“民族”，但“希腊民族”的概念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整个希腊共同对抗非希腊世界时才显现出来，这与后来罗马对抗“蛮族”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事实上，马其顿对希腊入侵并最终扩张为一个庞大的“希腊世界”，几乎就是一次“蛮族入侵”。

总之，在古典时代，“民族”并没有和“族群”、“部落”等完全分开；即使那时有“民族”这个概念，它主要也是将“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民族”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那时是十分模糊的。

第三节 中古时期的“民族”

公元5世纪，“蛮族”大举南下，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各部落如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伦巴德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如潮水般涌下来，分割占据了原西罗马帝国各地，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与此同时，匈奴人、斯拉夫人、保加人等等也向东罗马帝国边境压下来，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在黑海和巴尔干之间建立了许多国家。

蛮族在入侵过程中相互融合并融合了当地原有的居民，形成后来欧洲各民族的

⁵²⁷ 参见《韦氏大学词典》(Cf. Webster's Ni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马萨诸塞 1984 年版，第 9 版“natio”条；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词海》，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0 年版，“nation”条。

轮廓。在入侵过程中，“蛮族”消灭了古典文明，但“文明”却以基督教的形式传播给“蛮族”。整个过程中有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一是“蛮族”从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迁徙运动，二是基督教徒从南向北、由西向东的传教运动。等这两个运动基本结束时，欧洲已经形成了基督教的大世界，古典时期“文明”与“野蛮”的差别消失了，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已基本拉平。因此，以这种不平衡为基础的古典“民族问题”就不存在了，古典形式的“民族”差异也一同消失。

新社会的基础是领地分封制，按照封建原则，土地从国王开始一级一级往下分，由大贵族到小贵族，最后再到农民。随着土地的分割，行政司法权也被分割了，接受领地的人同时也从高级封建主那里接过领地的管理权，在典型的封建制度下（比如封建早期的法国），领地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封主不能直接插手封臣领地上的事务，而且，封臣的封臣也不再是他的封臣，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建社会是一个按领地分割的社会。

封主对封臣间结成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纽带，在封建关系下，小领主“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下并同意效劳”，大领主“则同意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回报”。⁵²⁸封臣最大的义务是为封主服军役，土地“由国王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军役义务，封臣们在自己的地产上征集受过训练的人，带领他们去打仗。”⁵²⁹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军役义务不一定由封臣自己直接履行，军事贵族到后来也可以变成政治贵族，但有一点是确定不变的，即封臣效忠于封主，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服从封主的权威。违背了这一点，封建关系就被破坏了，领地可以被没收，封主可对其进行讨伐。

有两个问题应该注意：第一，在典型的封建制度下，封臣只效忠于他的直接封主，也就是谁给他土地，他就效忠于谁。这在多数场合使土地的终极来源——作为“国家”的符号的国王，不成为多数领主效忠的对象，“国家”于是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任何领主都可以带领他手下的封臣武装反叛国王，因此对领主而言，“国家”无可无不可。

第二，领地不具备“民族性”，也就是说，接受领地的人可以是任何人，领地也可从任何封主那里接受，而不受“国籍”或“民族”的影响。举例来说：诺曼征服⁵³⁰后，大批英国领地落入法国贵族之手，成为法国人在英国的领地；反过来，在12、

⁵²⁸ 海斯和克拉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Calton J.H.Hayes & Frederick F. Clark,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纽约1966年版，第91、92页。

⁵²⁹ 祖勃里兹基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简史》（Y.Zubritsky, V.Kerov & D.Mitropolsky, *A Short History of Pre-Capitalist Society*），莫斯科，第95页。

⁵³⁰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带领法国贵族争夺英国王位，在英国建立诺曼底王朝，史称“诺曼征服”。

13 世纪，英国国王又拥有大片法国领地。他自己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他在法国的领地，既可以分封给英国人，也可分封给法国人。这种情形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由一个“外国人”来接受某块领地甚至整个“国家”的事，在中世纪欧洲不乏其例。

由以上两点可以知道：如果封建主发生冲突，那么冲突是以领主间的依附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原则高于一切，人们认同于领地，而不认同“国家”或“民族”。

对于广大农奴来说，情况也几乎雷同。农奴被固定在领主的土地上，不可任意走动，从社会归属来说，他们属于某个庄园，一旦他出生在这个庄园，他就永远隶属于这块土地，随着庄园的转手而改换主人。他们的封建义务是属于庄园的，领主是谁并不重要，领主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对农奴来说无所谓，“国家”对农奴来说则是一个遥远的东西，管辖他们的是庄园而不是“国家”。

所以，对中世纪的几乎一切人——领主或农奴来说，“国家”和“民族”概念都很淡薄，在一个分割的封建社会里，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是领地而不是其他。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波西米亚”等等主要的是一些地理概念，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波西米亚人”等等也主要表示他出生于那一块土地上，而很少带有“民族”区分的意义。事实上，中世纪欧洲作为基督教的大世界，一切“国界”都是开放的，自由人可以在基督教世界里自由地来往，并不因为他的“国籍”而受阻。相反，“领地”却未见得对一切人开放，每一块领地都是相对封闭的实体。

不过“民族问题”还是有的，特别是当这个基督教的大世界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人们对“民族”的理解就会突然升温。这种情况发生在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蒙古人入侵东欧中欧、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半岛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清楚地意识到入侵者是“异族”，但这种意识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等等都是“异教徒”，异教信仰使他们与欧洲人有着根本的不同。欧洲人自身虽然也有差别，比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就是这样。在中世纪欧洲，“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异教”与“异族”混为一谈。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基督教是一种普世的宗教而不是民族的宗教，它包容一切信徒而不分其民族。当整个欧洲都包容在基督教大世界里时（尽管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人们对宗教的认同感产生出强烈的亲和性，从而大大地掩盖了“民族”的差别。再加上，中世纪欧洲只使用一种书面语言即拉丁文，这使得民族的属性更加不清楚。与此同时，把社会划分开的是领地而不是国家，冲突发生在领主之间，领主与领地又都不讲民族性——由于这种种因素，中世纪的“民族”和中世纪的社会一样，被封建社会分割得支离破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的，在一个浑浑噩噩的基督教大世界里，一切“民族的”差异几乎都被填平了。

第四节 “民族”与“国家”吻合

迄今为止，“民族”这个概念在欧洲人脑海里都很模糊，原因是“民族”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形的依附实体，因而一直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存在。在欧洲，认同和效忠的对象已经有过许多，它们是氏族，是宗教，是部落，是家庭，是封主，是领地，是教会，是宗教，但始终不是民族。没有人为“民族”而死，没有人为“民族”献身。只是到了近代，情况才发生变化，“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为有形的实体，而它作为清楚的意识也开始在脑海里形成并成为国人共同的效忠对象。近代民族最大的特点是民族与国家的等同，“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必须赖以生存的支柱。这个认识最终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信念（按现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政治与民族的单元应该同一”，⁵³¹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国家与民族同一，国家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

国家与民族同一的过程起源于中世纪后期，当时，欧洲发生了一系列战争，结果造就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比如，西班牙收复失地战争驱逐了阿拉伯人，造就了现代的西班牙民族；英法百年战争划开了英法两个国家，铸造了两个不同的民族。在北欧，人们看到瑞典从丹麦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形成丹麦与瑞典两个民族。在东欧，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同时，俄罗斯与波兰的相互入侵与抵御，又清楚地划分出这两个民族。在形成民族的过程中，王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把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最早的“民族国家”。王权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了专制的权力，成了凌驾于民族之上的“独占的权力”，黑格尔对此十分欣赏，说“这就使国家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中枢。”⁵³²亨廷顿对此也加以肯定，他曾说：“现代化需要推动变化的权威”，在16、17世纪，“专制君主”正是这种权威。⁵³³总之，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家统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清除，国家的发展具备了初步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王权是时代的需要。

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的“民族的”国家的建立，在这个阶段上，国家不再属于个人，它应该属于整个“民族”。“民族”与王权发生对抗，最终推翻专制王权。这以后，阻碍国家发展的最后障碍消除了，国家可以开始全力发展。⁵³⁴为克

⁵³¹ 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牛津1983年版，第1页。

⁵³²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5页。

⁵³³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2页。

⁵³⁴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中详细讨论过。见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章。

服专制王权，欧洲发生过许多革命，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其中的典型，因此许多学者说法国大革命及以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⁵³⁵亨廷顿也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冲突是“君主的冲突”，在它之后则是“民族国家冲突”，⁵³⁶这显然把法国大革命作为民族国家诞生的标志。但事实上，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民族国家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君主必须以最高权威的姿态出现，把“民族”与“国家”强行撮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形成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现代化就不可能发生。请想象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个中世纪的基督教大世界里，整个欧洲的发展水平基本拉平，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很相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大体相同，因此“国家”和“民族”的差异都很狭小。这时，突然有一两个地区先发达起来，它们以“民族”为依托，关上“国”门致力于发展，“民族”的凝聚力突然间加大，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自己与“民族”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先富起来”的解决办法，每一个“民族”都只自己顾自己，而不让其他基督教兄弟们拖住自己的后腿。于是，“民族”间的差异扩大了，“国家”间壁垒树立起来。先发展的“国家”立即对后发展的国家形成压力，让它们感到不发展就难以生存。但要发展就必须调动“民族”的力量，从而必须形成“民族的”国家。因此，近代民族差异实际上是发展的差异，近代民族问题是发展所生成的问题。现代化事实上是以民族与国家为单位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

由于现代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民族间的差异也必然拉大，这使得各“民族”清楚地感觉到彼此间的不同，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近代欧洲各民族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一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宾格勒说“‘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⁵³⁷事实上，在民族意识没有清楚地形成之前，我们很难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形成。民族意识一般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出现，当民族主义用清楚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近代民族才算形成。

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一直是欧洲动荡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在发展

⁵³⁵ “公认的看法是：在现代意义上引起欧洲民族问题的真实推动力，是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见塔依奇和波特主编：《历史上的欧洲民族问题》（Mikulas Teich & Roy Porter e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剑桥 1993 年版，编者序，第 xix 页。

⁵³⁶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Samuel Huntington: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 年夏季卷。

⁵³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98 页。

的不平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民族冲突会始终存在。

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出现了，即新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相继产生，在一些原本不认为存在特定“民族”的地区，也不断形成新的“民族”。这一现象在尼德兰地区表现得很充分，16世纪之前，尼德兰（意为“低地”）只是一个地区的名称，没有人认为那时有特定的民族，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形成过国家。16世纪下半叶，尼德兰北部从西班牙统治下脱离出来，形成荷兰。19世纪，比利时脱离荷兰，卢森堡又脱离比利时，各自成为“民族国家”。到20世纪，比利时的弗莱芒人和瓦隆人又都声称自己是“民族”，有权享受民族自决权。类似尼德兰的情况在欧洲许多地区都出现过，这使得欧洲的“民族”不断增多，比如在1850年代，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马志尼曾经说欧洲只有11个“真正的民族”，然而到1870年，按当代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在欧洲遍地开花，其中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克罗地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乃至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等等，就连撒丁岛这种“迄今为止想不到会出现民族主义的地区”，民族主义也勃然兴起。⁵³⁸“民族”的裂解现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高潮，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1989年以后，东欧也形成民族裂解的现象，导致东欧的民族问题骤然升温，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切。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可以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为摆脱这种地位，“边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地方主义为号召反抗“中心”，而这些条件如果带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就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地方民族主义”。于是，一种新的意识产生了，新的“民族”有可能形成，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则是其奋斗的目标，而整个过程的根本目的，是后发展地区企图改变从属地位，变“边缘”为“中心”。⁵³⁹西方学者对欧洲近代历史上民族裂解的现象十分在意，有些西方学者声称：“是民族主义产生民族，而不是相反。”⁵⁴⁰如果考虑到民族的自我认同过程在近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的。

前面已经说过，近代民族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民族与国家等同，如果用某种概念表达，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同一个民族应当组织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个国家也就应该只包括同一个民族。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

⁵³⁸ 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E.J.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剑桥1990年版，第106页。

⁵³⁹ 类似的观点已经在国内学者的著述中表达出来，可参见宁骚：“论民族冲突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夏季卷。

⁵⁴⁰ 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55页。

的，随着历史的进展，民族间的混居现象十分普遍，要想在各自民族间清清楚楚地划出一条线，建立纯洁的“民族国家”，在实践中绝对办不到。因此民族主义的这种追求就使民族间的龃龉永远不会消除，并随时可能发展成公开的冲突。

在近代，民族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其后果，发展的需要把欧洲按民族分割开，这是近代民族问题最大的特点。

第五节 期待与展望

曾经对权力与腐败问题作过精辟论述的英国阿克顿勋爵在谈到民族主义时说：“民族属性的目的既不是给人自由也不是使人富庶，它将两者都牺牲给把民族作为国家依托的紧迫需要，其经过过程将打上物质与道德沦丧的印记，结果可以使一种新的发明凌驾于上帝的创造与人类的利益之上。”⁵⁴¹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几百年历史证明，它既有功勋，又有罪责。功勋在于它保证了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罪责在于它造成了长久的动荡不安，既可给本民族造成灾害，也可给其他民族带来苦难。

民族主义推动现代化发展，是因为现代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依托，需要调动它可以调动的可能的资源，而民族正是调动各种资源的方便途径，民族主义则为动员民众提供口实——这个过程在一切现代化国家几乎都得到了证明。但民族主义并不是绝对地有利于现代化，从民族主义出发也可以引申出强烈的仇外情绪，结果是拒斥一切外来文化，封闭自己，使自己沉湎于民族自大狂的迷幻之中。⁵⁴²

就其罪责而言，民族主义的副作用已经被历史表现得很清楚了。欧洲几百年动荡的一大根源是民族主义，多少次震撼欧洲的大战起源于民族主义，就连现在的东欧动荡，也不能不说是迷失了方向的民族主义负面性质在起作用！

但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化过程在欧洲进行到现在，已经出现新的转机。新转机主要表现在西欧，在西欧，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都已经基本完成。人们于是看到：几百年前，当现代化即将起步时，西欧各地几乎都处于同一状态中；现代化起步时，差距开始拉开了，有些国家先走，有些国家后行，民族间的差异越来越清楚，造成总体发展的不平衡。民族间的冲突由此开始，纠纷与隔阂成为西欧近代史上的一大主题。但时至今日，这种不平衡又被平衡的发展相对拉平了，民族的纠纷于是开始平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一体化运动开始了，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欧盟。可以说，从同到不同再回到同，西欧已走完了一个“同一——差异——同

⁵⁴¹ 转引自科恩：《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历史》（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普雷斯頓 1965 年版，第 125 页。

⁵⁴² 国内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可参见孙立平：“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东方》1996 年第 1 期。

一”的循环，以民族对抗为特征的“近代古典”民族主义，到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在东欧，这个循环还没有走完，地区与民族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尤其在一些“帝国型”的国家（多民族、高度集权）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中心”与“边缘”的区别还很明显。可以预测，在这些地区，民族纠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变化反而使东欧变得动荡了，正如学者盖尔纳所说：“继之而起的都是小国，它们缺乏经验，而且一般都比较弱，然而却都具备以前帝国所具有的一切不利因素——它们被附带进去的少数民族所困扰，而那些民族中还包括以前处于主宰地位文化属性的人，这些人对现在这种新的从属地位很不习惯，他们还拥有相同文化的同族兄弟，可以在时机到来时帮助他们抗拒这种从属地位。”⁵⁴³两三百年前在西欧发生的情况，一百多年前在中欧发生的情况，正是今天在东欧许多地区发生的情况，“中心”与“边缘”正在调整位置，动荡仍会有所持续。

民族的积怨是冤冤相报的，如恶性的循环，难以化解，彻底解决欧洲的民族问题，除有利的时代潮流与强大的国际压力外，最主要寄希望于发展差距的缩小、不平等状态的迅速消除，如西欧经几百年发展所做到的那样。19世纪末一位法国学者曾说过这样的话：“民族并不是永存的，民族有其始，也有其终，也许一个欧洲的联邦取代各民族，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情况还不是这样。在当前，民族的存在是一件好事，甚至是必要的事。民族的存在能保障自由，假如世界上只有一部法律、一个主宰，那自由就会丧失了。”⁵⁴⁴

且不论他对自由的说法带有何种理想的色彩，他关于“民族”终将消失、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又不得不继续保留的矛盾之分析，在我们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时，却依旧反映着时代的困惑。

⁵⁴³ 欧内斯特·盖尔纳：“从大搏斗的废墟中升起：市民社会、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Ernest Gellner, "From the Ruins of the Great Contest: Civil Society, Nationalism and Islam"），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92年3月13日，第10页。

⁵⁴⁴ 勒南：《什么是民族？》（E.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巴黎1982年版，第28页。

第四章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

第一节 政治稳定与发展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显得格外重要，稳定大概和发展密切相关，有稳定则有发展，无稳定就无所谓发展。二战后的许多事例似乎都说明了这个推理：在战乱不已、纷争频仍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谈不上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非洲一些国家，在那些政变迭起，民族和部族冲突不断的国家中，经济建设几乎不可能。二战前就开始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国家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土耳其到 20 年代末国内政局稳定后，经济发展才当真起步；而中国直到 1949 年都处在不断的战乱中，结果是在此之前的一切现代化努力都归于失败，因此把发展与稳定连结在一起的看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便是一道公式。

但相反的例子也可举出许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相联。有些地方政治高度稳定，但经济却并不发展，二战后的印度政局是相当稳定的，但它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有些地方政治动荡频繁，但经济发展却也不慢，这方面的例子是南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多多少少都是这样。有些国家政局很稳定，经济形势却不乐观；韩国政坛一贯是吵吵闹闹(至少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是如此)，但它的经济发展却屡现奇迹。泰国政变选出，经济发展却很稳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当然不错，而它的政治局势又出奇地平静。可见，各种类型的例子都可以找到，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些地方，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如何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经济却在石油美元的扶持下惊人地发展——其政局几乎平静如水，几十年来没有一点变化。不少人认为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化必须稳定，要稳定则必须有强大的权威。但亨廷顿对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其实认识得相当清楚，他说：“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一项目标的进展同另一项目标的进展并无必然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促进政治稳定；而在另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严重破坏政治稳定。同样道理，某些形式的政治稳定可以激发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形式的政治稳定又会阻碍经济发展。”⁵⁴⁵可见亨廷顿并不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有固定不变的因果关系。有人把亨廷顿的书解释成为了经济的发展应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其实是一种曲解。

^{*} 本文最初发表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⁵⁴⁵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中文版，第 6 页。

第二节 现代化启动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

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有，是否有规律可循？一个国家总希望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因为政治动荡而使国家蒙受灾难。现代化本身是一种转型，人们总希望转型的过程比较平稳。亨廷顿写《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显然就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他希望探讨稳定与不稳定的种种原因。但亨廷顿没有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随阶段而变化的相互关系，这使得他虽然意识到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却没有能够看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与稳定间存在着一种阶段性的互为因果关系：在某些阶段上，稳定可能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另一些阶段上，政治上的某些变动可能是发展所必需的，至于这种变动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以稳定的方式还是以不稳定的方式），那就要由各种主客观条件来决定了。

有一个问题亨廷顿阐述得很好，就是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必须有强大的国家，必须有权威。对许多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基本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⁵⁴⁶所以亨廷顿指出：没有稳定的权威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强大的、为全体人民一致接受的政治权威，即民族的国家。他提出：“经济增长需要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则植根于纯一的民族共同体。”（第 376 页）“在政治上先进的社会中，对那些比较直接的社会集团的忠诚要从属于并被纳入对国家的忠诚之中。”⁵⁴⁷由此可见，把亨廷顿的理论看作是一种权威主义的理论，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国家的权威不是绝对的，它随现代化的阶段而发生变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历中，人们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站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专制王权。专制王权取代了过去血统的、地域的、分散的权威¹，由此而把国家从战乱引向稳定。所以专制王权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使民族第一次有一个凝聚核心。但这个核心的建立几乎都是在长期的战乱中完成的，为了克服过去分散的权威和排除外来的权威，往往要用很暴烈的手段才能做到。在专制王权建立的过程中出现的不是稳定，而是不稳定，只是在极端的不稳定之后确立了权威，才最后形成了稳定。

稳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这表现为重商主义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不

⁵⁴⁶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8 页。

⁵⁴⁷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33 页。

过在这一次发展和真正的现代化发展——大工业发展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专制王权一般都不会主动推进现代化，相反他们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化是这样发生的：它先借助王权的力量造成了国家的权威，然后用民族的国家取代君主的国家，为现代化发展扫除障碍。在欧洲国家，推翻专制王权的过程往往也是暴烈的。在英国，经过 20 年的革命战争和 20 年的王政复辟，最后用一个巧妙的妥协解决了问题。在法国，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了 25 年之久，最后还是被专制王朝卷土重来。在德国，革命虽然没有那么诚心诚意，但毕竟也是充满了暴力——有时是用对外的战争来替代内部的纷乱。因此在现代化的这个阶段上，不稳定很可能是难免的，理由很简单——当原有的统治者不愿接受现代化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现代化，以维持现有体制的高度稳定；要么出现革命、暴动、造反等等，为现代化扫除障碍，而这当然就意味着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对此其实也有所知，他曾说革命“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⁵⁴⁸。但他没有意识到不稳定也可能是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手段：当社会需要靠革命来推动现代化时，它当然是不稳定的。

对于 20 世纪才开始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来说，情况是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一般都经历过殖民统治，在殖民势力退却后才获得独立；或者在传统体制下生存得太久，结果被弄得羸弱不堪，直到经过激烈的奋斗才重新振作起来。这种独立的过程或重新振作的过程往往充满了暴力或动荡，恰似欧洲国家在形成专制王权时的情况一样。也正如欧洲国家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不稳定之后出现一个国家的权或(专制君主)那样，新独立或新振作的国家也出现了国家的至上权威。但 20 世纪，这种权威不是由君主而往往是由某些政治组织来体现的，那就是政党。亨廷顿说得很精彩：在 20 世纪，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至高无上相当于 17 世纪欧洲国家君主专制的至高无上，二者都是为创建一个民族共同体提供基础，从而为现代化准备条件。”⁵⁴⁹

新国家建立后，它的前途未见得光明，现代化的目标很难说就已经确立了，国家的稳定因此和目标的选定会有很大关系，这就像在欧洲国家专制王权确立后，统治者未必愿意推进现代化一样。

在一个传统势力不太强，或者其实力已经在争取独立的过程及重新振作的过程中被严重削弱的国家，领导权也许会掌握在致力于推进现代化的人手中，这时，国家的高度稳定是必要的，因为稳定能保护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而任何不稳定都会使现代化蒙受损失。这时，追求稳定不仅必须而且合理，而只有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才能同意“稳定就是发展”这样一个命题并且同意亨廷顿关于如何维持稳定的许多

⁵⁴⁸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287、288 页。

⁵⁴⁹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370 页。

见解，比如不要把现代化的期望值定得太高，以免目标的破灭引发民众的不满；⁵⁵⁰不要让经济发展得太快，以免过快的发展速度带来过大的突变刺激；⁵⁵¹不要让民智开发得太早，以免其知识水平超越现实所能容纳的界限；以及现代化的实施应采用费边式战略和闪电式战术相结合，每一次行动只能设定一个相对低度的目标以免激发起过多的反对派，⁵⁵²等等。

但在另一些国家，政权可能不掌握在推动现代化的人手里，传统势力可能很强，现代化的一切努力都受到抵制。殖民主义撤出后留下权力的真空，填补真空的可能是权欲熏天的野心家，他们除了自己的权力外什么都不关心。对殖民主义的憎恨和对民族耻辱的怨愤会引发激烈的排外情绪和偏颇的民族自尊心理，从而对现代化的伴生物乃至现代化本身都恨之入骨。传统并不一定来自传统的统治者，实际上，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在现代世界上，传统的统治者为了延续其统治的合理性，反倒愿意进行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改革，比如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就是如此(在较早进行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中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普鲁士的俾斯麦就是一例)。而领导国家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和发动革命推翻传统制度的新政治精英却可能对传统抱有更深刻的眷恋，他们可能更愿意以传统的民族文化来抵制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以传统色彩的民族主义在饱尝西方侵略之苦的民众中争取更大的支持，从而为新建立的政权提供更充分的合理性。在这种权力已交给“现代”新人但现代化进程却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而被下意识地推迟的国家中，政治稳定是靠不住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仍会很尖锐，迟早要爆发冲突；而且拖延的时间越长(在此种条件下可以有一段相当长的高度稳定时期)，冲突就会越激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和非洲新兴国家中，政治稳定呈现出纷杂的局面。一般来说，领导权若掌握在致力于现代化发展的人手中，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就比较高；而“非现代化因素”(比如传统文化的因素、部族对立的因素、个人权欲的因素等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其政治稳定就始终会是一个问题，即使在一段时期内呈高度稳定状态(由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有高超的统治手腕等等)，其潜在的爆发力也会相当巨大，超稳定的政治局面可能会在一个晚上就全然崩溃。亨廷顿在 60 年代末写作这本书时曾高度赞扬的一些“稳定的”政治结构，后来被证明是不稳定的。亨廷顿的问题在于他未能把现代化分解出阶段来，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上，稳定和不稳定都有其特定的条件，造成稳定和不稳定的原因也不是无规律可循的。

⁵⁵⁰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49~51 页。

⁵⁵¹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54~55 页。

⁵⁵²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374~375，380~382 页。

第三节 现代化推进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所谓“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权威取代分散的、宗教的、集团或地域性的权威。第二应达到“政治职能的区分化”，国家官僚机构的出现便是其集中的表现。第三，“政治现代化涉及整个社会中更多集团的参政”。亨廷顿并且认为，人民的大规模参政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员大区别”。⁵⁵³显然，参政比前两个因素都更重要，亨廷顿相信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权力发展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即：先集中，再扩大，员后分散。

我们已经看到；“权威合理化”指的是权力的集中，这在民族国家建立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职能区分化”的目标按亨廷顿自己的说法，在欧洲大陆发展得很早，专制君主时期就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扩大参政就是打算推进现代化的人掌握政权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对20世纪的新兴国家来说，尽管亨廷顿认为它们同时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任务之艰巨环境之复杂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但事实上，扩大参政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强大的政治权威建立起来后，参政是最复杂的问题。参政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关系到新制度的稳定性。推进现代化的人掌握政权之后，现代化有可能顺利地展开。但现代化会很快造就新的社会集团，形成新的社会要求，新集团新要求迟早需要在政治上反映出来，而如何吸收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集团，便是体制面临的迫切任务。

一个在把权力转移到推进现代化的人手中从而获得宝贵的政治稳定的国家，现在将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在谈论这一点时，必须时刻记住：现代化是一个连续快速变化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迅速的变化。因此当一个阶段结束从而达到平衡与稳定时，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又意味着不平衡不稳定的因素已经随之而来。原有的稳定正在消失，新的稳定是争取的目标。

掌权者如何处理参政问题，于是成了现代化开始后争取维持继续稳定的关键。我们看到在新兴国家中，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局势的分化。南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参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政局一直比较动荡。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但参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政局一直比较稳定。韩国一度动荡得很厉害，焦点正集中在参政问题上。新加坡的参政问题似乎是被冻结的，这样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亨廷顿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很有见地，他认为：制度化是问题的关键，“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⁵⁵⁴，一个新兴国家越早建立起制度化

⁵⁵³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8~39页。

⁵⁵⁴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4页。

的体系，它就越容易保持政治的稳定，因为制度化能够保证把不同社会集团(如新产生的阶级，少数民族集团等等)按既定的程序稳步地吸收到体制之内，以免它们在体系外造成无规则的破坏。亨廷顿对制度化和参政这两个变项的相对发展程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所作的论述非常值得人们注意，他说：参政和制度化两者都处于低水平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尽管这种不稳定也许要到未来才表现出来；制度化高出参政水平的社会是稳定的，因为它有能力吸收日益扩大的参政要求；参政水平已超过制度化水平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体系缺乏有效的规程接纳广泛参政的社会力量；参政与制度化两者都处于高水平且已取得平衡的社会是最稳定的，这些政治体系既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又很发达。亨廷顿关于四种组合形式对政治稳定造成的不同后果的论述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如果以世界各国的现实情况来验证这一判断，可以说基本上符合事实。由此，可以知道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应该是不稳定的，因为它的参政超出制度化水平；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应该是稳定的，因为他在战胜入侵者后立即致力于制度化建设，而且这种努力在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斯里兰卡自由党在 50 年代动员农村的努力虽然使该党赢得大选并取得了农民的支持，但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结构却把泰米尔少数民族排除于体系之外，为以后出现的种族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印度在参政和制度化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它尽管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但政治上却呈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

应该说明：亨廷顿的“参政”并不是“民主化”的同义词，“参政”指的是对政治事务的关心与参与——社会集团是否想通过政治的途径提出和解决问题？而政治途径既包括投票和选举，也包括骚乱、闹事、政变和革命等等。有序的政治参与给国家带来稳定，无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则一定使国家动荡不已。正因为如此，才有制度化高于参政水平或参政水平高于制度化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说，可见制度化对政治体系而言是多么重要，它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是追求社会稳定的最关键的因素。

总之，亨廷顿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即制度化应先于参政的扩大，而且制度化建设从一开始就应该向有利于参政扩大的方向发展。有些制度不利于参政在未来的扩大，因此会对未来的稳定产生影响；一个灵活而具有充分容纳能力的体系最能保障持续的稳定，向这个方向的制度化努力是最值得提倡的。直到这一个切入点上，亨廷顿才提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民主制度最有利于制度化的参政扩大。

第四节 政治结构需适应社会变化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结构适应社会变化的问题，应变

能力是稳定的先决条件，政治技巧则退居其次。中国的传统结构曾经是一个超稳定体系，在受到现代文明挑战之前存在了几千年，被历史证明有高度的生存力。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农民起义频频发生，但制度的稳定性却不受影响，在几千年的漫长的时间里，“治”多于“乱”，体现出制度的合理性。但在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之后，它却无所适从，一乱逾百年，而且越乱越烈，直到现代化成为全民的共识之后，才从大乱而大治，为现代化创造了必备的环境。究乱之根源，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变能力不够，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才逐渐取得对现代化的认同与承受力。亨廷顿对此的评论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太合理了，以至它对现代社会的应变力几乎等于零。⁵⁵⁵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哪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适时而变。在一个变化为绝对真理的历史阶段上，只有跟上变化，才能驾驭变化。亨廷顿对此也很清楚，他说“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而且把它看作是“暴力和骚乱事件的根源”所在。⁵⁵⁶但他的书没有紧扣住这一论题，让人们认识不适时而变将会导致多么大的危险；相反他在政治技巧方面做了太多的文章，让人们误以为稳定便是目标，为此可以牺牲一切。达对一本享有盛誉的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尽管他对于稳定的技术性因素的确阐述了很多卓越的见解。

⁵⁵⁵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85～186页。

⁵⁵⁶ 赛谬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5页。

第五章 “反现代化”现象的理论假设

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是它在主宰社会的走向，即企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它与“现代化”的解决方法刚好相反，是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渡，因此是“反现代化”。“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其实质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代化的实质。如果其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那么暴烈终将产生。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运动，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孕育、生成并扩散、推进的过程。尽管人们在认识现代化这一过程时，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是有所片面的，但不可否认，历史的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这就是现代化的方向。五百年中，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离“传统”社会越来越远，“现代性”则越来越明显。变化的方向是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或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现代化的实质其实是向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过渡，这一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迟早都要被卷入到这一过程中，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新的文明（或新的生存方式）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全球渗透性，它有能力将世界捏合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使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不可抗拒地扩散到全球各地，而原先不可逾越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等等被尽可能地溶缩为最小。也就是说，用一个最广意义上的“世界文明”来融合前此所分别形成的地区文明和族别文明等等，使之带有全球性，也就是共性。以前地区文明、族别文明等所具有的识别性特征只有在融入“世界文明”的共同背景之后才能保持其特殊性并延续下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消亡了，让位于“现代”；然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被保留下来，它融入了“现代”的有机体之中”。由此我们说，现代化意味着逐渐远离传统社会，它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现代化的方向是十分确定的，它是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个全世界都普遍发生的事实，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当然，“现代”的一切是否“好”，是否符合人类生存的最大利益；现代化的走向是否正确，假如它不曾这样走过来是否更好？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极其深刻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终极命运。然而历史的方向已经形成了，我们已无法改变它，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从“传统”到“现代”已无从转变。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它迫使人们接受。

但历史同样也告诉我们：面对现代化的强行推进，很少有不经抗拒就加以接受的。现代

* 本节最初发表于《学术界》2001年第4期，原题目为《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

化意味着形成一种新文明，而对世界上多数已有的文明来说，它却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异质文明，因此抗拒是一种本能。一切文明当遭遇异质文明的侵犯时，拒之于外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文明都有排他性，否则它自己就无法延续。积淀越深厚，排他性也就越强。积淀本身就意味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文明曾经对其他文明进行过有效的抗拒和吞噬，一种文明越古老，它的抗拒和吞噬能力也就越强，因而自信程度就越高，越倾向于对异质文明进行本能的抵抗。因此当现代化以强制的力量向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时，它几乎处处遭遇抵抗。然而，一切抗拒最终都被证明无效，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曾成功地抗拒过现代化的推进。外来入侵者可以被赶走，但入侵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却仿佛更有力地证明：只有接受现代化，才是保存原有文明和原有社会结构的唯一出路。于是，抗拒的努力最终都会被放弃，人们会自动接受现代化，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曾发生过的事。

由此我们知道：在抗拒之后，接受便是唯一的出路。对多数后发型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接受总是被迫的，差别仅在于：经过多长时间的抗拒，以及多大程度的困惑，人们才终于意识到现代化原来是不可抗拒的！自此以后，一个自觉的现代化运动就应该开始了，对这个运动，人们应该抱以共识。

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很容易看到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抗拒”与“接受”间剧烈的冲突，“守旧”与“维新”间生死的搏斗；看到社会动荡与这一冲突紧密相关，而几乎在所有的场合，最终又总是以实行变革告终，而不管这一变革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终于到来。因此，人们总认为冲突始终是在“守旧”与“维新”之间进行的，一方抗拒现代化，另一方则主张接受现代化，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立场，它们间的斗争为现代的政治舞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脚本。但我现在要提出的是：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它有时可以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在非常长的历史时期里，正是它在主宰社会的走向。这是个隐秘的角色，其面目含糊不清：对反对现代化的人而言，它隐没在主张现代化的阵营中；对支持现代化的人而言，它扎根在传统主义的立场上。因之，守成者视之为立新派，维新者视之为守旧派；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却往往又看不出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此要么把它当作温和的守旧立场看待，要么将它视之为不彻底的维新企图。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独立的立场，是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它在现代化的冲击刚刚波及进来时便已经悄悄地出现了，而当顽强抗拒的努力终究无效时，这个立场可以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行之有效。这个立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这种实践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并正在出现；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主导，在另一些地方即使不是主导，也是强大的社会存在。研究者一般将这种现象归之于尚未解决好的“传统”与“现代”之冲突的继续，或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某一中间阶段，但我却不认为它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相反，它是企图把“传统”与“现

代”调和起来的一种解决方法，不过它与“现代化”的解决方法刚好相反，它是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渡，因此是“反现代化”。

“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其实质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代化的实质。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是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其取向是形成世界共性的“现代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过改造被很好地融合进来，成为现代文明的营养与组成部分；那么“反现代化”就恰恰是取一个相反的方向，它试图通过实行“现代化”来维护传统社会，维护其原有的价值核心。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出现一个与现代化十分相似的运动，其表现形式与现代化的表象十分相像，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种种特征。但由于其方向是相反的，它最终不可能接近现代文明所必备的价值体系，并不时会在这一点上引发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冲突，由此波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以致使整个过程反复出现动荡，最终可以造成过程的断裂。

但问题尚不尽如此，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现代化”和“反现代化”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运动在同一过程中出现，使人们很难判断存在着两个不同反现代化的方向。“反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镜相，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当一个物体的运动在镜子里呈现时，其运动的轨迹看起来是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的，但实际上这个方向已经被镜子颠倒了：你抬起左手，镜中抬起的却是右手。“反现代化”之所以是现代化的镜相，正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反转了现代化的走向。

因此在一个被强迫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当人们看到现代化起劲时，人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反现代化”起劲。在很多情况下，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同时起劲，当然也可以一先一后地起劲，而在后一种场合，反现代化往往比现代化更早起劲。

那么反现代化的历史地位如何？应当说，当顽强抗拒的努力全都失败后，反现代化和现代化一样，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且从根植于传统的思想意识之中走出来，这是一种更为方便的选择。反现代化因此减少了对现代化的抗拒阻力，使社会的主导趋势由抗拒转向接受，而且由于作为镜像它与现代化保持着视觉上的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现代化共同完成某种使命，使变革的潮流成为主流。但反现代化终究与现代化相反，它深知其价值取向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置根于基础之上的对立，因此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将在根本处爆发，这是导致过程断裂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因素。反现代化如果不能在过程中逐渐溶入现代化而使镜像和真相合为一体，那么暴烈终将产生，它以镜子的破碎为终结。

“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并存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存在于后发展国家，而且在先发展国家也可能存在过，在一切国家都有可能存在。区别在于：双方各占多大的比重，以及由谁主宰着过程？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会是非常剧烈的，这是动荡的巨大根源。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个案探讨*

现代化研究勃兴以来，人们很快就围绕着现代化的道路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现代化是不是只有“西方的”模式，存不存在“非西方”的其他模式？对这个问题，布莱克在 70 年代就曾说：“对现代化过程的大部分解释都强调西方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在制度遗产方面的差别，并且认为后者在开始出现现代化转变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仍很可能保留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推论不仅可用西方社会的制度适应于现代化的要求，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用其他社会的制度来适应这种要求。较后发展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抛弃自己的制度而一味向西方借用各种制度，而是要评价自己的制度遗产，并且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它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⁵⁵⁷ 这就是说，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有其特色，要认识到这种特色并尊重这种特色。

布莱克的说法固然不错，他指出了“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但问题是：道路之分是否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界，模式不同是否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不少人似乎很愿意这样看，在学术界，对早期现代化理论提出最大挑战的两个重要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其出发点就都是“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之分。⁵⁵⁸

这样一个两分世界的方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亨廷顿在 70 年代末就曾发问：“两个现代社会——其中一个是非西方的现代社会——之间更相似呢？还是两个西方社会——其中一个是非现代的西方社会——之间更相似？”他还说：“两个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会大大超过任何一个非西方社会与一个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⁵⁵⁹ 事实上，在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上，西方国家遵循的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多种模式，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英美法的“自由经济”模式，有德国的

* 本节最初发表于《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原题目为《再论“反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例分析》，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23—137 页。

⁵⁵⁷ 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⁵⁵⁸ 沃勒斯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实际上发展了？在一个层面上答案不难找。我们所使用的惯用语‘已发展’或‘低度发展’国家过去 30 年来已沿用，正是指过去 50 至 300 年来，上面提到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意义上都已‘发展’（或未发展）的国家。一般说来，把西欧的国家加上日本列入‘已发展’国家，把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归为低度发展国家。”这可说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见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许保强、汪辉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6 页。另一方面，依附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阿明也说：“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序，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 页。

⁵⁵⁹ 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4 页。

“统制经济”模式，俄国采用的是政府直接干预的政策等等。这些不同的方式都被详细地研究过，比如特里比尔科克的《欧洲大陆列强的工业化》就是一部实证性很强的专著。⁵⁶⁰ 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方式又并非只在西方国家中沿用，非西方国家也一样使用，界线不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相反，文化与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条件更多地决定着方式之不同。当然人们可以说西方国家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路，但又有多少“非西方”国家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呢？

谈到政治现代化，情况也同样如此。巴林顿·摩尔说几乎所有主要国军爱都经历过某种政治革命：英法美等国经历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最终引导到“西方形式的民主制度”；德意日等国“经过反动的政治形式而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保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俄国、中国等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这是“导向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⁵⁶¹ 尽管我们未见得同意他的观点，比如法西斯主义是否是一种“革命”；但他也并不认为西方只走了一条道路，“革命”的方式不只一种，而且革命这种现象也并非只发生在“西方”或“非西方”国家，这却是明显的。亨廷顿说得更明白，他说西方国家经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现代化方式，即“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他的分类标准相当难懂，但有一点却很明确，即西方国家没有走同一条路。亨廷顿还指出非西方国家也不走同一条路，道路的差别并不以“西方”和“非西方”为界。⁵⁶²

尽管如此，很多人在谈论现代化时，仍轻易地将“西方”和“非西方”对立，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非西方”与“西方”之间有截然不同的道路。这种看法现在颇有市场，有人甚至把道路问题与东、西方的“身份”(identity)等同。然而事实是：虽说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但道路的区分决不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法国、俄国和中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还有很多国家也都走了革命的路），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强调不同的道路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即无论选择什么道路，现代化的方向却是相同的。把道路的不同对立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似乎“西方”的现代化和“非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同的。不同的道路是否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不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无论道路有何种不同，经历有何种差异，现代化的方向应该是一样的，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现代化只有一个方向，即从“传统”走向“现代”，而绝无其他。这样说并不是把

⁵⁶⁰ 特里比尔科克：《欧洲大陆列强的工业化》(Clive Trebilcoc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纽约 1981 年版。国内学者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也已经很有认识，可参见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⁵⁶¹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4—335 页。

⁵⁶²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88 页；以及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比较”全章。

“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是说现代化的指向是明确的。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现代化：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也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转型，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⁵⁶³这样的转型是整体性的，它只可能有一个指向。

如此，对不同道路的过分强调及把它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做截然划分就掩盖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方向？乍看之下这个问题非常奇怪，而且事实上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想到是因为它被“道路问题”掩盖了：“方向不同”和“道路不同”看起来是一回事。但假如我们首先肯定现代化的方向不可改变，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就立刻显现出来：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过不同的方向，那么它们是什么？答案只能有两个：要么我们的前提是错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方向，它可以漫无目标地射向四面八方，也就是说，有多种“现代化”：要么现代化的方向只有一个，不同方向的出现表明现代化出了问题。对这样一个严重的二律背反，我们以前居然就没有看出来？由此，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反现代化”。

“反现代化”在现实中有实例可寻，但必须首先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往往交叉存在，相互纠缠，很难截然分开，因此纯粹的“反现代化”不是随时可见的。事实常常是：“现代化”和“反现代化”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但一段时间中某种倾向更表现为主流色彩，因此就更突出了运动的某一个方向。下面四个案例可以看作是“反现代化”的例子，但由于“反现代化”理论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案例的理解和分析仍需要做很多工作，此处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梗概。

案例一：反宗教改革 “反现代化”并不是“非西方国家”的专利，除少数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外，多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被“触发”的，“反现代化”因此也同样会存在，严格地说，宗教改革发生在西欧国家现代化的酝酿阶段，它是西欧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次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也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推动器。人们现在都承认：民族国家是现代化起步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因此宗教改革在西欧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宗教改革从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开始，到全面改造教会组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致引起政治与社会的变革。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一种新的宗教热情勃然兴起，它否定教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坚称人应该与上帝直接沟通，从而宣告了个人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权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接轨，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精神条件。在政治领域，对教会等级结构的怀疑引导到对政治等级结构的怀疑，政治平等的胚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又

⁵⁶³ 罗荣渠教授基本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造成国家教会的出现，从而为已经集权的世俗政体提供了更强大的权力基础即意识形态权。无论如何，资本主义首先在宗教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天主教会面临亘古未有的危机，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罗马教会第一次感受到解体的危险。天主教一方面试图消灭反对派，因而发动一次次宗教战争；另一方面又做出真诚的努力，从内部改造天主教，这就是“反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教会内的腐败趋势得到遏制，许多人所痛绝的邪恶现象被清除，教会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同时，一种新的宗教热情也随之出现，这是一种对天主教复兴的乐观的信念，同时又是对教会中进发的一种福音主义的衷心的期待。在政治领域，反宗教改革也认可了世俗权力日益坐大的趋势，改革后的天主教也逐步变成一个个国家的宗教，这意味着天主教会不再是民族国家的障碍。从许多方面看，反宗教改革完成了宗教改革所成就的许多工作，但天主教的改革和新教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反向运动的，正如《牛津基督教史》的作者所说：“通常，反宗教改革被看作是从充满希望的和开放的和解主义（类似新教并准备同新教和解的一种宗教精神）转向更具对抗性的一种运动，……在人们对现代欧洲文明的记忆中，伽利略‘地球仍在运转’本质上代表着进步的力量，而罗马则选择与之唱对台戏的做法，这构成了反宗教改革教会长期思想贫乏的原因。因为它表明，反宗教改革教会已堕入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旧宗教体系中。”⁵⁶⁴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天主教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普遍比新教国家更艰难，遭受更多的挫折与障碍，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则必须在经历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大动荡——大革命之后，才实现了现代化的大突破。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在现代化历史上显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案例二：开明专制 18世纪上半叶，欧洲专制制度已面临普遍危机，这标志着现代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国和荷兰已经推翻了专制王权，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北欧国家（如瑞典）也明显出现克服专制的趋势，而法国则正经历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最终将引导法国走向大革命。在启蒙运动的冲击下，曾经为专制主义提供合法性依据的理论——“君权神授”已经崩溃。专制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事情，专制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过去了。这时的欧洲国家，谁先摆脱专制，谁就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先起步，专制主义已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障碍。然而，在中东欧，专制主义却维持下来了，获得了新的生命，这必须归功于所谓的“开明专制”现象。

“开明专制”的本质是维护专制，但开明专制不再宣扬“君权神授”，而改用启蒙思想来装点门面。“开明君主”似乎是科学和理性的保护者，企图用这种形象来为已经失去合理性的专制制度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所有的“开明君主”都声称自己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甚至说自己“论秉性是哲学家，论职责是政治家”。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有很深的交往，把这些思想家称作是自己的“老师”。“开

⁵⁶⁴ 约克·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明君主”按照启蒙思想的启示执行了许多“开明”政策，其中共同的特点是：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业，开办教育，传播知识，提倡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开明专制在行政方面也做了许多改革，目的是提高效率，加强合理性。正如腓特烈二世所说：“治理良好的政府应该有一个体系，其条理性就如同哲学体系一样。”⁵⁶⁵乍看之下，开明专制与西欧正在出现的变化相当合拍，“开明君主”似乎在有计划地推行某种类似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官方政策。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拯救封建制度而不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开明专制的根本目的是巩固专制，在所有实行开明专制的国家（普、奥、俄等国），专制制度都很强大，而其基础正是王权与封建贵族的结盟（不像在西欧国家那样，专制的王权曾经与市民等级——工商集团结成同盟，而共同反对封建贵族）。这样一种同盟只会为垂死的封建制度招魂摇幡，在这种同盟下的“开明专制”，只是为挽救旧制度押下的最后一个法宝而已。所以，当西欧的专制制度已穷途末路，新社会已呼之欲出时，中东欧的开明专制则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佩里·安德森曾说：中东欧专制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农奴制再版”，原因就是专制的君主为贵族的再生（他本人也属于这个阶级）尽了最后的努力。因此，尽管开明专制实行了种种“开明”的政策，但“这些表面上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启蒙时代欧洲绝对主义的东欧样板的性质和地位。因为这些君主政体的基础结构甚至在他们极其辉煌之时，依然是古代的和倒退的。”⁵⁶⁶开明专制的“进步发展”确实与当时欧洲的时代方向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它终究是反方向发展的。普、奥、俄等“开明专制”国家后来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缓慢和曲折的进展，与这种反方向的现代化努力不能说没有关系。

案例三：奥斯曼帝国的自我更新 以上两个例子都来自欧洲，表明在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第三种态度”也是时有所见的。现代化浪潮推进到“非西方”国家时，出于文化上的巨大反差，从“抗拒”到“接受”就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反现代化”的倾向就更有生成的土壤，“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趋向更容易纠缠，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非常强盛的国家，思想、文化都曾相当发达。它曾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16世纪达到了强盛的顶峰。但是在16世纪，欧洲已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与理性开始传播，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而一个新的社会正骚动在时代的母腹之中。然而，奥斯曼却正处于由极盛而衰落的转折之时，更不幸的是，它坚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偏见，认为基督教是未臻成熟的宗教，只领悟了一半的真理；伊斯兰教才是神喻的真正领悟者。因此，它闭

⁵⁶⁵ 加尔顿·哈耶斯、弗里德里克·克拉克：《中世纪与近代早期》（Calton Hayes & Frederick Clark,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纽约1966年版，第422页；斯蒂芬·李：《欧洲史概览 1494—1789》（Stephen Lee,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494—1789*），伦敦1984年版，第259页。

⁵⁶⁶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眼看不到欧洲的变化，而它自己又被内部滋生的黑暗、腐败和因循守旧彻底腐蚀了。欧洲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奥斯曼却越来越落伍，它在一次次对欧洲的战斗中一次次失败，终于面临了灭顶之灾。这时，它不得不途穷思变，于是，它对现代化的“抗拒”不得不转变为某种程度的“接受”，“反现代化”的现象就在这时出现。

不能说奥斯曼没有有识之士，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实行现代化；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思想的主流却是对抗，希望用学习西方来抗拒改造奥斯曼。因此在变革之初涉及的只是皮毛的东西，如服饰、家具、建筑风格等，而稍稍涉及实质性的变革，如建立新军，则无有不失败的，在18世纪有两位君主因为建立新军而被废黜，结果当然是奥斯曼在战争中更大的惨败。

1826年马哈穆德二世用武力消灭了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传统的禁卫军，改革的进程才真正开始，尤其是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花厅御诏》，此后到1878年，是奥斯曼历史上的“坦泽马特”时代，即改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改革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成了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共识。可以说，这是奥斯曼自觉走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时期。

“坦泽马特”改革几乎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经济、行政、司法、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力度还相当大。比如说，《花厅御诏》和后来的法令与宪法都规定了立宪、公民自由、法律平等的许多原则，距离现代国家的标准似乎相当接近。而且，国家致力于发展，努力改造传统的经济，促进工商业。但是整个改革的过程仍然散发着一种陈腐的气息，让人们疑问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哪里？

《花厅御诏》称帝国之所以衰落，原因是人们背离了古兰经，违反了先知的教导，因此必须革除时弊，回到伊斯兰的正确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整个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位高级外交官曾经说：“宗教是我们法律的基础，是我们政府的根本；就连苏丹陛下自己，也并不比我们任何人更能动它一动。”⁵⁶⁷ 我们知道，基督教世界曾因为宗教改革而推进了现代化的启动，伊斯兰世界却因为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其现代化就更显得举步维艰。坚守伊斯兰教不变的法统而实行的改革，是否在方向上出现了自我的抵触？有意思的是，“坦泽马特”后期有一批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自称“新奥斯曼党人”，他们也主张改革，但指责政府的方向不对，说它无视伊斯兰教法，把改革推上了世俗化道路。⁵⁶⁸ 实际上，帝国的改革绝对无意违背伊斯兰教旨，尤其在涉及到制度性的根本问题时更是强调“道统”，比如在法律方面宗教法仍是基础，世俗法仅表现于商法、刑法等等。政治上提出实行“代表制”，但坚称它原本就出自古兰经的古老制度，因此所谓代表是官方指定的，苏丹则集教权与王权于一身，仍是权力的独占者。“新奥斯曼党人”认为如此仍旧方向不对，它们的理想是：要恢复古代伊斯兰的理想社会。

我们不能说“坦泽马特”完全是“反现代化”性质，因为其涉及面广，参与的人很多，各

⁵⁶⁷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110页。

⁵⁶⁸ 罗德里克·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有各自的出发点和归宿。但运动整体却不时表现出很强的“反现代化”倾向，从官方来说，它惟一的目的是保住奥斯曼国家，回归帝国昔日的辉煌。

即便如此，“坦泽马特”仍旧失败了。1878年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发动政变，把奥斯曼重新拉回到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这种政策把奥斯曼一步步引向崩溃、灭亡，直至一个新生的土耳其在奥斯曼的废墟上出现。这以后，民族的土耳其全心全意地拥抱现代化，在与旧时苏丹奥斯曼决裂之后，土耳其才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

案例四：中国的洋务运动 如果说奥斯曼的“坦泽马特”性质比较复杂，中国的洋务运动相对就比较简单了。西方人一般把洋务运动称为“自强运动”，其目的与“坦泽马特”是一样的。但洋务运动的内容却非常单一，就是只学技艺，不见建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卫道士——儒学士绅。它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和进行御外战争中深切感受到中国积弱已久，不学西方便无可生存，于是兴起一个学习西方技术的潮流，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源头。不过，这个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反现代化”的性质。

首先，运动的发起者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他们的世界观是正统儒学的，生存方式体现着士大夫的生活理想。无论从思想源流还是从社会存在上看，他们都不代表任何“新生力量”。他们的政治抱负出自儒家的功名动机，谈不上任何新社会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他们的立身准则，也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回归儒学社会是他们真诚的愿望（至少嘴上是这样说的）。因此，他们的视野是向后的，正如张之洞所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其次，运动的目的是“自强”，是“御夷”，应付“千古未有之奇变”。洋务运动的一切作为无非是想设法对付外来的威胁，以维护万世不变的中国传统社会和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因此，洋务运动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能和发展相关产业上，并不企图（也几乎没有意识到）需要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处理“夷务”，与中国社会并无关联。“御夷”就是为了保住中国的传统社会。因此，费正清曾敏锐地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部世界和内部叛乱的双重威胁所做的反应，就是重新确立或‘中兴’旧的儒家制度，而不是使之现代化。”⁵⁶⁹

所以，运动所完成的也只是购置一些枪炮船舰并随后企图模仿制造，再办一些兵工厂，修筑一些铁路，开挖几个煤、铁矿等等。当然，洋务运动也创建了新军，培养了翻译和技术人才，在后期并认识到要开办一些民用工业，这些都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并非运动的本意。事实上，洋务运动有意识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只涉及表皮、不触动根基的基本战略，早期传播西学的智者，如林则徐、魏源等实际上是把西方的物用制度都介绍进来的，其中包括西方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但洋务运动却把这些“较为完整

⁵⁶⁹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

的早期现代化构想……缩小范围为，练兵、制器”⁵⁷⁰，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洋务运动并不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不能说洋务运动不主张“变革”，但这种变革绝不是“变祖宗之法”，相反，只不过是革除流弊、匡扶“王政”而已。洋务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世事的“变革”，实现了王朝的“中兴”，但这种“中兴”只是“重新肯定了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它希望自己的模式符合古代的黄金时代，没有一点进步的近代观念”；“中兴的理想是僵硬的和谐，而不是充满活力的增长，其眼光局限于古代的儒家模式。”⁵⁷¹ 洋务运动的“退后”价值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它学西学是为了抗西学，学西方是为了恢复中国的传统秩序。罗荣渠说洋务运动是一次“现代化延误”⁵⁷²，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它之所以“延误”，是因为它的“现代化”是反向的，它与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洋务运动毋宁是一次“反现代化”运动。

尽管有上面这些论述，我却要再一次说明：“反现代化”这个命题及对它的讨论仍属于初步探索。我提出“反现代化”这个命题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缓慢发展和过多挫折归咎于保守力量的过分强大，因而对现代化造成了太多的阻碍。现代化的命运似乎完全取决于“保守”和“革新”之间的斗争，取决于它们间的力量对比。但我愿意指出的是：“现代化延误”未必是由保守派一手造成的，“革新”也可以造成同样的效果。“反现代化”常常是由“革新者”发动的，他们相对于纯粹的“守旧派”而言，可以说是“改革派”。“反现代化”正因为有一种模糊不清的特色，因而迄今为止一直是被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数曲折”的位置上来看待的。但“反现代化”确实是一种反向的“现代化”，它的这种性质及其对现代化造成的伤害，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反现代化”又经常是连接绝对的“抗拒”和自觉地“接受”这两种态度的中间状态，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无可奈何地出现了。对这一现实，我们又不加承认。

⁵⁷⁰ 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⁵⁷¹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324页。

⁵⁷²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第六章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近代以前，世界上也曾有过“强国”，但那时的“强国”都是地区性的，只发挥地区的影响，一般不具备世界意义。“世界强国”则是在世界进入一个共同体系即“世界体系”之后才出现的，这个“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现代化潮流在西欧兴起并传播到整个世界的客观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⁵⁷³。很显然，“世界强国”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又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们将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探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第一节 早期重商主义时期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强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的兴盛标志着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葡萄牙在强盛时只有 200 万人口，土地面积不到 9 万平方公里；西班牙稍大，土地面积 50 万平方公里，但是直到 1700 年，也只有 600 万人口。两个小国竟可在近代刚开始的时候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还是有必然因素的，原因在制度方面：葡、西两国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又最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这两个原因使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抢占先机，先争得一杯羹。

葡、西两国的民族国家在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中形成。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伊比利亚半岛，对当地人进行统治。经过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葡、西两国驱逐了阿拉伯人，解放了国家，同时也统一了国家。在驱敌和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于是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君主专制。与中世纪的分裂状态相比，君主专制标志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历史》2004 年第 6 期。

⁵⁷³ 这里仅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强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未包括苏联。苏联建国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体制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些使苏联在 20 世纪能够成为“世界强国”。

着国家的统一，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尽管在这个时候君主以国家化身的身份出现，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但民族国家的形成仍然是关键的一步。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刻，谁先建立民族国家，谁就先发展。葡、西两国在这方面抢先一步，也就抢占了近代早期的发展机遇。

统一的王国政府推行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把“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了，早期“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在政府支持下，葡、西两国发起“地理大发现”，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地理大发现”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而达到高潮，这样，葡、西两国就成为近代以来最早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同时也具备了从“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能力。在“地理大发现”中，葡、西两国掠夺殖民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大帝国：葡萄牙人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西班牙人则从美洲的贵金属开采中牟取巨利，据估计，1503—1660年间，西班牙获取黄金200吨，白银1.86万吨⁵⁷⁴。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从美洲流入的金银使欧洲的黄金总量增加5%，白银总量几乎增加50%，从而引发了“价格革命”⁵⁷⁵。两个小国从“发现世界”中获取巨大利益，而“发现”世界同时也引起争夺世界。1493年，在教皇的主持下，葡、西两国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该线以东属葡萄牙，以西属西班牙，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开始。

财富、领地、世界霸权给葡、西两国带来了“领袖地位”，西欧各国无不以其为项背。西班牙更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西方“霸主”：在1516—1556年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西班牙不仅占有美洲殖民地，而且据有意大利一部分、奥地利及其属地、尼德兰地区(今天的荷、比、卢)，一度还占有葡萄牙，其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各国。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国家称霸的努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近代国际关系可以从反西班牙的斗争算起。

关于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人们可以提出许多动因。例如，文艺复兴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科学与理性正在传播，这是“地理大发现”的知识基础；城市和商业已经发展，盈利的动机正在积聚，这使人们想去海上冒险；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享乐主义”形成风气，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这些动机都是存在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海外活动，也不可能把重商主义付诸实践；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没有国家的参与就没有重商主义，没有国家的动机就不存在葡、西两国的早期崛起。

葡、西两国的强盛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随后便衰落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

⁵⁷⁴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⁵⁷⁵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1页。

张。以西班牙为例：为维护霸权，从查理五世登位起(1519年)，西班牙连续打了140年的仗，直至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认输为止。连年的战争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王朝政府在1557、1575、1596、1607、1627和1647年6次宣布破产。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1566—1654年，为镇压荷兰的起义西班牙花费了2.18亿达卡，而它从西印度群岛搜刮的总财富却只有1.21亿，的确得不偿失！⁵⁷⁶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有中国学者说：西班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扩张”⁵⁷⁷，这句话一针见血。葡、西两国所体现的早期资本主义非常不彻底，还只是刚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葡、西两国的贵族其实是旧的封建军事领地贵族，他们的“重商主义”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用纯粹的暴力去抢劫金银——只是在积聚金银这一点上，他们是“重商主义者”！国家的注意力也不在发展商业方面，对生产性活动就更不在意，有这么一件荒唐的事：西班牙政府在很长时间里给“羊主团”（养羊业行会）保留特权，让羊可以任意吃庄稼，农业由此荒芜，长期停留在极低的生产水平上⁵⁷⁸。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挡了葡、西两国发展的趋势，终于使它们过早停滞，很快就被别国超越。

第二节 鼎盛重商主义时期

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是荷兰(尼德兰)，这是个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战争中兴起的国家。

荷兰地处欧洲西北角，当葡、西两国逐渐衰落时，西北欧涌现出几个新兴民族国家，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荷兰。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正在向西北方向转移，因此西北欧取代西南欧称雄欧洲，便有其经济基础。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1550—1650年这段时间是“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的大好时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⁵⁷⁹。这句话含义深刻，因为它表明：如果葡、西两国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扩张”的结果，那么西北欧诸国的勃兴则意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是从西北欧开始的，作为一个制度，“资本主义”在荷、法、英三国开先河。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荷兰的兴起，就知其意义所在了。

荷兰也是个小国，实际上比葡萄牙还要小。但荷兰却是个商人国家，17世纪有一半人住在城市，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商业。当欧洲经济中心北移时，荷兰成了面对大西洋的商品集散地，1560年前后，它有1800多艘海船，这已是地中海商业中心威尼斯100年前在它

⁵⁷⁶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⁵⁷⁷ 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见小标题。

⁵⁷⁸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章。

⁵⁷⁹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159页。

鼎盛时拥有船数的 6 倍之多；40 年后，荷兰的商船超过了 1 万艘——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

沿荷兰海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荷兰商船驶往世界各地，几乎垄断了全球贸易，这使它在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时，一下就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荷兰人成了“海上马车夫”，17 世纪也变成“荷兰的世纪”。荷兰的世纪是商业的世纪，这是我们理解荷兰崛起的关键。

荷兰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荷兰创造了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簿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荷兰人使用了一整套现代手段规范金融业务，尤其是由政府出面提供担保，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银行”这种现代的金融机构，从而为借贷、存款等提供了高度保障。由于把借贷率从 16 世纪初的 20%—30% 降到 17 世纪的 3% 甚至更少，荷兰就能够把全欧洲的资本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构成荷兰商业的金融基础。荷兰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一个“富国”，它虽小，却成为新、旧两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的经验说明金融的重要性，后起的强国，如英、美、日等无不仿效。

在政治方面，荷兰也创造了一种新制度。荷兰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国家，它一直在各国君主间互相转让，是异国君主的附属地。16 世纪初，荷兰接受西班牙的统治，而西班牙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它把荷兰当作钱袋，无情榨取，终于把荷兰逼上了造反的路。1566 年荷兰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战争打了 40 多年，结果以建立“联省共和国”告终，荷兰取得独立地位。荷兰的经历再一次说明民族国家对现代化发展是何等重要：没有国家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反西战争中，荷兰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即“共和国”：七个省协商推举共同的元首（即执政）负责联省行政，各省则高度自治，管理内部事务。荷兰的独立与联省制使荷兰成为一个有效的国家，正是在这个国家的保护下，荷兰走上了强国之路。因此经济史学家诺斯和托马斯说：“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⁵⁸⁰ 荷兰之取代葡、西，是商人共和国取代受重商主义影响的“君主加贵族”，封建的残余被铲除了。因此，尽管荷兰也处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这却是一个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

荷兰的强盛维持了约一个世纪，然后就衰落了，过度扩张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荷兰太小，经不起其他国家的竞争。起初它还吸取葡萄牙的教训，尽量不直接占领殖民地；但后来它发现要保护它的商业垄断地位就不得不占领土地，东印度公司总督安东尼奥·范迪

⁵⁸⁰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5 页。

门说：“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⁵⁸¹。如此一来，它便卷入与欧洲各国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而这是一个小国所无力承担的。

但荷兰落伍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其制度创新精神迅速消退，它一直停留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没有再向前跨一步。这一步后来被英、法两国跨出了，因而也就被它们所取代。英、法两国本来就比荷兰国土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一旦荷兰在制度方面失去更新的活力，被超越便是注定的。17世纪下半叶，英国通过3次战争打败荷兰，剥夺了荷兰的贸易垄断权。18世纪末，拿破仑法国消灭了联省共和国。虽说在1815年荷兰复国，但这时它已经无足轻重了。英、法间的争夺已成为“强国”关系的主题。

第三节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英、法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荷兰好，只要时机成熟，就更能发挥世界作用。

英、法的崛起也是从民族国家开始的。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1485年英国建立都铎王朝，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专制王权确立的界石。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稳定，国家太平，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欧洲大国。英国的海上力量就是在这时形成的，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式宣告西班牙的没落和英国的崛起。此后，英国连续向海外扩张，英帝国也逐渐形成了。

与此同时，法国也努力建立民族国家，但它的过程要曲折得多，挫折也更大。王权和贵族长期相持，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时王权才占上风。但波旁王朝建立后，法国的局势并未稳定下来，大贵族继续动乱，并勾结外敌入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一步加强王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结果，到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年)，法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当时欧洲的顶点，路易十四自诩“朕即国家”，把国王与国家等同为一体。他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把全国置于他一人控制之下。由此，国王成了国家的代表，反国王也就是反国家！法国依靠这个专制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也为日后的挫折埋下伏笔。

统一国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专制王朝统治下，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欧陆霸主。两国王权都推行重商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两国早期的强盛中，“民族国家加重商主义”的公式依然有效。但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都向前发展了一步，都从早期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生产，这就在重商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晚期重商主义认为：积累金银的关键是多生产，多生产才能少买多卖，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赚取金银。出于这种考虑，国家大力鼓励生产，奖掖工业，一方面

⁵⁸¹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满足国内的需要，一方面使更多的产品流向国外。为此，两国政府都把发展手工业作为重要的国策，这就为两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写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荷兰正是在这一点上落败的，它一直没有能推进到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从而把引导世界潮流的地位拱手让给了英、法。

不过英、法后来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当法国在不断强化专制体制的时候，英国却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结果把专制制度推翻了、英国的革命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继续前进。1688年，英国再次爆发革命，称“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确立了议会的统治，王权逐渐虚设，成了立宪君主。“民选”的代表通过议会治理国家，并掌管国家的财政。通过这样一个改造，英国政府似乎变成了一个公司董事会，有产者管理国家，执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财产权和政权相互吻合，不再脱节，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专制国王不复存在，国家被交到“民族”手中，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创新，英国从此就走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有西方学者说：英国“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⁵⁸²，从这个角度理解英国的崛起，就能懂得其中的历史意义。

“光荣革命”后，英国全面接收荷兰的遗产：银行、证券、信贷、流通、资本市场、股份公司、保险业务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手段都在英国建立并完善起来。不久，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时，英国又顶替荷兰，控制了大部分海上通道，通过发展贸易，特别是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殖民活动也在此时进入高峰，英国在全世界发展殖民地，构筑“第一帝国”的基础。国内手工业蓬勃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以毛纺织业为支柱的对外贸易与日俱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技术革新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让一切人都可以去努力追求财富。总之，在18世纪，英国已存在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由英国发动工业革命，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但法国也在发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形成重商主义的高峰，专制制度竭尽全力发展工商业，其执行者就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这个时期，法国修筑道路，疏通河道，鼓励商业，设立工场。柯尔伯曾经说：“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则是他的后备军。”⁵⁸³可见政府的重商主义精神之坚定。为发展外贸，法国向全世界伸出触角，力图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路易十四时期，法兰西帝国已见雏形，柯尔伯则是帝国的缔造人。

就实力而言，法国并不差。1700年，法国有将近2000万人口，人口数是欧洲各国中最多的(英国只有900万)。法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好，农业一向发达，传统的制造业(如

⁵⁸² 托马斯·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⁵⁸³ 转引自陈晓律：《发展与争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奢侈品、酒、工艺品等)享有盛名。路易十四登位后,政府权力集中,财力雄厚,君主又有能力,励精图治。他亲政后,把陆军从1659年的3万人扩充到1690年的40万人,几乎是当时英、奥、普、俄、荷5国军队的总和。1689年法国海军有主力舰120艘,而英国只有100艘,荷兰是66艘⁵⁸⁴。凭借这支军队及法国的国力,路易十四要与英国争雄,并非不能成功。

但法国的的问题出在制度上。从大的方面说,专制制度已经过时了,它使法国僵化。专制制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虽说在克服封建混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时候有合理性,但统一完成后,就只会伤害国家。比如,路易十四野心太大,他既想争夺海洋,又要称霸大陆,结果四面出击,在亲政54年中打了32年仗,乃至柯尔伯也抱怨说:国王打仗时“从未考虑过,总共有多少钱可以支配”⁵⁸⁵。从1688年到路易十四去世法国一直在打仗,他的继任者又继续打,几乎打了整整一个18世纪。如此穷兵黩武,法国终于穷困潦倒。事实上路易十四留下一屁股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没有还清。

同时,政府的收入越来越糟。收入靠官僚队伍去征集,但这支队伍不仅耗资巨大,而且没有效率,并且贪污。法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特权阶层不纳税,这就使许多人通过买官去逃税。王朝卖官本是想增加收入,现在却进入一个怪圈:有钱人买官而不纳税,纳税人无钱而纳不起税。这样做起初的出发点是摆脱议会的控制,避免像英国那样由议会来控制财政权,从而大大提升国王的专制权力。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特权问题突出,国家大受其害。专制政府及其支柱特权阶层已明显与国家利益相对立,不推翻专制政权,法国就不能继续发展。

由此可知,18世纪的英、法争霸以英国胜利告终,是有其原因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及造成这种力量的制度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688—1815年间英、法进行了7次较量,其中除第6次(法国帮助美国独立那一次)法国略占上风外,英国都取得决定性胜利。较量在两国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在英国,它扩大了需求,刺激了经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法国,它增加了负担,毁坏了财政,激化了社会冲突,进一步挖掉专制制度的墙脚。在争霸过程中,英国从晚期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时代,登上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台阶,它自己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旗手。1848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煤是2/3,棉布达1/2以上,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其密度到20世纪末都未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赶上。它的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0%—25%,但它的国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的0.2%,人口还不到2000万⁵⁸⁶。工业革命带给英国的,是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全世界,这是以前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英国以

⁵⁸⁴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18页。

⁵⁸⁵ 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⁵⁸⁶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

惟一的世界霸主的面目出现了。至此，我们看到：英国“强国”之路连续向前走了两步：一步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再一步从重商主义走进了工业时代。英国引领潮流的能力已经超常发挥了，这使一个小国长期地独占霸权。

有意思的是，法国也走出了这两步，但总是落在英国后面。18世纪末，法国爆发的大革命对专制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是法国全面现代化的开始。以后近百年时间中，经过几次革命，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动荡，到19世纪末，法国终于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确立了共和制。法国的政治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给人类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但政治的长期动荡也给法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法国被迫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工业革命，其启动已比英国晚，速度更比英国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让法国不堪重负，使得它在与英国的争夺中倍感艰难。虽说最终法国还是把“双重革命”都完成了，但它终究屈居第二，不得不接受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强国的地位，同时，也建立起仅次于英帝国之后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英国和法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强国，它们的经历说明：工业社会的出现需要有合适的制度保障；只有先创造制度保障，才能走进工业化的轨道。在创造制度保障的过程中，英、法两国道路不同，各自都有巨大的创建。在创新过程中它们各自引领了潮流，留下宝贵的遗产，这是它们领先工业世界的秘诀。

第四节 危险的选择：军国主义道路

相对英、法而言，德国、日本是后起的国家，作为后起国家，它们尝试走不同的路，希望能超越英、法。

德国一直非常落后，原因在于它始终未能建成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的卫护，德意志的现代化也迟迟不能起步。1848年，德意志曾发生革命，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德国，同时也要推翻各邦国的专制主义。革命的失败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领导权落到了旧统治集团手里，这使得德国的发展道路与英、法完全不同。领导德国现代化的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它通过对外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时间是1870年。德国的统一姗姗来迟，可是它一旦来临，就表现出无比的威力，再一次证明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德帝国建立后飞速实行工业化，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完成了英国近百年才得到的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它已是工业强国了：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只占世界总额的13%，英国占32%；到1900年，德国赶了上来，占17%，英国是20%；1913年，德国已超过英国，占16%，英国却只是14%⁵⁸⁷！

德国的成功归功于它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迄至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正统”是自

⁵⁸⁷ 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0年版，第22页。

由放任，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它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看不见的手”是最有力的手。但德国却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在国家指导下，经济能更顺利发展。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实践中的执行者是俾斯麦。德国的做法在世界工业化史上是重大的创新，国家的力量被重新调动，不再只充当经济发展的“守夜人”。在国家的指导下，人力、物力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经济活动的目的性也更强。工业化成了国家的目标，也是国家的行为。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帝国政府有意识地指导重工业发展，使得电气、化工、铁路、钢铁等产业迅速跃居世界前列，由此，德帝国超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直接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德国的榜样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越到后来，人们越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工业化，20 世纪的世界更是如此。

但在容克集团的指导下，经济发展却指向了军事目标，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德意志帝国不是建立在铁和血上，而是建立在钢和煤上”⁵⁸⁸。德国的问题出在“领导者的错位”上，历史把一个旧普鲁士统治集团放到了德国现代化的领导地位上，这个集团把德国引向军国主义，用军事力量直接挑战世界霸权。从立国之时起，德国的扩张意图就十分明显。德意志民族长期受压迫，一旦国家发展，民族主义就突然膨胀，爆发成不加掩饰的沙文主义。德国资产者抱怨在未能投入竞争之前，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了，因此竭力要求向外扩张，夺取德国应有的份额。容克统治者则把扩张看作是自己统治之合法性所在，不扩张，就难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二世开始执行“世界政策”，即所谓“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⁵⁸⁹，也就是抢夺殖民地，争夺欧洲霸权。这就把德国推到了几乎所有大国的对立面，德国未免有些自不量力：1913 年，德国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 16%，英、法、俄三国加起来占 26%，美国则占 36%⁵⁹⁰，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就必败无疑。但一战的失败并没有使德国吸取教训，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党夺权，继续执行旧帝国政策，其野心更大，手段更狠毒。纳粹夺权是德国的灾难，同时也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世界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打败纳粹德国。二战后，德国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它用武力争夺世界霸权的做法也彻底失败了。

与德国相似的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和德国十分相像，它同样用国家的力量推动工业化，也同样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追求工业化，和德国一样，日本的工业化也是在政府蓄意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速度相当快。

⁵⁸⁸ J. N.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J.N.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伦敦 1919 年版，第 40 页。

⁵⁸⁹ 转引自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0 页。

⁵⁹⁰ 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0 年版，第 22 页。

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它大约用了50年时间就跨越了两次工业革命，只相当英国所用时间的1/3。50年中，它的工业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大约12%增加到42%（第三产业是38%，第一产业即农业则降到20%左右）⁵⁹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基本是一个工业国，虽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距离，却是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摆脱了西方欺凌、顺利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成功给许多非西方国家以很大鼓舞，当时中国就有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试图寻找救国的方略。

但日本自己却走错了方向。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竭力模仿西方，企图一举而成“大国”。1871—1873年是其关键时期，当时明治政府派出强大的代表团出访欧洲，成员中有多位决策人物。代表团回国后提出的结论是向德国学习，这成为日本后来的国策，其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家“太先进”，不符合日本的国情；德国的情况最接近日本，因此是学习的好榜样⁵⁹²。此后几十年，日本走德国道路，不仅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建设上仿效德国，而且国势初振就学德国对外扩张，要为日本争“大国”地位。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征韩”；接着与中国开战，抢走台湾；再与俄国开战，争夺中国东三省。几次得手后它就更加狂妄，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其实，日本直到1938年也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英国是9%，法国是5%，美国是32%，苏联是19%）⁵⁹³，以这样的力量对抗世界，当然如以卵击石。

日本之所以走德国道路，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明治维新后它的社会结构和德国非常相像，出现的问题也和德国几乎一样：旧的统治集团控制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因此出现“领导者的错位”。明治维新是在旧统治集团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集团是武士集团。武士集团长期把持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民众的力量被压制了，新的社会集团则天生残缺。正是这种情况让明治政府坚信日本与德国国情相近，因此应该走德国的路。

总结上述，德国和日本的“强国”模式是这样的：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高速发展经济，创造了一种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称之为“统制主义”模式。统制主义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与修正，它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追求快速工业化。然而，德、日两国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旧统治力量的优势，旧统治集团领导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缺失了西方诸国所经历的自由主义洗礼。统制主义的经济模式加上非自由主义的社会与国家，使德国和日本之“强国”特征体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

⁵⁹¹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508页。

⁵⁹²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410页。

⁵⁹³ 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这个变种因其强烈的侵略性而最终被消灭。尽管如此，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成功的因素，却仍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第五节 当代资本主义集大成

超越英、法的其实是美国，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1776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奋起反抗英国的统治，通过战争，取得了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于“新大陆”，是新大陆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没有“旧大陆”的传统包袱，一张白纸，可以任意作画。第二，它又受英国政治传统的强烈影响。当时英国已摆脱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了议会的最高主权，所以在作画时其实有一个摹本，这就是英国议会制。第三，在这样两个基础上，新国家创造了新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这些原则是：平等、自由、民主、法制，以及权力的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如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在那时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创举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在立国之初，已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了。

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人们常常强调它的分权，强调它的联邦制度和它高度的地方自治。人们会说：这些是美国的特殊性，特殊性使美国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但人们常常忘记：美国国父们创造的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正如美国官方的说法所言：“他们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政府组织——在一定界限和明文规定的范围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政府”⁵⁹⁴。美国国家政权首先是强大而统一的，没有这个基础，美国不可能富强；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说，美国并不特殊。美国的创新在于：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府，它分权但不分裂，制衡却不抗衡；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下，地方政府又高度自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却不可胡作非为——其中的秘诀是：国家的法治。如今，我们常会把这种状态看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标准状态，但究其所以，却是美国的创造。美国之幸运就在于它在英国统治下已经搭车行驶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甚至和英国一同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它缺少的只是一个国家，即美利坚民族国家。独立战争恰恰给它带来了这个国家，而一旦有了这个国家，它就可以向工业社会挺进了。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独立之前，它一直处在英帝国重商主义的庞大体系中，是英国世界商业网的主要支撑点之一。它既为英国提供原料，又为母国提供市场，据估计：18世纪时，美洲有80%的进口来自英国，30%的出口去往英国，其他出口则大部分去往加勒比的英国殖民地。⁵⁹⁵ 晚期重商主义把美洲殖民地放在工业社会的门口，一旦摆脱英国的

⁵⁹⁴ 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美国历史简介》，香港1982年版，第48页。

⁵⁹⁵ 参阅R. C. 西蒙斯：《美国早期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0、262页。

控制，它自己的工业革命就随时可以发生。事实上，由于种种天然的联系，英国的技术发明很快就能传到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几乎是紧跟在英国之后。19世纪上半叶，西进运动更为工业革命打了强心针，从这时起，工业革命就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世纪的两件大事特别有意义，其一是西进运动，其二是南北战争。西进运动造成两大后果，一是个人价值观的勃兴。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只要个人奋斗，就能获得成功。二是一个庞大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美洲大陆。这两大后果，一是无形的，一是有形的，都为缔造一个“大国”准备了条件。南北战争除了人们常说的解放黑奴外，对国家而言有两点更重要：一是保全了国家的统一；二是工业的北方战胜农业的南方，国家从此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飞奔。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约翰·杜威说：“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总之，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站在“世界强国”的大门口了。

但美国最终超越英、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则归功于一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资本主义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美国的国家发展(包括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在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影响下进行的，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改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使美国成了新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为摆脱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方向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操纵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拯救市场，拯救在市场条件下继续维持的“自由”资本主义，惟一的办法居然是“中止市场”！但“中止市场”又不是“消灭”市场，市场的一切形式都必须保留下来，买卖的过程也应该一如既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控制”市场的权力，而执行这种权力的恰恰是国家⁵⁹⁶！于是，国家和市场就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都得以发挥，混乱的市场竞争中加进了“计划”的因素，它改变了迄今为止自由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却又并非使用“统制主义”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的集大成，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新模式使美国克服了自英国创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后一直存在的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从而成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

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登上了世界最强国的地位，欧洲列强都受到重创，只有美国大获其益。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约是

⁵⁹⁶ 可参阅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54页。

苏联的3倍；1948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2倍多，苏联的6倍⁵⁹⁷。“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使它控制了世界的金融；此后，美国经济一直独占世界鳌头，虽后来受日本和西欧的挑战，以及苏联的竞争，至今仍然保持优势。高速发展得益于它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它始终保持的创造活力。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水平始终居于世界前列，它对高科技的敏感使它的生产力水平不断突飞猛进，在旧技术条件下眼看已达到极限的时候却又能再上一层楼，因此能一再摆脱其他国家的追赶——80年代出现的“信息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显然，美国的“强国”地位置身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然而，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在二战后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独占世界。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更肆无忌惮，美国以“一强独大”的身份强权控制世界舞台，其所作所为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与不满。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独大局面会永久维持下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这一点。入侵伊拉克是它单边主义的大暴露，同时也是它无力独霸世界的清楚表现。在一个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多极化”特征也愈益明显的世界，国际协商和合作是惟一的出路。和在它之前的其他“世界强国”一样，美国的“强国”地位也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作为。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了以上“世界强国”兴替的过程后，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在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还在延续。从它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时间，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否则就理解不了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也理解不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崛起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我们习惯于把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形态，这是一种误解，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来看待资本主义就很难理解许多历史现象，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相互更替的过程。

第二，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强国”问题，我们发现“世界强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相连关系，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影响着“强国”的沉浮，反过来说，“强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国之“起”，一国之“落”，一国之“兴”，一国之“衰”，都有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体现着某种隐含的“必然性”。但这不是说只要是历史发生的就一定是“必然”的，绝对的“必然”无异于宿命。国家的兴盛有它的自身因素，

⁵⁹⁷ 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它的活力，它的奋进，它的积累，它的信念，都使一个国家有可能积聚起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中获取先发之势。在资本主义某一个发展阶段上，凡能够抓住潮流、逐波而上者，就常常抢占发展的优势，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头羊。能动性 & 创造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掌握引导着国家的运行方向。而所谓“强国”地位，实际上就是引领潮流的能力。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强国”引领了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些国家自身于是也就体现了这些时代的潮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国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一旦这些国家丧失引领潮流的能力，它们也就不再是“世界强国”。

第三，资本主义既然是阶段性发展的，那么新阶段与旧阶段之间就存在着承接关系，新阶段是旧阶段的接替者，新旧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变更。新的阶段于是既保留旧阶段的基本特征，又必须对旧阶段做出实质性的变更，这就是创新。新的领头人于是从旧阶段中脱胎而出，从原先跟进的地位走到了领头的地位。地位变换的根本条件是它对旧阶段做出了实质性的突破，用新的创造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创新的内容恰恰是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因此，新的“强国”体现了新阶段的新特点；反过来，资本主义新阶段又因为新“强国”的出现而得以形成。于是，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强国，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的创造者：在资本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阶段变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

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 Bagchi, Amiya Kumar e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95.
- Baran, Pau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57.
- Barash, David P. and Webel, Charles P.,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London 2002.
- Brauch, Hans Günter and others eds.,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Re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erlin, 2008.
-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1979.
- Crouzet, Francois, *The Victorian Economy*, New York, 1982.
- Deane, Phyllis & Cole, W. A.,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 ~1959*, Cambridge, 1969.
- Duncan, W. Raymon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76.
- Eccleshall, Robert,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 London, 1986.
- 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Prentice-Hall, 1966.
- Elsenhans, Hartmut,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e Histor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North-South Relations*, New Delhi, 1991.
-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7.
-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83.
- Hajer, 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1995.
- Hartmann, A.V. & Heuser B. eds.,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s i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2001.
- Hayes, Calton & Clark, Frederick,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 New York, 1966.
- Hobsbawm, E.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1990.
- Hopkins, Terence & Wallerstein, Immanuel,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1982.
- Ionescu, Ghita, *Leadership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Statsemanship of Adenauer, De Gualle, Thatcher, Reagan and Gorbachev*, London, 1991.
- Jeong, Ho-Won,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ldershot, 2000.
- Keynes, J.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1919.
- Kohn, Hans,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Kruijer, Gerald J., *Development Through Liberation: Third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 Macmillan,

- 1987.
- Lane, Pe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1978.
- Lee, Stephen,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494—1789*, London, 1984.
-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64.
- Locke, John, *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New York, 1952.
- Marwick, Arthur, *Britain Society since 1945*, London, 1996.
- McClelland, D. C.,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1961.
- Mol, A. J. P., *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 Utrecht, 1995.
-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eacon Press, 1967.
- Presbich, Raul,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1950.
- Preston, P. W., *Developmen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 1996.
- Renan, E, *Qu'est-ce qu'une nation?* Paris, 1982.
- Sharma, Nand K., *Government & Economic Development*, Jaipur, 1996.
- Smith, Dan, *The Atla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2003.
- Tannenbaum, Frank, *Ten Keys to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2.
- Teich, Mikulas & Porter, Roy e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Trebilcock, Cliv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New York, 1981.
-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1978.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1979.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1984.
- Wood, Anthon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 London, 1982.

中文部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 阿尔蒙德、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埃里希·策尔纳：《奥地利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

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安德生：《瑞典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保罗·韦贝尔：《卢森堡大公爵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贝兰斯坦：《莫卧儿统治下的印度帝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出版社，1985年版。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查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

陈令霞、张静芬：《东非三国——缔造民族国家的里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陈晓律：《发展与争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陈祖洲：《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程汉大：《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葡萄牙历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董进泉：《西方文化与宗教裁判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杜威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方幼封、曹珺：《漫漫探索路：拉美一体化的尝试》，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房龙：《荷兰共和国兴衰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弗兰克·哈格特：《现代比利时》，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甘米齐：《宪章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0年版。

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763—1793》（第八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郭应德：《阿拉伯中古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海斯、穆恩和卫兰：《世界史》上册，三联书店1974年版。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

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洪邮生：《加拿大——追寻主权和民族特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三联书店，2005年版。

胡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胡连生、杨玲：《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黄庆华：《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6年出版。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姜忠尽等：《中非——从部落跃向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卡尔·博恩等：《德意志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卡列维·霍尔斯特：《和平与战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克尔伯特·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克里斯托弗·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肯尼斯·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拉尔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李芳、刘沁秋：《印度——在第三条道路上踟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李庆余、周桂银：《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版。

李英男、戴桂菊：《俄罗斯历史之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林德宏编：《经济哲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刘成、马约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刘成：《和平学》，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刘金源等：《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刘笑盈：《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罗伯特·勒纳等：《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罗德里克·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三联书店，1965年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罗肇鸿：《高科技与产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米尔斯基：《第三世界：社会、政权和军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莫里斯·布罗尔：《荷兰史》，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

纳达夫·萨弗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欧曼、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

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钱乘旦、王宇博主编：《换个角度看世界——现代化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秦麟征：《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信息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让·德科拉：《西班牙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中国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塞尔索·富尔塔多：《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出版社，1963年版。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唐昊、彭沛：《巴基斯坦 孟加拉——面对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

特里萨·拉克夫斯卡等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滕藤主编：《海上霸主的今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百年强国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托马斯·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万以诚等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西里尔·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西蒙斯：《美国早期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萧秦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徐文渊：《走向21时期的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杨叙：《丹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姚介厚等：《西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约翰·伍里宁：《芬兰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约克·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张红：《加勒比海英联邦国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钟茂初：《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阐释》，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周穗明：《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